

# 高校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途径

谢振安

(安徽理工大学 党委宣传部,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党的十八大关于党的建设重大战略,高校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具体要求,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从四个方面提出了高校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途径,旨在为普通高校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为提高高校党组织驾驭高校科学发展的能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提供智力支持。

**关键词:**高校;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途径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01-03

## On construction ways of learning, serving and innovative Party organizations

XIE Zhen - an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Party Committee ,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rning, serving and innovative Marxist governing party is a crucial strategy of Party Construction by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o construct learning, serving and innovative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 to further lear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task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important ways of such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four aspects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them with theoretic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and providing intelligent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ir Party organizations' ability to drive the school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to run a satisfactory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earning, serving and innovative Party organizations; construction ways

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高度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这一重大命题提出,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是第一次,对于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履行党的历史使命具有重大意义。高校只有大力推进高校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才能不断提高高校党组织和党员的理论素养、服务意识和创新能力,增强高校党组

织和党员对党的教育方针的执行力,巩固党在高校的领导地位,领导高校牢牢把握人才培养是立校之本、科学研究是强校之路、社会服务是兴校之策、文化传承创新是荣校之魂的办学理念,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研究探索高校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的基本途径,以学习为前提和基础,以服务科学发展、服务广大师生员工为根本目的,以创新为检验学习和服务的标准,层层推进、扎实开展,建立长效机制,对高校建成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收稿日期:2012-12-22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长效机制研究”(AHSK-12D1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谢振安(1963-),男,安徽颍上人,教授,从事高校宣传管理工作。

## 一、建设高校学习型党组织,提高服务和创新的能力

建设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就是要提高服务和创新的能力,带领全校党员不断加强学习,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当前首要政治任务是认真地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大精神,要全面准确深入地学习领会,把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开创高校各项工作的新局面:一是全面把握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成功经验。二是全面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三是全面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四是全面把握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扎实开展工作,以实际行动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样才能真正增强高校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高校要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组织党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教育、科学、文化、法律和管理等知识。坚持和完善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坚持丰富学习内容与创新学习方式方法相结合、学习理论与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相结合、集中教育轮训与健全完善学习制度相结合。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党员经常性学习教育体系,健全学习教育制度,改进学习教育方法,创新学习教育手段,不断提高政治和业务素质。真正使党的十八大精神做到入脑入心,在全校上下努力形成学习的新高潮、凝聚高校科学发展的新共识、推动高校科学发展事业的新进步。

## 二、建设高校服务型党组织,明确学习和创新的根本目的

建设高校服务型党组织,就是要明确学习和创新的根本目的,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广大师生员工服务的理念,根植师生员工,造福师生员工。坚持为基层服务,为广大师生员工服务,始终与广大师生员工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任何时候都把服务广大师生员工放在工作的第一位。注重丰富服务内容,把十八大报告关于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等部署要求融入、落实到为广大师生员工服务中去,全面地保障广大师生员

工各方面权益。完善党员领导干部基层调研、民主接待等制度,使党员干部服务师生员工的渠道畅通,把各种优势资源配置到广大师生员工学习生活工作中去,形成为广大师生员工服务的强大合力。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定期开展结对帮扶、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等活动,为党员学习、工作和生活通过周到细致的服务。切实做好流动党员服务和管理,进一步落实“流动有序、管理有章、永葆先进”的工作要求,对于流动到校外党员,要积极配合做好的教育管理工作,对于流动到本校的党员,要及时编入党的基层组织,参加党的各项活动,同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逐步把流动党员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注重服务效果,建立健全服务广大师生员工的评价机制和指标体系,请广大师生员工对高校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把广大师生员工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高校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服务效果的第一标准,切实提高广大师生员工的满意度。

## 三、建设高校创新型党组织,增强学习和服务的主动性

建设高校创新型党组织,就是要增强学习和服务的主动性,带领全校党员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破解高校科学发展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挑战。落实加强和改进党员队伍教育管理的要求,大胆突破党员教育管理难点,高质量抓好党员发展工作,确保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落实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着力整治“庸懒散贪”等不良风气,以优良党风凝心聚力、带动校风学风。要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落实人才强校战略,落实人才优先发展的要求,牢固树立科学人才观,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完善各项人才政策,建立健全人才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营造干事创业良好环境,把更多的优秀人才集聚到高校科学发展事业中来,完善人才工作管理机制,努力形成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师生员工信任、堪当高校科学发展重任的高素质队伍,重视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的培养选拔,建立健全后备干部选拔、培养制度。

## 四、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促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高校党组织建设

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高校党组织长效机制的建设,一要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制。高校要成立创

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活动领导组,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学校创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活动的领导、组织、检查和督促工作。二要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积极开展“学习标兵”、“服务标兵”、“创新标兵”和党员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三型标兵”的评选和表彰活动。三要建立健全经费投入保障机制。致力于为党员参加学习教育培训提供坚强的物质保障,加强软件和硬件建设。四要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把各基层党委开展创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情况列入全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考核,作为评价各基层党委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成效的重要内容等。

高校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历史性的任务,需要着眼于服务师生员工这一根本任务,不断夯实基层组织、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充分发挥高校学习优势,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和改进高校党建工作,不断增强高校党组织在高级知识分子、大学生和中国未来精英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 参考文献:

- [1] 张雪. 推动高教科学发展 [N]. 光明日报, 2012-12-19 (16).
- [2] 王森泰. 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执政党 [N]. 光明日报, 2013-1-3 (03).
- [3] 吴慕君, 李捷. 努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 [N]. 海南日报, 2012-12-04 (A6).
- [4] 冯刚. 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研究 [M].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 (8).
- [5] 胡真. 高校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2 (11): 19-22.
- [6] 刘云山. 不断深化思想认识 努力把握工作规律 推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向广度深度拓展 [J]. 求是, 2012 (9): 3-9.
- [7] 黄建军. 推进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现实路径 [J]. 高校理论战线, 2012 (6): 35-38.
- [8] 胡刚. 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困境及对策探析 [J]. 理论界, 2012 (2): 25-27

## 文后参考文献表中中国著者汉语拼音名字可否缩写?

问 参考文献表中中国著者汉语拼音名字可以缩写吗?

答 可以。虽然 GB/T 7714—2005 规定,“用汉语拼音书写的中国著者姓名不得缩写”,但是著录实践比较混乱:缩写和不缩写并存,有的将缩写名置于姓之前,有的将双名缩写为1个字母,等等。有些编辑同人曾建议“一律采用缩写”,但因没有标准依据,响应者寥寥。

最近发布的 GB/T 28019—2005《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的 5.1.4 指出:“国际体育比赛等场合人名可以缩写。汉语人名的缩写,姓全写,首字母大写或每个字母

大写,名取每个汉字拼音的首字母,后加小圆点,声调符号可用省略。”参照这一条款的规定,我认为,在著录文后参考文献表这一特殊场合,为了做到简明、统一,也不至于给检索文献带来多少不便,在著录中国著者汉语拼音姓名时,同欧美著者的姓名著录一样,名字可以采用缩写,且缩写字母后的小圆点及声调符号均省略。例如:将“Yáng Wèimín”著录为“Yang W M”或“YANG W M”,但不得著录为“W M Yang”“YANG W”等。

摘自《编辑学报》2012年第3期

# 党内民主制度体系的科学构建

孙功<sup>1</sup>, 颜杰峰<sup>2</sup>

(1. 安徽理工大学 思政理论课教学部,安徽 淮南 232001;2. 中央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应当从完善党员权利保障制度、党代会制度、党委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等方面进行,并使这些制度相互连接,协调联动,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制度体系。

**关键词:**党内民主;制度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04-04

## On the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of inner - Party democratic institutional system

SUN Gong<sup>1</sup>, YAN Jie - feng<sup>2</sup>

(1.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nhui Universit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2. School of Marxism,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ner - Party democracy is the life of the Party. The adherence to democratic centralism, the strengthening of inner - Party democratic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the guidance of people's democratic by inner - Party democratic shall be conducted from the aspects of perfecting the guaranteeing system of Party members' rights, the Party Congress system, the Party Committee system, the Party electoral system and the inner - Party supervision system. Moreover, these systems, via being made inter - connected and inter - active, shall be integrated into one organic institutional system.

**Key words:** inner - Party democracy; institutional system; construction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sup>[1]</sup>十八大报告提“党内民主制度体系”,而不是单纯提“党内民主制度”本身,表明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已由单项制度突破转向制度的整体建构,这为新形势下提高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指明了方向。党内民主的发展要靠制度来保证,而制度应该是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从体系中来设置制度,使之常态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应当从完善党员权利保障制度、党代会制度、党委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等方面进行。

## 一、完善党员权利保障制度

党内民主的实质是广大党员当家作主,即党员

是党内民主的主体。所谓党员主体地位,就是指广大党员在党内生活及党的实践活动中居于主导的、自由的、决定的地位,主要表现在:广大党员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党员主体的民主权利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和保障,党员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实际参与党内事务及党的管理活动,党内事务能够充分体现党员主体意志,党员主体能够自由地选择党的领导成员以及党的建设的各项活动始终以党员为主体来开展等等<sup>[2]</sup>。党员主体地位的观点是党内民主理论最根本的观点。

党员在党内民主中的主体地位,必须要以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等法的形式规定下来,这就是党员权利保障制度。长期以来,尽管党章及党内相关法规对党员权利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实际的党内生活和党的实践活动中,仍然存在着知情权不够、参与权不够、选举权失真、监督权弱化等党员民主权

收稿日期:2012-12-13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工程省级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研究项目”(20122013SZKJSGC7-1)

作者简介:孙功(1968-),男,安徽五河人,教授,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史。

利流失的现象。这种现象是由一些党组织及其领导对党员权利的忽视、党员的民主素质不够、制度建设存在缺陷、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余毒的影响等多种原因造成的。

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党内民主发展的物质基础;二是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提高党员民主素质,增强广大党员的维权意识;三是大力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程序化制度建设,建立党员权利保障的体制机制;四是积极推行党务公开;五是建立和完善刚性的责任追究制度;六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残余。

## 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

党代会是党的权力中心,是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最重要场所和最基本载体。党代会制度是实现党内民主的最基本的形式和制度。党代会具有选举、立法、决策、监督等职权,但其权力同样存在流失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党内重大问题往往不是在党代会上讨论决定,而是被全委会、常委会或别的会议取代,有时只是在形式上经过了党代会;党代会只能在一年一度的会期内发挥一定作用,在其闭会期间权力严重流失;党代会同各种与其相关的委员会的权力关系不明确。上述党代会权力流失现象大多与代表大会实行非常任制有关。因此,完善党代会制度的关键在于实行党代会常任制。

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进行一系列配套改革。根据各地试点多年的实践经验,最基本的有以下四项措施:

一是恢复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党代会能够经常召开,是其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享有最高的决策权、最高的监督权、党内法规制订权和人事任免权。然而,由于它五年才召开一次,党章的有关规定难以真正落实,党代会权力严重流失。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有效办法之一就是恢复实行党代会年会制。

二是实行党员代表任期制。实行党代会常任制,除了需要实行年会制之外,还必须实行党员代表任期制。党代表任期制是参照人大代表任期制的。党代表实行任期制后,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期间继续履行权利和职责,继续发挥党代表的作用。

三是设立党代会常设机构。所谓“常任制”,是指党代会能够持续不断地行使权力。代表大会年会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年会制只能一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不可能一年到头都

在开会。因此,在会期外,因为没有组织载体,代表大会无法发挥其作为最高领导机关、决策机关、监督机关的职能和作用,党代表也难以开展活动。所以,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应该有一个能使其继续行使权力的载体。这就要求党代会选举产生一个常设委员会,多少类似人大常委会那样。常设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代表大会的重要职能,处理日常事务。

四是改革党的领导机构设置。设立党代会常设委员会后,需要对现行的党的领导机构设置进行改革。常设委员会作为党的权力机关,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日常决策权;党的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保留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党的纪律监督机关,应该实行垂直领导体制,并扩大其权限。常设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都由党代会选举产生,并对党代会负责。在代表大会年会上报告工作,接受监督与质询。三机关人员原则上不应交叉任职。

## 三、完善党的委员会制度

党的委员会制度是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项基本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得到恢复和坚持,党委会制度运行情况总体良好,但也存在两大顽症:一是个人专断,家长制;一是自由主义,各自为政。具体地说,党委会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党委全委会作用还不能充分发挥,二是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还不够健全,三是党委票决制还不太完善。改革党委会制度,最主要的是要加强制度建设,使党委会制度的运行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

一是健全全委会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党委会一般分为全委会和常委会,全委会在保障党委重大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实践证明,党代会的决策,风险较小,但成本很大,而常委会甚至个人的决策,成本较小,但风险很大。因此,全委会的决策似乎成为最佳选择。应通过健全定期召开全委会会议制度和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从而健全全委会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全委会的作用。

二是健全党委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方针,建立和完善党委会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一方面,党委会应当结合实际对重大事项进行细化和量化,以便明确哪些是需要党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的重大问题,而不是随机确定。另一方面,党委会议事必须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议事规程大体

包括:确定例会议题和例会时间、严格会议议程、充分发扬民主、选择恰当的表决方式等。

三是健全党委票决制。党委票决制是指党委会成员用投票的方式进行决策的制度。在党委会中,一人一票,每个票值相等。健全党委票决制,需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其一要逐步扩大票决制的主体和客体范围。票决制的主体应当由目前的常委会扩大到全委会,票决制的客体应当由目前的重要干部任用扩大到包括“三重一大”的所有问题。其二要不断完善票决制的环节。在投票表决前,应做到充分酝酿;在投票表决过程中,应做到充分讨论,并对票决过程进行全程如实记录;在票决结果出来后,应做到决议公示。其三要探索实行差额票决制。为了提高票决质量,票决拟任人选或拟通过方案应当多元化,而不是单一化,从而使票决做到多中选优,而不是投信任票。其四要加强票决制的配套制度建设。票决制不是党内民主的全部,需要同其他党内民主措施配套进行,比如党组织的考察、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工作业绩考核、民主评议等。

#### 四、完善党内选举制度

党内选举是党员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把党的领导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授予党的各级机关及其领导者的基本形式和途径,是党内民主中最核心的问题。发展党内民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党内选举制度。

一是改革党内候选人提名制度。所谓党内候选人是指由特定主体按照一定的程序提名,通过选举后成为领导干部或党代表的人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是提名的主体,特别是领导机关的“一把手”垄断提名权。党内选举中的暗箱操作往往就产生于这个环节。为此,改革党内候选人制度必须明确候选人条件;必须在候选人提名中做到不带框框、不定调子、不授意图;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必须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候选人提名制度;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惩戒制度。

二是完善差额选举制度并积极稳妥地引入竞选。改革开放以来,党逐渐实行差额选举制度。但是,党内差额选举的幅度、范围和比例还很不够,有待进一步扩大。每个党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每个党员都有权成为党代表。因此,当选者产生的最具合法性和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就是实行被现代文明实践所验证的民主竞选。竞选有利于选举人对当选者的监督。

三是逐步建立党内弹劾罢免制度。弹劾罢免

制度是选举制度的自然延伸,是选举制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逐步建立党内弹劾罢免制度,有利于反腐倡廉和纯洁党的领导干部,有利于增强党的干部队伍新陈代谢和优胜劣汰的能力,有利于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又有利于完善党内选举制度。

#### 五、完善党内监督制度

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党风党纪、反腐倡廉的重要手段。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现行党内监督制度仍然存在着薄弱环节,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党代会的监督职能未能充分发挥;二是党委全委会的监督机制不健全;三是党内专门监督机构与同级党委会的关系没有理顺。因此,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健全和完善已有的监督机构和监督制度,充分发挥这些机构应有的监督作用。

一是健全党代会的监督制度,发挥党代会对党委会的监督职能。按照党章,党代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它有权对由它选举产生的党委会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是以权制权,体现了权力监督的普遍法则,具有最高权威性。同时,党代会是党员参与讨论和决定党内重大事务最主要的场所和载体,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广大党员的意志和要求,因而,党代会的监督也是一种有组织的党员监督,最能体现民主监督的属性。健全党代会的监督制度,加强党代会对党委会的监督职能,可以从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实行党代会代表任期制、提高代表对党委领导层监督的时效性、提高党代会的会议质量、扩大党代会的监督权等方面着手。

二是健全党委会的监督制度,发挥全委会对常委会的监督职能。健全全委会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一方面,健全定期召开全委会会议制度。目前,应适当增加全委会的会议次数。中央全委会每年可召开两次例会,省、直辖市全委会每年至少召开三次例会,市县全委会每年至少召开四次例会。这样可以保证全委会能够及时对重大事务进行决策,否则,全委会的决策权就有可能流失到常委会。此外,应不断丰富全委会的会议内容。全委会会议的议题,既可以由常委会提出,也可以由委员、常委联名提出。全委会在对议题审议时,应增加询问、质询、批评、建议等内容,而不仅仅是被动的听取和表态。另一方面,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制度。常委会由

全委会选举产生,必然要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出现全委会对常委会监督不到位的问题,特别是在全委会闭会期间,其监督作用难以发挥。因此,应在全委会对常委会经常性监督上作出具体规定。除了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外,全委会还应每年定期对常委会进行考核,并对常委会成员进行民主测评,促使其更好地履行职责。

三是健全纪委会的监督制度,充分发挥纪委会的专门监督职能。党的专门监督机构的地位和职权问题,实质上就是它与同级党的委员会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党章规定党的专门监督机构在党的委员会领导下工作,这就使之成为党的委员会的一个办事机构,从而难以对党的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形成平行的监督和制约。笔者认为,健全纪委会的监督制度,必须调整和理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同级党的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加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同级党的委员会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情况的监督。为此,应对现行党章中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以提升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位和规格。

在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中,完善党员权利保障制度是基础,完善党代会制度和党委会制度是重点,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是关键,只有使这五项制度相互联接,协调联动,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制度体系,才能切实推进党内民主。

#### 参考文献:

-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1.
- [2] 刘益飞.持之以恒地确立党员主体地位[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3):8-10

〔责任编辑:吴晓红〕

## 标有引号(或书名号)的并列成分之间用不用顿号?

答 需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根据GB/T 15834—2011《标点符号用法》给出的规则,“标有引号的并列成分之间、标有书名号的并列成分之间通常不用顿号”。例如:“双效”“双爱”期刊是办刊人的最高追求;毛泽东的“老三篇”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但是,“若有其他成分插在并列的引号之间或并列的书名号之

间(如引语或书名号之后还有括注),宜用顿号。”例如:“双效”(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皆好)、“双爱”(读者、作者都爱)期刊是办刊人的最高追求;我们编辑部里订有《人民日报》(海外版)、《科技日报》、《编辑学报》等报刊。

摘自《编辑学报》2012年第3期

# 执政价值观: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

卢少求,程增俊

(阜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摘要:**执政价值观是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在党的执政实践中具有重要的认同内聚和精神引领的作用。党的执政价值观分为核心价值观和非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非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安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它与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紧密相联,在党的执政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执政价值观;党的执政文化;结构体系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08-05

Governing values: core elements about the governing culture of the CPC

LU Shao - qiu, Cheng Zeng - ju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 Fuyang Teachers College, Fuyang, Anhui 236037,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elements about the governing culture of the CPC, governing values play the crucial roles of identity cohesion and mental guidance and are divided into core values and non - core values. The former is to establish the Party for the public, to govern for the people; the latter is ideological security, 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which are closely linked to and have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role in the CPC's governing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governing values; the governing culture of the CPC; structure system

执政价值观是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关涉党为何执政、凭何执政以及如何执政等问题,在党的执政实践中具有重要的认同内聚和精神引领的作用。我们认为,党的执政价值观分为核心价值观和非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非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安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其中意识形态安全是关键、民主法治是保障、公平正义是基础,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条件。

## 一、党的执政价值观与执政文化建设紧密相联

执政文化是执政主体为实现其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根本利益和价值目标,在运用国家权力管理社会事务的过程中开创、推行并不断发展的一系列富有一定意义和秩序的价值、制度、观念和作风等

精神形态的综合及其表现<sup>[1]25</sup>。党的执政文化是由执政价值观、执政制度、执政心理、执政作风和执政形象等构成。在这个内容体系中,执政价值观是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决定着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执政党的执政文化建设乃至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建设,都是在一定的执政价值观指导下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党的执政价值观与执政文化建设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 (一)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离不开执政价值观的指导

任何政党执政都有清晰的执政价值观。由于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不同,执政价值观则有所不同,但从作用的路径、范围和效用上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直接反映在执政党的执政文化建设之中。因此,确立什么样的执政价值观既反映执

收稿日期:2012-11-2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研究”(12BKS0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1YJA7100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阜阳师范学院2012年度校级科研专项课题(2012DJSZ02)。

作者简介:卢少求(1969-),男,安徽舒城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执政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政党的本质，也体现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核心价值观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它对党的执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导向作用，直接影响党的执政效能的高低；推进党的执政文化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期待，也是党的执政价值观的具体体现。“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sup>[2][16]</sup>没有执政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恒定而又具延续性的执政价值观，执政主体就易于陷入价值乏力感、无根感，就无法在执政主体的价值培育中构筑有效的价值认同，形成持续而又有感召力的价值吸引力，进而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使党用最小的执政成本获得最佳的执政成效。

## （二）执政价值观也离不开执政文化的外在培育

行为学研究表明：“人的行为模式即人们行为的一种模式化和路径依赖。如果某一个社会成员的某些行为方式具有重复性、连续性和相对固定性，我们可以说这种行为方式模式化了。人的行为模式形成的原因，有着生物的、心理的、政治的、阶级的、宗教的诸种原因，然而文化的塑造，可以说是行为模式形成的重要原因。”<sup>[3][19]</sup>任何一种执政文化都深受政党文化的影响，反映着执政党特有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与它所选择的执政价值观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如果执政主体置身于特定的执政文化氛围之中，就会逐渐适应、认同该党传承下来的执政模式和执政理念。也就是说，执政主体在其个体价值观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会不由自主地受制于这种执政价值观的影响，在其执政实践中，会将一定的执政理念及其相应的执政准则对象化为执政价值观，从而形成符合执政党需要的执政行为。因此，执政价值观一经形成，就会通过执政文化介入执政主体的精神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执政主体的个体价值观，从而塑造执政主体的思想和行为。

## 二、党的执政价值观的结构体系

一般来说，每个执政党的执政价值观都有一个复杂的结构体系，在这个结构体系中，有些执政价值观处于核心地位，有些执政价值观处于非核心地位，由此区分出党的执政价值观分为核心价值观和非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在执政价值观结构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非核心价值观则在一结构体系中不居于主导地位、不起决定作用。

从价值学意义上说，核心价值观包含在党的执政价值观结构体系之中，体现执政的根本价值导向和价值利益，起着规范行为、稳定秩序、提供精神动

力的作用，是党的执政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党的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定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执政价值观的内在结构体系来看，核心价值观在执政主体的价值选择、价值评判中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决定作用，引导执政主体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方向，在执政价值观的结构体系中处于最基础、最核心的部位。党的核心价值观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它在党的执政价值观结构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核心主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价值利益，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标准，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价值目标和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党必须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目标根植于执政主体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形成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行为。二是从执政价值观的内在认同来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核心价值观已经在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逐步为全党普遍认同和接受。这一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具有统摄性。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个体价值目标，认同党的核心价值观，并自觉转化为自身的行动指南。如果缺少了这种对核心价值观的普遍认同，党的执政所确立的价值理想和信念就会失去依托。在当下，这种核心价值观最通俗的表述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非核心价值观是相对于核心价值观而言的，非核心价值观是指在执政价值观结构中居于次要地位，不起主导作用和决定作用的执政价值观。主导与非主导、支配地位与从属地位，这是核心价值观与非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区别。不过，非核心价值观虽然不起主导作用或决定作用，但并不意味它们在执政价值观结构中无足轻重或不起作用，它们在执政党的执政实践中都发挥着各自极其重要的作用，现分述如下。

意识形态安全是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党的执政价值观的关键要素。过去我们过多的强调国家安全而忽略了意识形态安全。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西方文化入侵以及“意识形态分化”战略日益引起社会主义国家的警觉，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成为政党执政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当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而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则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威胁。有学者企图借“多元经济决定论”、“民主政治

决定论”、“多元文化决定论”、“社会活力论”等主张,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意欲通过指导思想多元化来达到“和平演变”的政治目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这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目标,也是执政文化建设必须划清的重大界限。目前,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除了策略上抵制和防范渗透外,其根本路径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文化思潮多样发展之间的关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中的重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经由双向运行机制来实现构筑和突破。一是通过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政治化,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二是通过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化,上升为公民文化。这种双向运行机制能否实现,往往取决于四个要素:一是始终保持党的执政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先进性;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练、概括必须注意其普适性、保持其权威性,认同的自主性;三是执政主体的模范带头作用;四是尊重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规范<sup>[2][2]</sup>,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抵御和抗衡西方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民主法治关涉执政党执政思维方式,亦即如何执政,它是执政党非核心价值观的构成要素。局部执政和全面执政初期,由于“革命方式”的惯性思维、传统观念的禁锢作用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化作用,党的执政思维不可避免地留存战争年代的领导方式。但是,如何执政问题,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就显得越来越突出。党的十五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都反映了党的执政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民主的方式、法治的方式都是科学的执政方式,民主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

质要求,解决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么执政的问题,是执政党执政宗旨的重要体现。依法执政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必须服从民主法制的基本原则,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建立健全一整套民主化、法制化的决策机制,提高党在执政过程中决策的科学化水平。这是党执政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变,说明党在从局部执政向全面执政转变的同时,正在完成从革命文化向宪政文化的转变,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

公平正义关涉执政价值、执政制度和执政形象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世界政党执政的实践表明,社会公平正义一旦出现严重的问题,就会导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激烈冲突,最终危及执政党的执政地位<sup>[4]</sup>。反之,则社会关系融洽,人民群众信任,执政地位巩固,社会充满活力。当前,我国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诸如收入差距过大、机会不均、贪污腐败、司法不公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对党的执政形象和执政权威产生了一定的弱化作用。这就要求党公正执政,加大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力度,自觉地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正确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和矛盾,平等地对待各阶层社会成员,及时纠正不公正行为。坚持公正执政与党的性质、宗旨,民主法治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结合,没有公正执政,就无法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无法体现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使其享有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等,健全各项制度,切实解决“弹簧门”、“玻璃门”所导致的种种不公正现象。当然,公正执政还必须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如果没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就无法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创造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只有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体现党公正执政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诉求,以及十六大以来党不断丰富和完善公平正义理论的时代语境和内在意蕴。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党的执政价值观之一,与党的执政文化关系紧密。不仅表现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执政文化的相互推动,而且表现为两者之间的相互交融。局部执政时期,解放区经济建设成就本身就渗透、包含党的执政文化建设思想的发展。毛泽东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

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他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sup>[5]1079</sup>全面执政初期，由于受战争和革命时代主题的限制，受长期革命斗争的思维惯性的影响，这一问题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的确立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远远超出其发展本身，包含着更高层次的执政文化意蕴。执政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表现在，一是执政文化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执政文化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动力作用既表现为一种精神动员，又表现为一种价值导向。二是通过执政文化建设提高执政主体的领导发展能力以及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三是执政文化能够引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层次。缺乏执政文化导航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是盲目的、失向的，最终有可能在实施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问题上走弯路，遭失败。

综上可见，核心价值观与非核心价值观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核心价值观居于党的执政价值观的核心地位，决定着党的执政价值观体系的总方向和总特征，对非核心价值观起着统领和约束的作用，并为其提供方向和支撑，对党的核心价值观起着稳定和内聚的作用。另一方面，党的核心价值观又离不开多样性的非核心价值观，它们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共同构成党的执政价值观的结构体系。没有核心价值观，执政主体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诉求就会失去根本方向；没有非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就会失去基础和依托，甚至会变成不切实际的价值乌托邦。在党的执政价值观中，核心价值观代表着先进价值观的发展方向，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价值利益，也体现着党的执政价值观的先进性特征。而非核心价值观则与党的执政价值实践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更多地体现着党的执政价值观的表征内容和依托机理，更多地体现着党的执政价值观与其他执政党价值观之间的共性特征与个性特征。

### 三、执政价值观在党的执政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执政价值观虽然是无形的，不具有强制力，但一经执政主体认同接受，就会进入自觉的无意识状态，对执政主体的价值判断、行为取向等产生软约

束，反映在执政制度设计、执政心理培育、执政作风及其执政形象的塑造之中。因此，执政价值观在党的执政文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 （一）执政价值观是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在现代政党制度下，执政价值观是每一个执政党必须明确的重大问题。执政价值观的确立，有助于凝聚共识、规范行为，更好地为执政客体服务。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执政党的执政活动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在其执政活动中，执政党与社会、人民构成一种价值关系，执政党是价值客体，社会、人民是价值主体。执政党的执政价值高低取决于其路线、方针及政策对社会和人民的利益有多大的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执政党的执政价值观关系着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文化涉及多方面内容，但其执政价值取向无疑是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其首要取向的。这一执政价值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理念。首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价值观体现了党与民的辩证关系，党执政与人民群众，是不可分离、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其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价值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因此，党执政所确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应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执政所确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使党执政获得稳定而又具合法性的执政根基。

#### （二）执政价值观是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

党的执政经历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的发展历程，这期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这对党的执政价值观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及时回应作出调整。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首先，执政地位的变化。局部执政时期，面对多元政治和多元文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特殊历史环境，党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宗旨意识，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其执政文化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全面执政后，党的执政价值观面临诸多挑战。在价值选择上是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在价值定位上是做人民的公仆，还是做官老爷等，这些都增加了党性蜕变的危险性。一些心术不端、党性不强的人，经不起执政地位变化的考验，容易产生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危险。其次，队伍状况的

变化。经过 90 多年的发展,党的队伍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党兴旺发达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标志,但是,如果疏于建设和管理,就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执政价值观在党的建设中内在的认同力和影响力,始终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不为执政权力所惑,不为执政利益所诱,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再次,执政文化环境的变化。全面执政后,党的执政文化由革命型执政文化、封闭型执政文化转变为开放型执政文化,如何在执政文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提高党的执政文化建设水平,保持党的执政价值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紧迫、更为重要。一是过去单一化的意识形态格局已被打破,表现出一种多元冲突、复杂多变的文化境遇。二是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各国之间的文化软实力竞争十分激烈。近年来“普世价值”的论争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渗透与反渗透、争夺与反争夺的严峻形势。三是长期执政引发的文化创新懈怠的危机。历史经验证明,由精神懈怠引发思想僵化、理论停滞、道德滑坡、意识形态坍塌、奋斗精神泯灭等连锁反应,是一

些国家共产党丧失先进性、群众性和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sup>[6]</sup>。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执政思想文化不断创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执政思想文化创新的最集中体现,但是在执政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方面仍然还存在众多不足,容易使执政思想文化传播失去生机和活力,从而阻滞执政文化建设的有效提升。

#### 参考文献:

- [1] 卢少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研究 [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9.
-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Z].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3] 王淑芹. 信用伦理研究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 [4] 龚培兴,潘泽林. 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是党执政为民的要求 [J]. 党建研究,2006:53-55.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廖 言. 高度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 [N]. 光明日报,2011-10-02 (3).

[责任编辑:范君]

## 未出版的学位论文参考文献著录方法

按 GB/T7714-2005 的示例,可归纳出未出版的学位论文的著录格式为:“主要责任者. 题名[D]. 授予地: 授予单位, 授予年: 引文页码”。其中,文献类型标志“D”不应细分为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等。按 GB/T7713.1-2006《学位论

文编写规则》,“授予单位”指授予学位的机构名称,对大学而言,即要求标示学校规范的全称,而不是著录至其二级机构“学院”或“系”。例如:“樊英. 经济增长中系统演化的复杂性研究[D].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5:51-52.”。

# 股票流动性的行业差异研究

孙方思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系, 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流动性为投资者进行证券的买卖转让提供了机会,是证券市场的生命力所在。股票的流动性对投资组合的构建及投资管理效率会产生很大影响,而不同股票的流动性与其所在行业有很大的关系。选取459家A股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了流动性的行业差异,同时,动态数据分析发现各行业股票流动性在时间序列上存在一致的变动趋势。

**关键词:**流动性;行业差异;换手率;ILLQ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13-05

## Study on the stock liquidity of industrial differences

SUN Fang - si

(Anhui Industry & Trade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Liquidity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investors to transfer securities, which is the vitality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 The liquidity of the stock has a great effect on portfolio construc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management; the liquidity of different stocks varies with industrie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selected 459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and reveals the industrial differences of the stock liquidity. Meanwhile, the analysis on dynamic data shows that there is consistent fluctuant trend of stock liquidity in time sequence in each industry.

**Key words:** liquidity; industrial differences; exchange rate; ILLQ

## 一、引言

流动性作为证券市场的重要属性,其水平及变化不仅仅体现着个股乃至市场的交易特征,对于资源配置亦产生深刻影响。时下,出现的一种新理论——流动性黑洞(Liquidity Black Holes),即流动性在瞬间消失的一种现象,引起了投资者及相关金融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接踵而来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后在投资管理中流动性将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正因人们从中意识到流动性在时间上的缺陷。

流动性受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有因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和自身特性而致金融资产的不同。而在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形成了各类行业,不同行业的公司规模的差异性也显而易见,例如金融业和采掘业的规模优势较传播业和信息技术业,随之而来的行业流动性也因此存在差异。

Chordia等(2000)在“流动性的共性”的研究中针对流动性的行业特征指出,从时间的角度来看股票的流动性在不同的行业中有着或强或弱的特征,与此同时也较大程度的影响着单支股票的组合交易成本和股票的非对称性风险。因此,股票流动性的行业差异的研究有着一定的价值和意义,有利于广大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同时也利于资源的合理配资。

## 二、文献回顾

从股票市场的角度,流动性可细分为四类,分别是个股流动性、组合流动性、行业流动性以及市场流动性。多年研究显示,学者对流动性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市场或个股的流动性及流动性风险定价方面。如韩冬(2006)对市场流动性进行了研究,实证结论表明我国股市存在显著的流动性风险,而且其属于系统风险,不可分散。王茂斌,孔东民

(2010) 的研究结果发现, 个股系统流动性风险与其预期回报呈现负相关关系, 即中国股市非流动性存在明显的财富效应。流动性定价方面的研究很多, 陆静, 李东进 (2005) 采用 LA-CAPM 模型选取上交所的 A 股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验证了资产的期望收益与资产的流动性风险和市场资产组合的流动性风险有关。席红辉 (2006) 分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数据, 发现流动性水平和股票收益存在着显著关系。苏冬蔚, 麦元勋 (2004) 在 1999 年 1 月至 2003 年 7 月的 A 股市场的基础上, 研究过程中运用换手率指标验证了我国的资产定价受股市中流动性的影响相当显著。其他学者还在流动性与资本结构的问题上做了研究, 如郑竹青 (2007) 对 2001 年至 2006 年股票流动性与资本结构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 并进行了行业比较, 发现股票流动性强的公司倾向于股权融资, 麦元勋 (2008) 以 1998 到 2005 年的上市公司股票为样本, 得出的结论是资本结构与股票流动性为负相关。

中国经济近年来发展迅速, 与此同时也意味着高风险时期的到来。风险的差异性形成于各行业中, 并伴随着新变化与新特征, 产业政策及相关法律在宏观经济环境的背景下都对风险的差异性具有一定影响。近年学者也关注于行业效应, 并着手于研究股票收益率与行业的相关性。史美景 (2002) 对股票收益率受行业因素的影响中做了研究, 其中运用随机效应方差分量模型。彭艳、张维 (2003) 实证分析表明在我国证券市场中, 规模效应, 风格效应, 行业轮换和地域轮换效应明显存在。蔡伟宏 (2006) 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股票市场的行业指数仍有着颇高的相关性, 这一结论的得出运用了滚动回归的方法和经过系统性因素解释后。张根明 (2006) 研究了我国证券市场行业的波动特点, 证明不同行业波动性不同导致股票收益率的差异。范龙振、王海涛 (2004) 根据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和地区距离, 并参照标准的国家行业分类, 将上海股票市场中的股票划分为 12 个地区和 15 个行业, 在 1995 年 7 月到 2001 年 6 月这一时期内, 基于上海股票市场的股票回报率月数据对回报率的地区和行业效应进行了横截面和时间序列分析, 其中运用了约束回归分析法。结论显示上海股票市场的行业和地区效应相当明显, 而且结果表明行业效应远大于地区效应。杨小燕、王建稳 (2008) 研究了 2006 年 1 月至 2007 年 4 月行业间的收益率关系, 得到股票收益率受行业因素影响的结论。

由上述文献可见, 目前国内对行业流动性的研究还很少, 能参考的文献唯有阚先成、黄建兵

(2007) 的, 他们探求了股票流动性在不同行业中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2005 年 1 月 4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上证 180 指数成份股数据, 并对股票买卖价差、深度和换手率等不同行业的流动性指标研究分析, 得出了不同行业的股票在同一时间上具有流动性上的差异的结论。但是黄建兵 (2007) 的研究样本仅为上证 180 成份股, 所选取的流动性指标多为股票价差, 这些指标并未体现股票的交易量影响。本文将考察 459 家上市公司, 并运用换手率, 交易金额和综合指标 ILLQ 来衡量流动性, 全面考察不同行业股票的流动性的差异性。

### 三、研究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1. 流动性指标

尽管流动性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 但是对于流动性的确切定义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最常见的是 Schwartz (1988): 流动性是指证券能以合理的价格迅速成交的能力。Harris (1990) 指出流动性的四个维度: 即时性、宽度、深度、弹性。即时性指成交的速度; 市场宽度常见指标是买卖差价, 在特定时间内, 资产交易的买方溢价很小或卖方折价很小, 则该资产具有流动性; 市场深度衡量流动性的数量因素, 即在特定价格上的订单总数量, 深度指标可以衡量市场价格的稳定程度, 深度越大, 一定数量的交易对证券价格的冲击越小; 弹性指标衡量的是由于一定数量的交易导致价格偏离均衡水平后恢复到均衡价格的速度。考虑到流动性的多维性, 本文选取了三种指标, 同时, 选取多种流动性衡量指标, 也克服了单一指标偏误, 使得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这些指标分别是:

#### (1) 弱流动性指标 (ILLQ)

弱流动性指标和股票流动性水平是负相关的, 即 ILLQ 越大, 股票流动性越差。其计算公式为:

$$ILLQ_t = \left( \sum_{d=1}^n |r_{td}| / vol_{td} \right) / N_t$$

其中,  $r$  是个股的日收益率,  $vol$  代表的是个股日交易量, 本文计算的月度 ILLQ 是个股日 ILLQ 的月度加总平均, 由于 ILLQ 非常小, 本文将计算结果乘以。弱流动性指标反映了价格变动对交易量的敏感性, 体现了股票的弱流动性, 如果该指标较大, 那么显示很小的交易量将会引发较大的价格变动, 亦表明此股的流动性水平较低。

#### (2) 换手率 (TURN)

换手率的计算公式为:  $TURN_t = LN(vol_t / N_t)$

换手率是交易量与上市流通股本的比值。体

现了某只股票在一段时间内的交易活跃度。如果换手率越高,说明投资者买卖股票的意愿越强烈,即流动性水平越好。为了研究方便,本文将月累计换手率的对数作为流动性指标。

### (3) 交易金额(TRD)

该指标指的是一定交易时间段内某个股票的交易总金额,同样体现了该股票的活跃程度,交易金额不仅仅包含了交易数量,也包含了成交价,可以间接反映出股票的流动性状况。由于交易金额数据较大,本文以其对数值进行研究。

### 2.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沪深股市的全部A股为研究对象,并按一定原则进行了筛选,最终获得459家上市公司。样本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11年2月到2011年7月。为了保证研究的稳定性,本文剔除了下列公司:

(1)多地上市的公司。本文研究对象为只发行A股的公司,如果上市公司同时发行A股以外的股票,其股票流动性影响比较复杂。

(2)非正常经营的ST上市公司。对于存在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剔除,因为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异常,对研究效果有一定影响。

(3)数据异常的公司。在收集数据过程中,存在部分异常数据,本文将出现异常的公司进行了剔除。

指标计算所用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运用的分析软件为Stata11.0。

## 四、实证分析

### 1. 统计分析

本文行业分类标准采用的是证监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考虑到样本公司数目较少,本文以行业大类进行分析,保证各行业拥有充足的公司数量。行业信息整理结果统计在表1。

表1 样本公司行业分布概况

| 行业信息 | 公司数量 | 所占比率   |
|------|------|--------|
| 房地产业 | 34   | 7.41%  |
| 工业   | 254  | 55.34% |
| 公用事业 | 36   | 7.84%  |
| 商业   | 51   | 11.11% |
| 综合类  | 84   | 18.30% |
| 合计   | 459  | 100%   |

从表内的统计信息可以发现,样本公司内,工业类行业公司最多,占总样本数的55%以上,其次为综合类企业,占18.30%,房地产业公司最少,仅有34家,占7.41%。表2为样本整体的统计描述,表内信息显示,指标ILLQ的标准差为1.46。意味着该指标波动幅度较大。

表2 流动性衡量指标的统计描述

| 指标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 ILLQ | 3.93  | 1.46 | 0.17  | 28.23 |
| TURN | 12.36 | 0.21 | 9.88  | 14.65 |
| TRD  | 21.12 | 0.43 | 14.80 | 23.81 |

表3 行业间流动性水平的动态考察

|      | 指标均值 | 2011.2 | 2011.3 | 2011.4 | 2011.5 | 2011.6 | 2011.7 |
|------|------|--------|--------|--------|--------|--------|--------|
| 房地产业 | ILLQ | 3.54   | 2.48   | 6.07   | 6.06   | 5.85   | 3.73   |
|      | TURN | 12.38  | 13.10  | 13.08  | 12.55  | 12.34  | 12.72  |
|      | TRD  | 20.66  | 21.39  | 20.10  | 20.87  | 20.64  | 20.86  |
| 工业   | ILLQ | 3.33   | 2.53   | 1.91   | 4.89   | 5.06   | 3.74   |
|      | TURN | 12.39  | 13.07  | 13.14  | 12.69  | 12.38  | 12.72  |
|      | TRD  | 21.20  | 21.87  | 21.74  | 21.26  | 21.00  | 21.37  |
| 公用事业 | ILLQ | 2.75   | 2.24   | 1.00   | 5.02   | 4.90   | 3.41   |
|      | TURN | 12.63  | 13.12  | 12.89  | 12.52  | 12.40  | 12.73  |
|      | TRD  | 20.77  | 21.40  | 20.90  | 20.60  | 20.34  | 20.80  |
| 商业   | ILLQ | 4.51   | 4.45   | 4.69   | 7.84   | 7.54   | 6.61   |
|      | TURN | 12.47  | 12.92  | 13.26  | 12.58  | 12.24  | 12.48  |
|      | TRD  | 20.86  | 21.49  | 21.89  | 21.02  | 20.51  | 20.89  |
| 综合类  | ILLQ | 3.20   | 2.82   | 1.81   | 4.97   | 5.03   | 3.87   |
|      | TURN | 12.54  | 13.10  | 13.14  | 12.84  | 12.56  | 12.76  |
|      | TRD  | 21.13  | 21.85  | 22.35  | 21.18  | 20.97  | 21.21  |

表 4 流动性衡量指标的相关系数

|      | ILLQ   | ILLQ   | TRD    |
|------|--------|--------|--------|
| ILLQ | 1      | -0.312 | -0.333 |
| ILLQ | -0.312 | 1      | 0.1214 |
| TRD  | -0.333 | 0.1214 | 1      |

从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参见表 3 的结果,可以看出三种衡量指标表现出一定的不协调,如公共事业类,在 2011 年 3 月,ILLQ 为 1.00,是考察期内最低,说明这个时候股票流动性水平在该期间内最高,TURN 为 12.89,也代表着较高的流动性水平,但是 TRD 则显示流动性不太理想,其数值仅为 20.90。但是,总体上 ILLQ,TURN,TRD 三种指标展现的流动性水平基本一致。如综合类行业、工业,ILLQ、TURN,TRD 都显示流动性水平在 3 月、4 月较高,6 月份行业内股票流动性比较低。可见,指标的选取会影响到研究结果,本文选取三种指标进行考察则有效的客服了单个指标造成的偏误,为此本文计算了指标间的相关度,表 4 给出了三种衡量指标的相关系数,ILLQ 指标与其他指标呈负相关,TRD 和 TURN 指标为正相关,说明三种指标的衡量效果基本一致的。从整体角度来讲,不同的行业流动性变动趋势接近一致,因为表内信息显示三种指标显示各个行业均在 2011 年 4 月份流动性水平最高,2 月和 6 月的流动性水平较低。

表 3 是不同行业的动态数据描述。以横截面数据分析,不同行业的流动性是不一样的。以 2011 年 2 月为时间点,换手率 TURN 最高的为公用事业类行业,为 12.63,最低的为房地产行业,仅为 12.38,同样地,公用事业的 ILLQ 和 TRD 值为 2.75 和 20.77,房地产行业分别为 3.54 和 20.66,也说明了这两类行业相比,公用事业流动性普遍较高。这意味着,行业属性是影响流动性的重要因素。通过计量分析来验证股票流动性行业差异的显著性。

## 2. 行业差异性检验

从统计数据来看,行业是影响股票流动性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国家出台了一些产业政策来支持一些新兴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也不同,投资者对股票所属行业认识不同,所以,行业之间流动性存在明显的差异。本文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股票流动性行业间差异的显著性,表 5 给出了检验结果,结果表明,行业差异性十分显著。

表 5 行业差异性检验

|       | 检验结果       |
|-------|------------|
| 卡方检验值 | 63.732 *** |
| 显著性水平 | 0.000      |

表 5 检验结果的显著性概率非常小,说明了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流动性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进而运用 wilcoxon 检验方法进行对比检验。检验结果整理在表 6 中。

表 6 行业流动性水平对比检验

| 指标   | 高   | →   | 流动性水平 | →   | 低   |
|------|-----|-----|-------|-----|-----|
| ILLQ | 工业  | 综合类 | 公用事业  | 房地产 | 商业  |
| TURN | 综合类 | 工业  | 公用事业  | 房地产 | 商业  |
| TRD  | 综合类 | 工业  | 公用事业  | 商业  | 房地产 |

虽然三种指标检验结果略有不同,如 TURN 和 TRD 指标都显示综合类企业的流动性水平高于工业类企业,而 ILLQ 指标显示工业的流动性水平高于综合类。但是,三种指标都说明,综合类企业和工业类企业的流动性水平较高。房地产和商业类企业的流动性水平是考察样本内最低的。这说明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预期,产业政策等因素使得不同行业的股票交易性不同,最终表现在股票的流动性不同。

## 五、结论

一般来讲,行业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在同一时期内不同的行业其收益和流动性不同。本文通过对 A 股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不同行业股票的流动性存在着差异性,总体上,房地产和商业类企业的流动性水平低于工业和综合类企业的流动性水平。同时,动态数据的考察发现,不同行业股票的流动性水平的时间序列变动趋势是基本一致的。行业差异的出现,对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提出较高的要求,因为对行业未来发展能否准确判断,是把握市场未来投资方向的先决条件,将直接影响到组合中股票的选择和投资权重分配,从而影响到组合投资的绩效。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应当考虑股票的行业属性,在投资时,对国家产业政策,行业的生命周期等因素进行考虑,进行不同的侧重。

**参考文献:**

- [1] Yakov Amihud, Haim Mendelson. Asset pricing and the bid – ask spread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6 (17) :40 – 45.
- [2] Lubos Pastor, Robert F. Stambaugh. Liquidity Risk and Expected Stock Return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3 (111) :35 – 36.
- [3] Paresh Kumar Narayan, Xinwei Zheng. Market liquidity risk factor and ? nancial market anomalie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J]. Pacific – Basin Finance Journal, 2010 (18) :21 – 23.
- [4] 陆静,李东进.基于流动性风险的证券定价模型及其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5 (12) :145 – 150.
- [5] 孔东民.流动性风险与资产定价:来自中国股市的证据[J].南方经济,2006 (3) :91 – 107.
- [6] 麦元勋.基于流动性 Beta 系数的我国股市流动性风险实证研究 [J].现代管理科学,2006 (6) :117 – 119.
- [7] 王茂斌,孔东民.个股系统流动性风险与预期回报:基于套利定价模型的检验 [J].当代财经,2010 (3) :51 – 60.
- [8] 苏冬蔚,麦元勋.流动性与资产定价:基于我国股市资产换手率与预期收益的实证研究 [J].经济研究, 2004 (2) :95 – 105.
- [9] 梁丽珍,孔东民.中国股市的流动性指标定价研究 [J].管理科学,2008 (6) :86 – 93.
- [10] 席红辉.流动性风险与预期股票收益 [J].统计与决策,2006 (1) :94 – 97.
- [11] 黄峰,邹小苑.我国股票市场的流动性风险溢价研究 [J].浙江大学学报,2007 (37) :192 – 200.
- [12] 张根明,任福匀.我国证券市场行业板块的波动特点分析 [J].统计观察,2006 (1) :99 – 100.
- [13] 史美景.随机效应方差分量模型及应用 [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24:99 – 101.
- [14] 彭艳,张维.我国股票市场的分板块投资策略及其应用 [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 (12) :148 – 151.
- [15] 范龙振,王海涛.上海股票市场行业与地区效应分析.系统工程学报,2003, (4) :123 – 127.
- [16] 蔡伟宏.我国股票市场行业指数超额联动的实证分析 [J].南方经济,2006 (2) :91 – 98.
- [17] 杨小燕,王建稳.股票收益率的行业效应分析 [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8 (3) :76 – 83.

[责任编辑:范君李丽]

## 姓名中“吕”的汉语拼音怎样拼写?

答 长期以来,很多科技期刊将“吕”拼写为“Lv”或“Lu”,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拼写应为“Lü”。在有些场合,姓要求用大写字母拼写时,“吕”应拼写为“LÜ”。按照GB/T 28039—2011的6.2:“根据技术处理的特殊需要”,在

书刊等场合,“大写字母 Ü”可用 YU 代替。因此,在科技书刊中,如有需要,可以将“Lü Heping(吕和平)”拼写为“LYU Heping”。

摘自《编辑学报》2012年第3期

# 安徽省产业结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

周瀚醇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会计系, 合肥 230041)

**摘要:**为了探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的关系,文章以安徽省2005—2010年数据为例,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对三者进行动态关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导致安徽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能源消费总量的快速增长,其次是能源利用效率和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值,故而要加快安徽省经济发展必须率先从改善能源利用效率和调整产业升级开始。

**关键词:**产业结构; 能源消费; 经济增长; 灰色关联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18-04

Grey relevancy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industrial structur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nhui province

ZHOU Han - chun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Anhui Business Vocational College, Hefei 230041, China)

**Abstract:**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this paper, by adopting grey relevancy pattern, makes a dynamic relevancy analysis of the three factors on the statistics between 2005 and 2010 of Anhui provinc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rapid increase in total consumption of energy has higher association with GDP than with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ratio of the second industry, which makes it a prerequisite for Anhui province to develop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upgrade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accelerate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industrial structure; energy consump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grey relevancy analysis

## 一、安徽省产业结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概况

改革开放30余年来,安徽省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其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12359.3亿元,为1980年的87倍,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如图1所示。

在1990年以前,其三次产业结构为“一、二、三”形式,安徽作为农业大省,第一产业一直占较大比重;1995年后产业结构转化为“二、三、一”形式,即第二产业比重上升超越第一产业成为首要产业;2005年以后,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第一产业逐渐萎缩至20%以下,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呈现出齐头并进的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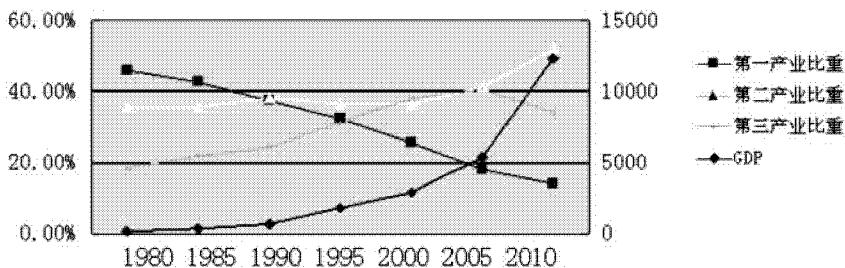


图1 安徽省1978年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变迁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收稿日期:2012-11-28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11SK592)资助

作者简介:周瀚醇(1983—),女,安徽合肥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产业组织与产业政策。

从另一方面看,安徽省在煤炭、有色金属等资源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我国重要的能源省

份,但其能源消费和我国其他省份相比又存在一定差距,如表1所示。

表1 2010年全国及部分省(市)产业结构及能源消费比较

|    | 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      |      | 能源消费情况            |                     |
|----|-------------|------|------|-------------------|---------------------|
|    | 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 能源消费总量<br>(万吨标准煤) | 生产总值能耗<br>(吨标准煤/万元) |
| 全国 | 10.1        | 46.8 | 42.1 | 389 509           | 1.29                |
| 安徽 | 14          | 52.1 | 33.9 | 9 707             | 0.97                |
| 江苏 | 6.1         | 52.5 | 41.4 | 25 774            | 0.73                |
| 浙江 | 4.9         | 51.6 | 43.5 | 16 865            | 0.72                |
| 广东 | 5           | 50   | 45   | 26 908            | 0.66                |
| 湖南 | 14.5        | 45.8 | 39.7 | 14 880            | 1.17                |
| 湖北 | 13.4        | 48.6 | 37.9 | 15 138            | 1.18                |
| 江西 | 12.8        | 54.3 | 33   | 6 355             | 0.85                |

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1年)、安徽统计信息网 <http://www.ahtjj.gov.cn>

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从表1中可以看出,安徽省三大产业占GDP比重与中部湖南、湖北及江西三省差别不大,而与全国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浙江、广东等省比较,第一产业占比偏大,第三产业占比较小,说明安徽省第三产业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从能源消费情况中的生产总值能耗来看,安徽省的能耗情况为0.97,明显优于全国和中部三省,但与苏、浙、粤等全国几个节能降耗模范省份相比,仍有明显差距。这说明安徽省的工业化进程与能源消费要形成良性循环尚有提升空间。

## 二、灰色关联模型

### 1. 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原理

灰色关联分析源自“灰色系统理论(Grey Theory)”,它以“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诸如“小样本”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充分利用“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去了解、认识世界,实现对系统的有效控制<sup>[1]</sup>。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判断其关联程度的紧密性,曲线越接近,序列间的关联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由此可以判断引起该系统发展的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

利用该理论,尹春华、顾培亮(2003)实证检验了我国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的关系<sup>[2]</sup>,牛鸿蕾(2010)考察了江苏省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sup>[3]</sup>,陆敏、赵湘莲(2012)检验了江苏省经济

增长、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的灰色关联度<sup>[4]</sup>,彭远新等(2010)就安徽省和江苏省的能源强度进行了比较<sup>[5]</sup>,刘翀(2011)对安徽省工业经济结构与能源结构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sup>[6]</sup>。本文以灰色关联理论为基础,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安徽省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的关系,动态、定量的反映各参考序列与经济增长序列的关联紧密程度,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提供政策支持。

### 2. 灰色关联分析的数学模型

#### (1) 确定分析序列

设参考序列(或母序列)为: $x'_0(t) = \{x'_0(k) | k = 1, 2, \dots, n\}$

比较序列(或子序列)为: $x'_i(t) = \{x'_i(k) | k = 1, 2, \dots, n\} (i = 1, 2, \dots, N)$

(2) 对所分析的变量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便于变量进行比对

$x_0(k) = \frac{x'_0(k)}{x'_0(l)}$  和  $x_i(k) = \frac{x'_i(k)}{x'_i(l)}$ , 则初值化后

相应的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分别为  $x_0(t)$  和  $x_i(t)$ 。

#### (3) 计算关联系数,确定关联度

关联系数  $r_i(K) = (\Delta X_{\min} + \theta \Delta X_{\max}) / (\Delta X_0(K) + \theta \Delta X_{\max})$

关联度:  $\rho_i = \sum r_i(K) / n$

其中,  $\Delta X_{\min}$  为最小绝对差,  $\Delta X_{\max}$  为最大绝对差,  $\Delta X_0(K)$  为  $X_0(t)$  和  $X_i(t)$  在  $k$  点的绝对差;  $\theta$  为

分辨系数,有研究表明,  $\theta \leq 0.5364$  最好,此处取值 0.5。关联度越接近 1,说明序列间的关联程度越大。

#### (4) 关联度排序

将关联度按大小排序,若  $\rho_1 > \rho_2$ ,则说明参考序列  $X'_0(t)$  与比较序列  $X'_i(t)$  更为相似。

### 三、实证分析

#### 1. 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安徽省 2005~2010 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具体变量包括:安徽省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作为系统特征序

列  $X_0$ ,表示经济增长;  $X_1, X_2, X_3$  分别为第一产业总产值、第二产业总产值、第三产业总产值占 GDP 比重,表示安徽省产业结构;以能源消费总量( $X_4$ ) (单位万吨标准煤),能源利用效率( $X_5$ ) (即单位产值能耗,单位万吨标准煤/亿元),能源消费结构( $X_6$ ) 表示安徽省能源消费情况。其中由于能源消费结构( $X_6$ )以煤炭为主,故而本文采用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值进行衡量。上述六个指标为  $X_i, i=1, 2, \dots, 6$ 。经过整理后的 2005~2010 年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 2 安徽省 2005~2010 年 GDP、产业结构、能源消费原始数据

| 年份   | GDP       | 第一产业比重 | 第二产业比重 | 第三产业比重 | 能源消费总量 | 能源利用效率 | 能源消费结构 |
|------|-----------|--------|--------|--------|--------|--------|--------|
| 2005 | 5 375.12  | 0.1798 | 0.4132 | 0.4070 | 8 323  | 1.2104 | 0.7817 |
| 2006 | 6 148.73  | 0.1673 | 0.4307 | 0.4020 | 8 793  | 1.1497 | 0.8039 |
| 2007 | 7 360.92  | 0.1630 | 0.4468 | 0.3906 | 9 766  | 1.0514 | 0.7924 |
| 2008 | 8 851.66  | 0.1602 | 0.4674 | 0.3749 | 11 377 | 0.9405 | 0.7317 |
| 2009 | 10 062.82 | 0.1486 | 0.4875 | 0.3639 | 12 666 | 0.8840 | 0.7024 |
| 2010 | 12 359.33 | 0.1399 | 0.5208 | 0.3393 | 13 376 | 0.7854 | 0.7257 |

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1 年)、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 2. 标准化处理

以 2005 年作为基准,将表 2 进行无量纲化处

理,结果如表 3 和图 2 所示。

表 3 安徽省 2006~2010 年 GDP、产业结构、能源消费无量纲化数据

| 年份   | $x_0$  | $x_1$  | $x_2$  | $x_3$  | $x_4$  | $x_5$  | $x_6$  |
|------|--------|--------|--------|--------|--------|--------|--------|
| 2006 | 1.1439 | 0.9304 | 1.0422 | 0.9879 | 1.0565 | 0.9498 | 1.0285 |
| 2007 | 1.3694 | 0.9068 | 1.0814 | 0.9597 | 1.1734 | 0.8686 | 1.1038 |
| 2008 | 1.6468 | 0.8909 | 1.1311 | 0.9213 | 1.3670 | 0.7770 | 0.9361 |
| 2009 | 1.8721 | 0.8265 | 1.1796 | 0.8942 | 1.5218 | 0.7304 | 0.8985 |
| 2010 | 2.2994 | 0.7780 | 1.2603 | 0.8338 | 1.6071 | 0.6489 | 0.928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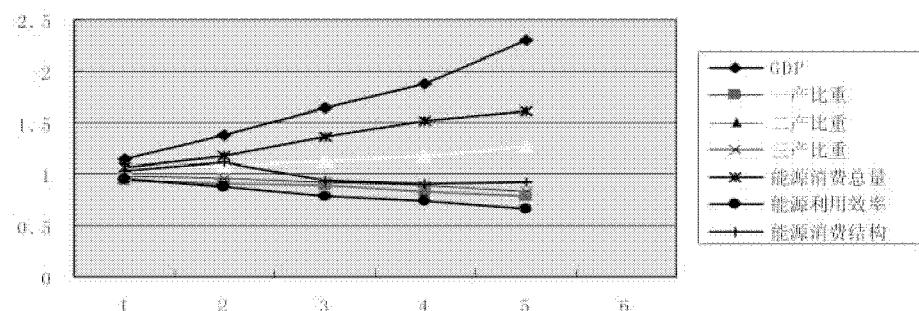


图 2 安徽省无量纲化数据序列趋势图

#### 3. 灰色综合关联度和关联系数排序

根据“灰色关联理论”,参考序列“安徽省经济

增长”与比较序列“六因素”的综合关联度结果见表 4。

表4 影响安徽省经济增长因素的灰色关联度

|      | 一产比值    | 二产比值    | 三产比值    | 能源消费总量  | 能源利用效率  | 能源消费结构  |
|------|---------|---------|---------|---------|---------|---------|
| GDP  | 0.656 9 | 0.680 6 | 0.659 8 | 0.840 7 | 0.737 8 | 0.663 1 |
| 紧密程度 | 6       | 3       | 5       | 1       | 2       | 4       |

#### 4. 实证检验分析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安徽省产业结构变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从图1可以看出,安徽省产业结构的变迁符合“库兹涅茨三次产业理论”:第一产业产值占经济总体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稳步上升,但趋势渐缓;第三产业虽有波动但总体保持上升趋势。这些均显示安徽省产业结构正从低附加值的第一产业向高附加值的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且第二产业是优势主导产业。

第二,从表4关联度排序可以看出,六个变量序列中与经济增长关系最大的为能源消费总量,其次为能源利用效率。从图2也可以看出,能源消费总量无量纲化序列与GDP曲线的关联程度更紧密,这与灰色关联度分析一致。它们都说明安徽省的经济增长仍然是靠能源消费驱动,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比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更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其次,与经济增长关联度较高的是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比值和能源消费结构,显示出第二产业既是安徽省的支柱产业,也是能源消耗最大的产业,今后要加快安徽省经济发展必须率先从改善能源利用效率和调整产业升级开始。

第三,从产业结构方面看,第二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为紧密,这表明它对经济增长率影响较为稳定,在经济发展中起着稳定器的作用。而第三产业与经济增长关联度较靠后,反映出安徽省第三产业发展仍比较薄弱,这也与表1中安徽省第三产业占比落后其他多数省份情况相符。如何对第三产业的制度创新和安排作出改进,不断加大第三产业比重是安徽省面临的新方向。

第四,从能源消费方面看,能源消费与能源利用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安徽省能源消费总量、能源利用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综合关联程度达到0.840 7和0.737 8,都显示了它们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能源利用效率的关联度位于能源消费总量之后,说明安徽省能源经济效率和技术效率尽管有了一定程度提高,但能源利用效率偏低的状况仍有待改进;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程度处于第三位,这表示随着我国大力推进“低碳经济”、“节能减排”政策以来,煤炭作为传统的主要能源,正被新的清洁能源技术所替

代。

#### 四、对策与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为提高安徽省能源利用水平,促进安徽省经济快速增长,应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善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形成合理能源消费结构;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力度。

第一,安徽省应继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优势,改变过去粗放型高能耗增长模式,改造提升能源密集型产业,坚持走“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能力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二,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重视煤炭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更要重视经济与环境、资源、生态的协调发展,特别是提高新能源、新材料、环保产业产值,另外还要坚持开发节约并举,提高全民的节能减排意识,提倡节约、科学的生活方式,形成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社会风气。

第三,大力开发多种可再生能源,可以提高安徽省能源自给能力,缓解目前能源紧张的局势。安徽省是农业大省,应继续鼓励秸秆资源丰富的粮棉油主产区和能源林基地建设生物质能发电项目,支持发展城市生活垃圾发电;此外地理环境多样,沿江沿湖、分水岭等地区水能、风能资源开发前景广阔;以开发区集中联片建设为重点加快太阳能城市示范建设,继续推进芜湖繁昌、池州吉阳等地核电工程的建设。

#### 参考文献:

- [1] 刘思峰,郭天榜.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 [2] 尹春华,顾培亮.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消费的灰色关联分析[J].天津大学学报,2003(1):104-107.
- [3] 牛鸿蕾.江苏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灰色关联模型[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6):31-34.
- [4] 陆敏,赵湘莲.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联分析[J].统计观察,2012(2):109-111.
- [5] 彭远新,林振山.江苏、安徽能源强度比较分析与启示[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0(4):345-350.
- [6] 刘翀.安徽省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的实证研究[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1-14.

[责任编辑:范君李丽]

# 女性网购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与消减路径研究

刘蓓蕾<sup>1</sup>, 何 莉<sup>2</sup>, 钱黎春<sup>1</sup>, 吴金南<sup>1</sup>

(1. 安徽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 安徽 马鞍山 243002; 2.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自然科学版), 安徽 马鞍山 243002)

**摘要:**女性天性敏感, 网购的高风险降低了女性消费者的网购热忱。无事爱关注、易受网评的影响、冲动购买及其后的期望失调等行为因素导致女性有更高的网购风险感知;女性消费者网购最关注的是绩效风险、服务风险和交付风险三种风险。因此, 电商企业可以通过产品、包装、服务、口碑等方面路径, 消减女性消费者网购风险感知。

**关键词:**风险感知;女性消费者;网络购物

**中图分类号:**F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22-04

##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ubtraction paths

### of females' risk perception of online shopping

LIU Bei - lei<sup>1</sup>, HE Li<sup>2</sup>, QIAN Li - chun<sup>1</sup>, WU jin - nan<sup>1</sup>

(1. School of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 anshan, Anhui 243002, China; 2.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ournal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Ma' anshan, Anhui 243002, China)

**Abstract:** As females are innately sensitive, high perceived risk of online shopping can reduce their zeal of consumptions. Factors of close concern about and easy influence from online comments and females' unbalanced expectation from their impulsive purchases lead to females' high risk perception of online shopping. What female consumers care about most are the three risks of performance, service and delivery. Accordingly, the e-commerce merchants can reduce female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risk in online shopping through paths of products, packing, service and reputation, etc.

**Key words:** perceived risk; female consumers; online shopping

在传统购物环境中,女性一直是家庭购物的主力军,但是在网络环境下,却有不同。CNNIC 发布的《2011 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1 年我国男性网购用户占总体 60.9%,女性网购用户为 39.1%,显著低于男性,与 2010 年相比,男性占比偏高的情况更加突出<sup>[1]</sup>。令人奇怪的是,在 2009 年 CNNIC 的报告中,女性网购用户占比为 61.5%,显著高于男性<sup>[2]</sup>,为什么情况发生了逆转,是什么因素促使女性网购用户比例降低?在我国网购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大,网购用户规模持续增长的大背景下,为什么女性消费者占比发生大幅减少现象呢?笔者认为网络购物方式本身具有的高风险特点,加之女性特有的网购行为对网购风险的认知放大是导致女性风险感知高的主因,故研究针对女性消费者关注度最高的绩效风险、服务风

险和交付风险三种风险,为电商企业提出消减女性网购风险感知的多种可行路径。

## 一、网络购物的高风险性

根据 eDataPower (2004) 调研咨询网站的调查显示,76% 的消费者认为网上购物风险较大是不选择网络购物的主要原因<sup>[3]</sup>。消费者购物感知风险最早由 Bauer 在 1960 年美国市场营销协会第 43 届年会上提出,其后从感知风险的定义、构面,到影响因素、策略都有大量文献。网络购物兴起于九十年代中后期,得益于互联网的普及,更早的相似购买方式有邮购和电话购物。这几种购买方式都属于居家购买(in-home shopping),会使购买者感知到更大的风险<sup>[4]</sup>。

关于消费者网络购物风险感知,学者已经做了

大量研究,但是从女性消费者视角的研究较少,只有少量分析了性别因素导致风险认知的差异,没有深入研究女性消费者真正关注的风险类型及原因,以及如何消减女性对网络购物的风险感知。为弄清女性消费者网购风险感知构面、成因及影响因素,笔者通过焦点小组访谈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式,对女性网购爱好者及倾向者进行了调查,发现女性消费者网购风险感知高与网络购物方式的特点及其行为特点密不可分。其一、无法事先见到商品实体。传统购买方式下,消费者是先看到商品,通过五官感知、体验商品,对商品进行评价。由于事先体验,所以相对风险较小。居家购买无法在购前见到产品,仅凭图片和文字描述等获取产品信息,不够充分,风险较高;其二、售后服务不便。产品购买后可能会出现问题,居家购买虽然具有购买的便利性,但在返回有问题商品时,却非常不便利,存在返回时间长,成本高,容易出现途中损坏,无法当面交涉,甚至卖家不负责任等问题;其三、商家违约成本低。由于没有实体店铺,卖家违约成本小,使用虚假图片、假冒伪劣商品以次充好、虚假商品评论等问题较为普遍。此外还存在着立法和监管不健全等多方面问题。

## 二、影响女性网购风险感知的行为因素

在社会化过程中,女性从小所受教育与男性不同,父母更注重教育男孩子要独立,女孩则被鼓励可以相互依赖和共同活动<sup>[5]</sup>。大量文献显示女性更加注重关系的维系,相互联系比男性更加频繁(Tannen, 1990; Brannon, 1999)<sup>[6]</sup>,尤其是在网络通讯时代。女性日常行为中的这些特点也延续到了网络中,通过对42名女性网购爱好者及倾向者的深度访谈,笔者总结出女性消费者网络购物中的几个行为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女性对网购风险感知度提高。

### 1. 无事爱关注

女性一般负责家庭用品的购买,日常交流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购物,如购物体验,促销信息,使用心得等等。现代女性比起上一代更加爱惜自己,因而有很多现实和潜在需求。女性的一大共同爱好就是逛街,延伸至网络就是无事闲逛,即使没有明确需求,也喜欢浏览相关产品信息网页,看看别人的评价,转转社区,因此可以看到更多的负面评价,感知到更多的风险。

### 2. 喜欢发表评论并易受评论影响

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具有依赖和群聚的特征,因而更喜欢交流相互间感兴趣的信息,包括购物评价。发现或使用了特别满意或者不满意的产品,喜欢发表评论,与人分享。女性消费者相比较男性认

为负面信息的不良后果发生的可能性更大<sup>[7]</sup>,更易受到消极评价的影响,因而感知到的风险更高。

### 3. 冲动型购买

女性对事物具有感性认知的特点,网络卖家展示的商品图片往往具有相当的诱惑力,在商品实际使用中一般难以达到图片所展示的效果。良好展示效果勾起的购买欲望,无法通过实际接触进行理性评价,常会导致冲动购买的后果。冲动购买后与期望形成反差,故感知风险较高。

女性消费者的这些行为特点具有相悖性,她们喜欢交流和收集信息,这是一种理性行为,可当遇到非常心仪的物品时,又往往会冲动购买,与其规避风险的行为倾向相悖。同时又具有因果关系,正因为喜欢无事闲逛,给冲动性购买行为提供了机会,冲动性购买与高风险相伴,继而又会出现规避风险的行为,如一段时间远离网络购物。女性消费者的网络购物行为是复杂的,具有一定波动性。

## 三、女性消费者关注的网购风险

董大海(2005)在文献回顾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将网络购物风险感知整理为十个构面:财务风险、时间风险、绩效风险、心理风险、身体风险、社会风险、隐私风险、来源风险、服务风险、交付风险<sup>[8]</sup>。井森(2005)则将网络购物风险感知归纳为八个构面:经济风险、绩效风险、身体风险、时间风险、隐私风险、服务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sup>[9]</sup>。两个研究中风险因素交叉点较多,前者多出来源风险和交付风险两项。

先前研究显示女性消费者网络购物风险感知侧重点与男性消费者有所差异。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召开了女性网购爱好者和女性网购倾向者两个焦点小组访谈会,参加者(10人、12人)包括女性教师、学生、公务员、公司职员等,年龄分布在20—45岁,通过焦点小组访谈总结出女性消费者网购感知主要风险因素,接着进行了深度访谈(42人,非重复抽样),深入探讨女性消费者网购过程高度关注的风险因素,并对风险因素视重要性打分,根据分值将女性消费者网购风险感知要素排列如下:绩效风险,服务风险,交付风险,财务风险,隐私风险,时间风险。访谈过程发现,女性消费者认为来源风险与绩效风险是一致的,表现为网站提供的商品信息与产品不一致或不真实,绩效风险是女性消费者网购最为关注的;服务风险、交付风险、财务风险、隐私风险,由于女性消费者倾向网购的商品类型不同,支付方式也不同,故具体排序有所差异;由于急着使用的商品不会通过网络购买,所以对时间风险关注度较低;被访问者表示对于可能会涉及身体风险、社会风险及心理风险的商品,一般

不会通过网络购买。

Ellen Garbarino (2004) 通过实证研究网络购物风险感知的性别差异中,发现女性消费者在信用卡信息被盗损失、虚假的网站信息、隐私风险、运输风险几个方面的风险感知显著高于男性<sup>[10]</sup>。与本研究通过焦点小组访谈和深度访谈所得结论一致。

#### 四、消减女性网购风险感知路径分析

女性由于社会化过程角色特点及行为特征决定其在网购过程感知风险与男性存在差异。女性天性敏感,对风险更加关注;生活方式细致,对服装配饰、化妆品、零食、书籍、电子产品等需求种类多,更新频率快,喜欢追逐潮流、新奇,成为商家的重要利润来源。笔者根据女性网购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提出消减女性风险感知度最高的绩效风险、服务风险和交付风险的多种路径,使电商更好地服务于女性消费者,提高其网购满意度。

##### 1. 详实、新颖的产品介绍

女性网购最关注的是绩效风险,因为不能在购买前接触商品,依靠产品图片、文字描述、视频及其他买家的评价做出决策,信息不对称,绩效风险较高。女性最担心自己买到的商品与图片不一致。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卖家为降低成本,借用其他卖家图片,产品介绍雷同,缺少吸引力。详实的产品介绍对于消减风险感知至关重要,卖家要重视产品介绍,在真实的基础上突出详细、新颖。制作产品介绍的过程可以参考相关产品的顾客评价,看顾客在购买相关产品的过程中的关注点,有针对性地予以介绍。注意不能刻意回避产品缺点,如实告诉顾客产品的局限和可能存在瑕疵,降低冲动购买的可能性,反而会增加顾客的信任,提高其购物满意度。

##### 2. 多场景、多来源的图片展示

访谈中女性消费者谈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图片色差问题。在不同的光线条件下拍照及买家的电脑显示器差异都会导致色差的存在,难以彻底消除。但是可以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色差对风险感知的影响。首先,图片要真实,照片的拍摄场景尽量选择自然光,色差相对较小;其次,出售的多款、多色产品都要有图片,方便消费者决策参考;最后,照片来源途径可以多元化,实际中卖家提供的图片,消费者总是担心会有修饰、或不真实。可以鼓励买家提供其真实的照片,并采用积分或者折扣等激励手段。其他买家的使用照片,可以更好地为潜在网购者提供有效参考。产品使用方式是个创新无限的环节,有创意的使用方式可以带来新的需求,并提高满意度,对于消减绩效风险感知效果显著。

##### 3. 更精致的包装

网购通常意味着长途运输,交付风险也是女性

消费者感知较高的一种风险。所谓精致包装,既包括硬度适中、大小合适、Logo 醒目的外包装,也包括精美的内包装、使用说明及保护商品的填充物。网购者首先见到的是产品包装,借此形成对商品的第一印象和基本定位,包装对周围的人也可以起到宣传的作用。加之网购商品价格划算,常作为赠送亲友的礼物,包装尤为重要。虽然消费者网购是为了低价格,可是低质量的包装会导致消费者对产品绩效认知的降低,提高交付风险和绩效风险的认知,故得不偿失。况且女性消费者中买椟还珠者大有人在,所以精致的包装对于女性消费者形成重复购买和口碑推荐十分必要。

##### 4. 优质及时的客户响应

由于不能面对面与消费者进行沟通,女性消费者又较为敏感,优质的客户服务对于消减绩效风险和服务风险感知非常重要。归纳访谈过程,女性消费者对网络卖家服务的不满因素主要有:不理人,不热情,反应慢,不了解情况,不能提供有价值参考信息,不能识别老顾客等。网络客户服务应该制定相关标准,不能因为忙碌而忽视顾客。对女性买家的服务过程要注意把握几个关键环节:

(1) 快速响应,耐心解答。可以设置温馨的自动回复,提醒顾客没有被忽视。也可通过可爱的卡通表情进行快速回复,保持顾客受关注的感觉。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所以需要客服耐心解答消费者的各种问题。

(2) 让顾客等待的时间不能太长。由于网络搜寻信息的便利性,买家可以同时联系多家网店,及时反馈尤为重要;

(3) 首先快速浏览聊天记录。根据消费者的关注点,有所侧重地回答其问题。查看记录可以迅速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增加顾客的信任和理解。有利于其他商品的推销。出于分担快递费用的想法,女性消费者一般倾向在同一家店购买多件产品。与其建立亲密的关系,往往可以实现更顺利的推销;

(4) 建立顾客数据库。顾客在咨询商品信息时,有时会简单介绍自己的职业、身高、体重等信息,作为选择商品的参考依据,这些都是商家的重要情报,此外购买达成便获得了消费者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要及时收藏、整理。将顾客加为好友,并根据特征进行分群,方便促销信息的传递,并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全方位消减女性网购服务风险。

##### 5. 完善的售后服务

女性网购的一大障碍是售后服务风险高,访谈过程中,女性网购倾向者明确表达了这种顾虑。产品在使用过程会出现各种难以预料的问题,实体店

铺处理售后服务问题有其便利的特性。网络购物在途时间长,快递过程可能造成损坏,不能面对面交涉,有些问题难以说清等,消减售后服务风险是实现女性消费者放心网购的一个重要环节。完善的售后服务包括:7天无条件退换货,及时征询顾客反馈意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和产品中存在的问题,存在争议时合理的成本分担(尽量多承担邮费部分,店家的邮费更便宜)等。在处理售后服务的过程中,诚挚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网络商品的价格通常大幅度低于实体店价格,在低价格和不影响使用的前提下,一般顾客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瑕疵,提出无理要求的是少数,以诚挚的态度换取顾客的理解是完善售后服务的基础。

#### 6. 高度的口碑传播

Ellen Garbarino (2004) 通过实验法验证了来自朋友的推荐对女性消费者网络购买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笔者在访谈过程仔细询问了女性网购意愿受其他买家产品评价的影响情况,受访者表示购买前会仔细查看其他买家的评价,对于有中评和差评的情况会谨慎购买,并且自己网购后,也会认真进行评价。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说明积极、中肯的评价对于消减女性绩效风险感知至关重要,其他买家的好口碑比高成本广告效果要好得多。如何引导热心买家形成良好的口碑营销效果呢?

第一,鼓励真实原则。对于认真评价的消费者应该给予积分等奖励措施,即使评价非正向,只要是其使用中的真实体验,都应该鼓励。如果一件热卖的商品,评价中没有一句不满,一定不真实、不可信;第二,奖励措施得当。应该根据店家销售的商品类型,选择成本不高,有一定新意的赠品,能达到宣传效果的最好。比较实用的措施是根据评价,先积分,待买家下次购买时,赠送合适的赠品,如小包装食品,购物袋,挂饰等都是女性消费者所喜爱的;第三,建立评价体系。欲形成好的口碑传播,应对买家的评价进行引导。如在店家说明中鼓励对产品颜色、面料、质感等买家关注的细节及新颖使用方式等进行评价,与原有评价形成差异佳,提供使用照片优等等;第四,建立会员制管理模式。每个人对产品的评价是基于其原本使用的产品,在不知评价者为何人时,无法确认其评价是否有参考作用。对多次光顾的买家实行会员制管理,登记其年龄、职业、区域、肤色等信息,这些背景资料可以给其他买家提供更好的借鉴。由于不提供姓名等具体信息,所以不会泄露个人隐私。

### 五、结语

网络购物环境的高风险性,使得相对敏感的女性消费者参与网络购物的担忧有所降低。这实际

上是女性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感知风险更为敏感。网络购物感知风险与网络购物过程中具有的无法事先见到商品实体、售后服务不便、商家违约成本低、立法和监管不健全等特点相关。通过相关的探索性研究,进一步得到以下结论:女性消费者相对于男性所具有的无事爱关注、易受网评的影响、冲动购买及其后的期望失调等网络行为因素导致女性有更高的网购风险感知;女性网购最关注的是绩效风险、服务风险和交付风险三种风险。因此,电商企业应在关注女性网络行为特征和其所关注的主要风险类型的基础上,通过产品、包装、服务、口碑等方面路径,有效消减女性网购风险感知。

时间仓促,本研究只进行了定性调研,没有进一步进行大样本的定量研究,没有深入研究男性消费者和女性消费者关于风险感知的差异,也缺少对女性网购行为因素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的研究,这也是以后的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络信息中心. 2011 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研究报告 [R]. 2011 (12).
- [2] 中国互联络信息中心. 2009 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研究报告 [R]. 2009 (12).
- [3] eDataPower 调研咨询公司. 消费者网上购物感知风险调查报告 [R]. 2004 (8).
- [4] Akaah J, Korgaonkar P. A Conjoint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Risk Relievers in Direct Marketing [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 1998 (4) : 38 - 44.
- [5] Norina L. Columbaro .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 by Deborah Tannen [J].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Quarterly. 1992 (4) :398 - 401.
- [6] Brannon L. Gender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J]. Needham Heights (MA) : Allyn and Bacon, 1999 (2) :187 - 203.
- [7] Slovic P, Malmfors T, Mertz CK, Neil N, Purchase FH. Evaluating chemical risks: results of a survey of the British toxicology society [J]. Hum Exp Toxicol, 1997 (16) :289 - 304.
- [8] 董大海. 消费者网上购物感知风险构面研究 [J]. 管理学报, 2005 (2) :55 - 60.
- [9] 井森. 消费者网上购买行为感知风险动态模型研究 [J]. 工业工程与管理, 2005 (6) :28 - 32.
- [10] Ellen Garbarino, Michal Strahilevitz.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perceived risk of buying online and the effects of receiving a site recommendation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 2004 (57) :768 - 775.

# 基于云存储模式的非书资料管理系统

黄兴燕<sup>1</sup>

(淮南师范学院 图书馆,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介绍了传统的非书资料管理模式,目前光盘网络化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云存储的概念及结构模型。论述了云存储模式下的非书资料管理系统的建立和该系统的特点及优势。

**关键词:**云存储;云计算;非书资料管理;随书光盘管理

**中图分类号:**G2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26-03

Non – book materials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cloud storage pattern

HUANG Xing – Yan

(Library of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introduces traditional non – book materials management pattern,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discs networking management pattern, the cloud storage concept and structure model as well. The paper also illustrates the non – book materials management system built on the cloud storage model as well as its features and superiorities.

**Key words:**cloud storage; cloud computing; non – book materials; book – attached discs

## 一、非书资料的定义、类型及特点

1974 年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 IFLA 对非印刷型文献统一称为非书资料(Non – book materials,简称 NBM)。非书资料是指以音像、形象等非纸质方式记录有知识的载体<sup>[1]</sup>。非书资料根据载体类型的不同,一般来说有缩微型、视听型、机读型、电子型以及网络出版物等类型。与印刷型文献相比,非书资料具有:存储类型多样化、易存储、易检索、易传播、易于共享等突出优点。现在音像资料多以独立的系统(如:网上报告厅、名师讲坛等)在网络上发布,非书资料管理系统多用于管理随书光盘。

## 二、传统的非书资料管理模式

随书光盘出现在上世纪 90 年代,绝大多数图书馆对随书光盘这种新的文献类型没有做明确的收藏规划。对于那些数量众多的中小型图书馆来说,当时计算机网络并未普及,对随书光盘收藏的概念是模糊的,既无完整的编目和分类,也无固定

的收藏空间,借出后归还与否随意性强,缺乏有序的管理,流失了部分的随书光盘资源<sup>[2]</sup>。现行随书光盘管理方式有以下三种:

1. 书盘合一管理方式:将光盘附在书中随图书中,一起参与流通。其优点是光盘可以随图书一起流通外借,方便了读者对光盘的利用。缺点是光盘容易损坏,丢失率较高,影响后续读者的利用。

2. 书盘分离管理方式:将随书光盘与图书同时著录,但分开存放。光盘由电子阅览室或其他地方保管。读者需要借阅随书光盘时,到光盘存放地提出申请,登记后借出。此方法的优点是有利于光盘的保管,损坏率和丢失率低,其缺点是增加管理人员的工作量,同时也增加了读者的借阅手续,影响光盘的使用率。

3. 光盘网络化管理方式:光盘网络化管理方式目前常用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基于 OPAC (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ue 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 系统的管理方式,就是在图书编目时对 CNMARC (China Machine – Readable Catalogue 中国机读目录) 数据添加必要的字段。随书光盘与图书共用一个索书号、条

码号和 ISBN 号。在 CNMARC 数据的 215 字段的 \$e 中, 增加: “本书附书光盘( )张”的内容。在 CNMARC 数据的 856 字段中再添加光盘文件的下载地址。把光盘压缩成 ISO 或 RAR 格式, 建立 FTP (File Transfer Protocol 文件传输协议) 服务器, 把缩成 RAR 或 ISO 格式的随书光盘数据存储到 FTP 服务器上, 供读者下载。另一种方式是购买或开发独立的非书资料管理系统, 这种方式有自己一整套的随书光盘加工、上传、发布、检索等管理办法, 有其独立的数据库系统, 读者使用该系统, 可以通过书名、作者、ISBN 号、索书号等多种途径进行检索随书光盘资源, 并可下载到个人电脑中<sup>[3]</sup>。实现随书光盘的网络化管理, 读者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只要有电脑及网络的地方, 就可以使用随书光盘资源。有效地解决了光盘因使用损坏、丢失而造成的有书无盘, 以及一人借出他人苦等诸多问题。对图书馆来说, 既保证了光盘收藏的完整性, 又实现了光盘利用的高效性, 可谓是一箭双雕的好事情。

### 三、目前光盘网络化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 1. 人力资源消耗越来越大

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图书馆图书的采购量越来越大, 虽然复本有下降的趋势, 但种数越来越多, 附带光盘的比例也越来越大, 光盘资源总量越来越多。图书馆加工光盘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 这项工作逐渐成为了图书馆工作中压力越来越大的工作。

#### 2. 硬件投入成本越来越高

由于光盘资源数量越来越多, 容量越大, 所占的磁盘空间也越来越多, 据统计, 现在随书

光盘的总容量在 33~36T, 7 万多张, 并且每年还在以 1 万多张的数量在增加, 需要占据 4~5T 的磁盘空间。如此大的存储容量对中小型图书馆来说肯定是个不小的压力, 就是对大型图书馆来说, 其硬件投入也是不少的开资。

#### 3. 读者需求及时性的要求越来越高

当今读者对随书光盘的依赖越来越重, 并且对随书光盘发布的及时性要求越来越高。

由于图书馆光盘加工量大, 制作周期就长, 往往新书上架后, 随书光盘要推迟一段时间才能发布在网络上, 有的馆要推迟一个月或更长时间, 这么长的时间显然不能满足读者对随书光盘发布及时性的要求。

## 四、基于云存储模式的非书资料管理系统的建立

单馆模式下的非书资料管理系统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 对图书馆发展也存在着人力资源开销大、硬件投入多、光盘数据更新慢等不利影响。而基于云存储模式下的非书资料管理系统是解决以上问题的有效方法。

#### 1. 云存储的概念和结构模型

云存储是一个新的延伸概念, 缘于云计算。云存储是指在网络技术的基础上, 采用集群应用技术或分布式文件系统技术, 将分散在网络中, 不同地方的数个不同类型的存储设备, 通过专用的应用程序, 将其集合起来协同工作, 共同对外提供数据存储及业务访问功能的系统<sup>[4]</sup>。云存储系统的结构模型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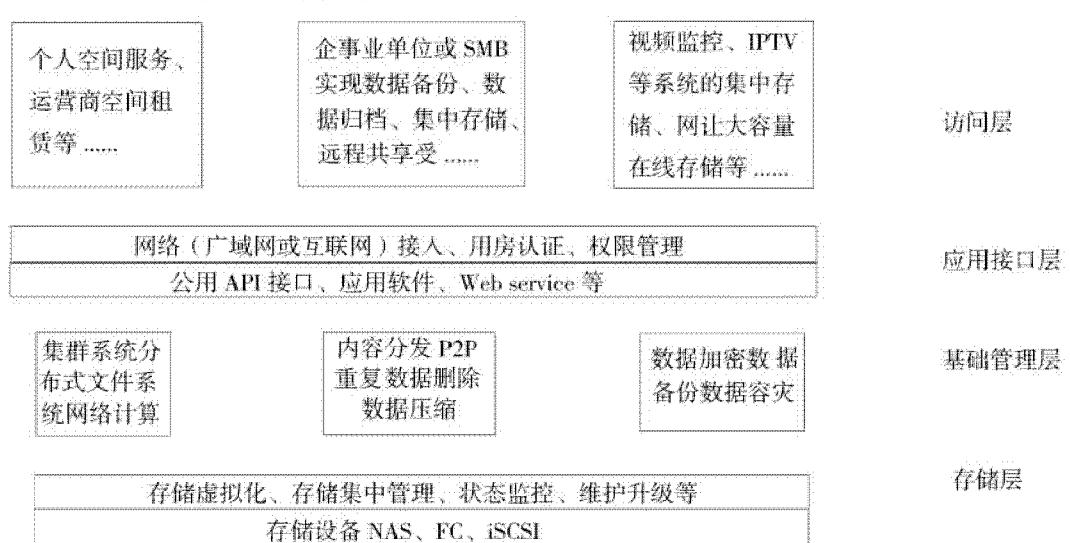


图 1 云存储系统的结构模型

#### 2. 云存储模式下的非书资料管理系统建立

云存储模式下的非书资料管理系统, 是在提供

非书资料管理的数据商处建立云存储服务器集群,把从 90 年代以来,所有附含随书光盘图书中的光盘数据全部放入云存储服务器集群中,并且建立与相应图书 MARK 关联的,供读者检索的数据库系统,对外提供有偿的非书资料检索与下载服务,这属于企业云的范畴。在图书馆也建立一个本地的非书资料管理系统,该系统带有一定的存储容量,用于存放全部或部分本馆现有图书的随书光盘数据以及供读者检索的数据库,对本馆读者提供非书资料检索与下载服务,这属于地方云的范畴,在企业云与地方云之间建立数据同步的关系,企业云存储中的数据可以通过网络同步到图书馆的非书资料管理系统的本地存储中,实现了数据的动态缓存。数据同步关系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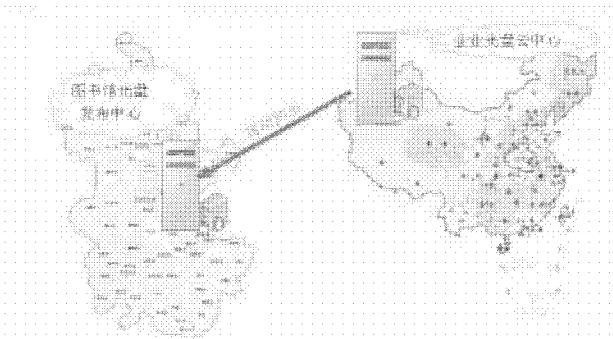


图 2 企业云与地方云数据同步关系

读者检索随书光盘时,先在图书馆本地的非书资料管理系统中进行的,如果检索到本地系统中有该光盘数据,则直接从本地系统载到读者的个人电脑中浏览或安装使用;如果本地系统中没有该光盘,则读者直接向企业云存储系统请求,利用云查找技术,检索到读者所需光盘,提供给读者直接下载,并且张此光盘会自动同步到本地图书馆非书资料管理系统的存储中,下一位读者再检索到这张光盘,就可从本地系统中直接下载。其检索流程图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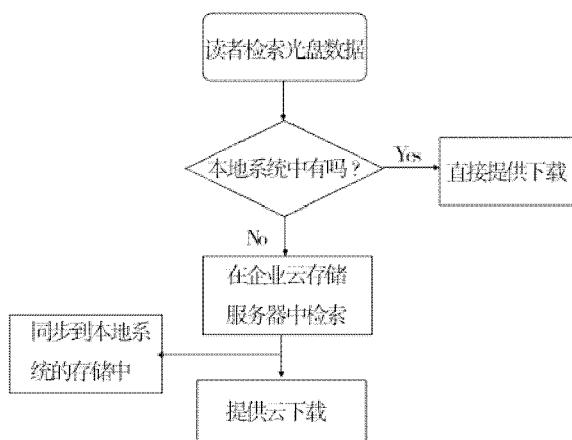


图 3 光盘检索流程

云存储模式下的非书资料管理系统应该支持

P to P, P to SP 等协议,这样可有效提高光盘下载速度。系统还应该具备数据动态缓存、元数据自动更新等功能。所谓数据动态缓存就是由于本地存储空间的限制,随着新光盘的不断加入,本地存储会溢出,这时,系统会自动删除陈旧的光盘数据,保证新光盘数据留有足够的空间。

### 3. 云存储模式下的非书资料管理系统特有的优势

一是各图书馆无需再自行加工光盘,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二是使用数据动态缓存技术,节省了存储空间,节省了存储设备的硬件投入;三是光盘数据更新周期短,由于新的图书所附的随书光盘数据是由数据提供商加工,由专人负责的,所以更新速度快;四是光盘数据全面,查全率高,有利于提高读者满意度。

云存储模式下的非书资料管理系统是图书馆新的服务模式,该系统可以消除传统非书资料管理系统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具有节省人力物力,节省硬件投入,光盘数据更新周期短,光盘数据查全率高等优点,是新一代非书资料管理系统的发展方向。

### 参考文献:

- [1] 魏青山,雒虹. 非书资料管理的比较与思考[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9,27 (2):62-65.
- [2] 陈丽. 非书资料的网络化管理[J]. 中国民康医学,2011,23 (16):2069-2070,2077.
- [3] 吴甫. 随书光盘网络检索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4 (4):69-71,89.
- [4] 秦之瑾. 面向行业的智能化知识管理与云服务方案[J].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2011,28 (12):159-160,182.
- [5] Brodkin, Jon. Storage as a cloud [J]. Network World, 2008, 25 (20):44-48.

[责任编辑:范君李丽]

# 从市场营销哲学的演变看高校如何应对新的毕业生就业形势

汪 煜

(蚌埠医学院 学生工作处,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毕业生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市场选择机制已经形成。受此影响,高校在毕业生就业工作中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越来越多地将一些市场营销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就业工作之中。通过对市场营销哲学的演变过程与我国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历程的对比分析,论证了将市场营销哲学运用与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由市场营销哲学理论的最新发展预测高校将采取哪些措施应对新的就业形势。

**关键词:**毕业生;就业;市场营销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29-04

## How to deal with the new graduate employment situation regarding the evolution of marketing philosophy

WANG Yu

(Students' Affairs Office,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

**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ese graduates employment system has undergone fundamental changes; graduates have alread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abor market. The market selection mechanism of two-way selection and self-employment has been formed. As a result, the roles played by the colleges in employment system of college graduates are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market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applied to the employment work.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e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connection between marketing philosophy and graduate employment by contrasting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marketing philosophy and the reform process of college graduate employment system. What's more, the paper predicts what specific measures shall be adopted to deal with the new employment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marketing philosophy.

**Key words:** graduates; employment; marketing

当前,我国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和供需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机制在毕业生就业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受市场规律的影响,市场营销的理论和方法必然会被引入到高校的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市场营销哲学的演变过程也会与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历程高度一致,通过对最新市场营销哲学的研究,可以预测未来的就业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为高校就业工作指明方向。

## 一、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引入市场营销的理论和方法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尤其从1992年劳动力市场体制改革以后,中国的就业制度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化<sup>[1]</sup>。但对教育是否应该产业化、高等学校是否是企业或工厂、高校毕业生是否是产品等问题,无

收稿日期:2012-11-20

作者简介:汪煜(1974-),男,安徽定远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毕业生就业。

论在政府部门、学术界还是社会民众中都存在着很大争议。抛开教育是否应该产业化不谈,笔者认为,高等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者,与企业生产经营由许多相似之处。国内有学者从十七个方面将两者进行比较,得出了高校和企业一样,具有明显的营销组织主体的构成要件和具体特征<sup>[2]</sup>。

高校毕业生作为社会新增劳动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市场经济中商品的主要特征,理应成为劳动力市场的组成部分。2002 年教育部等四部委在《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意见》中要求,“必须进一步深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建立市场导向、政府调控、学校推荐、学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用政府文件的形式正式将高校毕业生纳入劳动力市场的范畴。因此,市场营销的绝大部分理论和方法都可以在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加以应用。

随着高校扩招步伐的放缓和经济社会的逐步转型,高校的毕业生就业工作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既有机遇又有挑战。高校一方面要解决扩招后大批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帮助他们充分就业;另一方面要面临自 2009 年以来全国高考报名人数逐年下降带来的生源危机的挑战,毕业生就业状况对其生源的好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是在就业工作市场化后出现的。市场营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营利性企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近几十年国外许多非营利组织也在其决策和管理中引入市场营销的理论和方法,摸索出了一套适合“无利润分配机制”的市场营销理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作为非营利性事业单位的高校,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利用市场营销的理论和方法,无疑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选择。

## 二、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历程与市场营销哲学演变的对比分析

市场营销是指以满足人类各种需要和欲望为目的,通过市场变潜在交换为现实交换的一系列活动和过程。市场营销哲学,就是企业在开展市场营销活动的过程中,在处理企业、顾客和社会三者利益方面所持的态度、思想和观念<sup>[3]</sup>。自 17 世纪 50 年代市场营销成为企业自觉实践以来,先后出现了生产观念、产品观念、推销观念、市场营销观念、客户观念和社会市场营销观念。其中,生产观念、产品观念和推销观念通常被称为传统观念。

生产观念和产品观念都是建立在商品供不应

求的卖方市场条件下的营销哲学。前者重生产、轻营销,认为企业应不断扩大生产,降低成本,以扩展市场。后者重产品、轻需求,认为企业应不断改进产品,提高其附加值。推销观念产生于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过渡阶段,认为消费者多存在惰性或抗衡心理,企业必须采取各种推销手段,刺激消费者购买本企业产品。在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三个阶段中,都体现出或自觉、不自觉的运用到这些传统营销观念。

第一阶段从 1982 年到 1989 年,始于恢复高考后首批学生毕业。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毕业生由国家集中统一计划分配,高校和用人单位必须严格按计划派遣和接收毕业生,毕业生也必须服从分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在后期高校也参与到调配计划的制定和协调中,但用人单位和毕业生仍没有自主选择权。在此阶段不存在毕业生就业市场。第二阶段从 1989 年到 2002 年,始于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的《关于改革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报告》。主要特点是择优推荐和有条件的双向选择,即放宽对毕业生就业地区和部门的限制,支持和鼓励多种所有制单位接收毕业生,毕业生按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双向选择就业或按调节性合同规定就业。此阶段是就业市场萌芽和初步形成时期。

在这两个阶段,高等教育仍是精英教育,高校毕业生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加之,就业市场尚未最终形成,高校没有推销或营销毕业生的必要和可能。但高校在此期间高度重视人才培养的质量,进行了大量针对性的教育教学改革,为国家输送了一批急需的高质量毕业生,体现出了生产观念和产品观念的理念。

第三阶段从 2002 年至今,始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意见》。主要特点是市场导向、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即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要求挑选对方,国家只对就业市场进行宏观调控。至此,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吻合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基本建立。

在此阶段,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毕业生逐步从供不应求向相对的供大于求转变,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凸显出来,就业率成为悬在高校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提高就业率,高校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推销毕业生,推销观念被广泛采用。在就业工作中,除了盲目追求高就业率,弄虚作假导致毕业生“被就业”等问题之外,还出现了市场营销哲学认为在推销观念指导下最容易出现的“市场营销

近视”。“市场营销近视”就是企业只关心如何让用户接受自己已经生产出的产品,不注意捕捉和预测市场需求的变化,生产出来的产品虽然很好,却因不符合市场需求卖不出去,最终陷入困境。

我国平均受教育程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急需大量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另一方面,高校自主办学权力有限,不可能即时根据市场需求作出调整,而部分高校仍抱着学校就是培养人才的,只要培养出合格的毕业生,就完成了任务,就业是政府和毕业生自己的事,忽视就业工作,缺乏市场观念,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不能满足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于是出现了在大批毕业生找不到适合工作的同时,大量用人单位招不到合格员工的结构性失业现象。这种结构性失业就是“市场营销近视”所造成的。

不难看出,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与发展脉络是和市场营销哲学的发展与演变一致的,其未来的发展也必将与市场营销哲学的演变相一致,这是由高校毕业生是劳动力市场组成部分这一市场属性所决定的,是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必然结果。

### 三、市场营销哲学的新发展与高校如何应对新的就业形势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力快速发展,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新的市场营销哲学应运而生。先后出现了市场营销、客户和社会市场营销等观念,营销组合也从4P扩充发展出6P、10P、4R等组合。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将毕业生真正纳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更晚,随着毕业生就业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市场营销哲学发展的新成果必然会更多地得到运用。从市场营销哲学的发展脉络中,不难得出高校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应对新的就业形势。

#### (一) 把就业工作提升到学校的战略发展层面

科特勒认为<sup>[4]</sup>,在战术营销组合制定之前必须做好探查、分割、优先和定位四项战略营销计划。即通过调查研究,根据消费者不同需求细分市场,预测市场未来发展趋势,据此选择可以最大限度发挥自身优势的细分市场,并通过塑造独特的企业或产品形象,确立与自身条件相符的市场位置,确保企业和产品能紧跟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实现企业的长期发展。

随着高校扩招步伐的放缓,毕业生就业工作正从暴风骤雨式的应激状态逐步向常态化过渡,从单纯肤浅的数量统计向深层次的质量提高过渡,从短

期行为向着眼长远过渡。与企业制定战略营销计划一样,为适应这种转变,高校必须将就业工作提升到学校战略发展层面来考虑,将就业工作重心,从就业指导、信息收集、市场开拓等事务性工作转移到分区域、分类别、分学科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分析研究和人才市场需求的预测上,为高校教育教学效果的评判提供客观依据,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专业设置与调整、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和长远发展定位提供决策依据,推进高校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有特色、高水平的发展道路。

#### (二) 为用人单位提供更多的让渡价值

现代市场营销观念认为与价格相比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时更看重所获得的让渡价值,即得到的总价值与付出的总成本之间的差额。企业只有比对手提供更多的让渡价值,才能在竞争中胜出。同样地,高校要想在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中胜出,也必须在提升毕业生质量的同时,尽可能减少用人单位招聘和使用毕业生的成本。

1. 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质量的好坏始终是市场竞争的基础,无论何种营销哲学,都是建立在高质量产品基础上的。同样,毕业生的综合素质是其就业成败与否的关键所在。高校应在准确把握市场需求的前提下,依据自身条件,即时调整办学定位和方向,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转变。研究型大学应着重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高层次研究型复合型人才,应用型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要大力培养动手能力强、社会急需的高水平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同时,加强毕业生学习、社交、创业、职业生涯规划、求职择业与自我营销等能力的培养,提升毕业生的竞争能力和用人单位所能获得的总价值。

2. 大力推进校企深度合作。通过一对一的营销模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其特殊需求的客户观念,适用于那些高价值或需要周期性重购、升级产品的营销。为了使毕业生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能紧跟知识和技术更新的步伐,目前高职高专院校多已按照客户观念,采取了订单培养模式。这种模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要求的吻合度,较好地解决了前面提到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同时,大大节省了用人单位的招聘及后期培训的成本,学校和学生也没有了就业的后顾之忧,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和学习上,形成各方共赢的局面。

舒尔茨在关系营销的基础上提出了关联、反应、关系和回报4个全新营销要素,即4R组合。指出在竞争性市场中,顾客的忠诚度是不断变化

的,企业只有让用户介入产品的生产、定价、渠道、促销等营销组合的各个环节,与之形成互助、互求、互需、互动的关联关系,双方均在交易中获益,使交易变成责任,让顾客变成朋友,才能赢得稳定的生存空间。高校扩招、合并、升格,在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高校及毕业生同质化的倾向,高校间展开了激烈的甚至是恶性的竞争,促使高校必须找准自身定位,走差异化发展之路。为此,高校应该在利用自身的人才优势,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的基础上,推动校企开展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合作,让企业参与到高校专业的设置、培养方案的制定及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中,逐步形成稳固、长久的战略合作关系。

### (三) 走社会化发展之路

1. 充分整合、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科特勒将不可控因素引入到4P组合中,提出了大市场营销理论。认为可控的因素是相对的,不可控因素对企业的影响和制约是绝对存在的,企业不应简单地适应环境,需要科学安排营销组合,使之与不可控因素相适应,甚至影响自己所处的市场环境。毕业生就业工作是一项牵涉到方方面面的民生工程,对高校来说不可控因素很多,不是高校单方面能够解决的。因此,高校要运用大市场营销理论,整合教师、校友、家长等各种资源,充分利用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各方力量,争取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抢占就业市场的先机,赢得竞争的主动。

2. 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和责任。上述各种营销哲学的出发点都是企业和消费者利益,忽视了这两者与经济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之间潜在的现实冲突。20世纪70年代以统筹兼顾企业、消费者、社会三方利益的社会市场营销观念逐渐形成。企业承担的社会义务和责任越多,就会得到更多消费者的认可,从而在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大学的社会责任应超越社会义务这一层面,它是指大学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应承担的独特的使命与责任<sup>[5]</sup>。胡锦涛主席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对高校的社会责任提出了新要求,即“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弘扬我国优秀

传统文化,是在广大青年中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高校只有顺应这一历史发展潮流,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 (四) 组建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就业工作队伍

当前,就业工作的重心正在由单一地注重校内产品生产或单一地注重学校产品销售,向研究市场需求、注重产品加工、兼顾营销各个环节方向转变<sup>[6]</sup>,工作的性质和内容发生了根本变化,迫切需要在原有的公共管理、职业指导、心理咨询等专业人员之外,组建一支规模更大,涉及学科更多的职业化、专业化的就业工作队伍。例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库营销、网络营销、体验营销、顾客关系管理、交叉销售等全新的市场营销观念已被企业广泛应用,随着这些营销观念的引入,需要具有市场分析、信息工程、公共关系等教育背景的专业人才加入到就业工作的队伍中。因此,未来要想做好就业工作,只是简单地保证场地、设备、人手等条件已是不可能的了,它需要从战略高度长远谋划,需要更多人、财、物的投入,需要引进和培养大量高层次的专业人才。

### 参考文献:

- [1] 邹东涛. 发展和改革蓝皮书(No. 1)—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1): 6.
- [2] 黄苏芬, 祖明. 大学生就业工作中的市场营销理念探讨 [J]. 宿州学院学报, 2005, 20 (10): 129.
- [3] 郭国庆. 市场营销学通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4): 19.
- [4] 菲利普·科特勒, 加里·阿姆斯特朗. 市场营销原理(第13版) [M]. 楼尊,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5] 袁长清. 高校大众化教育中的社会义务与责任 [J]. 教育与现代化, 2002, 65 (4): 64.
- [6] 郑晓明. 高校大学生就业市场营销发展新趋势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6, 148 (8): 48.

〔责任编辑:吴晓红〕

# 读诗会：朵渔诗歌的当代性

主持人：王光明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48 )

**摘要：**朵渔诗歌具有鲜明的“当代性”，这体现为他的诗歌介入和见证当代生存的愿望和能力。他在诗中或与伟大人物对话，或回溯平凡祖先的一生，从中辨认当下生存的困境并汲取活在真实中的力量。朵渔诗歌有很强的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能力，并不断走向开阔和博大。但感时忧国情怀驱动下的批判书写和反讽诗学也成了他写作中的一把双刃剑。当代诗歌的现实担当精神和诗歌的本体立场之间如何融合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读诗会；朵渔；当代性；感时忧国

**中图分类号：**I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33-06

A poetry seminar: the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of DuoYu's poetry

WANG Guang-m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DuoYu's poetry assumes evident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impulsion and capability of his poetry to witness the contemporary subsistence. He either converses with great figures, or traces his ordinary grand father's life, from which he identifies the dilemma of current existence and draws the spiritual strength in reality. DuoYu has a strong capacity of introspection and self-renewal, which helps his poetry to move towards an open and broad sphere. Yet, critical works and ironic poetics driven by his concern of the era and the country has become a double-edged sword in his writing. So, how to merge the realistic feelings of the contemporary poems and ontologic position of poetry is a worthy of meditation.

**Key words:** poetry seminar; DuoYu;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the concern of the era and the country

## “当代性”和朵渔诗歌的“当代性”

**王光明：**这学期我们以一系列当代诗人作为讨论对象，通过探讨这些活跃在诗歌现场、诗艺正在发展着的诗人诗作，去和当下诗歌对话，并思考新背景下何为诗歌、诗歌何为的问题。本次我们讨论的对象是朵渔。讨论文本包括：朵渔诗歌《河流的终点》、《听警察讲妓女被杀的故事》、《秋天带来怀恨的人》、《拉拉：最终的虚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大雾——对话：索尔仁尼琴》、《高启武传》、朵渔随笔《追蝴蝶·后记》等。

**陈培浩：**我先介绍一点朵渔的情况。朵渔，1973年出生于山东，原名高照亮，1994年毕业于北师大。朵渔曾经是“下半身诗歌”代表，但是2003年朵渔对下半身的身体写作伦理有了反思，他的诗歌开始走向广阔和承担。2008年以前，朵渔的名声主要是在诗歌圈内，但汶川地震时他的那首《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使更多诗歌圈外的人认识了他。2009年，朵渔获得了华语传媒文学奖年度诗人奖。朵渔同时还是一个文化学者，出版过《史间道》等著作；反而是作为诗人，他的诗集并没有正式出版过。他的诗集《追蝴蝶》实际上是由民刊

收稿日期：2012-11-20

**主持人简介：**王光明(1955-)，男，福建武平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艺学；讨论人：陈培浩、王飞(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博士生)；徐娜婧、彭英龙(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硕士生)；徐小、任培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硕士生)；景立鹏、张吟雪(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硕士生)。

《诗歌与人》出版的，并无公开刊号。朵渔在该书后记中称，他将用这种方式来出版他的全部诗歌。他是一个有态度的诗人，是一个表里如一的诗人。大学毕业后由于无法适应体制生存，遂辞职做自由撰稿人。他是这个时代罕有的努力保持写作与生活同一性的诗人，因此他的诗歌才被认为创作了一种独特的尊严感。我本人非常佩服朵渔诗歌跟现实短兵相接的能力，佩服朵渔诗歌中心灵跟坚硬现实对峙的紧张感。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作品来探讨。

我为本次讨论寻找的一个角度是当代性。当代性是一个近年诗坛关注较多的话题，孙文波正在编一个诗刊就叫《当代诗》，后来还在首师大搞过一次关于“当代诗”的专题讨论。我原来对这个概念持保留意见，因为觉得在现代之外，后现代、当代这些接踵而来的概念都有边界不清的问题，引进诗歌后就更是如此。但是，这个概念跟那些仅为争夺眼球、分享象征资本的泡沫概念还不一样，它虽没有清晰的边界，却有可贵的问题意识。这个概念被使用、被讨论源于现代汉诗在审美和内容上持续更新的需要。现代汉诗不是已完成的美学结晶，而必须在和新时代持续对话中完成对体制化话语的脱壳和美学更新。在新世纪复杂的诗歌语境下，一方面审美自律性日渐成为某种体制化想象，甚至已经有大量的“先锋流行诗”（陈超语）；另一方面，很多人依然不惜牺牲诗歌的文类特点，一味强调诗歌的道德承担。那么，究竟何为当代性，什么是当代诗歌值得探索的方向，显然有讨论之必要。

因此，虽然“当代性”跟当代文学的“当代”有纠缠，跟“后现代性”，“先锋性”同样有纠缠，即使它不足以成为建构文学史的概念，但依然不失为当下文学批评中的有效概念。

我所理解的“当代性”：“当代性”不是对“现代性”的绝对反叛和断裂，而是“现代性”在当下的深化和具体化。另外，“当代性”跟“后现代性”可以没有关系，但不排除某些具有当代性的诗歌被阐释出后现代特征。我理解的诗歌“当代性”就是有跟当代存在持续对话的强烈愿望，有能力见证当代的生存困境，在凝聚当代经验的过程中不离弃对诗歌本体立场的守护。在生存和审美的双重前沿探索诗歌的新可能。

我理解的朵渔诗歌的“当代性”，它大概表现为三点：一、写作的自我反思和更新的能力。朵渔曾是“下半身写作”的代表人物，上世纪末开始形成的身体写作伦理在世纪之交几乎演变为一个神话，“下半身写作”正是身体写作伦理在诗歌的延伸。然而，2003 年前后，朵渔却因为一场大病而意

识到身体写作伦理的限度（固执于身体对写作既是一种打开，也是一种遮蔽），从而更新了自己的写作。2008 年的地震诗之后，很多人欣赏朵渔诗歌那种对抗性的质素，那种金刚怒目的一面；可是朵渔的写作追求非常自觉，他在次年发表的《爱虚构》组诗中呈现了另一面：在离乱之世中坚守爱的可能的一面，即“饮你的茶，但不饮你的恨”。这些诗歌中朵渔的技巧细腻高超、修辞丰富，这是一种诗的态度；同时又思想深邃，深刻而不刻薄，更有一种可贵的文学态度。二、朵渔诗歌自觉延续写作的承担姿态和知识分子传统。九十年代特殊的文化语境中，痞子、混不吝、满不在乎等气质大行其道，“知识分子”成了被污名化的对象。一时风气，那些本来都是知识分子者，都自称反对“知识分子”。朵渔明确提出“诗人不该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可以看到他对于五四、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传统的自觉传承。九十年代以来，坚守、庄严和沉重经常变成被嘲笑的对象，似乎只有插科打诨才是人的本然。但朵渔明确向这些说不，他说诗什么也不能承担，但可以承担虚无。如此以写作/生活的同一性来强调承担，使朵渔获得在当代写作中的辨识度。三、见证与愉悦的双重坚守。诗的见证和诗的愉悦常常被割裂，它事实上涉及了诗歌与社会、诗与本体的关系，所谓大众化和纯诗化是纠缠二十世纪新诗史的一组关系。介入社会的见证伦理往往忽视诗歌的本体要求，而文本愉悦的自律性伦理发展到极端，也渐渐丧失跟时代和存在对话的能力。朵渔诗歌就有兼容二者的自觉：在见证一端，从思想、历史切入，希望用诗歌进入历史，为当下寻求一个解释，如《高启武传》；但在愉悦一端，他的写作在修辞和想象的独特性上同样突出。《高启武传》中“我”想象跟已逝的爷爷同回童年，隔代对话，这是属于诗歌的想象力；而他诗歌丰富的手法，如“阶级的虚线”、“世俗的斜坡”等精彩同位喻的使用，使他诗歌的见证并不殃及诗的愉悦。我先介绍这些，请大家讨论。

**王飞：**回应一下培浩谈的当代性，就朵渔的《河流的终点》来说，他以隐喻的方式提出一个纯粹当代的问题：人的存在意义如何安放？在前现代，比如基督教背景下的，人除了现世的荣誉、职责，还有终极的意义守护和接纳。在儒家伦理中，各阶层的人也都有命定的位置和存在意义。只有当代，人的存在意义成了问题。举个例子，九十年代之后，随着“劳动光荣”这种伦理逐渐贬值，普通劳动者只是在一种严重透支的国家政治伦理中还有名义上的存在意义。实际上，普通劳动者除了是

卑贱的劳动者，在大众的价值判断中没有什么荣誉和意义，成了当下价值尺度无法容纳的群体。再者，当下的年轻人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的时候，他们的父辈因为缺乏经济权威和技能，其生存信念和价值被背弃了，成为子女们最不愿成为的人，这些人的存在意义无处安置。而诗人以一种宽厚、悲悯的情怀，不关心河流有着怎样不同的起源和性质，关心那些河流——不同的生命历程、命运、道路——是否被接纳的问题，事实触及“当代”的意义破碎图景。

### 见证当下的愿望和能力

**陈培浩：**朵渔诗歌有很强的和当下生活对话的愿望和能力。他的诗歌不但对正在发生的生活作出反应，而且往往能找到诗的回应方式，努力去敞开当下生活的复杂面相。或许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比较早期的一首诗——《听警察讲妓女被杀的故事》。

**徐娜婧：**我认同培浩师兄前面的说法：“当代性”趋于指向当下这层意思。在读《听警察讲妓女被杀的故事》这首诗时，我一直在想，它的“当代性”体现在哪里？或许，从它的主题到措辞风格都相对的当代、当下，体现对当下社会中的常发事件、小人物命运的关注。还有一种感觉，可能有些引申过度了，这首诗的整体风貌类似唐诗中的元白诗派，生活气息较浓厚。

这首诗的题目已经交代了内容——听警察讲妓女被杀的故事，“我”于是思考：这个妓女是否可能有其他命运结局呢？借着几行很有趣。“一片云从山顶/翻过来，露出微雨的清凉/两只蝴蝶在木栏上/扇动着翅膀，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了”。就整首诗而言，此前此后说的都是“听警察讲妓女被杀的故事”这一话题，中间跳开来插入这几行，再重新折回。翻过山顶的云，蝴蝶的扇动，微雨的清凉，由这些组成的情境造成一种冰凉的触感，情绪方面倒是契合了诗情的需要。若是没有这几行，这首诗肯定会黯然失色不少。

**陈培浩：**你讲得很对，这是一首口语诗，口语如何创造诗性，这里有点场景切换、蒙太奇的意思，一片云从山顶/翻过来的“翻”字就可以看出语言功力。

**王飞：**中间这几句确实有意思，诗人在具体的情境中思索这个妓女的命运，这是一个群体普遍性的悲剧，无可避免，即便蝴蝶扇动翅膀——象征着可以引发风暴等巨大、未知的后果并改变未来——结果仍是一样。

**王光明：**我也觉得“一片云从山顶/翻过来”这一段写得很好，但为何要有最后几句“这老兄/一边写诗，一边办案，死与抒情/正如黑暗融进黄昏的光里”呢？前面写妓女被杀，并且“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了”的命运，都非常好，但后面似乎有点冲淡主题了。

**陈培浩：**我是这样看的，我恰恰是喜欢最后这几句。底层写作是新世纪以来非常热门的话题，但诗歌如何去书写底层？如何不被道德所绑架，写出事物应有的复杂性呢？一个妓女被杀了，可能有人会写妓女的悲惨，有人会写凶手的残忍，有人会写社会的冷漠。朵渔虽用极平淡的口吻，但他在追问，她的命运是否有另一种可能。然后他说：没有，不能有另一种结局！为什么没有，最后几句或许就是答案。写诗的警察在此有两种身份：作为诗人，他也许是人道的、悲悯的；但作为警察，他显然不可能以诗人的立场去办案。人总是在某种社会身份中被格式化，被循唤出某种人格。诗人和警察的身份同存于一人身上，它提示着一种暧昧性——“黑暗融进黄昏的光里”，这也是一种光明和黑暗的过渡状态，这种复杂的交织恰恰回答了何以她的命运没有其他结局。

**王光明：**可是一首短诗，主题太多，力量就散了，这是值得思考的。

**彭应龙：**我觉得《听警察讲妓女被杀的故事》中间写到云和蝴蝶的几句，写的是当时诗人眼前的实景：也就是诗人琢磨着“会不会有/另一种结局”的时候，他看着眼前的景色，沉思了一会，又想“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了”。最后的结尾“这老兄/一边写诗，一边办案，死与抒情/正如黑暗融进黄昏的光里”倒未必是对警察的反讽，而有可能是对诗的反讽，“一边写诗，一边办案”是说写诗的这个身份无法改变他警察的这个身份，“抒情”总是无力的。这和《今夜，写诗是轻浮的》的结尾构成呼应：“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今夜，人类的沉痛里/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轻浮如刽子手，/轻浮如刀笔吏”，二者都有一种对诗歌写作本身的反讽。

**景立鹏：**王飞师兄上面从当代性谈《河流的终点》，我来细读这首诗。此诗用一个极具历史重量和情感容量的意象表达了对现代人当代生存的深切关照与思考，包含了行走与皈依、漂泊与家园的辩证法。整首诗围绕着“河流”这个核心意象展开。“河流”是时间与生命的象征，她绵长、广阔、

优雅，她们有潮起潮落、冰期汛期，她们有不同的“出身”，各异的“家谱”，操控着“胃里的鱼虾的命运”，又都承载了无数“生活的泥沙”和沉重的历史。然而，这些都不是诗人所关心的，诗人关心的、找寻的是河流的终点，或者说，诗人关心的不是河流从哪里走来，走在哪里，而是走向哪里。诗人终于找到了，找到了河流的终点——一个接纳了她们疲惫的身躯的地方，一个劝慰了她们艰难的旅程的合适的理由。而至此，诗人也完成了对人的当代生存的隐喻。在缺乏厚度、醉心速度的狂奔时代中，在急功近利、众生喧哗的商业浪潮中，在钢筋铁骨、色彩斑斓的城市文明里，人们相互追逐、行色匆匆而又不知所往，最终沦为生活的浪子，精神的逐客，时间的浮萍。

另外，这首诗在形式上也颇为讲究。首先，主体视角的切入，如反复在句首出现的“我关心”“我不关心”准确的表明了诗人的积极介入姿态。其次，前几句均为“我关心的不是”“我不关心”，在不断的否定中使诗歌的语势、气脉越来越坚决，诗末用一句干脆的“我关心的是河流的终点”对前面做出回应，掷地有声，铿锵有力。

**徐娜婧：**我也说说《河流的终点》。这首诗的节奏比较明显，词句上直接提示出来：从“关心的不是”“关心的不是”到“不关心”“不关心”再到“关心的不是”“关心的不是”，诗篇前面的这种否定情绪以简单的对称呈现，一气呵成读下来却带来一种疑惑和欲望，到底关心什么？当然，诗歌的题目本身点明了关心的对象，然而氛围的营造还是有它的效果：“我关心的是河流的终点”，读到这一句，读诗的人和诗人一起松了口气。此外，最后几行的这个“比如”很有意思。放在此处看似偶然的联想，随意举个例子——“比如我记忆里的/一条河流，她流到我的故乡时/已老态龙钟，在宽大的河床面前/进退，欲走/还休。”却让人忍不住怀疑这份随意和偶然的真实性，一个相当可能的场景是这样的：由于某种契机诗人想起了故乡的河流，记忆中的河流，与此同时对“河流的终点”这一问题的关怀应运而生，接着就出现了上述的写作。

## 诗歌如何进入历史

**王飞：**培浩，不如你谈一谈《高启武传》。

**陈培浩：**这首诗以诗作传，写的不是历史大人物，而是朵渔的祖父高启武。它不是写祖父生平，来投射一种亲情和怀念，而是把祖父的一生的几个片段置于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中，从中辨认一个普通人在历史中对真诚、真话的坚持。朵渔不

是日常地写祖父，他是历史地写祖父。对祖父命运的回顾使他发现：祖父的命运并未随风，说谎还是求真依然是一个在折磨当代人的问题。这首诗显示了强烈的进入历史的愿望，当朵渔在当代稀薄的精神空气中向历史求助时，他却从祖父这种普通人的真诚获得坚守的信心。

**景立鹏：**朵渔的这首颇具史诗风范的《高启武传》，似乎试图通过一个人的命运轨迹写出个人命运与历史理性之间的胶着与离散状态，从而在历史现场中窥探隐匿的真理。诗中既有对个人命运的同情，又有对历史真相的追问，所以在诗的结尾诗人说：“我在抽象的思念你、还原你、答复你！”同时这种个人命运被历史裹胁的重述，又渗透着一种无力感和焦虑感。

高启武每一次的人生沉浮都与历史紧密相关，充满紧张感。苦难的少年时代，他需要吃土，却还得在黑窝头里寻找安慰，在浮冰的闪光里，在谋生的游戏里寻找安慰；翻身的时代，他“挺了挺腰杆”却“有点硬，有点疼”，可是一转眼就被“从同志打回敌人”，重新熟悉“黑暗的牢房，地主的粮仓”。

在语言形式上，该诗颇具匠心的分别采用史传手法和现代诗形式并行的两条线索展开，无疑又增加了历史的反讽性。古代立传的多为上流社会的贤达或知名人士，而且内容多为歌功颂德。劳苦大众只是史册中沉没的大多数，他们是失语的。而诗人却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沉默者立传就颇有意味了。是反讽？是扣问？

另外，从修辞策略上来看，这种张力恰恰就表现在大的反讽之下的无处不在“小反讽”。“夜里狗叫，不是鬼子进村，是乡上的书记/有人了解他的底细，让我奶奶不要出门”，而且他要相信“小儿子就是喜欢啃树皮”“大儿子不是水肿是阶级的虚胖”“老婆不是不能生她是政治性的月经不调”，他喜欢听“那集权的钟声，牛虻与耗子的合唱”。诗人通过一系列的反讽对个人与历史的关系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但却没有答案，只能“抽象地思念你、还原你、答复你！”

**张吟雪：**《高启武传》这一组诗通过小人物的人生片段介入历史，探究的是小人物高启武对于生存和尊严的追求。对于诗歌而言，这种介入的视点是特别的。诗中的高启武同余华笔下的福贵有着某种相似，他们最为基本的追求同样是活着，不同的是朵渔赋予了高启武更多精神层面的内容。比如对于正义的执着“八千人等着你去说谎，八千人等着你来犯错/但我们没有粮了，这千真万确……”，“八千人抓住了你的脖子，将你垂直地从同

志打回敌人”,以及对于政治的抨击:“你告诉过我你从来不缺阶级的敌意”,“你的大儿子不是水肿是阶级的虚胖/你的老婆不是不能生 她只是政治性的月经不调”。

高启武临终前,语其长孙曰:“吾一生,苦甚!汝当努力为学,食官粟”。这句话,是高启武终其一生对于苦难的理解,苦难是由于阶层的差异,也许登上体制的列车,就会脱离苦难。而朵渔也确实的做到:“我后来的确端上了这样一个铁饭碗,但最终我还是亲手把它砸了。我不是讨厌碗里的饭,但我讨厌盛饭的碗。”由此,朵渔与其笔下的高启武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对于体制的讽刺,对于政治的讽刺,对于正义的坚持。正如他自己所言“昨天的你,今天的我…”,朵渔笔下的高启武更像他自己的形象。但我不太明白诗中“你死了,死的意思是/我们终于有了同一个父亲”的意思。

**陈培浩:**大概是朵渔从祖父对谎言的拒绝中找到生命认同感的一个诗化表达,这是诗中他和祖父成了“兄弟”的原因,也是诗最后一句“我在抽象地思念你、还原你、答复你!”中“抽象”和“答复”的一种具体诠释。

**徐娜婧:**人死后,入土为安。土地是爷爷的归宿,最后也会是孙子的归宿。也可能和父权传统有关,父亲死后,长子为父,同样都是权威。这里想提供多多的一首诗《我读着》,写父亲。诗歌的最后是这样的:“我读到我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腐烂/我父亲身上的蝗虫,正独自存在下去/像一个白理发师搂抱着一株衰老的柿子树/我读到我父亲把我重新放回到一匹马腹中去/当我就要变成伦敦雾中的一条石凳/当我的目光越过在银行大道散步的男人……”

**陈培浩:**诗歌这种非叙事文体是否有能力进入历史,该如何进入历史,我想对这些问题《高启武传》都有所回答和探索。他进入历史的愿望,对于沉迷于虚假经验的写作是一种匡正;他在遗忘和阉割记忆成为支配性制度的环境下,重新思考了诗歌何为的问题。

## 反讽诗学的双刃剑

**陈培浩:**不如谈谈这首《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它被认为是2008年地震诗潮中写得最好的一首。它超越了由灾难激发的一般性同情和眼泪,以及包裹在“大爱”叙事中的胜利幻觉。在死亡这种绝对的灾难面前,没有任何胜利可言。所以,它所谓的轻浮,事实上不是对同情心的拒绝,而是对同情心在复杂的话语环境中被利用而产生的耻辱感。反而是这种对“轻浮”的耻辱感激起了知识界强烈的共鸣。

**王飞:**《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主题大概是仿照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景立鹏:**如果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表现出了诗歌,或者说艺术对人祸的无力与沮丧感,那么,在汶川地震时“写诗是轻浮的”,则表达了诗歌在天灾面前的无奈与自卑感。但诗人并没有止于此,相反无奈与自卑只是他反思与抗争的起点。

**徐娜婧:**《今夜,写诗是轻浮的……》这首诗成功的背后有一个大情感在推动着,面临诸如地震这样的灾难时,人内心深处的悲悯与恻隐都很剧烈,在同情体验中感受到巨大的沉痛与巨大的爱。

**张吟雪:**有人评论说读朵渔的诗歌会体会到一种“隐私被掀起一角的快感”。这种快感是诗人自己的同时也属于读者。对于这种快感我的解读是读者的认同感。在《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中,诗人写“主持人是轻浮的,宣传部是轻浮的,将坏事变成好事的官员是轻浮的…”这种带有讽刺性的评论是针对某种宣传论调,针对于媒体高调的渲染。这种讽刺于读者必然是有共鸣的,即所谓认同感。

**彭应龙:**我来谈谈朵渔的《大雾——对话:索尔仁尼琴》,诗中写道:“想当年,伟大的雾都时代,那迷人的/大雾,团结如细雨,幽暗如原野/多少天才在雾中相遇、相爱/在雾中团结起来……”其中“大雾”应是指极权时代,在这样一种极端的社会状态中反抗的东西很明确,但现在这个时代给人的困惑是,“如今,雾已散去/你已离开,烟尘滚滚,映现着/闪光的碎片,基础不在了,只剩下/赤裸裸的荒原”,就是,你想反抗也不知道反抗什么了。但是后文又写道“就让大雾把一切重新遮盖吧”,“大雾”的隐喻再次出现了,意思好像变了又好像没变,这里给人的感觉是,朵渔自己好像也没想清楚自己在想什么……

《大雾》的结尾中的“细雨中的苹果树”、“堆聚在农具间的雪花”、“牛仔裤、花衬衫”等等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柔弱”的意象,作者在一番对体制的抗争之后,意识到对蕴藏在日常生活自身中的美与尊严的观察和体认,本身就构成“一种对铁的应答”。这与肖开愚在九十年代后期的转变有点类似,肖开愚在九十年代写了很多反讽现实的诗歌。而在1997年写了一首《安静,安静》,这是一首写日常生活的、柔弱的、充满温情的诗,这首诗意味

着肖开愚看待生活的方式有所变化,里面有两句是这样写的,“既不享受拒绝之硬,/也不享受逃避之软”,这里“拒绝之硬”指的就是与体制的硬碰硬,对抗性,而“逃避之软”指的就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诗人表示对这二者都加以拒绝,这个态度非常有意思。

**王光明:**朵渔对索尔仁尼琴“细雨中的苹果树”是不是有些误解呢?索尔仁尼琴“只要还能在雨后的苹果树下呼吸,就还可以生活”,这里“雨后的苹果树”是一种美对生命的拯救,并不依赖于与“铁”的对抗。朵渔把它放置在柔软与铁的二元对抗结构中,也许反而削弱了以美的感性自足生存的丰富性。

**陈培浩:**确实,朵渔的诗歌强烈的渴望见证当下,这首和索尔仁尼琴对话的诗歌,“大雾”也许是对他对当代精神境况的一种隐喻。他希望从索翁的“大雾”中回到自己站立土地上的“大雾”,所以这首诗体现出明显的及物性,每一字都指向我们的生活。像“如今,团结如仪的只有水泥/和谎言,我经常感到无路可走/准确说,是道路太多,每个人/都有一条路、一个理由/和一道世俗的斜坡,却没有一条路/能够走到黑”。朵渔实际上提出在“大雾”弥漫的时代如何确证价值的问题。朵渔是追求复杂性的,追求“不饮恨”的伟大情怀的,但在与现实短兵相接的同时,他的反讽手法非常频繁而娴熟,但反讽背后的二元对抗结构确实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更多丰富性的呈现。

**王光明:**我在《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中说过这么一段话:“现代汉语诗歌是在一种在诸多矛盾

和问题中生长,在变化、流动中凝聚质素和寻找秩序的诗歌。它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如何以新的语言形式凝聚矛盾分裂的现代经验,如何在变动的时代和复杂的现代语境中坚持诗的美学要求,如何面对不稳定的现代汉语,完成现代中国经验的诗歌‘转译’,建设自己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现代汉诗永远在寻找着它的当下形态,从当代性这个角度谈朵渔,是很恰当的。他的诗歌语言锐利,充满快感,关注当代生活,是一种有语境的写作,有介入当下的强烈愿望。诗歌参与当下,想像当下,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中国文学历来有关怀社会现实的传统,无论是传统社会读书人的兼济天下,还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感时忧国,都说明中国文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经营。但夏志清先生那篇著名论文《中国作家的感时忧国精神》说得好,感时忧国和道德承担是一种特色,但也可能变成一种负担妨碍作家更高远的展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诗歌对现实强烈的批判性会使诗失之偏狭,失去呈现丰富性的可能。

相比《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和《大雾:对话索尔仁尼琴》,我更喜欢《秋天带来怀恨的人》和《拉拉:最终的虚构》,前者直面现实、批判现实,功能性特征比较明显。后者不从强烈的对抗思维中展开,反而显得丰富、博大和复杂一些。

我们今天的讨论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一位当代优秀诗人的细读,而是通过他去思考诗歌的现实担当精神和诗歌的本体立场之间如何融合的问题。

[责任编辑:吴晓红]

# “新与旧的适应” ——重识戴望舒诗歌的“传统”和“现代”及其关系

郑成志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戴望舒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戴望舒对中国传统诗词有益资源的择取和现代西方诗艺的吸纳,创作了独具个人艺术特色的象征主义诗歌,给当时的中国诗坛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戴望舒的象征主义诗歌不仅打破了当时中国新诗“已成的秩序”,向“理想秩序”又迈进了一步,而且还丰富了西方象征主义诗学体系。

**关键词:**传统; 现代; 现代主义; 象征主义诗歌

**中图分类号:**I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39-07

On the mutual adaptation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a recognition o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 in Dai's poetry

ZHENG Cheng - zhi

(School of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Dai Wang - shu is an important poe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As a representative of modern poetry in the 1930s, Dai created his distinctive symbolic poetry by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resources and modern western poetry, which has exerted huge influence on Chinese poetry at that time. Dai's symbolic poetry not only broke through the “given order” of Chinese poetry with a step forward towards “the ideal order”, but also enriched the western system of symbolic poetry.

**Key words:** tradition; modernity; modernism; symbolic poetry

戴望舒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诗人,他的诗歌不仅承续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有益质素,还融化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手法,其诗歌中所体现出的感觉经验的独特性和诗艺技巧的创造性,在当时的新诗坛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引领了一种新的风气。他以记忆、梦想和回返等方式来展开诗歌,抵达现代的策略,又使中国的象征主义诗歌迥异于之前李金发、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等初期象征主义诗风,被称为“中国化的象征主义”、“中国新诗第二次整合的界碑”。然而,无论是对

中国传统诗词的发掘,还是对西方现代诗艺的开掘,在戴望舒为数不多的诗歌创作和仅存的几篇诗论中都显示了他对“传统”和“现代”的独特选择和创造性的转化、融合,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诗坛带来了新的气象。

—

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大概开始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之间。1929年4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戴望舒自编的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内收二

收稿日期:2012-11-20

基金项目: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0世纪30年代自由诗理念研究(09YJC751041)”资助;2011年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世纪30年代自由诗研究(2011B17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郑成志(1971-),男,福建永定人,文学博士,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理论。

十六首诗歌，编为《旧锦囊》、《雨巷》和《我底记忆》三辑。1933 年 8 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戴望舒自编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全书收集了 1929 年出版的《我底记忆》中《我底记忆》辑中的诗作七首和 1929 年后至 1932 年留法前的诗作三十四首，共计四十一首。书末附录《诗论零札》十七条，诗集由杜衡作序。1937 年 1 月，上海杂志社出版了戴望舒自编的第三本诗集《望舒诗稿》，诗集收辑了《我底记忆》与《望舒草》两集的全部作品和未发表过的《古神祠前》、《见毋忘我花》、《微笑》、《霜花》四首诗，全书共收诗六十三首。书末除附录《论诗零札》外，还附了自己译为法文的诗六首。1948 年 2 月，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戴望舒自编的第四本诗集《灾难的岁月》，诗集收辑了戴望舒 1934 年 5 月至 1945 年 5 月抗战胜利前夕的诗作，共二十五首，都是以前未曾编集出版过的。

综观戴望舒四本自编诗集包括后人所收集的佚诗，其诗作中意象的选择、意境的营造到艺术表现方式，都呈现出非常鲜明的对中国传统诗词的吸收和接纳。早年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中《夕阳下》意象的选择非常有代表性。晚云、残月、古树、落叶、衣角、荒冢、晚烟等都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常用的意象，它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中已经形成为相对稳定的符号系统，潜移默化的存留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而《雨巷》一诗中的“丁香”更是经典意象，它与幽怨、美丽的姑娘结合在一起，更是代表了一种美好、高洁的理想。类似的古典诗词意象在这一本诗集的其它诗作中频繁的出现，如《寒风中闻雀声》中的“枯枝”、“高楼”、“华鬓”，《流浪人的夜歌》中的“怪枭”、“饥狼”、“残碑断碣”，《山行》中的“朝霞”、“啼鸟”、“征衣”、“山径”，《残花的泪》中的“古园”、“蝴蝶”、“香泪”，《秋天》中的“歌吹”、“猎角”、“浮云”等等。而在第二部诗集《望舒草》的《旅思》一诗中，诗人撷取芦花、征泥和促织等古典诗文意象，成功的转化了传统诗词中的思乡主题，写下了游子“栈石星饭的岁月，/骤山骤水的行程”，试图在浪迹天涯中寻求心灵安慰的思乡情绪；而《深闭的园子》构筑了一个“花繁叶满”却“静无鸟喧”被废弃的园子，主人却在“迢迢的太阳下”奔波，从另一个侧面描写了游子对家的思念；《印象》一诗通过“幽微的铃声”、“小小的渔船”、“古井的暗水”、“颓唐的残阳”来抒写一种寂寞凄清的情绪，回荡着浓浓的古典情调；《烦忧》一诗不仅用了古典诗歌中不规则的平仄、对仗（虽然是白话新诗的形式，但仍可看出是对律诗形式的转化），同时还利用旧体诗回环复沓的手法（说是寂

寞的秋的悒郁，/说是辽远的海的怀念。/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说是辽远的海的怀念，/说是寂寞的秋的悒郁。/），使这首短诗读起来有余音袅袅的韵味；《古神祠前》虽然是第三部诗集的作品，但却属于早期诗作。诗中的蜉蝣、蝴蝶、云雀、鹏鸟等意象都来源于《庄子》篇章，同时这些意象也是作为典故，运用比兴手法来表现诗中说话人对自由的向往、追求和失落的愁怀（终于，绝望地，/它疾飞回到我心头/在那儿忧愁地蛰伏）；《灾难的岁月》是戴望舒最后一部自编诗集，《古意答客问》从题目到题旨充斥“古意”，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道家情怀弥漫于整首诗中；而《我思想》一诗，更是高度浓缩的《齐物论》；其它如《秋夜思》、《小曲》、《夜蛾》、《寂寞》等诗，是对古典诗词婉约风格的借鉴和转化，技巧显得比之前更加娴熟。后期的《元日祝福》、《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心愿》、《口号》、《偶成》等诗作呈现了诗人诗风新的嬗变，主题和情调都充满了对战争胜利的渴望和“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的信心。

戴望舒对古典诗词艺术资源的挖掘和择取确实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诗风；但是不管取径于何种传统艺术资源，若没有对传统艺术资源的更新和创造性的转化，任何一种模仿和重复的虚假作品最终还是会被时间淘汰的，因为“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地或胆怯地墨守前一代的方法，‘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的”<sup>[1]12</sup>。的确，戴望舒在自己的诗论中多次说：“不必一定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我不反对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旧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诗情”；“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sup>[2]1692</sup>；“诗的存在在于它的组织。在这里，竹头木屑，牛溲马勃，和罗绮锦绣，贝玉金珠，其价值是同等的”<sup>[2]1701</sup>。在戴望舒最初的作品中，虽然是“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倾向于把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sup>[3]1349</sup>，如前文所论的《夕阳下》、《寒风中闻雀声》、《流浪人的夜歌》，还有同一时期所写的《自家伤感》等，但这些诗作更为突出的是，戴望舒在注重意象的择取、意境的构设、比兴手法的运用、炼字的推敲等之外，更显示了诗人感觉的敏锐、在主观抒情的过程中不断的知觉化，真正实践着“诗不是某一个官感的享乐，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sup>[2]1692</sup>的西方现代诗学观念。比如，远山啼哭得紫了，/哀悼着白日底

长终；/落叶却飞舞欢迎/幽夜底衣角，那一片清风。/(《夕阳下》)在这一诗节里，诗人用通感、象征、拟人等手法暗示诗中说话人孤独、寂寞、凄清的情绪；又如，希望今又成虚，/且消受终天长怨。/转看风里蜘蛛，/又可怜地飘断/这一缕零丝残绪。/(《自家伤感》)诗人在这一诗节里是描写希望的幻灭，但却通过“转看”两字，把抽象的空虚、幻灭感转化为可视、可感的具体的画面。而被叶圣陶称为“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的《雨巷》选择了古典诗词的经典意象“丁香”，诗人描绘了一个传统的春雨江南意境，利用回环复沓的艺术手法和象征、暗示的手段以及江阳韵的贯通全篇，表现了诗中说话人对理想的追求却又在现实中幻灭的情绪，从更深一层讲，《雨巷》折射了一个时代的情绪。在此诗中，音乐性的利用不仅承接了古典诗词的音律传统，同时也接纳了魏尔伦诗作中音乐性先于一切的观念的影响。到了《望舒草》时期，戴望舒却已经开始勇敢地反叛他所谓的“音乐的成分”了，认为“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sup>[2]691</sup>。从《断指》开始，诗人抛开诗歌语言注重精炼、讲究音律等固有特征，别出心裁地以散文化的语言叙述一个牺牲的革命志士的断指，显示了“在亲切的日常说话调子里舒卷自如，锐敏，精确，而又不失它的风姿，有节制的潇洒和有工力的淳朴日常语言的自然流动，使一种远较有韧性因而远较适应于表达复杂化、精微化的现代感性的艺术手段，得到充分的发挥”<sup>[3]350</sup>。而在《我底记忆》中，单调、不变的句式看似枯燥乏味，但是在对日常意象“烟卷”、“笔杆”、“粉盒”、“木莓”、“酒瓶”、“诗稿”、“花片”等描写上，形象的呈现了抽象的记忆，同时也暗示了诗中说话人“心灵的微妙和感觉的微妙”。这种“全官感”或“超官感”的诗学观念在之后的很多诗中体现出来：如“温柔的是缢死在你底发上，/它是那么长，那么细，那么香；/但是我是怕着，那飘过的风/要把我们底青春带去。”/(《夜是》)“她有太多的蜜饯的心——/在她的手上，在她的唇上；/然后跟着口红，跟着指爪，/印在老绅士的颊上，/刻在醉少年的肩上。”/(《梦都子》)而在《三顶礼》中，通感的手法更是运用的出神入化，用“翻着软浪的暗暗的海”勾起“寂寂的旅愁”，然后更进一步的迁移到具体的事物“我的恋人的发”上，“恋之色的夜合花”成为了“恋人的眼”，用蜜蜂的蛰形容恋人的吻；《秋蝇》虽然化用了古典诗词“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诗句，但这首诗却更多的通过秋蝇的视觉、知觉和听觉的转变，来呈现秋蝇生命走向消亡的过程，从另一个侧面暗示了人在纷繁

复杂的的世界里奔波挣扎的悲剧性的生存状态。在戴望舒最后一本自编诗集《灾难的岁月》里，尽管诗的主题和情调有了新的突破，形式上也出现了新的“综合”，象征主义手法也运用的比较少了，但是其融合西方现代诗艺技巧却显得更见纯熟，比如《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诗，诗中说话人通过超现实主义的想象，用残损的手掌从北至南地“摸索”自己惨遭屠戮的江山，以象征的手法再现民族的生灵涂炭，同时也点出了“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充满生机勃勃的气象。至此，戴望舒的诗风已经完成了“华丽的转身”，其成功充分表明了他“上接我国根深柢固的诗词传统这种功夫的完善，外应(迎或拒)世界诗艺潮流变化这种敏感性的深化，而再也不着表面上的痕迹。我们到此就很难讲它们受了例如晚唐、五代诗词的‘影响’，虽然气质上和这些诗词的纤丽是一脉相承的”<sup>[3]351</sup>。

## 二

戴望舒通过对传统诗词有益资源的择取和现代西方诗艺的吸纳，创作了既有民族特点也有个人特色的白话新体诗，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影响力的诗人，其诗风也为当时许多年轻诗人模仿，被称为“现代派”诗的代表人物。这里所谓的“现代派”诗，最先因戴望舒、李金发、施蛰存、艾青、何其芳、金克木等人的诗歌发表在《现代》杂志而得名；实际上，《现代》杂志译介西方象征主义、意象派、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流派的诗歌和诗论也确实影响了当时一批年轻的诗人，并且，戴望舒、李金发、施蛰存、艾青、何其芳、金克木等人的诗所呈现出对现代西方诗艺的吸收和接纳也的确与西方现代派诗歌有密切的关联。可以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现代派”新诗对西方现代派诗歌有诸多的学习和借鉴，它们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中的“现代”质素的辨析就显得尤其重要。

施蛰存当年在编《现代》时曾对刊中的诗风做过很详细的阐释，在第四卷第一期的《又关于本刊中的诗》一文中，他说：“《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的现代诗形。”这里所谓“现代生活”是指“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现代的辞藻”是不管生疏的古字，文言文中的虚字，“只要适宜于表达一个意义、一种情绪，或

甚至是完成一个音节”就会采用,而没有“古”的或“文言”的观念;“现代的诗形”是指“《现代》中的诗,大多是没有韵的,句子也不很整齐,但它们都有相当完美的‘肌理’(Texture)”。<sup>[4]6-7</sup>施蛰存在此连用六个“现代”来强调《现代》中的诗与当时其它的诗歌创作以及前一代诗人们创作的不同,这种不同来源于现代生活的变迁,而现代生活的变迁又改变了诗人们的感觉方式和经验类型,这些感觉、经验方式的迁移从根源意义上来说都应归因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性冲动。马泰·卡林内斯库认为现代性有两种,他把它们称为“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马泰·卡林内斯库认为前者即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概念,它大体上延续了现代观念史早期阶段的那些杰出传统。这种现代性概念“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可测度的时间,一种可以买卖从而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可计算价格的时间),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所有这些都以各种不同程度联系着迈向现代的斗争,并在中产阶级建立的胜利文明中作为核心价值观念保有活力、得到弘扬”;而另一种现代性,“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者到自我流放。因此,较之它的那些积极抱负(他们往往各不相同),更能表明文化现代性的是它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sup>[5]48</sup>然而,无论从历史语境的视角还是从文化语境的视角来考量,《现代》中刊载的诗所彰显出的现代性与马泰·卡林内斯库所言的两种现代性都存在很多的差异,它呈现出半殖民地国家在走向现代性过程中浓厚的区域性特征。史书美在研究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时曾谈到,新的跨国现代主义研究强调对于亚洲、非洲、拉美等非西方现代主义所处具体“情境”(situatedness)的关注,这一情境“虽然与西方现代主义所处情境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但同时也与后者保持着某种对话性联系”;“非西方的现代主义起源于对现代性、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等等观念的不满,因此,他也必然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密切相关”。因此,非西方现代主义与西方现代主义在“协商”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多种特定的模式:“有的非政治性地自愿参与进西方现代主义运动”、“有的则为了地区需要对现代主义进行某种调整,以便应对现代主义殖民行为所带来的焦虑”、“有的则对欧洲中心主义模式的现代主义进

行了彻底的颠覆”。正是由于非西方现代主义和西方主义存在这种纠缠迎拒的关系,“当(它们)相异性被强调之时,我们意识到非西方现代主义向人们提供了一些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的现代性经验和叙述,这种经验和叙述是在与西方都会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概念进行杂交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变异物”;“当(它们)相似性被强调之时,我们认识到一种跨国界和去地区化(deterritorialized)现代主义;这种现代主义为世界主义之文化政治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哪怕其背后必然隐藏着‘中心 – 边缘’的等级观念”。<sup>[6]4</sup>从这个层面上看,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文学更多的是倾向于前一种情况,而戴望舒的诗歌所呈现出的传统与现代相互缠绕的现代主义特征,则是非西方现代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的既相互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最好代表之一。

20 世纪 30 年代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人们从中国社会的“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是繁复多样的,他们都“回到各自的内在,谛听人生谐和的旋律”,“根据独有的特殊感受,解释各自现时的生命”。<sup>[7]63-64</sup>具体到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从《断指》、《我底记忆》等诗开始),它是通过抒写“记忆”、“怀乡”、“梦想”等来呈现自己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不适感,从而抵达自己心目中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比如在《我底记忆》中,戴望舒这样写到:我底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忠实得甚于我最好的友人。//它存在在燃着的烟卷上,/它存在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它存在在破旧的粉盒上,/它存在在颓垣的木莓上,/它存在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在压干的花片上,/在凄暗的灯上,在平静的水上,/在一切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上,/他在到处生存着,像我在这世界一样。//杜衡在《望舒草·序》中谈及戴望舒当时的生活时这样写到:“从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二去国为止的这整整五年之间,望舒个人的遭遇可说是比较复杂的。做人的苦恼,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做中国人的苦恼,并非从养尊处优的环境里长成的望舒,当然事事遭到,然而这一切,却决不是虽然有时候学着世故而终于不能随俗的望舒所能应付。五年的奔走,挣扎,当然尽是些徒劳的奔走和挣扎,只替他换来了一颗空洞的心;此外,我们差不多可以说他是什么也没有得到的。”<sup>[2]54</sup>一方面是“做中国人的苦恼”,一方面是为生活“徒劳的奔走和挣扎”,使诗人徒具“一颗空洞的心”;面对现实生活的虚无和血淋淋的事实,戴望舒只能到“燃着的烟卷上”、“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破旧的粉盒上”、“颓垣

的木莓上”、“喝了一半的酒瓶上”等记忆中的事物里去寻找慰藉，只有它们是最忠实的，也是最真实的。回忆是对一去不复返事物的追念，它不可能给回忆者带来任何现实的安慰，现代都市生活的压迫感更是造成了诗人怀乡病，在《对于天的怀乡病》这首诗中，“怀乡”并不是具有实在意义的对故乡的怀想，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原乡神话”。现代都市的喧嚣，生活的空虚导致了现代人的烦躁、焦虑、失眠、头痛等等症状，因而只能在冥想中“回返”到梦想中澄明、湛蓝的“青天”，在那里“没有半边头风”，“没有不眠之夜”，“没有心的一切的烦恼”，“可以安安地睡着”。戴望舒在此诗中所表现的“现代情绪”是一种属于诗人自己的“个人情绪”，现代主义诗歌研究专家孙玉石先生在谈到现代派诗人所谓的“诗情的程度”或“诗的情绪”时认为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特征：“一个是注重诗歌的开掘内在的取向”，“另一个趋向是注重诗人情绪的现代性特征”<sup>[8]137-138</sup>。在“开掘内在的取向”上，戴望舒的诗歌进入到记忆和梦境的世界，这里的记忆混合着个人的情感经验和对传统文化的深情眷恋，是向后看的；这里的梦境也不是憧憬式的，指向未来的，而是怀乡式的。而在“诗人情绪的现代性特征”上，戴诗中没有人力车夫，没有新兴工业的浓烟滚滚的烟囱，更没有摩天大楼，只有诗人自己在都市生活中受到剧烈的冲击后产生的疏离感，因而只能在传统的文化记忆和想像中寻找情感的安慰和精神的出路，从这个层面上看，“城市是一个隐喻，是唯一恰当的隐喻，通过这个隐喻可以表明各种关系问题。市场的需要要求诗人同任何手工业工人一样移居城市；竞争的压力迫使诗人极不稳定地生活在与他的社会进行战斗的状态之中，生活在与所有其他愉悦新兴资产阶级、并为他们的剩余现款而争吵的人进行战斗的状态之中，因为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保证艺术的物质基础：他们是艺术的消费者，而出钱的人则有权点戏。于是孤立的诗人便带着与浪漫主义主观性不同的绝望的心灵转向内心深处，拼凑着文化的零章片断，这些零章片断使他暗暗感到有所归属，感到存在着某种秩序，不管这种秩序带有怎样的个人色彩。因此，诗人就有了自己的文化环境，即使他必须持续不断地创造这个环境。”<sup>[9]314-315</sup>戴望舒在《乐园鸟》中写一只春夏秋冬都在“飞着”的乐园鸟时以提问的口吻写到：“华羽的乐园鸟，/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华羽的乐园鸟，/这是神仙的佳肴呢，/还是为了对于天的相思？//”；“华羽的乐园鸟，/在茫茫的青空中，/也觉得你的路途寂寞

吗？//”；“华羽的乐园鸟，/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诗人在诗中所描写的“乐园鸟”一年四季都在忙碌着，它们餐风饮露，但却又毫无明确的目标，这与其说是“幸福的云游”，还不如说是“永恒的苦役”。在这里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认为“乐园鸟”其实就是象征着现代社会中每天忙忙碌碌、生活毫无目的，一辈子也碌碌无为的“空心人”呢？

### 三

戴望舒通过记忆、梦想、返回等方式来抵达的现代，既不同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或者说现代化的现代性（同一时期徐迟的诗集《二十岁人》，尤其是《都会之满月》一诗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这种现代性），同时也异于自波德莱尔以来所提出的“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或者说是反现代的现代性，戴望舒并没有像许多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一样创造一个具有深度美学效果的诗歌世界来与当时平庸保守的现实世界相抗衡，他认为诗应当“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它本身“就像是一个生物，不是无生物”，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这种诗歌观念不仅区别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理论，也不同于李金发、穆木天和王独清等人的初期象征主义诗歌诗歌追求。

施蛰存在《戴望舒诗全编·引言》中说：“初期的戴望舒，从翻译英国颓废派诗人道生和法国浪漫派诗人雨果开始，他的创作诗也有些道生和雨果的味道。中期的戴望舒，偏爱了法国的象征派诗，他的创作诗就有些保尔·福尔和耶麦的风格。后期的译诗，以西班牙的反法西斯诗人为主，尤其热爱洛尔迦的谣曲，我们也可以在《灾难的岁月》中，看到某些诗篇具有西班牙诗人的情绪和气质。”<sup>[2]6</sup>从施蛰存对挚友的概括可以看出，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与他的诗歌翻译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他的诗歌却又与初期象征派李金发、穆木天等人的诗歌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由于生硬的模仿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给中国新诗坛带来的是“神秘”、“看不懂”，孙玉石先生在研究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歌时从“意象本体的象征性”、“情调传达的暗示性”、“语言叙述的新奇性”等角度对李金发等人的诗歌作了深刻的剖析，同时也指出“他们追求的‘纯粹的诗的世界’，只建设在艺术自身狭窄的天地，而脱离了时代和人民更广大的生活土壤。他们在吸收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艺术养分时，缺乏一种诗的自觉意识，即在诗的观念与方法的更新中自我选择和创造

的主体精神,致使他们的艺术吸收超过了艺术自身的承受力,模仿力超过了创造力,因而他们企图沟通中西诗歌艺术的良好愿望,也就被多少带着盲目性的创新热情和实践所淹没了。他们在创作实践中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找到西方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诗歌审美追求的融合点”<sup>[8][12]</sup>。西方象征主义诗学体系最核心的就是“通感”论,被称为“象征派的宪章”的《感应》一诗非常形象地阐释了“通感”的精义:“自然是一座神殿,那里有活的柱子/不时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语言;/行人经过该处,穿过象征的森林,/森林露出亲切的眼光对人注视。//仿佛远传来一些悠长的回音,/互相混成幽昧而深邃的统一体,/像黑夜又像光明一样茫无边际,/芳香、色彩、音响全在互相感应。//有些芳香新鲜的像儿童肌肤一样,/柔和的像双簧管,绿油油像牧场,/——另外一些,腐朽、丰富、得意洋洋,/具有一种无限物的扩展力量,/仿佛琥珀、麝香、安息香和乳香,/在歌唱着精神和感官的热狂。//”波德莱尔诗中所昭示的“通感”论首先是人本身各种感官之间的相互感应和沟通,如“芳香、色彩、音响全在互相感应”,也就是嗅觉、视觉、听觉的相互沟通;其次是人类内部的精神世界与外部自然界的相互感应以及世间万物的普遍应和,如人在“穿过象征的森林”时,森林也对人报以亲切的目光注视;更为重要的是,诗中暗示了人的感官、精神世界与超验世界亦即“上天”之间的相互应和。学者吴晓东先生认为前两层意义上的应和还停留在所谓的“人本象征主义”层面,而第三层应和则构成了“超验象征主义”,它是波德莱尔“通感”论中最重要的部分,昭示的是象征主义诗学的“超验本体论”<sup>[10][34]</sup>。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超验本体论”所营构的诗歌中梦境、幻境导致了象征主义诗歌的神秘性。象征主义诗学中另一个核心理论就是“暗示”。马拉美认为:“直陈其事,这就等于取消了诗歌四分之三的趣味,这种趣味原是要一点一点去领会它的。暗示,才是我们的理想。一点一点地去复活一件东西,从而展示出一种精神状态,或者选择一件东西,通过一连串疑难的解答去揭示其中的精神状态:必须充分发挥构成象征的这种神秘作用。”<sup>[11][42]</sup>对比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象征主义诗歌,其与西方象征主义诗学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尤其与超验本体论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李金发在法国语境中创作的象征主义诗歌,正如朱自清所说,“他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他的诗不缺乏想象力,但不知是创造新

语言的心太切,还是母舌太生疏,句法过分欧化,叫人像读着翻译;又夹杂着些文言里的叹词语助词”<sup>[12][375]</sup>;给人以“神秘”、“看不懂”之感。李金发所引领的“从意象的联结,企望完成诗的使命”初期象征主义诗歌,由于“不能把握中国的语言文字,有时甚至于意象隔着一层,令人感到过分浓厚的法国象征派诗人的气息,渐渐为人厌弃”<sup>[7][59]</sup>。而戴望舒在翻译后期象征主义诗人的诗歌过程中非常注重他们写诗的技巧,比如玄迷·特·果尔蒙(Gemy de Gourmont, 1858 – 1915)诗歌呈现“绝端的微妙——心灵的微妙与感觉的微妙”的手法;保尔·福尔(Paul Fort, 1872 – 1960)用“最抒情的诗句表现出他的迷人的诗境”的手段;耶麦(Franlis Jarnmes, 1868 – 1938)“抛弃一切虚夸的华丽、精致、娇美”而以“自己的淳朴的心灵来写诗”的技巧,综合这些特殊的手法“恰巧合乎他底既不是隐藏自己,也不是表现自己的那种写诗的动机”<sup>[2][51] – [52]</sup>,形成了戴望舒象征主义诗歌艺术的独特个性。比如《印象》一诗:“是飘落深谷去的/幽微的铃声吧,/是航到烟水去的/小小的渔船吧,/如果是青色的真珠;/它已堕到古井的暗水里。//林梢闪着的颓唐的残阳,/它轻轻地敛去了/跟着脸上浅浅的微笑。//从一个寂寞的地方起来的,/迢遥的,寂寞的呜咽,/又徐徐回到寂寞的地方,寂寞地。//”诗中“幽微的铃声”、“小小的渔船”、“真珠”、“古井”、“残阳”等都是从传统诗词的意象中转化而来,或者直接搬用过来,诗人在这首诗中通过传统、常见的意象构造一个诗情朦胧、寂寥的意境来抒写自己寂寞心态的微妙的感觉,全诗既没有用一种浪漫主义直抒感情情调的手法,也没有象征主义诗歌中意象与意象之间大幅度的跳跃,而是从相对常见、普通的意象中去一点一点的“暗示”诗中说话者无法排遣的寂寞心情。即使是写梦境的诗,戴望舒的诗歌与西方象征主义者们的诗歌也有很大的不同,如他的《寻梦者》:“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妍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你去航九年的旱海吧,/然后你逢到那金色的贝。//它有天上的云雨声,/它有海上的风涛声,/它会使你的心沉醉。//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然后,它在一个暗夜里开绽了。当你鬓发斑斑了的时候,/当你眼睛朦胧了的时候,/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珠。//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怀里,/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于是一个梦静静地升上来了。//你的梦开出花来了。/你的梦开

出娇妍的花来了，/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诗中写“寻梦者”经过艰难的跋涉，终于使自己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尽管自己已经“鬓发斑斑”、“眼睛朦胧”。诗的结尾虽然略带忧伤，但是娇艳的花毕竟能够慰藉伤感的心灵。西方象征主义诗人笔下的梦，更多地是从超验本体论出发，追求一种对“不可知”的事物的领悟与把握，试图以“通灵”的想象力沟通与神秘世界之间的感应，在梦幻中去洞见“天上的美”；马拉美还强调“对事物进行观察时，意象从事物所引起的梦幻中振翼而起，那就是诗”[11]42。西方象征主义者们对梦的描写显然带有宗教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有时让读者的想象力难以抵达，而戴望舒对梦的描写就相对真实，这不仅是在意象的择取上，同时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领悟上。

戴望舒在中国新诗史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的诗歌通过记忆、梦想、返回的方式来抵达诗歌的现代性，同时也正是戴望舒的诗歌重新接通了中国传统诗词的有益资源和创造性的转化了西方象征主义诗学技巧，使得中国的象征主义诗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诗坛成为“新事件”。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不仅打破了中国新诗“已成的秩序”，使中国新诗又向“理想的秩序”迈进了一步，而且也丰富了西方象征主义的诗学体系。

#### 参考文献：

- [1] 托·斯·艾略特. 传统与个人才能[M]//传统与个人才能.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 [2] 戴望舒. 戴望舒诗全编[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9.
- [3] 卞之琳. 戴望舒诗集·序[M]//卞之琳文集(中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4] 施蛰存. 又关于本刊的诗[J]. 现代, 1933 (4).
- [5] 马泰·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 [6] 史书美. 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9 – 1937) [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 [7] 李健吾. 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A]. 咏华集·咏华二集[C].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 [8] 孙玉石.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9] G·M·海德. 城市诗歌[M]//现代主义.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 [10] 吴晓东. 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 [11] 马拉美. 谈文学运动[M]//黄晋凯, 张秉真. 象征主义·意象派.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 [12] 朱自清.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M]//朱自清全集(第4卷).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吴晓红〕

# 废名对“含蓄”传统的再发现

罗小凤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 南宁 530001)

**摘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诗对“明白清楚”之风的反拨中, 废名是典型代表。他的诗注重暗示、曲折、含蓄, 被认为晦涩难懂。不仅他的诗如此, 他在重新考察古典诗传统时重新认同传统中的“含蓄”质素, 形成对传统的再发现, 亦是对自身诗歌创作经验的再发现。

**关键词:**废名; 含蓄; 再发现

中图分类号:I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46-05

## Fei Ming's rediscovery of the "implicit" tradition LUO Xiao-f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new poetry revolt against the trend of transpicuous and clear writing in the 1930s, Fei Ming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His poetry, b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qualities of suggestion, complication and connotations, is regarded as obscure. Besides his poetry, he re-identified with the "implicit" quality when reexamining the tradition of classical poetry and rediscovered such a tradition, which is also a sort of rediscovering of his poetic writing experience.

**Key words:** Fei Ming; implicit; rediscovery

刘半农曾指出废名的诗“无一首可解”<sup>[1]</sup>, 罗振亚则认为是“现代诗派中最难启的‘黑箱’”<sup>[2]</sup>, 都是发觉了废名的诗注重暗示、曲折、含蓄的特点。废名不仅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如此, 当他“重新考察”古典诗传统, 亦形成了对传统中“含蓄”质素的再发现。

### 一、“明白清楚”的反拨

初期白话新诗以“明白清楚”为第一要务, 胡适便于 1920 年 8 月在答钱玄同谈“什么是文学”时曾指出:“文学的基本作用(职务)还是‘达意表情’, 故第一个条件是把情或意, 明白清楚地表出达出, 使人懂得, 使人容易懂得, 使人决不会误解。”<sup>[3]</sup>在胡适对新诗的设计方案里, 白话新诗被当作对古典诗传统的反叛, 成为诗体大解放的突破口和新诗发展的路向。而在胡适们看来, 古典诗大

多是“晦涩”的, 与新诗的明晰性要求格格不入, 因此, 胡适选取了自己所接近的“元白”一派作为新诗立足的根据和理论指向, 肯定了“明白易懂”的美学标准; 而朦胧糊涂、晦涩难懂的“温李”一派, 则被视为唐末出现的“妖孽诗”。在胡适“明白清楚”之诗歌理念下的初期白话诗只能如周作人所批评的像“玻璃球”般晶莹透彻得太厉害, 整个新诗园地不过是一片“幼稚园”, 甚至成了“一班闲人拿去放牛”<sup>[4]</sup>的荒芜之地。开一代诗风的郭沫若全凭灵感与直觉写诗, 在他看来, 写诗应该“以自然流露为上乘”<sup>[5]</sup>, 采取宣泄式、独白式、申诉式等爆喷方式抒情, 豪放粗暴, 雄放直率, 真符合了梁启超所谓的“奔进的表情法”, 即“情感突变, 一烧到白热度, 便一毫不隐瞒, 一毫不修饰, 照着那情感的原样子, 逆裂到字句上”<sup>[6]</sup>, 因此, 郭沫若的诗基本上与暗示、含蓄无关。1920 年代中期, 周作人考察

收稿日期: 2012-11-20

基金项目: 201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930 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倾向研究”(12YJC751057)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罗小凤(1980-), 女, 湖南武冈人, 文学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攻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了“五四”以来的新诗后敏锐提出：“诗的功用本来不在明说而在暗示”，他主张要在“语体的简易”的小诗里表现“诗思的深广”，而这须“全凭着暗示的力量”<sup>[7]</sup>，这种对暗示之力量的重视，显然敏锐地洞察了诗之为诗的本质特征，但在当时诗坛却并未得到重视。此后，经由李金发“别开生面”、穆木天强调“暗示能”、“诗越不明白越好”<sup>[8]</sup>、王独清“诗是最忌说明”<sup>[9]</sup>等诗观的阐发与实践，含蓄诗风渐有所长，但很快被1920年代后期革命诗歌的龙卷风所席卷淹没，大众化倾向占据话语主导权，要求明白易懂，能为所有大众读懂或听懂，直接宣告、真实披露、如实揭示等成为诗歌的传达策略，诗歌甚至成为革命宣传与鼓动的传声筒与宣传单。1930年代普罗诗社与中国诗歌会的相继出现与主导诗坛，诗歌更成为革命斗争的扩音器，提倡“明显的呼声，强烈的呼喊”，要求创造通俗易懂、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化的诗歌，因此直抒胸臆、直接描摹成为诗写的主要方式，而直白明朗则成为共同追求，表现方式追求通俗化，即“抒情单纯化”、“表现具体化”，一概抛弃隐喻、象征等暗示手法，主要采用“抒情”、“表现”、“描写”、“歌唱”等方式。但与此同时，戴望舒、杜衡、曹葆华、施蛰存等诗人所引入的以象征派、意象派为主汇流成的现代主义诗潮大行其道，曹葆华所主编的《北平晨报·北晨学园·诗与批评》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现代主义诗论与诗作，《现代》杂志、《新诗》、《大公报·文艺·诗特刊》等杂志报纸亦为西方现代主义的引入与推介作了大量工作，带给1930年代的中国诗坛巨大冲击。由于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风的影响，1930年代的诗坛出现了“晦涩”之争这一引人注目的文坛公案，其争论焦点“晦涩”其实是对“明白清楚”之诗风的反拨，是含蓄传统的承传，是诗之为诗的又一根本特征。在这场论争中，废名与卞之琳、何其芳、林庚等诗人的诗都被指为“晦涩”，确实，他们都在自己的创作中注重含蓄，使用隐喻、象征等暗示手法，因此，当他们回望古典诗传统，重新发现了古典诗词重暗示、含蓄的传统。

在对“明白清楚”的反拨中，废名无疑是一个典型代表，他一反胡适把“元白”一派作为新诗发展前例的姿态，而把当时被胡适视为“反动派”的朦胧晦涩的“温李”诗风作为新诗发展的根据，重新发现了“含蓄”的诗歌质素，无疑都是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也是对自身新诗建设经验的发现。

## 二、废名对“含蓄”传统的认同

胡适选取自己所接近的“元白”一派作为新诗

立足的根据与理论指向，肯定了“明白易懂”的美学标准；而他认为晦涩难懂的“温李”一派，则遭其否定。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便把中唐的元稹、白居易作为白话诗传统的代表，而把温庭筠的词、李商隐的诗当作唐末出现的妖孽诗<sup>[10]</sup>。一直遵循导师杜威的经验主义并以进化论为自己的理论逻辑根据的胡适其实并未厘清“元白”派与“温李”派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五四”以来的白话诗乃是《诗三百篇》以来以“元白”为代表的“中国诗自然趋势所必至的”<sup>[11]</sup>。废名毫不客气地指出胡适“对于已往的诗文学认识得不够。他仿佛‘白话诗’是天生成这么个东西的，已往的诗文学就有许多白话诗，不过随时有反动派在那里做障碍，到得现在我们才自觉了，才有意的来这么一个白话诗运动。援引已往的诗文学里的‘白话诗’做我们的新诗前例，便是对于已往的文学认识不够，我们的新诗运动直可谓之无意识的运动。”<sup>[12]</sup>废名指出胡适是由于对古典诗传统认识不够而认为白话诗自古便有之，并援引已往的诗文学里的“白话诗”做新诗前例。在废名看来，新诗运动是无意识的运动，此观点显然与胡适相反。对于已往的诗文学，废名有自己重新考察后的新思考与新发现，他在《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开篇便指出，中国已往的诗文学向来有两个趋势，“就是元白易懂的一派同温李难懂的一派，无论那一派都是在诗的文字之下变戏法，总而言之都是旧诗，胡适之先生于旧诗中取元白一派作为我们白话新诗的前例，乃是自家接近元白一派旧诗的原故，结果使得白话新诗失了根据。”<sup>[13][28]</sup>废名发觉胡适一辈由于自己接近“元白”一派旧诗而取“元白”一派做白话新诗的前例，结果正使白话新诗失去了发展的根据，因此废名否定了白话诗初期胡适一辈推崇与跟随“元白”之风的美学观念，而推崇以反动派“温李”为代表的诗：

胡适之先生所推崇的白话诗，倒或者与我们今日新散文的一派有一点儿关系。反之，胡适之先生所认为反动派“温李”的诗，倒似乎有我们今日新诗的趋势。

我又说，胡适之先生所认为反动派温李的诗，倒有我们今日新诗的趋势，我的意思不是把李商隐的诗同温庭筠的词算作新诗的前例，我只是推想这一派的诗词存在的根据或者正有我们今日白话新诗发展的根据了<sup>[13][27-28]</sup>。

显然废名反胡适之道而行，否定了胡适所推崇的白话诗的发展根据即“元白”诗派，而认为“温

李”诗词存在的根据“正有我们今日白话新诗发展的根据”。然而,需要明确的是,事实上,废名反拨胡适追认“元白”一派为白话诗“正宗”的取向而选取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词及其同一脉系为新诗发展根据,并非由于其含蓄、暗示,而是认为其含有“诗”的内容和“诗”的感觉等新诗之为诗的内容,并注重呈现“感觉”,展开想像。但无可否认的是,正是废名自己诗歌创作中对含蓄、暗示的重视,使他无意识地在反对胡适时选择与认同了“温李”一派,因此,虽然废名并没有明确地在他对古典诗词的重新阐释中论及其对“含蓄”、“暗示”的再发现,但由于“温李”一派诗词的一个极其重要而鲜明的特征便在于“隐僻”、“含蓄”,“温李”诗词诚如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叙》中所概括的“温飞卿之绮靡”与“李义山之隐僻”(高棟:《唐诗品汇?总叙》),均“意致迷离,在可解不可解之间”(陆次云?:《唐诗善鸣集》卷上),“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因此,废名对“温李”一派的选择,在深层次上正反映了他对“含蓄”、“暗示”的重新认同,这亦是对古典诗传统的一种再发现。

### 三、废名对“含蓄”的实践

废名在新诗创作实践中极为注重使用暗示手法。据最新出版的《废名集》所搜集的废名诗歌,废名诗作从 1922 年至 1948 年达 104 首,而 1930 年代创作达 80 首。诚如朱英诞所言:“说到废名不能不说到技巧,说到技巧不能不说到晦涩”<sup>[14]</sup>,1930 年代废名的诗晦涩奇僻,语言虽简洁朴实,淡如清烟,但背后所深藏的机锋、意趣却深玄而蕴藉。正是这种“奇僻”的难懂,突显了废名诗歌的独特价值,显示了与“胡适期”诗歌不同的审美诉求与趋向。废名在其诗歌创作中,以“暗示”手法达成“含蓄”效用的方法主要在他对隐喻的使用。

吴晓东曾在解读《桥》这部诗化小说时指出:“废名的诗化语言的本质和精髓可以说正在于‘隐喻’。”<sup>[15]</sup>虽然吴晓东的总结是就《桥》而言,但由于《桥》乃一部诗化小说,所使用的语言是诗化语言,故而实际上指出了废名诗歌语言的本质。废名的诗之无解、难懂、晦涩,重要原因在于其“隐喻”手法的运用。“隐喻”是“把语言的字面意义‘转移’掉,从而转向它的比喻意义”<sup>[16]</sup>,隐喻是从修辞入手的,但隐喻决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它的本质是文化的,尤其是经过历史长期积淀、文化底蕴深厚而又已为人耳熟能详的隐喻,如果不能返回历史文化的深处解读,就无法领略诗人的深意。

废名在诗中极其擅长使用隐喻手法。他笔下

许多意象都隐喻着深远的文化底蕴,废名通过这些意象传达其隐喻的内涵。废名诗中喜欢用“镜子”意象作隐喻,据废名在《天马诗集》中提到 1931 年 5 月曾写了四十首诗,编成《镜》<sup>[17]</sup>,以“镜”做组诗名;而据笔者统计,废名 1930 年代创作的 80 首诗(以《废名集》中收录为根据)中,有 10 首写到“镜”意象,《无题》、《自惜》、《伊》、《花露》、《镜》、《沉埋》、《妆台》、《莲花》、《镜铭》、《壁》等诗中都出现了“镜”,可见诗人对“镜”之迷恋。“镜子”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长久的文化积淀,乐黛云曾在《中西诗学中的镜子隐喻》<sup>[18]</sup>中详尽地梳理了中西诗学中镜子隐喻的衍变,他指出,镜子在中国诗学里是一个贯穿始终、经常被用来说明文学艺术本质的隐喻。老子便用“镜子”来比喻人心,《道德经》第十章曰:“涤除玄览,能无疵乎!”老子认为人心就像镜子一样,必须洗涤除尘,免去瑕疵。庄子的“至人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则认为人心能和镜子一样公正完美地反映周围的事物。佛教传入中国后“镜子”的比喻涵义衍变成“空”和“虚”,东晋和尚僧肇(385—414)所言“夫至人虚心其照,理无不统。怀六合于胸中,而灵鉴有余;镜万有于方寸,而其神常虚。”(《肇论·涅槃无名论·妙存第七》)便强调了镜子的“虚”。唐末洞山良介禅师《宝镜三昧》中更进一步认为镜(心)、形(物)、影(镜象)三者都是虚幻:“如临宝镜,形影相睹。汝不是渠,渠正是汝。”<sup>[19]</sup>道家之“镜”也有“虚幻”之义,唐末道士谭肖所著《化书·道化第一》就说:“以一镜照形,以一镜照影,镜镜相照,影影相传;是形也,与影元殊,是影也,与形无异。”中国诗学受佛、道的影响颇深,“镜子”作隐喻便强调“静”和“虚”,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者,吟咏情性也……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镜”所隐喻的是“空幻”。而明代诗论家谢榛所言“夫万景七情,合于登眺,若面前列群镜,无应不真。忧喜无两色,偏正惟一心,偏则得其半,正则得其全。镜犹心,光犹神也。”<sup>[20]</sup>亦以镜子来比喻“静”和“虚”。可见,“镜子”的隐喻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和底蕴。废名以“镜”为喻,暗示自己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人生观,和虚无、空幻的精神境界。如《镜铭》:“我还怀一个有用之情,/因为我明净,/我不见不净,/但我还是沉默,/我惕于我有垢尘”,诗人是一个怀“有用之情”的凡人,但在尘世又总惟恐染上垢尘,于是只有以沉默来保持“明净”,暗合了神秀说的“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也许人生就是一面镜子,诗人以“镜”自喻自铭,映射了

诗人内心不愿同流合污的明净之诉求。废名还有不少以“镜”入诗的诗句，如：“时间如明镜，/微笑死生”（《无题》），“如今我是在一个镜里偷生”（《自惜》），“光阴好比一面镜子似的”（《伊》），“我凄然泪下，渗透西子镜”（《花露》），“自从梦中我拾得一面好明镜，/如今我才晓得我是真有一副大无畏精神”（《镜》），“我不愿我的镜子沉埋，于是我想我自己沉埋”（《沉埋》），“因为梦里梦见我是个镜子，/沉在海里他将也是个镜子”（《妆台》），“余有身而有影，/亦如莲花亦如镜”（《莲花》），“病中我轻轻点了我的灯，/仿佛轻轻我挂了我的镜”（《壁》），等等，废名对“镜”意象的反复使用，使“镜”获得了某种母题和本体意义，充满隐喻意味，镜像人生与实在人生、幻象与实象、世俗与理想交织于镜里镜外，而“镜里偷生”则成为生活于现代社会的废名的真实写照。

废名诗中的其他意象如“花”、“灯”、“月”、“海”、“星”等都使用了隐喻手法。这些意象由于积淀深远，因而都暗寓着深厚的文化蕴涵，尤其是佛学意蕴。吴长龙曾专门从佛学渊源上论及这些意象的佛学意蕴在废名诗中的投射<sup>[21]</sup>。佛学意蕴附着在意象上，使这些意象在废名笔下都具有隐喻意义。如“莲花”，这是一个与佛教渊源甚深的“花”意象。由于“莲花”本身出淤泥而不染，甚至不着于水，超凡脱俗，被誉为“花中君子”，而佛教寻求解脱人生苦难，从人世的苦海中超脱而抵达极乐净土，因此其追求的境界与“莲”的特性相吻合，如《大智度论·释初品中户罗波罗蜜下》曾明确阐明对“莲”之品性的欣赏：“比如莲花，出自污泥，色虽鲜好，出处不净。”而《从四十二章经》中的“我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花，不为污染”则奉“莲”的高洁、纯净为自己处世之楷模。因此，佛陀常被世人誉为“人中莲花”，正是象征着他不沾染尘世间任何烦恼和忧愁；而佛教中其他许多事物、事件都与“莲”有关，如“莲刹”、“莲胎”、“莲花戒”、“莲花智”、“舌上生莲”、“归宅生莲”等，都是由于佛教世界与莲花的深刻关联。余光中曾在《莲的联想·代序》中也论及莲花与佛教的联系：“莲以一暑为一轮回，《莲华藏世界》，以一花为一完整的宇宙”<sup>[22]11-12</sup>，“至于宗教，则莲即是怜。莲经，莲台，莲邦，莲宗，何一非莲”，“莲为神座。如来垂目合十，结跏趺坐在莲花之上。观世音自在飘莲渡海，而往普陀”<sup>[22]7</sup>。在佛教中，莲花是常见的吉祥物，有着香、净、柔软、可爱四德，象征着美、善，而在诗人笔下，“莲”则常喻指智慧、纯净、境界。废名诗中的“荷花”意象便如此，隐喻着深远的内涵，常象

征超尘脱俗、纯净无染的人生理想，集真、善、美于一身，如《海》：

我立在池岸  
望那一朵好花  
亭亭玉立  
出水妙善，——  
“我将永不爱海了。”  
荷花微笑道：  
“善男子，  
花将长在你的海里。”

“好花”、“亭亭玉立”、“出水妙善”的荷花纯净、圣洁，象征超尘脱俗的出世之心，而废名在此更赋予它一种“佛祖”的意蕴，“善男子，/花将长在你的海里”仿佛禅语一般，富有哲理，“微笑道”显然有着佛祖的大度、超拔和智慧。《莲花》、《人间》等诗中的“莲”亦象征着一种超凡脱俗的品性与高洁的境界。废名诗中的其他“花”亦非普通之花，而是隐喻着深厚的意蕴，正如《大日经·疏八》所言：“花者，是从慈悲生义。即是净心种子于大悲胎藏中，万行开放庄严佛菩提树，故说为花。”由于“花”意象本身便拥有开花结果的含义，因而它隐喻着“万行之因”、“成就佛果”<sup>[23]</sup>等含义，即象征智慧、真理、悟性等。废名在《拈花》一诗中化用了如来佛祖“拈花微笑”的典故，“遗世而独立，/微笑以拈花”中的“花”显然并非现实之“花”，而是与“拈花微笑”的“花”一样象征“悟”，象征大智慧，大真理。废名写“花”的诗还有《掐花》、《小园》、《莲花》、《路上》、《池岸》、《人间》、《墓》、《诗情》、《眼明》、《草·树·花》、《花的哀怨》、《栽花》、《果》、《坟》等，均赋予了“花”深刻的隐喻意义。与“花”、“荷花”意象相应，废名笔下的“海”意象则是“苦海”、“污浊”的象征。在佛教中，人生被视作“苦海”，世界则是充满了污浊的“魔”，人每天生活于“苦海”和“魔”中，要不断修行摆脱，才能由人生苦海的此岸抵达“极乐净土”的彼岸，而这种修行就要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不受“魔”的污染侵蚀。因此，废名笔下的“海”与“花”常对应出现，如前所引的《海》，“我将永不爱海了”与“善男子，/花将长在你的海里。”两句显然寓意深刻，“花”要保持自身的高洁、纯净，需要超脱于“海”，但“花”却又长在“海”里，因此，废名在诗中所要暗示的寓意是人永远都无法真正脱离尘世而存在，只能生于“海”而不爱“海”，只能如“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好，方是真正的美。《渡》中的“渡

于人生之海”、《人间》中的“我的泪是泪海之朵”等诗句中的“海”都是尘世苦海的象征。“灯”是废名笔下负载着隐喻意蕴的另一个重要意象。“灯”由于其光亮、光明而能帮人消除黑暗，解脱困扰，因而在佛教中象征着智慧，正如《坛经》所言：“一灯能除千年暗，智慧能灭万年愚。”“灯”之光明，常喻指人的心性智慧，悟性慧根，因而从佛陀时代“点灯”就已成为一种供养方式，“灯”成为佛家十供养（香、花、灯、涂、果、茶、食、宝、珠、衣）中的必备之物。佛前点灯意味着希望佛菩萨赐予智慧之光。废名笔下的“灯”是自我“明心见性”、驱逐人世黑暗、追求光明和智慧的隐喻，如“病中我起来点灯，/仿佛起来挂镜子，/像挂花似的”（《点灯》）中的“灯”是能驱逐内心黑暗和“病”的光明之“灯”，象征着光明、希望；“灯光好象写了一首诗/他寂寞我不读他/我笑曰，我敬重你的光明。/我的灯又叫我听街上敲梆人”（《灯》）中的“灯”则象征着深夜读《道德经》时与老子思想神遇的顿悟境界。《四月二十八日黄昏》中反复出现“一个灯一个灯”，诗笔由电灯柱上的“灯”旋即转移到“石头也是灯”、“道旁犬也是灯”、“盲人也是灯”、“叫花子也是灯”、“饥饿的眼睛也是灯”，“灯”显然由现实的“灯”引申到光明、智慧的象征，隐喻着人类对光明、智慧的渴望与追求。废名以“灯”入诗的作品还有《十二月十九夜》、《宇宙的衣裳》、《坟》等，其中的“灯”都带有象征和隐喻意蕴。废名笔下的“日”、“月”、“星”等意象亦都有隐喻意蕴。《坛经》中有云：“世人性净，犹如青天，慧如日，智如月，智慧常明”<sup>[24]</sup>，“日”、“月”、“星”都象征着智慧、悟性。废名把它们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出来，在现代汉诗歌语境中重新燃烧，虽然字面明白清楚，平易亲切，背后却深含丰富的意蕴，含蓄隐晦地暗示了诗人所要传达的感觉与精神世界。

可见，废名对被胡适否定的“温李”一派的认同与重新定位，使他无意识地重新认同了“温李”一派诗词的“隐僻”，形成了对古典诗传统中“暗示”、“含蓄”质素的重新发现，这既是他以隐喻手法形成暗示、含蓄等传达效力的创作经验之反映，又形成了他对古典诗传统中传达方式的再发现。

## 参考文献：

- [1] 刘半农.《刘半农日记》(1934 年 1 月 6 日) [J]. 新文学史料, 1991(1).
- [2] 罗振亚. 迷人而难启的“黑箱”——评废名的诗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9(2): 190–204.
- [3] 胡适. 胡适诗话 [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1: 262.
- [4] 周作人. 新诗 [N]. 晨报, 1921-06-1.
- [5] 郭沫若. 论诗三札 [M]//文艺论集.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217.
- [6] 梁启超.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M]//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七. 中华书局影印, 1989: 77.
- [7] 周作人. 论小诗 [N]. 觉悟, 1922-06-29.
- [8] 穆木天. 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 [J]. 创造月刊, 1926, 1(1).
- [9] 王独清. 再谭诗 [J]. 创造月刊, 1926, 1(1).
- [10] 胡适.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M]//胡适文集(三).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51.
- [11] 胡适. 谈新诗——八年以来一件大事 [M]//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 上海: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 300.
- [12] 废名. 新诗应该是自由诗 [J]. 文学集刊(第 1 集), 1943.
- [13] 废名. 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 [M]//谈新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14] 朱英诞. 新诗讲稿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77.
- [15] 吴晓东. 镜花水月的世界——废名《桥》的诗学研读 [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3: 208.
- [16] 泰伦斯·霍克斯. 隐喻 [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0: 4.
- [17] 废名. 天马诗集 [J]. 风雨谈, 1943(4).
- [18] 乐黛云. 中西诗学中的镜子隐喻 [M]//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88–101.
- [19] 普济. 五灯会元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784.
- [20] 谢榛. 四溟诗话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71.
- [21] 吴长龙. 传统与现代的对接 [D]. 合肥: 安徽大学硕士论文, 2005.
- [22] 余光中. 莲的联想 [M].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80.
- [23] 丁福保. 佛学大辞典(上) [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1: 1260.
- [24] 坛经(法海本) [M]//郭朋. 《坛经》对勘. 济南: 齐鲁书社, 1981: 43.

[责任编辑：吴晓红]

# 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汉诗意象思维的发展

陈培浩

(韩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 广东 潮州 521041)

**摘要:**意象既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核心范畴,也是现代汉诗重要的思维方式。八十年代以来的现代汉诗写作中,意象思维得到了多方面的拓展:于坚的“拒绝隐喻”事实上以否认的方式反证了意象思维与诗歌的不可分离性;北岛则以多个意象有机性实现意象个人化;而张曙光的叙事性诗歌中,隐含以情境更新意象个人性的思维。意象在诗歌中或疏或密,或隐或显,但意象思维却始终是中国汉语诗歌中院的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之一。

**关键词:**意象思维; 现代汉诗; 于坚; 北岛; 张曙光

**中图分类号:**I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51-05

The development of imagery – thought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since the 1980s

CHEN Pei – hao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Guangdong 521041, China)

**Abstract:** The imagery is both a classical Chinese poetical core and an important thought pattern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Since the 1980s, the imagery – thought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has witnessed multiple developments. Specifically, Yu Jian’s abnegation of metaphor in fact testifies the inseparability between imagery – thought and poem; Bei Dao’s poetry achieves unique individualized imagery by arranging multiple organic images; Zhang Shuguang’s narrative poetry implicates thoughts that update the image by situations. Disregarding whether the imagery of poetry is explicit or implicit, sparse or dense, it is alway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of thinking in Chinese poetry.

**Key words:** imagery –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etry; Yu Jian; Bei Dao; Zhang Shuguang

意象是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概念,同样是现代汉诗的重要修辞和思维方式。八十年代以来的现代汉诗在意象的使用上遭遇现代性自我创新的挑战,但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自我更新。

现代汉诗也长期被称为新诗,新诗在不断求变求新的过程中产生了跟传统诗歌截然不同的标准,如臧棣所说“在古典时代,衡量一个诗人的成就,主要看一个诗人对神话象征和公共象征的领悟的程度。而在现代诗的写作史中,这种衡量尺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叶芝感到的,现代诗人必须在其诗歌写作中去创建自己的个人象征。”<sup>[1]</sup>

现代性面向未来开放的时间观决定了它不断创制可能性的审美取向,所以,传统的意象在现代

汉诗这里便产生了难题。所谓意象,是指经过诗人思想、情感和想象再处理过的名词性语言符号,是诗人心智情思和符号水乳交融的结果。意象往往是意寄于象,象蕴藉意。意象既是以少达多,又是寓抽象于形象,寓情感于画面的表达,是汉语形象性诗学的重要手段。与古典诗歌相对有限的语言体制相得益彰,其审美特性被发挥到极致。也可以说,意象是古典诗歌所找到的沟通读者和作者审美体验的有效桥梁。但是,在现代性标准进入新诗后,意象的桥梁却并不稳固。现代性要求创新,诗人于是不能安居于前人的审美桥梁而无所作为。面对意象,诗人们都有着强烈的“影响的焦虑”。如果说古代诗人可以坦然地在诗歌中通过月亮意

收稿日期:2012-11-18

基金项目:韩山师范学院青年基金项目“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诗歌的语言研究”(WQ2011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培浩(1980-),男,广东潮州人,广东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首都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文艺学。

象去触摸乡愁或闺怨的话,现代诗人面对月亮却不能不小心翼翼。前人的月亮书写越多,后人书写月亮的困难就越大。

在意象使用方面,当代诗人有着相当多的思考和尝试。既有像于坚那样断然主张放弃意象——从隐喻撤退的;也有像北岛那样长久坚持意象诗歌写作,在诗歌内部有机性创设中更新意象个人性的;也有像张曙光那样,在意象与情境的关系中,以情境磁化意象并更新意象内涵的。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共同构成了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汉诗意象思维的发展。

## 一、意象否认:于坚“拒绝隐喻”的悖论

80年代以来,诗歌开始朝个人性方向发展,(这种个人性当然也是必须在具体的时空中被历史化的,并不是说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个人化完全脱离话语宰制)个人化带来了文学上的语言焦虑,体现在诗歌上则是对于“圣词”的审视和反思。八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中,诗人们已开始认识到世界与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所以,个人化世界的建构有赖于个性化语言的寻找。对于诗歌中“大词”或“圣词”的拒绝成了一种重要的思考途径——于坚的“拒绝隐喻”正体现了这方面的理论努力。

早在80年代,于坚就开始诗歌随笔《棕皮手记》的写作。《拒绝隐喻》最初成型于于坚对随笔《棕皮手记》(1990—1991年)的整理,收录于1993年谢冕、唐晓渡主编的《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等选本。此篇短论观点惊人,但作为随感结构松散、逻辑性薄弱,“隐喻”一词使用较混乱。“拒绝隐喻”之说引起诗歌界较多争议;两年过后,于坚对此短论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成为《棕皮手记·拒绝隐喻——一种方法的诗歌》,改后内容更加充实,论述亦更为严密,对“拒绝隐喻”的使用更为谨慎。1995年9月,于坚应邀在荷兰莱顿大学亚洲国际中心“中国现当代诗歌国际研讨会”上发言,完整地阐述了他的“拒绝隐喻”诗观。此诗论更名为《从隐喻后退——一种作为方法的诗歌》,刊登于1997年第三期的《作家》。文章虽不断修改,但主体观点未变。于坚提出“文明以前世界的隐喻是一种元隐喻”<sup>[2]</sup>,这种隐喻是命名式的。它和后来那种“言此意彼”的本体和喻体无关。于坚所谓的“元隐喻”是一种世界原初语言命名世界的活动,在他看来,在一套符号体系表征了世界之后,人们便不再活在跟世界的直接对话中。于坚认为:“命名者才是真正的诗人”、“诗人所谓的隐喻,是隐喻后。是正名的结果。”<sup>[2]</sup>他认为前者是创造,后者不过是阐释。

于坚意识到,在一套既成的符号系统中,名和实的分离变得越来越严重,人们不再能够言说存在,而只是言说一套关于存在的符号:

五千年前的秋天和当代的秋天相比,早已面目全非,但人们说到秋天,仍然是这两个音节。数千年的各时代诗歌关于秋天的隐喻积淀在这个词中,当人们说秋天,他意识到的不是自然,而是关于秋天的文化<sup>[2]</sup>。

在他看来,隐喻的建立,意味着一种表达的成规惯例宰制了人们的思维,并造成表达活力的衰退,其结果是在公共意象的使用过程中词与物渐渐脱节,经验被遮蔽了,诗也隐匿了。他还常常对隐喻思维进行政治判断:

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诗歌的隐喻系统,是和专制主义的乡土中国经验吻合的。越是专制社会,其隐喻功能越发达,不可能想象在一个隐喻作为日常言语方式的社会里会出现像惠特曼那样的诗人<sup>[2]</sup>。

既然“隐喻”必须为写作专制甚至社会专制负责,那么他惊世骇俗的“从隐喻撤退”或所谓“拒绝隐喻”的主张便显得自然而然了。

不难看出,于坚诗学方案背后的问题意识来自于一种审美现代性的思路。现代性向未来投诚、向可能性敞开自身,那么重复便是最大的耻辱。这种现代性语境下写作的影响焦虑促使于坚做出反应,他为写作个人化提出的惊世骇俗的方案就是拒绝隐喻。

中国诗歌集中体现隐喻艺术的便是意象,他很具体分析了中国诗歌中从词到意象的技法:中国诗歌的发展,是一个伴随着词不断向意象转化的过程。无疑,意象比词更概括、集中、凝聚,也更富于表现力。中国诗歌的不断发展,使得意象这一个文件夹不断地充实扩大,其妙处在于以后要说一下文件名(意象)便可以了,这样不但使诗歌简约集中,而且带来了一种文学特有的陌生化效果。中国诗歌中大量的意象如香草、美人、春水等等,它们表现了特殊的内涵而被后人不断使用,而这种使用又使它们的内涵得以不断地扩展而有了大量的文化沉淀。譬如现在使用梅花这个词,它已往往不仅是“梅花”,而代表了“清幽、孤傲、高尚、纯洁”等精神性特征,梅花所隐喻的内容曾经给诗人以影响使他们写出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依旧”这样的句子,而这样的句子一旦产生,它又充实了梅花意象的内涵。中国诗歌正是在“词→意象”这一条道路上不断前进。

所以,在于坚那里,隐喻之弊便是意象之弊。拒绝隐喻是对传统诗写方式的放弃,是写作上求新意识下的修辞弑父,它以拒绝的姿态吁请着诗写的更新。这种方案可能为于坚的写作带来新活力,但

显然也带来了新的陷阱和悖论。

显然，于坚混淆了隐喻修辞和隐喻思维的区别。作为修辞的隐喻也许可能在某些文本中被拒绝，但作为思维的隐喻却难以被拒斥于诗歌门外。隐喻事实上是对语言表意功能的拓展，隐喻使意义从此物进入彼物，从具体世界进入抽象世界，隐喻是唤起事物隐秘联系的方式。所以，作为思维方式的隐喻无所不在且与诗歌不可分离。在于坚的大量作品中，看上去隐喻被拒绝了，事实上被拒绝的仅是隐喻的修辞，在思维的层面上，于坚的诗歌同样乞灵于隐喻。于坚非常著名的诗歌《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显然实践着于坚拒绝隐喻的主张，他为不祥的黑鸟提供了充满细节的新语境，试图颠覆以往隐喻中乌鸦的经典内涵。某种意义上说，于坚做到了，他解构了“乌鸦”，但解构的实现，其前提正是传统“乌鸦”隐喻的存在。所以，于坚的反隐喻写作常常内在地跟隐喻写作纠缠胶着。

这种完全解构式的反隐喻写作——恢复命名功能的写作，在于坚那里也是不能一以贯之的。随举一例，他在《0档案》“出生史”中有这么一句：

手术刀脱铬了 医生 48 岁 护士们全都是处女<sup>[3]</sup>

这句看似纯属叙述的句子意义的产生，其实不能离开于“手术刀”、“处女”这两个词的隐喻功能。很难说“护士们全都是处女”是一种现实描述，“处女”表达的是对一个僵化而充满道德洁癖体制的反讽。所以，“处女”已经由一种现实状态而被引申为“处女情结”或“陈腐的道德趣味”了。这种隐喻思维，也是于坚诗歌所不能不借重的武器。

现代性的求新意识使于坚拒绝诗歌中的陈腔滥调，希望写作能够重新回到存在身边，这构成“拒绝隐喻”方案的问题意识和合法性基础。然而，在为诗歌的陈腔滥调归因时，于坚却找错了根源。他认为隐喻必须为诗歌的陈腔滥调负责，无异于把杀人的责任归结到刀上。吊诡的是，这种方案在理论上虽然谬误重重，但对于于坚本人写作自我更新却并非完全无效。

拒绝隐喻虽无充分的理论基础，足以成为普适性的写作原则，却不失为某个诗人个性化的写作选择。正因此，其悖论性必须被指出：我们既不能因为它理论上的迷误而否认它作为个人写作方案的可能；也不能因为它在某个诗人身上产生的效果而将其扩大为普遍标准。

于坚拒绝隐喻方案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诗歌意象思维中“意象否认”的一种思路，通过对它的争议和讨论，人们更清晰辨别意象思维作为重要诗歌思维的作用。换言之，写作个人性的获得可以通过否定意象——拒绝隐喻的方式来获得，但在意象

的内部更新中同样可能实现。

## 二、有机性与意象创新：北岛《关于传统》的探索

北岛是朦胧诗人代表，意象思维在朦胧诗诗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更重要的是，北岛的写作，从未放弃过意象思维。在第三代诗歌通过叙事性、口语性而引入大量绵密的日常经验诗，北岛依然不为所动。写作的自我更新是每个严肃诗人的诉求，北岛的方式是为多个意象创设一种有机性，从而使意象既能在上下文中被解读，又不丧失个人性。我们通过他的一首短诗《关于传统》来分析他的探索：

野山羊站立在悬崖上/拱桥自建成之日起/就已经衰老/在箭猪般丛生的年代里/谁又能看清地平线/日日夜夜，风铃/如文身的男人那样/阴沉，听不到祖先的语言/长夜默默地进入石头/搬动石头的愿望是/山，在历史课本中起伏<sup>[4]</sup>

诗歌对“传统”的解释正是通过“野山羊”、“拱桥”、“悬崖”、“箭猪”、“风铃”、“文身”、“石头”等意象自身的隐喻和彼此的串联、并联、对位关系建立起来的。

“野山羊”不是小绵羊，不是顺从驯服的，而是野性独行的。诗中它甚至走到了悬崖之上，如果将野山羊置换为现代艺术家的话，显然也无可。在现代性独辟蹊径的压力下，艺术家们都走到了创新的悬崖之上，这时，他们必然要思考自身跟“传统”的关系。

而“拱桥”，显然是出走多时的“野山羊”跟传统之间建立起来的沟通途径，惜乎在诗人眼中，它“自建成之日起/就已经衰老”。

箭猪丛生的年代是什么年代呢？直观解释当然是厮杀的、撞击的，非诗情画意的年代，也许可以牵强附会为信仰坍塌、思维碎片化的后工业时代。那么，“箭猪”和“野山羊”又有何关系呢？同为野性之物，走到悬崖之上的“野山羊”是高处不胜寒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孤独；“箭猪”却是热衷于在猪群中相互搏斗并厮杀逐利的。羊，特别是野山羊是清高的；猪，特别是箭猪却是现世的。前者是艺术家，后者是庸众。这里北岛的精英心态又清晰地流露出来。所以，在箭猪丛生的时代，站在悬崖上的野山羊是无法看到地平线——太阳升起的地方。

孤独的野山羊，自绝于喧嚣庸俗的时代，又无法通过衰老的拱桥去汇入传统，（这是北岛跟艾略特不同之处）此时，“风铃”出现了，“风铃”本是美妙的声音的声源，是风和铃默契的合奏和共鸣，传统之风吹进当代的心灵之铃，在北岛眼中不过是一

种浪漫想象,因为这种风铃,如“文身”的男人那样阴沉,听不到祖先的语言。如果说“风铃”是动态的,在场的,诉诸耳朵和心灵,稍纵即逝的话;那么“文身”则是图腾化、抽象化,诉诸眼睛并且长久居留、难以抹去的。这大概是北岛对传统一种阴沉的看法:传统虽然被描述成“风铃”,事实上却不过是具有压迫性的“文身”罢了,是祖先强制性地在我们身体上留下的记号。后面三句带有反讽性,特别是“历史课本”的表达,历史不是历史本身,而是被叙述、被讲授的“课本”;“山”于是可理解为“历史课本”中确立下来的主流叙事。如果这样看的话,北岛的观点依然很“阴沉”,代表了一种对传统的悲观看法:因为山不是我们可以跟祖先共享的自然物,时间漫过的石头,最后都是被“历史课本”塑造的,这里那种历史的叙事化的立场很强,显然也不是朦胧诗时期北岛所会有的文化立场。

北岛非常喜欢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重要的原因是他在特朗斯特罗姆精湛的意象诗歌表达中获得启发和共鸣。北岛通过为诗歌中的多个意象创设有机性的实践,无疑更新了当代诗歌的意象思维。

### 三、情境之于意象:张曙光《1965 年》的探索

如果说北岛的意象思维是通过诸多意象之间的对位、串联等关系来创设有机性的话,张曙光的诗歌则追求情境对意象的磁化作用,文本情境同样使他诗歌中的意象获得了个人性。

一般而言,张曙光并不被视为意象诗人,研究界多认为他“创作于八十年代中期,却并未引起关注的《1965 年》,是九十年代诗歌中‘叙事’的起端。”<sup>[5]</sup>然而,这首叙事性很强的《1965 年》同样隐含着一种创新的意象思维——通过情境为个人意象提供保证。以《1965》为例,这首诗中充满了意象,像“雪”、“茉莉花”、“红色的月亮”、“电影院”、“陡坡”、“冬眠”的“动物”、“高压汞灯”、“淡蓝色的花朵”、“冬季”。

从于坚拒绝隐喻的思维来看,像“雪”这样被用了千百遍的词,其实太像其所指本身了——北方大雪初挂枝头的美丽和过后摇落地上被踩得脏不可言、混杂黑色泥土和无数脚印的存在,这难道不正是诗歌中被用破了的陈词滥调的某种象征。对于任何现代诗人而言,面对“雪”或“月亮”这样的意象都是有压力,张曙光并不例外。诗人该如何挣脱呢?于坚的方式是,干脆拒绝隐喻,隐喻总是会涉及到名词,它恰好是名词的一种意义衍生机制。

写作不可能避开名词或意象,于坚所谓的拒绝隐喻,很多时候就表现为解构意象——对乌鸦的逆向命名,他对塑料袋子的书写中充满着对各种文化流行意象的解构。但是,张曙光的方式不是拒绝隐喻,而是用叙事性的手段,巧妙地赋予意象以个人化的内涵。比如,在他的诗歌中,雪是死亡的隐喻或象征,但是他却绝对不会简单地说“雪是死亡”(或相类似的“雪有死亡的质地”、“雪散发着死亡的气息”、“雪闻着有死亡的香气”之类语言),因为当诗人用隐喻的语言装置来写作时,从本体到喻体的语言映射,其实正是诗人的思维向世界发起的正面强攻,它所能炸开的东西,很可能 是有限的。

应该说,张曙光保留了隐喻的效果,但是他放弃了明喻(像……)暗喻(是……)等通过修辞装置来实现的隐喻,他用叙事的铺垫来执行隐喻的目标。正因为隐喻弥散在整个诗歌语境中,所以,本体和喻体的关系就不再是直接的,确凿的,它是模糊多义的、多点发散的,因而也是更加丰富,更有创新可能的;一旦读出来也更加发人深思。我们看《1965》年中的“雪”:

那一年冬天,刚刚下过第一场雪

也是我记忆中的第一场雪<sup>[6]86</sup>

看似平淡的叙述口吻中没有任何关于“雪”的意义建构,即使有也是隐藏的、不动声色的。(如果说隐喻修辞的“是”、“像”是一种由诗人出面进行的强力导读的话,这种不动声色的叙事铺垫则是创设一个博物馆中的现代艺术展:陈列的顺序和方式已经包含着策展人观看世界的方式,但却没有一个导游来推销一种强制性的视点。)“那一年冬天,刚刚下过第一场雪”,这是主体客观的叙述口吻,“第一场”带来了某种“原初性的”、“充满期待憧憬”的意味;其潜在效果则是,暗示了这场雪对主体记忆的重要性,许诺了主体对记忆的确切把握。它虽然没有说出记忆,但暗藏记忆。我们接下来就会发现,记忆正是此诗的重要主题,而诗人在最后一句又颠覆了这种通过语气暗示出来的“确切记忆”。

第二句,“也是我记忆中的第一场雪”,第一句是一种客观化语气,第二句则是主体“不确定”语气:“记忆中的第一场雪”该如何理解呢?第一种解释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是那个冬天的第一场雪”。“我的记忆中”说明它很可能是不够确切的,只是“我”个人的某种印象乃至错觉,它是不确定的,跟第一句的那种“确定、客观”的语气是不同的。诗人悄悄地铺垫下诗歌最后的“自反性记忆”(这里的自反性不是哲学上的“自我反映”,而是自我反对,自我消解的意思)。第二种解释则是,这场雪既是现实的,也是隐喻的,它是我的记忆中第

一场严寒。因此，“雪”就不仅仅是“雪”了，它悄无声息地朝着“死亡的气息”逼近。结合全诗，这种含义确实是存在的：

傍晚来得很早。在去电影院的路上/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绕过一个个雪堆，看着/行人朦胧的影子闪过——/黑暗使我们觉得好玩/那时还没有高压汞灯/装扮成淡蓝色的花朵，或是/一轮微红色的月亮/我们的肺里吸满茉莉花的香气/一种比茉莉花更为凛冽的香气/(没有人知道那是死亡的气息)<sup>[6]86</sup>

这一段写雪后的傍晚去电影院看电影，后面括号内的句子埋藏着诗歌意义的密码——死亡的气息。正是从这个“密码”出发，我们发现这首诗所有被叙事性之灯漫不经心探照过的名词，其实都充满了隐喻。

这时，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典型此时语气与童年视角交融的片段：几个小孩子，绕过一个个“雪堆”，严寒堆成了我们的玩具，“行人朦胧的影子闪过——黑暗使我们觉得好玩”，这句话显得特别意味深长。“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经历和智力来理解“雪”的严寒和“黑暗”的残忍，没有办法理解那些从雪堆中闪过的朦胧影子所可能有的创伤和心事。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切“好玩”，这里有一个“类儿童视角”，因为它并不是真的要还原到儿童的那种角度去看世界，只是借用了当时儿童眼中的世界来跟现在进行对照。所谓“那时”，“没有人知道”便是此时的语气，此时的语气与童年的视角的交融，为“雪堆”、“高压汞灯”、“茉莉花的香气”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解释途径。

此时的语气告诉我们，在那种快乐无邪的记忆中，有一种死亡的气息在弥漫，只是它尚不为当年的我们所觉察。因此，此时的语气为诗歌解释提供了最重要的光源，所有的词都打上了死亡的色彩：雪中凛冽的香气是死亡的气息，那么雪很可能便是一场致人死亡的严寒。

“那时还没有”说明“高压汞灯”并不是童年场景中的现实存在物，它的引入不是现实性的，而是象征性的。它的引入是由于被装扮成“蓝色花朵”和“红色月亮”的高压汞灯跟雪被黑暗装扮成童年美好玩具之间具有同构关系。

1965年，“我”只有十岁，在童年演习着“杀人的游戏”的欢天喜地中，还无法理解一场早已降临的雪的含义。（从历史和文化意义上说，1965年之后即将降临的还有更大的雪）联系具体的历史语境，张曙光在这里漫不经心的语调而又步步匠心的

布置，有着充分的现实指向。

由此我们发现，张曙光在赋予“雪”个人内涵的过程中，他放弃了传统的隐喻修辞装置，而诉诸了更加复杂的叙事装置，这里包含了适时的铺垫与说明；主导性阐释语码的设置（“没有人知道那是死亡的气息”是这首诗意义的主光源）；“此时”语气与“童年视角”的交融和张力。在这多种复杂精微的叙事设置中，“雪”与“死亡气息”的关系，不是点对点的对应映射关系，而是必须在语境的有机性中去综合把握的一种气息。

这首诗还有其他很多值得分析的地方，但是此处，张曙光八十年代努力，在九十年代大放异彩，引领了九十年代的叙事性潮流。他延续了隐喻，又更新了隐喻的语言机制，相比于于坚拒绝隐喻的结构策略，他向叙事性掘进的思路对九十年代以来的诗写有着更重要的启示。而且，我们可以从八九十年代另一个位重要的诗人张枣的诗歌写作中看到相近的处理意象的经验。

#### 四、结语

意象既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核心范畴，也是现代汉诗重要的思维方式。八十年代以来的现代汉诗实践中，意象思维得到了多方面的拓展：于坚的“拒绝隐喻”事实上以否认的方式反证了意象思维与诗歌的不可剥离性的；北岛则以有多个意象有机性实现意象个人性；而张曙光的叙事性诗歌中，隐含以情境更新意象个人性的思维。意象在诗歌中或疏或密，或隐或显，但意象思维却始终是中国汉语诗歌思维之一。现代汉诗追求个人性和诗写的更新，诗歌中的意象思维也因此将变得更丰富多姿。

#### 参考文献：

- [1] 李心释,黄梵,臧棣,等.关于当代诗歌语言问题的笔谈(一)[J].广西文学,2009(1):88-94.
- [2] 于坚.拒绝隐喻——一种作为方法的诗歌[J].作家,1997(03).
- [3] 于坚.0档案[J].作家,1994(1).
- [4] 北岛.关于传统[M]//北岛诗歌集.佛山:南海出版社,2003:53.
- [5] 张桃洲.众语杂生与未竟的转型:1990年代诗歌综论[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5(6):92-102.
- [6] 张曙光.1965年[J].西部,2011(3):86.

〔责任编辑:吴晓红〕

# 山东章丘方言的语气词

高晓虹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083)

**摘要:**描写了山东章丘方言中语气词的出现位置及功能分布,并与普通话的语气词进行了比较。根据章丘方言反复问句末尾语气词的区别,推测普通话用于是非问句的“吧”应来自反复问句末尾的否定词,并认为章丘方言反复问句末尾的“啦”应是“么”。

**关键词:**章丘方言;语气词;功能分布

**中图分类号:**H1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56-07

## Modal particles in Zhangqiu dialect of Shandong province

GAO Xiao - ho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ositions and functional distributions of modal particles in Zhangqiu dialect of Shandong province and compares them with the modal particles in Mandarin. Based on the above study, this research assumes that the “ba” used in yes/no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in mandarin can be traced to the negative word used in VP – neg, and that “mang” of VP – neg in Zhangqiu dialect should be “me”.

**Key words:** Zhangqiu dialect; modal particle;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对于北京话或普通话的语气词,自《马氏文通》以来,已经有众多的研究成果,既有对具体某个或某几个语气词的描写分析,也有对语气词所表达的语气系统的建构<sup>[1]9-52</sup>。这些研究为汉语其他方言语气词的研究提供了参照框架。

章丘为山东省会济南所辖的一个县级市,其方言属于冀鲁官话。至今为止,章丘方言语气词的研究不多,赵学玲曾讨论过用于特指疑问句、选择疑问句、反复问句以及是非问句中的若干语气词<sup>[2]</sup>,高晓虹对助词的描写也包括语气助词在内<sup>[3]296-319</sup>。本文借鉴普通话语气词的研究成果,尝试对章丘方言的语气词进行较为全面的描写分析。例句多数取自自然口语录音材料,少数自拟。本文对语气词的记音与赵学玲略有差异,将其“尼”记为“呢”,“吗”记为“嘎”,将反复问句末尾的形式分别记为“噃”、“啦”,也归为语气词。这样,本文讨论的语气词有如下11个:呃[ə<sup>0</sup>], 嘬[lə<sup>0</sup>], 哩[liə<sup>0</sup>], 的[ti<sup>0</sup>], 噃[le<sup>0</sup>], 噥[pə<sup>0</sup>], 吧[pa<sup>0</sup>], 啦[la<sup>0</sup>], 呢[ni<sup>0</sup>], 嘎[mə<sup>0</sup>], 呸[məŋ<sup>0</sup>]。

### 一、语气词的出现位置

郭锐指出汉语的语气词主要出现在三个位置:句尾,句中停顿处,另一语气词之前<sup>[4]</sup>。章丘方言的语气词也是这样。

#### (一) 出现在句尾

句尾是语气词出现的最主要的位置,上面所举语气词都可以出现在句尾,例如:

你娘不待家,你咋吃的饭呢? (你娘不在家,你怎么吃的饭?)

就犄呃他点粉皮吃唠。(只夹了他一点粉皮吃。)

他跑到东北去咧。

我上街买点菜的。

我说,我喝上那点儿酒嘛。

你娘知道的不少噃?

快倒吃点儿感冒药吧。(快吃点感冒药吧。)

你找我有事嘎?  
明白过来啦?  
准是待那八九岁这里,我长 - 一场病呢。  
你爹嘎?

虽然都可以出现在句末,但不同的语气词表现不完全相同,即有的语气词除了表达语气,还有完句的功能,去掉之后句子就无法成立,如上例中的“咧”、“哪”、“吧”、“嘎”基本是不能去掉的;其他句子中的语气词去掉之后虽然句子的语气有变化,但仍然可以说。不过,“咧”在有的情况下也可以去掉,例如:

回家吃饭咧。→回家吃饭。

## (二) 句中停顿处

根据李兴亚<sup>[5]</sup>、方梅<sup>[6]</sup>,北京话语气词“啊、呢、吧、呀、啦、嘛”等可以出现在句中位置。其中方梅从篇章的角度考察,认为句中语气词是反映句子次要信息和重要信息划分的“主位—述位”结构的标志,并把可出现于句中的语气词分作三类:(1) 主位标记:啊、吧,不带语气意义,只起标示主位的作用;(2) 准主位标记:嘛、呢,有时带语气意义,有时不带;(3) 非主位标记:啦、呀,主要出现在多项并列成分之后。这些研究表明,位于句中的语气词与位于句尾的语气词功能有所不同,而且,并非所有的语气词都能在句中出现。

章丘方言可以位于句中停顿处的语气词主要有“呃”、“吧”、“哪”、“呢”、“嘎”,这几个语气词一般可以去掉,基本不会改变句子意义。例如:

那户<sub>那种</sub>大的呃,鸟不拉唧的那户<sub>那种</sub>的,叫屎苍蝇。

你和虎子吧,这就俺侄子。

秦香家冲到这条街,这不上你姥娘家去哪,这里一个庙子。

现在呢,他都是使上蜂窝煤,使这户转悠的鏊子。

这领导哪,就说是到赶上一年倒再说。

在口语中,一个句子常常分成两段来说,有的两段的次序跟一个句子时一样,只是前一段加上了语气词,如上述例句;有的两段的顺序与一个句子时正好相反,导致语气词位于句中。例如:

用着哪哪,这就说是?

孙成呃哪,这不去打酒的哪,给他师傅。

俺待买点儿菜的,上集上。

走哪哪,那个人?

以上情况是一种临时的用法,在口语中基本上每个语气词都存在这样的用法,显然与前面“吧”等固定的位于句中的语气词性质并不相同。还有一种情况,一个句子分成两段后,次序不变,但都带上了语气词,这也使语气词出现在句中。例如:

他就这啥咧,成呃卖劳力的咧。

这两种造成语气词位于句中的情况,虽然是临时的用法,但在口语中实际是非常普遍的。而这可能正是语气词从句尾向句中位置扩展的途径。

## (三) 另一语气词之前

这一位置是由语气词的连用而来的。丁恒顺讨论了普通话里六个最基本的语气词“的、了、么、吧、呢、啊”的连用问题,把这六个语气词分为甲(的)、乙(了)、丙(么、呢、吧)、丁(啊)四组,分析了甲乙、甲丙、甲丁、甲乙丁、乙丙、乙丁、丙丁等的连用情况<sup>[7]</sup>。齐沪扬也有关于语气词连用的说明<sup>[1]61</sup>。总的来看,普通话多为两个词连用,三个词连用时最后一词均为“啊”,而且常与第二词合音;基本只有甲、乙两组即“的”、“了”两词出现在另一语气词之前。丙丁两组的连用,在书面语中一般都直接写作“吗”、“哪”等。所以最常见的是“的”、“了”与其他语气词的连用。

跟普通话的“的”、“了”基本对应,章丘方言能出现于另一语气词之前的语气词主要是“的”、“哪”。例如:

后来解放哪以后,就上那里上学的咧。

看完这片地,咱再去看看村后的麦子的吧。

我又没有家口,一窝八口不都给你拉的哪。

人呃<sub>人家</sub>仔<sub>只要</sub>放个屁呃,香倒的哪。

她可没有办法哪,那可是她爹哪,她娘可死哪哪。

你吃哪哪?

他上大学哪哪?

他咋章忙早就走哪哪?

不过,章丘方言里与普通话语气词“了”对应的是“咧”,而不是“哪”,但“咧”不能在这一位置出现。“哪 + 语气词”往往可以用“咧”替换,但语气有细微的差异。例如:

她可没有办法哪,那可是她爹哪,她娘可死哪哪。

→她可没有办法哪,那可是她爹哪,她娘可死咧。

你吃哪哪? → 你吃咧?

他咋章忙早就走哪哪? → 他咋章忙早就走咧?

但“哪哪”连用时,换成“咧”句字的意思就完全改变了。例如:

你吃哪哪? (询问能否吃得)

你吃咧? (询问吃了没有)

“哪”有时也出现在另一语气词之前,这种情况的“哪”应是“哪”的弱化。

## 二、语气词的功能分布

讨论语气词的功能分布,主要是考察语气词在陈述句、疑问句等四种句类中的出现情况。齐沪扬

把现代汉语语气系统分为功能语气和意志语气两大类<sup>[1][20]</sup>，“语气词往往是功能类别的形式标志”，而功能语气也分为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四类。所以语气词的功能分布就是在四种句类中的分布情况。

### (一) 陈述句

章丘方言中除了“啦”之外，其他的语气词都能出现在陈述句中，包括“呃”、“唠”、“咧”、“的”、“唆”、“擐”、“吧”、“慢”、“呢”、“噏”。例如：

就<sup>才</sup>掎<sup>快</sup>呃他点粉皮吃唠。

这不，十四的那一年，我就能做起单裤来咧。

你待家里，我上街去买点菜的。

你叫我晚上里<sup>晚上</sup>去上学，我还不去唆。

放倒呃树，摸老鸹，他不是稳当慢”。

走到这大墓田里噏，就出来一些鬼呃。

五六年我才就业就到那里呃。

丢唠就丢唠吧（，我再给你买一个）。

准是待那八九岁这里，我长一场病呢。

待人呃南山里噏，就不使这呃咧。

### (二) 疑问句

疑问句分为特指问句、选择问句、是非问句和反复问句四种。据文献[2]，章丘方言用于特指问句的语气词主要是“呃”、“呢”、“噏”，用于选择问句的是“呃”和“呢”，用于反复问句的为否定词“不”和“没”，即本文的“擐”、“啦”，用于是非问句的有“呃”、“不（擐）”、“吗（慢）”、“吧”。下面举例说明章丘方言四种问句中的语气词。

#### 1. 特指问句：

你待上哪里呃？

你待那里做啥呢？

你爷爷擐？

#### 2. 选择问句：

你到底吃呃是不吃呃？

明日是晴天呢还是阴天呢？

特指问句和选择问句中的“呢”一般可以换作“呃”，但“呃”换成“呢”不一定自然。

#### 3. 是非问句：

你娘还没回来呃？

你待看书慢”？

你是红子—噏？

咱先走吧？

文献[2]指出用“不”即本文的“擐”的是非问句，基本都是否定式，但实际上肯定式也很常见。又如：

明日是他—生日噏？

此外，“唠”和“咧”也能出现于是非问句中。例如：

这些你能都吃唠？

你吃唠饭咧？

### 4. 反复问句：

他明日去上班—噏？

你夜拉去济南唠咯？

齐沪扬把疑问语气分为询问语气和反诘语气两种<sup>[1][21]</sup>。以上所举例句表达的都是询问语气。章丘方言能表达反诘语气的语气词有“呃”、“咧”、“吧”、“慢”。

这本书不是你的呃？

孩子不成器，你还能不管他咧？

都这个样咧，你还能做啥吧？

这户事情能办成慢”？

男人又把外头找唠一个来，她能不生气慢”？

其中“慢”最为常用，“呃”、“咧”、“吧”一般可以替换成“慢”，替换后，表达的反诘意味明显增强。例如：

这本书不是你的慢”？

孩子不成器，你还能不管他慢”？

都这个样咧，你还能做啥慢”？

### (三) 祈使句

章丘方言能用于祈使句的语气词主要有“吧”、“呃”、“的”、“唠”、“咧”。例如：

把衣服穿上吧！

咱们吃饭的。

明天早点来呃！

快倒把这碗饭吃唠！

回家吃饭咧！

今日就别走咧！

相比之下，用“吧”的语气比较和缓，命令的意味较弱，带有商量的口气。而用“唠”时语气较为强硬。用“唠”的情况比较少，而且，“唠”后面还可以再加一个“吧”，带上“吧”后，语气变得缓和。例如：

快倒把这碗饭吃唠吧！

据齐沪扬、朱敏的考察，现代汉语祈使句肯定式比否定式带语气词的比例高，肯定句中以“吧”、“啊”为主，其中“吧”占绝对优势，否定句中多为“啊”、“了”以及二者的合音<sup>[8]</sup>。在章丘方言中，显然“吧”也是最常出现于祈使句的一个语气词。上面所举例句，“呃”可以替换成“吧”，“唠”后面可以加“吧”，“咧”有的可以替换成“吧”，有的可以用“唠吧”替换，替换之后语气更为委婉和缓。例如：

回家吃饭咧。→回家吃饭吧。

今日就别走咧。→今日就别走唠吧。

### (四) 感叹句

能出现在感叹句中的语气词有“呃”、“咧”。例如：

今日天真好呃！  
他也忒嘲咧！

### 三、与普通话语气词比较

章丘方言语气词的分布情况如前所述,跟普通话语气词有同有异。这里仅以章丘方言语气词为准,看它们与普通话语气词的对应关系。二者语气词的大致对应关系如下表1。

表1 章丘方言与普通话语气词对应关系表

|     |   |    |   |    |     |     |
|-----|---|----|---|----|-----|-----|
| 章丘  | 呃 | 唠咧 | 的 | 噃吧 | 啦嘎” | 呢噃唆 |
| 普通话 | 啊 | 了  | 的 | 吧  | 吗   | 呢   |

“啊、了、的、吧、吗、呢”是普通话最基本的六个语气词。相比之下,章丘方言的基本语气词要丰富一些,除了“啊、的”之外,普通话的其他四个语气词都与章丘方言的两个甚至三个语气词对应。不过,不同的语气词对应的具体情况并不相同。下面我们分别来比较。

#### (一) 章丘方言的“呃”与普通话的“啊”

据储诚志[9],现代汉语的“啊”可以出现在四种疑问句、陈述句、祈使句、感叹句的句末以及位于句中停顿处。章丘方言“呃”的分布与之基本一致,也能位于句中停顿处和疑问句等的末尾。除此之外,章丘方言的“呃”还能位于其他语气词之前。例如:

你吃呃噃？

不过,这个“呃”主要出现在“噃”、“啦”之前,而且受其前词末音节的制约。文献[2]认为这个“呃”实际上是一种拖音,可有可无。正因为是一种拖音,“呃”的实际音值并不固定是[? 0],有时是其前音节韵母的延长。例如:

你结 唠 婚 - 口忙? n̪i<sup>55</sup> tɕia<sup>44-23</sup> lɔ<sup>0</sup> xuə<sup>213-21</sup> ~<sup>0</sup> maŋ<sup>0</sup>?

你吃饭呃噃? n̪i<sup>55</sup> tsʰɿ<sup>44-55</sup> fa<sup>21-55</sup> ə<sup>0</sup> / a<sup>0</sup> po<sup>0</sup>?

#### (二) 章丘方言的“唠”、“咧”与普通话的“了”

章丘方言语气词“唠”、“咧”出现的地方,普通话都为“了”。例如:

|            |             |
|------------|-------------|
| 章丘方言       | 普通话         |
| 就犄呃他点粉皮吃唠。 | 就夹了他一点粉皮吃了。 |
| 把这碗饭吃咧！    | 把这碗饭吃了！     |
| 你吃唠饭咧？     | 你吃了饭了？      |

回家吃饭咧！回家吃饭了！  
太好咧！太好了！

但有一种情况,即“V 唠”表示可能时,与普通话的“V 了”不对应。例如:

|      |      |
|------|------|
| 章丘方言 | 普通话  |
| 你吃唠？ | 你吃了？ |
| 你干唠？ | 你做了？ |

#### (三) 章丘方言和普通话的“的”

虽然章丘方言和普通话的“的”是一一对应的,但二者的用法并不完全一致。大致说来,章丘方言的“的”范围更大一些。《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列出“的”表达语气的两种用法,一是表示肯定,一是表示已然<sup>[10]92</sup>。这两种用法章丘方言都有。例如:

他会来的。(肯定)  
他什么时候走的?(已然)

除此之外,章丘方言“的”还有一种用法,例如:

后来解放唠以后,这啥,就上那里上学的(咧)。

孙成呃噃,这不去打酒的(唆),给他师傅。  
看完这片地,咱再去看看村后的麦子的(吧)。  
我上街买点菜的(咧)。

这里“的”后可以加其他语气词,也可以不加。这种用法,既可以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动作或行为,也可以描述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去掉“的”也完全可以说,但习惯上还是带“的”。这类“的”表达的意义跟普通话“去”的一种用法相同,即“动+去”,其中动词表示去的目的。以《现代汉语八百句》<sup>[10]341</sup>的句子为例:

咱们看电影去。(普通话)  
咱看电影的吧。(章丘话)  
他上街买东西去了。(普通话)  
他上街买东西的咧。(章丘话)

总的来看,“的”的这种用法,多是用在第一个动作为“去”或“上”等位移动词的连动结构后面,而这个连动结构的后一个动作为“去”的目的,如“去打酒”、“去看看”、“上街买点菜”等。有时“的”前不是一个连动结构,只有一个动作,但实际上可以补出一个“去”来,如“咱看电影的”可以说成“咱去看电影的”。所以,“的”的作用在于表明说话人的目的,带有语气词的性质,表达确认的语气。

在章丘方言里,“噃”和“吧”加在一起大致相当于普通话的“吧”。以《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吧”的用法来看<sup>[10]11</sup>,用于疑问句末尾的“吧”,章丘方言一般都用“噃”,其他的情况则用“吧”。

这屋是新盖的噃?  
这道题不难 - 噃?

你娘知道的不少 - 嘛?

快点走吧。

好吧,就章忙办。

就拿我们大队书记来说吧,他可是个好人呢!

就算你做得对吧,也得谦虚倒点儿。

去吧,路太远咧,不去吧,人家请唠好几趟咧。

但在提出建议的疑问句后面,则用“吧”。例如:

要不咱走吧?

这种疑问句与祈使句的功能一致。若把语调改为降调,就是祈使句了。

“嘛”和“吧”都可以用在句中停顿处,但《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所举“吧”用于句中停顿处的三种情况,包括用于举例、让步小句以及用于交替的假设,章丘方言都用“吧”,不用“嘛”。例如:

你和咱这里吧,章忙一片水,里头 <一些> 莺子,叫苇湾。(举例)

你没看俺牙后头都掉唠到吧,那时候干活干的呃。(让步小句)

吃饱,没滋拉味的;不吃吧,又挺饥困。(交替的假设)

但在章丘方言中,“嘛”位于句中停顿处的频率远远高于“吧”。例如:

一说手机没唠以后 - 嘛,叫他爸爸和他妈妈批评唠一顿。

糁子再搁上水泡唠以后 - 嘛,推唠就叫沫子。

打那 - 嘛,俺那三十来岁霎就牙疼唠。

他 - 嘛,他待一大马路那里。

沫子 - 嘛,再使那勺子舀到鏊子上,摊下来就是煎饼了。

里头 - 嘛,一些神像,一些人。

和人说起来嘛,就说俺大伯嫂子咋倒咋倒。

他再把这坯来嘛,就搬起来上那里去摞起来咧。

这里的“嘛”大致对应于方梅所说的“吧”,是一个主位标记,基本没有语气意义<sup>[6]</sup>。

章丘方言“嘛”和“吧”还有一个区别是,“嘛”之前必须是一个轻声音节,或者前面音节的韵母延长,并按轻声规则来变调;但“吧”却没有这种限制。例如:

你娘知道的不少 - 口报? n̩i<sup>55</sup> n̩iaŋ<sup>55</sup> tʂɿ<sup>213-21</sup>  
tʂ<sup>0</sup>ti<sup>0</sup>pu<sup>44-55</sup>ʂɔ<sup>55-21</sup>ɔ<sup>0</sup>pɔ<sup>0</sup>?

打那 - 嘛,俺那三十来岁霎就牙疼唠。ta<sup>55</sup>na<sup>21</sup>  
a<sup>0</sup>pɔ<sup>0</sup>.....

和人说起来报,就说俺大伯嫂子咋倒咋倒。  
xə<sup>55</sup>lə<sup>55</sup>ʂuə<sup>44-23</sup>tʂ<sup>h</sup>i<sup>0</sup>lɛ<sup>0</sup>pɔ<sup>0</sup>.....

好吧,就章忙办。xɔ<sup>55</sup>pə<sup>0</sup>.....

(五) 章丘方言的“嘛”、“漫”和普通话的

“吗”

如前所述,章丘方言的“嘛”只用于疑问句,而且如文献[2]所描写的,只用于表示已然的反复问句。例如:

明白过来啦?

俺使唠人家脸盆以后,人家说,你使呃俺那吊子啦?

你吃饭唠啦?

正由于其已然性质,所以常常与“唠”连用,位于“唠”后。大致上,“嘛”只相当于普通话“吗”询问过去发生事情的情况,而且只能用肯定形式发问。此外,跟“嘛”一样,其前也必须是一个轻声音节,或者前面音节的韵母延长。

章丘方言的“漫”既可以用于陈述句,也可以用于疑问句。用于疑问句时,与普通话的“吗”基本一致。《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吗”的用法<sup>[10]278-279</sup>,除了一例之外,章丘方言都可以用“漫”。例如:

你明天走漫?

你去过杭州漫?

他不吃辣椒漫?

这户事情能办成漫?

你不知道我现在很忙漫?

\*我送你的那支钢笔,还好使漫?

最后一例,章丘方言一般用“嘛”。

“漫”也可以像“嘛”一样询问已然发生的事情,但与“嘛”有所不同。

一是前面必须带“唠”,这个“唠”不能省略,也不能弱化;用“嘛”时“唠”可以弱化。例如:

夜拉他走唠漫? 昨天他走了吗? 夜拉他走唠/- 哪?

你吃唠饭唠漫? 你吃了饭了吗? 你吃唠饭唠/- 哪?

二是用“漫”时,是无疑而问,说话人肯定已经知道事情是这样的,只是为了确认,或者是为了引起话题;而用“嘛”时,是有疑而问,说话人完全没有心理预期。

即使“漫”用于询问未然的事情时,说话人也是有预期的。这可以通过与“嘛”比较得知。

你明天走漫? 你明天走 - 嘛?

你喝酒漫? 你喝酒 - 嘛?

用“嘛”时,是没有心理预期的,是有疑而问。而用“漫”时,是无疑而问,有心理预期的,当说话人问“你明天走漫?”时,已经知道听话人明天要走,只是确认一下;而问“你喝酒漫?”时,说话人的预期是听话人不喝酒,但却发现听话人喝酒,所

以进一步确认。

当“嘎”用否定形式发问以及用于反问句时，显然也是有心理预期的，因为发现事实与心理预期不一致，才通过询问来确认，或表达不满。例如：

五婶，你不喜欢看京剧嘎”？

这像话嘎”？

所以，虽然“嘎”的用法与普通话的“吗”基本一致，但所表达的语气并不完全相同，疑问语气很弱。正由于此，在很多情况下，带“嘎”的句子更像是陈述句。例如：

放倒呃树，摸老鸹，他不是稳当嘎”。

你这就说是，你个人吃饭，它不是摊一回煎饼吃好几天嘎”。

石林庵不是有神嘎”。

没看你姐姐那达霎嘎”，也是听人呃的。

一下雨的时候，它不是章忙<sub>一</sub>呃一个窟窿嘎”，顺倒就流下去咧。

东边这不是普集嘎”。

它这不省事嘎”。

我又没有家口，一窝八口不都给你拉的嘎”。

这时“嘎”基本都是用于否定句中。在普通话中可以用“嘛”替换，但有的替换后语气不一致。例如：

它这不省事嘛。

我又没有家口，一窝八口不都给你拉的嘛！

后一句在章丘方言中表达的是不满的情绪，换成“嘛”后，就有点套近乎的味道。

(六) 章丘方言的“呢”、“嘛”、“唆”与普通话的“呢”

文献[2]根据《现代汉语八百词》以及张斌的《现代汉语虚词词典》，把普通话“呢”的主要作用分为六种，即表示疑问、突出焦点、突出话题、有假设的意味、增加深究的意味和缓和语气的作用，章丘方言里由“呢”、“嘛”、“唆”三个语气词承担相应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示疑问的用“嘛”，突出焦点的用“唆”，其他的用法用“呢”。但从其所举例句来看，不只“嘛”用在疑问句中，“呢”也可以用于疑问句中，如“咱在哪里停车呢？”，把表示疑问作为“嘛”的用法，似乎太笼统了些。而且，就我们搜集的语料来看，“嘛”也有缓和语气、突出话题的作用，跟“呢”有相同的用法。例如：

不要老的，他要他老婆嘛？这就说，要他孩子呢？

结果嘛，就把那两个人来治住<sub>逮住</sub>咧。

他师傅一看嘛，你给我拿唠银子来咧。

女的嘛，缠的脚挺小，讲究那脚小。

我这个嘛，他照倒我这啥唠以后嘛，我就来一家咧。

准是待那八九岁这里，我长一一场病呢。

现在呢，他都是使上蜂窝煤，使这户转悠的鏊子。

他含嫌少，嫌少嘛，正好呢，一个呃不个呢。

那个我想要的长一点呢。

可是呢，你自呃你能打过人家唠嘛？

结果，那牙一不行呢，又得拿一个去。

和铃铛这呃似的逗呃，那时间呢？

我们认为，“呢”和“嘛”可能是自由变体，说话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二者的区别。但也可能二者正处于功能分化的过程之中。

“呢”和“嘛”都可以位于句中停顿处，也可以位于句末。至于“唆”，基本只能位于句末，确实有突出焦点的作用，可以替换成普通话的“呢”。例如：

你婶子她娘家娘俺还是同学唆。

你叫我晚上里<sub>晚上</sub>去上学，我还不去唆。

但有些情况，在普通话里一般不用“呢”。例如：

这呃床仔<sub>一</sub>米四唆。

你大姑是十五就娶唠唆。

她可没有办法唆。

我说，我喝上那点儿酒唆。

两个床连在一起，就是再要章<sub>这样</sub>个小床唆。

咱不管咋治，咱也熊训斥他，咱也说他，他耳不着<sub>听不见</sub>，咱可疼他唆。

### (七) 小结

由上可以看出，尽管章丘方言和普通话的语气词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但仍然存在许多细微的区别，章丘方言的有些用法，在普通话里并没有对应的表达。实际上，普通话的一些用法，章丘方言也没有对应的表达，这里就不再涉及。

## 四、结语

以上描写了章丘方言的主要语气词，并与普通话的语气词进行比较。总体来看，章丘方言的主要语气词比普通话多，每个语气词所表达的功能相应地要单纯些。章丘方言语气词的情况可以为普通话语气词的历史研究提供一些线索。

### (一) 从章丘方言的“嘛”、“唆”看普通话的“吧”、“吗”

章丘方言的“嘛”、“唆”主要位于反复问句末，与普通话的“吧”、“吗”分别有部分功能对应，在语音上也有一致之处，应该是同源的成分。章丘方言的反复问句末然与已然的区别是用“嘛”、“唆”来表示的，但普通话用不同的否定词来表示。

章丘方言：你吃-嘛？（未然）你吃-唆？（已然）

普通话：你吃不吃？（未然）你吃没吃？（已然）

不过，普通话的反复问句可以转换为带“吗”

的疑问句,例如:

你吃吗? (未然) 你吃了吗? (已然)

转换之后,已然和未然的区别由“了”来表示,语气词则都用“吗”。但在普通话中,“吧”用于是非问句时在章丘方言中大致对应于“噃”。例如:

普通话: 你就是李师傅吧?

章丘方言: 你就是李师傅噃?

是非问句实际也是一种反复问。结合章丘方言的情况,也许可以推测,普通话的“吧”并不完全都是从实词“罢”演变而来的,用于问句时可能同章丘方言的“噃”一样,是从反复问句末尾的否定词发展而来。但后来表达疑问的功能萎缩,只保留在是非问句中。

## (二) “噃”的来源

单从“噃”的功能及语音来看,很容易把它看作否定词的变音,如赵学玲文献[2]认为是“没”。虽然从其源头来看,“噃”应同普通话的“吗”一样由否定词发展而来,但今天不管是从语音形式上还是从意义上,都不再是否定词,应该承认它已经是一个语气词。那么,“噃”是不是普通话“吗”的变音呢?本文认为,“噃”应是“么”。主要的证据是,在章丘方言中,与普通话“这么、那么、多么”相对应的词是“章<sup>=</sup>忙 tʂəŋ<sup>213-21</sup> maŋ<sup>0</sup>、囊<sup>=</sup>忙 naŋ<sup>213-21</sup> maŋ<sup>0</sup>、当<sup>=</sup>忙 taŋ<sup>55-24</sup> maŋ<sup>0</sup>。由此可见,章丘方言中“么”音 maŋ<sup>0</sup>。所以,反复问句末尾的 maŋ<sup>0</sup> 应该

也是“么”。

## 参考文献:

- [1] 齐沪扬. 语气词与语气系统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9 - 52.
- [2] 赵学玲. 山东章丘方言的疑问句及疑问语气词 [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17 (6): 60 - 65.
- [3] 高晓虹. 章丘方言志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1: 296 - 319.
- [4] 郭锐. 现代汉语词类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234.
- [5] 李兴亚. 语气词“啊, 呢, 吧”在句中的位置 [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6 (2): 112 - 115.
- [6] 方梅. 北京话句中语气词的功能研究 [J]. 中国语文, 1994 (2): 129 - 138.
- [7] 丁恒顺. 语气词的连用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5 (2): 34 - 40.
- [8] 齐沪扬, 朱敏. 现代汉语祈使句句末语气词选择性研究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2): 129 - 138.
- [9] 储诚志. 语气词语气意义的分析问题——以“啊”为例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4 (4): 39 - 51.
- [10]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 [M]//吕叔湘文集(第五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92.

〔责任编辑:吴晓红〕

# 《汉语大词典》释义疏失六则

钱慧真

(南京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南京 210097)

**摘要:**考证了《汉语大词典》释义中存有疏失的五个词条,并提出修正意见:“虞”错立“神兽名”为一义项,当去除;“樊”当训为“通‘𦵹’,马颈上的饰品”;“休息”条当用《礼记·乐记》作最早的书证用例;“翳”条释义当突出其区别性义素“仆倒”;“股”、“蚤”、“蔬”条释义不全,当增补义项。

**关键词:**《汉语大词典》;释义;书证用例

**中图分类号:**H1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63-04

## On the six misinterpreted words in the Chinese dictionary

QIAN Hui - zhen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Chinese Studi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extually researches five misinterpreted words in the Chinese dictionary and proposes suggestions on their correction. As 虞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Jv) doesn't belong to the meaning of animal's name, it should be crossed out. 樊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Fan) should be interpreted the decorations which in horse's neck. 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in the word of 休息 (with the English version of Rest) is inaccurate. 翳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Yi)'s differentiating element of 仆倒 (with the English version of falling) should be highlighted. The meanings of 股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Gu), 蚤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Zao), 蔬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Shu), for being insufficient, shall be further supplemented.

**Key words:** Chinese dictionary; interpreting; documentary evidence

《汉语大词典》是我国大型多卷本汉语语词词典,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罗竹风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1卷,第2卷起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陆续出版。正文12卷,另有《附录·索引》1卷。在释义方面,《汉语大词典》义项齐备,古今兼收,对词义概括与辨析清楚,同时义项的编排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词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尽管如此,《汉语大词典》在释义方面,仍有疏漏。本文对《汉语大词典》的名物释义进行分析,认为其中六个词条释义存有疏漏,并提出修正意见。如有罅漏纰缪,尚祈方家教正。

### 一、【虞】

《汉语大词典》卷八第846页左栏“虞”词条义项2:神兽名。《汉书·郊祀志下》:“建章、未央、长乐宫钟虞铜人皆生毛,长一寸所,时以为美祥。”颜师古注:“虞,神兽名也。”《后汉书·董卓传》:“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虞、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李贤注引《前书音义》:“虞,鹿头龙身,神兽也。”

按:《汉语大词典》依据《汉书》颜师古注和《后汉书》李贤注,确立“虞”的第二个义项——“神兽名”,不妥。为了使意义更明,我们将所引书证例句的前后文一并引出,《汉书·郊祀志下》:“其夏,

收稿日期:2012-10-25

基金项目:2010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语史语料库建设与研究”(10&ZD117)资助;2010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吴三惠训诂研究”资助;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南京师范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钱慧真(1980-),女,山东夏津人,博士后,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汉语史与训诂学。

黄龙见新丰。建章、未央、长乐宫钟虞铜人皆生毛，长一寸所，时以为美祥。”此段文字是讲述各地出现祥瑞的征兆。夏季，在新丰见到黄龙，而建章、未央、长乐宫的钟虞铜人上皆长了毛，此种迹象被时人认为是祥瑞之兆。“钟虞铜人”为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乐器构建。1978 年湖北曾侯乙墓出土曾侯乙编钟，在编钟丛中，从下层到中层，每层有 3 个铜人，两层共 6 个铜人，铜人曲肘上举，承托着横梁，在编钟梁架的两端担负着“钟虞”职能，出土实物与古书记载相吻合<sup>[1]</sup>。建章、未央、长乐宫为汉朝的三个著名的宫殿，只有乐器可以在宫殿中摆放，神兽如何摆放着三个宫殿之中？依文意，颜注不妥。

《后汉书·董卓传》：“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欢呼而还。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虞、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穀石数万。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此段文字是讲董卓引兵抵达京城，其兵在洛阳城中大肆剽掠财物，淫掠妇女，又虐刑滥罚，以致人心恐慌，内外官僚朝不保夕。另外，他还擅自将五铢钱给为小钱，还将洛阳城的铜人、钟虞、飞廉、铜马之类充当铸造钱币的材料，大大地铸造钱币，致使“通货膨胀”。钟虞以铜为之，《汉书·贾邹枚路传》言：“悬石铸钟虞。”颜注：“称铜铁之斤石以铸钟虞，言其奢泰也。”故钟虞也可以充当铸造钱币的材料。

由此可见，颜注李注所释均不准确。孙诒让云：“《说文·虍部》云：‘虍，钟鼓之柂也，饰为猛兽。’即谓虍属之兽。古饰钟虞以猛兽，说者因误以虞为兽名。《后汉书·董卓传》李注引《前书音义》，及《汉书·郊祀志》、《贾山传》颜注，并以筭虞之虞为神兽。此盖以为‘虍’之假字，非古义也。”<sup>[2]3380</sup> 猛兽之名的意义本字当为“虍”，《说文·豕部》：“虍，封豕之属，一曰，虎两足举。”《广韵·鱼韵》：“虍，兽名。”虞与虍字形相近，故他们错将“虞”认为是“虍”之假借字。遍检先秦文献，均没有将“虞”用作猛兽义的用例。

《汉书·郊祀志下》颜师古注言“虞，神兽名也，县钟之木刻饰为之，因名曰虞也”。他认为虞本义为神兽名，悬挂钟的立柱，因其上刻画有此兽而名“虞”。《汉语大词典》仅截取了他解释的前半部分作为书证，颜注后半部分的说法亦无据。“虞”金文作、、形，为象形字，像拖起乐器的支架之形。“虞”上古群纽鱼部，“举”亦见纽鱼部，二者旁纽叠韵，音相近。《释名·释乐器》：“所以悬钟者，横曰筭，筭，峻也，在上高峻也；纵曰虞，虞，举也，在旁举筭也。”《广雅·虍部》：“虞，几也。”王念

孙疏证：“虞之言举也，所以举物也。”《方言》卷五“几，其高者谓之虞”。钱绎笺疏：“虞之言距也、举也。”由此可以推断，“虞”因其举起乐器的功用而得名，而非得名于猛兽之名。据文献记载，“虞”之上所刻画的纹饰各种各样，并不仅限于猛兽之形：《考工记·梓人》中记载以声音宏大的“蠃类”动物为钟虞，“大声而宏，则于钟宜，若是者以为钟虞”；以声音清阳的羽类为磬虞，“其声清阳而远闻，则于磬宜，若是者以为磬虞”。唐韩愈《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则描写其上有蛟龙之属，“蛟螭露簾虞，缟练吹组帐”。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则记载簾虞之上有鹭鸶孔雀羽装之“宫县四面，每面五架，架即簾虞也。其上安金铜，仰阳以鹭鸶孔雀羽装之，两面缀以流苏，以彩翠丝绒为之也”。扬雄《甘泉赋》记载上面刻画有龙鳞，“金人仡仡其承钟虞兮，嵌岩岩其龙鳞”。此类文献均可证颜注所说为非。

《汉语大词典》“神兽名”这一义项是建立在误训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应该去除。《汉语大字典》、《辞源》、《辞海》均没有这一义项。

## 二、【樊缨】

《汉语大字典》卷四第 1277 页左栏“樊”词条义项 10：通“鞶”。马腹带。参见“樊缨”。【樊缨】：络马的带饰。樊，马腹带；缨，马颈革。

《汉语大字典》卷四第 1278 页右《周礼·春官·巾车》：“锡樊缨，十有再就。”郑玄注：“樊，读如‘鞶’之‘鞶’，谓今马大带也。郑司农云：‘缨，谓当胸……玄谓缨，今马鞅。’”

按：《汉语大词典》对“樊”第十个义项及“樊缨”的解释依据《周礼》郑玄注。《周礼·春官·巾车》郑注“樊，读如‘鞶’之‘鞶’”为注音，不当为破字。所以，二者所释均不准确。“樊缨”《礼记》、《左传》均作“繁缨”。《礼记·郊特牲》“大路繁缨一就”；《礼记·礼器》“大路繁缨一就，次路繁缨七就”；《左传·成公二年》“请曲县繁缨以朝”。繁为𦇵之俗字。《说文·丝部》：“𦇵，马髦饰也。”段玉裁注：“𦇵，俗改其字作繁，俗形行而本形废。”

《说文·革部》：“鞶，大带也。”按：腹部的大带，凡装配好的马皆有，根本就体现不出尊卑差异。《春官·巾车》记录了古代官员因等级不同，而使用的马车、马具而不同，则樊必不应为普通的“马大带”。《诗经·小雅·采芑》、《大雅·崧高》、《大雅·韩奕》之“钩膺”毛传皆释为‘樊缨’。《说文·肉部》：“膺，胸也。”由此可见，则樊缨当在胸前而不在腹下。秦始皇陵出土的二号铜马车两骖马有两缕金革套环，一在颈部，下垂缨，考古学家将

其定名为“樊缨”；一在腹部，此即大带，将其定名为“鞶带”。孙诒让言：“樊正字当作‘𦵹’，此经及《左传》作‘樊’，假借字也。其义则当如许君说，为马髦上饰。后郑读为鞶，释为大带并非经义。《诗·大雅·韩奕》箋以樊缨释钩罿，则用毛诗说，与此注义异，是郑亦自有两解矣。……马大带虽亦马鞍具之一，然与𦵹迥异，不可释此经也。”<sup>[2]</sup><sup>[146]</sup>孙氏所说为是。孙氏所说得到钱玄先生的肯定，他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指出“樊，通‘𦵹’”，“为马颈之革带套环（樊），及下垂之缨饰（缨）”<sup>[3]</sup>。

我们认为“樊”应释为“通‘𦵹’”，马颈上饰品；“缨”为下垂到胸部的装饰物”，方为妥当。

### 三、【休息】

《汉语大字典》卷一第1172页右“休息”词条义项1:谓暂停活动，以恢复精神体力。《诗·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息。”

按：此处释“休息”引用《诗经》文献作为书证用例，不妥。《汉广》诗中的“休息”不当为复音词，“息”当为“思”，句尾助词。《毛传》云：“兴也，南方之木，美乔上疏也。思，辞也。汉上游女，无求思者。”孔颖达《毛诗正义》云：“传解乔木之下先言‘思、辞’，然后始言汉上，疑经‘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则？诗之大体，韵在辞上，疑‘休’‘求’字为韵，二字俱作‘思’。”其结论让人信服，致使后世《诗经》研究者多采用其说。如惠棟《毛诗古义》、清代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谦《诗三家诗义集疏》等都用此说。王力《诗经韵读》改“休息”为“休思”。向熹《诗经词典》言“通‘思’，句末助词”。雒江生云：“休息当为休思，《韩诗》作思可证。”洪湛侯则直接引用伦敦敦煌经卷证明，“观伦敦敦煌《毛诗音》《汉广》‘不可休息’下云：‘𤞼（炫）以休求息（此息字盖衍文）韵，疑息当为思。’是此卷以为‘休’‘求’当叶韵，疑‘息’当为‘思’，其说与《正义》全同。《正义》多本刘炫旧书，得此卷足以印证”<sup>[4]</sup>。“息”上古心母职部，“思”心纽之部，二者双声对转，音近故相通假。

在其它文献中，亦有“息”“思”相通用之例。《荀子·乐论》“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謬”，《礼记·乐记》文作“使其文足论而不息”，《史记·乐书》作“纶而不息”，此謬乃譌之讹。息与譌通，《庄子·人间世》“气息茀然”，向本作“譌”，崔本亦同。傅毅《舞赋》“噴息激昂”，“噴息”焦循作“噴思”，《易林·咸》曰“絶无以北，惆然噴思”。马融《长笛赋》“雷叹颓息”，“颓息”司马相如作“颓思”，《长门赋》“遂颓

思而就床”。“颓息”当为“噴息”之误，为喟然叹息之义。

由此可见，《诗经·周南·汉广》诗中的“休息”一词，不当为复音词。故《汉语大词典》释“休息”一词，不当用此书证作为最早用例。我们遍检先秦文献，认为可以用《礼记》作书证用例，《礼记·乐记》：“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其意义与构词已固定为复音词。另外，《汉语大词典》释“息”条，当增加一义项：“息”，通“思”，语尾助词。如此释义，方可全面。

### 四、【翳】

《汉语大字典》卷九第676页右“翳”词条义项6:通“殮”。树木枯死。《诗·大雅·皇矣》：“作之屏之，其菑其翳。”毛传：“自毙为翳。”陆德明《释文》：“《韩诗》作殮。”

按：《汉语大词典》据毛传确立“树木枯死”这一义项，我们认为释义不准确。《尔雅·木部》：“木自毙，枿；立死，菑；蔽者，翳。”由此可见，毛传虽然依据《尔雅》，但却断章取义，舍却了“自毙为枿；立死，菑”，径取“自毙为翳”，不妥。王先谦言：“《尔雅》先总释自死之木，下乃以菑、翳之一立一踣者相对为文，翳，已踣而枝干蔽地也。”<sup>[5]</sup>由此可见，“翳”并不能简单地释为“树木枯死”，其“仆倒”这一义素。陈奂：“《尔雅》‘蔽者，翳’，蔽与毙通，传云自毙，与立死对文，立着为菑，不立者为翳，皆木之死者。”<sup>[6]</sup>《考工记·轮人》郑注：“泰山平原所树立物为菑。”是“菑”有立义。桂馥《说文系传》曰：“既枯之木，侧立不仆，根着于地，曰菑。”由此可见，“其菑其翳”之“翳”当为仆倒在地上的枯木，与菑相对为文。

另外，《汉语大词典》依韩诗说，指出翳通“殮”，此说亦通，但“殮”亦有踣义，《后汉书·光武纪》“奔殮百余里间。”李贤注曰：“殮，仆也。”《墨子·明鬼下》“殮车中。”孙诒让《墨子间诂》引李贤注“殮，仆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仆与踣通。翳、殮双声，翳即殮之借字，故《释名》曰：‘殮，翳也，就隐翳也。’与《尔雅》‘蔽者，翳’同义。”由此可见，“殮”有亦有死后仆倒之义。

“翳”在《诗经》中出现的语境为：“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楨其椐；攘之剔之，其糜其柘。”《汉语大词典》释“灌”与“栵”、“楨”与“椐”、“糜”与“柘”均为名词，都引用《诗经·大雅·皇矣》篇为书证用例。释“菑”亦为“直立未倒的枯木”。依此，我们认为“翳”应释为“仆倒在地上的枯木”，此种解释，方可与“菑”前后

相应，亦能体现出辞书释义的内部逻辑性。

《埤雅》释为“木卧死为翳”，《辞源》释为“树木枯死，倒伏于地”，都比较准确。《汉语大字典》释为“树木自己死掉”，引此诗及毛传为书证，则纯属望文生义了。

## 五、【股】【蚤】

《汉语大字典》卷八第 826 页左“股”(zhǎo)词条、卷六第 1184 页左“股”词条均有漏收的义项。

按：《周礼·冬官·轮人》除记载古代制作车轂的工艺，还记载了制作车盖的工艺。“轮人为盖，达常围三寸，桯围之……参分其股围，去一以为蚤围，三分弓长，以其一为之尊。”郑玄注：“蚤当为爪。”林希逸《考工记解》：“股者弓之近部处也，蚤与爪同弓之末也爪之大小比股围三分减一分也。”王宗涑云：“股，弓近部者。爪，弓末也。”郑锷云：“股，与辐之近轂者谓之股同。弓之近部者亦谓之股，以其大也；蚤，与辐之入牙者谓之蚤同，弓之字曲者谓之蚤，以其小也。”（均见于《周礼正义》）车辐靠近轂的部分较粗，称作“股”，靠近轮辋的另一端较细，“对股言之，与人手相类，故以蚤为名”，同理，车盖盖弓末端曲向下，较为细小，所以称作“蚤”，戴震《释车》：“弓近部谓之股，弓末谓之蚤。”《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的“股”、“蚤”词条都没有列表示车盖弓组成部分的意义，依《冬官》文意及其清人注解，二者应分别添加“股，车盖弓近部之处”和“蚤，车盖弓末入牙处”义项。

## 六、【蔬】

《汉语大词典》卷九第 561 页左“蔬”词条有漏

收的义项。

按：蔬在古汉语中并不仅仅指称蔬菜，还有果实之义。如，《周礼·地官·委人》：“凡疏材木材。”郑注：“疏材，草木有实者。”《天官·大宰》：“八曰臣妾，聚敛疏材。”郑注亦云：“疏材，百草根实可食者。”按：疏俗字做蔬。《国语·鲁语》云：“烈山氏子柱，能植百谷百蔬。”韦注云：“草实曰蔬。”《尔雅·释天》：“疏不孰为馑。”郭璞注：“草菜可食者，通名为蔬。”邵晋涵正义：“散文言之，木实亦得为疏。”《玉烛宝典》引《月令章句》亦云：“疏食，谓山有榛栗杼橡，泽有菱芡凫茈之属，可以助谷者也。”

据以上文献所言，《汉语大词典》“蔬”词条当增加“统称果实”这一义项。

## 参考文献：

-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小组. 湖北文物大观 [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93.
- [2] 孙诒让. 周礼正义 [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3] 钱玄. 三礼辞典 [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044.
- [4] 洪湛侯. 诗经学史 [M]. 北京：中华书局，2002：79.
- [5] 王先谦. 诗三家诗义集疏 [M]. 北京：中华书局，1987：853.
- [6] 陈奂. 诗毛氏传疏 [M].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2：2012.

〔责任编辑：吴晓红〕

# 道教文献语言研究与训诂学 ——以《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为例

刘祖国<sup>1</sup>, 丁晓娟<sup>2</sup>

(1.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济南 250100; 2. 聊城大学 音乐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文献艰深晦涩,目前的道教文献语言研究非常薄弱。训诂学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帮助人们释读古典文献,是治中国古代学问的根基之学。2010年齐鲁书社出版的日本麦谷邦夫、吉川忠夫编,刘雄峰译《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对《周氏冥通记》作出了精确细致的点校与注解,但从训诂学的角度来看,在某些注释翻译方面尚有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关键词:**道教文献;《周氏冥通记》;语言;训诂学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67-04

## Taoist literature language studies and exegesis —taking the example of Zhou's Communications with Immortals in Dreams

LIU Zu - guo<sup>1</sup>, DING Xiao - juan<sup>2</sup>

(1.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2. School of Music,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Taois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yet as Taoist literature is profound and obscure,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aoist literature language is scant. As a research of ancient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which helps people read classical literature, exegesis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udy on Chinese ancient knowledge. In 2010, the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Zhou's Communications with Immortals in Dreams edited by Mugitani Kunio and Yoshikawa Tadao translated by Liu Xiongfeng was published, which makes exact punctuations and annotations.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egesis, some annotations are still in need of revisions.

**Key words:** Taoist Literature; Zhou's Communications with Immortals in Dreams; language; exegesis

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本土宗教,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相比,它是唯一根植于本国、发源于古代文化的民族宗教。儒、释、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然而,时至今日,道教的研究却是最薄弱的。道教宣称“神授天书”,喜欢故作神秘,逐渐形成了一种诡异神秘的文字风格,这种文字风格使很多人望而却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道教文献语言进行探求的欲望。

训诂学是主要研究中国传统古书中词义的学科,是中国传统语文学的一个分支。训诂学在注解古代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代书籍中的语法、修辞现象,它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帮助人们释读古典文献。训诂学是治中国古代学问的根基之学,它是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必须运用的一门基础性学科。训诂学是语言学里具有综合性和实用性特征的技术科学,它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

收稿日期:2012-11-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道经词汇研究”(12YJC740073)资助;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人文社科专项)“《太平经》词汇研究”(IFW12011)资助;山东省博士后创新项目专项资金“东晋南北朝古道经词汇研究”(200902034)资助

作者简介:刘祖国(1981-),男,山东临清人,文学博士,博士后,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史、文字训诂学。

值,还有很重要的实用价值。

道教典籍卷帙浩繁,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语言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道藏文献距今已有几百甚至上千年,要读懂这些材料,必须要有足够的训诂学知识。训诂学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能否科学地解读继承这笔文化遗产。

南朝梁周子良、陶弘景撰《周氏冥通记》四卷,内容是陶弘景弟子周子良自杀前所写的日记,记载了周子良梦中与神仙真人交谈的情形,故称“冥通”。周子良死后,经过陶弘景整理并加了注,成为今天传世的《周氏冥通记》。《周氏冥通记》是研究六朝道教的重要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然而迟迟没有现代整理本。2010 年 1 月齐鲁书社出版的日本著名学者麦谷邦夫、吉川忠夫编,刘雄峰译《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sup>[1]</sup>,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对《周氏冥通记》作出了精确的点校与注解,是目前《周氏冥通记》最好的注本。但其中仍有一些因对训诂学了解不够,而出现的误注、误译者。此刺取十例略加考辨,以求教于方家云尔。文中引例均据齐鲁书社本,标注卷数及页码,其中属于陶弘景所作的疏记悉用括号标出。

例 1. 卷三第 132 页: 丞曰: “今真人来,何不拜?”子良即起再拜,顿首稽颡,乞神仙之诀。(第 135 页译文: 乐丞说: “今天真人们前来,为何不去礼拜呢?”子良连忙起身再拜,点头哈腰,乞求授予神仙的要诀。)

按: 将“顿首稽颡”解作“点头哈腰”,大误!

“顿首”指磕头,旧时礼节之一,以头叩地即举而不停留。《说文·页部》: “顿,下首也。”张舜徽约注: “顿之言抵也,谓以头触地也……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八‘顿’字下引《说文》,作‘下首至地也’。”《汉书·东方朔传》: “居有顷,闻上过,朱儒皆号泣顿首。”道经文献中多见,如《上清道宝经》卷一《师资品第二》: “肘伏师门,顿首德宇。”《上清道宝经》卷一《经品第一》: “顿首经师之牖,乞启重玄之阙,等开实相。”前蜀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二《困急日中上请命章》: “某天曹,伏须告报,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再拜以闻。”《天枢院都司须知行遣式·表格》: “凡上表陈事皆用此式,笺亦仿此,但易顿首曰叩头,不称臣。如南斗北斗已下用笺。”

“稽颡”是古代一种跪拜礼,屈膝下拜,以额触地,表示极度的虔诚。《仪礼·士丧礼》: “吊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颡成踊。”《汉书·李广传》: “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梁书·韦叡传》: “其余释甲稽颡,乞为囚奴,犹数十万。”道藏

文献中多有用例,《冥通记》卷二: “共申至诚,稽颡辞请。”《无上秘要》卷四十九《三皇斋品》: “因稽颡三十下,又再拜起诵曰: ‘精心立斋戒,烧香拜皇文,沐浴玄云水,燔烟通上元。’”《太上洞渊神呪经》卷十四《杀鬼步颂品》: “今专解谢,倾胆首陈。先世所负,咸乞荡捐。一如尊勅,从师经言。稽颡再拜,上请天恩。”《太上洞玄灵宝十号功德因缘妙经·字一》: “言讫,叩头稽颡悲涕,仰视道君。”《太上慈悲九幽拔罪忏》卷九: “汝等男女,各发精诚,今日向十方天尊前,稽颡投诚,皆乞忏悔,归命三宝。”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一百五《清灵真人裴君传》: “君乃身投长渊,浮白水,冒洪波,越沙岸,崄巇沈溺,遂登空山,见而拜焉,顿头稽颡,乞请真诀。”

例 2. 卷三第 133 页: 陶某名录多阙穿处,不的由,纵见由我,我亦不得自任。(第 136 页译文: 陶隐居的名籍表中有很多不完备的地方,没有办法,虽然此事由我,可我也不能乱来。)

按: 的,本谓明亮,鲜明; 明白。《广韵·锡韵》: “的,明也。”战国楚宋玉《神女赋》: “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韩诗外传》卷一: “故人生而不具者五: 目无见,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后能见。”唐刘希夷《代闺人春日》诗: “珠帘的晓光,玉颜艳春彩。”《淮南子·说林》: “的者获,提者射”高诱注: “的,明也。为众所见,故获。”汉刘向《新序·杂事二》: “此的然若白黑。”的,清楚、明白的样子<sup>[2]</sup>。《冥通记》此例中,“的”作动词,义为“清楚、知道”。

由,缘由; 缘故。《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鲁国,抑有由也,作不顺而施不怨也。”《史记·孝文本纪》: “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晋干宝《搜神记》卷三: “既觉,惊呼,邻里共视,皆莫测其由。”宋王谠《唐语林·政事下》: “党项叛扰,推其由,乃边将贪暴,利其羊马,多欺取之。”

综上,“不的由”并非“没有办法”,而应译为“不清楚其缘由。”

例 3. 卷一第 23 页: 湘州人作同心竹,皆伺抽笋,因刻边为孔,笋乃带创成四。(第 24 页译文: 湘州地区的人们在作同心竹时,都要乞求露出笋来,而在其两端打孔,这样来,此笋便带着伤而成长为四根。)

按: 将“伺”解释为“乞求”,谬矣。笔者检诸文献,似未见用例。

伺,等待。古文献用例多见,《文选·刘琨〈劝进表〉》: “狡冠窥窬,伺国瑕隙。”刘良注: “伺,候也。”唐何超《晋书音义上·志第一》: “伺,候也。”

晋陶潜《闲情赋》:“起摄带以伺晨,繁霜粲于素阶。”《文选·陆机〈辨亡论〉》:“屏气局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损甘以育凌统之孤。”唐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新唐书·宋璟传》:“太平公主不利东宫,尝驻辇光范门,伺执政以讽。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庙社稷主也,安得异议!’”

例4.卷一第27页:去十月将末,忽有周氏事,既在斋禁,无由即得启闻。(第28页译文:去年十月末,突然揭晓周氏事情,用于当时正在斋禁中,是故而没有及时呈报。)

按:将“无由”译为“是故而没有”,未得的训。

无由,没有门径;没有办法。古书中常见,《仪礼·士相见礼》:“某也愿见,无由达。”郑玄注:“无由达,言久无因缘以自达也。”《汉书·刑法志》:“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三国魏曹植《歌》:“望云际兮有好仇,天路长兮往无由。佩兰蕙兮为谁修,宴婉绝兮我心愁。”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然万一时偶有好事者,而复不见此法,不值明师,无由闻天下之有斯妙事也。”《抱朴子内篇·勤求》:“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数百岁,不失人理之欢,然后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决须好师,师不足奉,亦无由成也。”南朝宋鲍照《松柏篇》:“欲还心依恋,欲见绝无由。”南朝齐谢朓《京路夜发》:“行矣倦路长,无由税归鞅。”南朝梁何逊《寄江州褚咨议诗》:“如何隔千里,无由举三爵。”南朝陈江总《怨诗》:“奈许新缣伤妾意,无由故剑动君心。”唐李德裕《二猿》:“无由碧潭饮,争接绿萝枝。”唐李朝威《柳毅传》:“终以人事扼束,无由报谢。”

例5.卷一第47页:闻二君及府中诸监僚选卿为保籍丞,此位乃始立,以助领诸簿录。其任数小而高清为美,兼得宗庇真仙,二三为宜。(第47页译文:听说二君及府中众僚推选你为保籍丞,这个职位是才立的,用以协助名簿的管理。该职虽任职的人数较少,但却是品级较高的职务,而且又是立于众多真人、仙人的庇荫下,什么事都好办。)

按:以“任职的人数”对译“任数”,可商!“任数”同义连文,即职务,职位。

任,职,官职、职务。《晋书·刘颂传》:“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唐韩愈《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序》:“刘兄自给事中出刺此州,在任逾岁。”数,顺序;次序。《逸周书·大聚》:“复亡解辱,削赦轻重,皆有数。”朱右曾校释:“数,等差也。”《荀子·劝学》:“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宋王安石《洪范传》:“自天一至于天五,五

行之生数也。”由“顺序、次序”引申而有“等级”义,宋王安石《上宋相公书》:“自去吏属之籍,以至今日,虽尝获侍燕语,然不能自同众人之数也。”

例6.卷二第81页:“子良字元龢,此乃世之善名,亦不胜于世,直是施于冥中耳。”(第82页译文:子良字元龢,这是世上很好的名字,但也不适用于现世,还是用于冥界吧!)

按:将“直”译为“还是”,毫无根据,检诸文献,难见此用法。

直,副词,特;但;只不过。此义古籍中屡见,《荀子·礼论》“直无由进之耳”杨倞注:“直,但也。”《孟子·梁惠王上》“直不百步耳”焦循正义引王引之《经传释词》云:“直,犹特也,但也。”《春秋谷梁传》卷十一:“不言帅师而言败,何也?直败一人之辞也。”《孟子·梁惠王下》:“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战国策·齐策》:“客胡为若此,寡人直与客论耳!”《庄子·人间世》:“弟子曰:‘趣取无用,则为社何邪?’曰:‘密!若无言!彼亦直寄焉!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汉刘向《列女传·节义楚成郑瞀》:“初成王登台,临后宫,宫人皆倾观,子瞀直行不顾,徐步不变。”《汉书·司马迁传》:“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东汉王符《潜夫论·赞学》:“是以君子终日干干进德修业者,非直为博己而已也,盖乃思述祖考之令问,而以显父母也。”《晋书·苻坚载记》:“方当使君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近代汉语仍有使用,宋辛弃疾《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

例7.卷二第103页:又一人来,甚华少,白衣。(第104页译文:此时又有一人进来,非常华丽且年轻,著白衣。)

按:“甚华少”译作“非常华丽且年轻”,大误。“华少”意思是年少、年轻。

华,年华,时光。北周庾信《竹杖赋》:“潘岳秋兴,嵇生倦游,桓谭不乐,吴质长愁,并皆年华未暮,容貌先秋。”唐贾岛《感秋》诗:“商气飒已来,岁华又虚掷。”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诗:“岁华何倏忽,年少不须臾。”唐刘方平《秋夜泛舟》诗:“岁华空复晚,相思不堪愁。”引申亦有“年轻,年少”义,《魏书·王叡传》:“渐风训于华年,服道教于弱冠。”唐李商隐《锦瑟》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金元好问《论诗》诗之十二:“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又,敦煌道经S.107号《太上洞玄灵宝升玄内教经》:“世人不问男女,皆好少壮,淫奢华色,意

得相入,不避死活,共相追逐,不能相离一时之间。”“华色”象征年轻的男女<sup>[3]</sup>。

例 8. 卷四第 204 页:其本欲取此日戴屋,而师不来,又小雨,遂不果,至丁亥日,方得戴耳。(第 206 页译文:他原本想在这天上梁,师却没来,而且还下着小雨,所以事情未成,到了丁亥日,即可上梁。)

按:“方”译作“即可”,显未中的。方,方始;方才。表示后面的动作行为历时之长,三国魏张揖《广雅·释诂一》:“方,始也。”清刘淇《助字辨略》:“方,始也,才也。”古代典籍中常见,《诗·大雅·公刘》:“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起行。”东晋王嘉《拾遗记》卷一:“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州,久而方灭。”南朝宋颜延之《秋胡诗》:“良时为此别,日月方向除。”南朝宋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滋。”南朝齐陆厥《奉答内兄希叔》:“屏居南山下,临此岁方秋。”唐韩愈《次硖石》:“数日方离雪,今朝又出山。”

例 9. 卷一第 61 页:子良仍起,襞纸疏之。(第 62 页译文:子良于是起床,铺开纸记了起来。)

按:“襞”并非“铺开”义,此释可商。

襞,本为折叠衣物,《汉书·扬雄传上》:“芳酷烈而莫闻兮,不如襞而幽之离房。”颜师古注:“襞,迭衣也。”南朝梁王僧孺《为人宠姬有怨》:“锦衾襞不开,端坐夜及朝。”后引申泛指折叠,汉王粲《刀铭》:“灌襞以数,质象以呈。”晋左思《娇女》:“上下弦柱际,文史辄卷襞。”梁元帝萧绎《金楼子》卷六:“合中之物,凡有三种,按卦而谈,或轻或重。又有人名裹襞纸中,射之得鼎卦。”南朝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摇襞。”南朝梁僧祐《弘明集》卷二十三:“帙舒轴卷,藏拔纸襞。”《南

史·陈纪下·后主》:“〔后主〕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八妇人襞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唐刘禹锡《乐天寄忆旧游因作报白君以答》:“酒酣襞笺飞逸韵,至今传在人口。”

例 10. 卷四 209–210 页:里屋人自称木道士者,是北星鬼官所使,勿信之。以邪情亟惑人,坏人真气。(第 211 页译文:里边屋子里的人自称叫木道士,他是北斗星的鬼官,不要相信他。他用邪恶的心来蛊惑人,人的真气容易被破坏。)

按:“亟”字漏译。亟,总是;屡次;一再。《左传·隐公元年》:“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左传·成公十六年》:“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杜预注:“亟,数也。”《孟子·万章下》:“繆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孟子·万章下》:“繆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汉书·刑法志》:“师旅亟动,百姓罢敝。”颜师古注:“亟,屡也。”南朝梁肖绎《藩难未静述怀》:“亟睹周王骏,多逢鲍氏骢。”唐韩愈《科斗书后记》:“愈亟不获让,嗣为铭文。”《冥通记》卷四:“其人亟乘一刀[一刀,小船。]”

#### 参考文献:

- [1] 麦谷邦夫,吉川忠夫.《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M]. 刘雄峰,译.济南:齐鲁书社,2010.
- [2] 方一新.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658.
- [3] 叶贵良. 敦煌道经写本与词汇研究[M]. 四川成都:巴蜀书社,2007:341.

[责任编辑:吴晓红]

# 论《秘密花园》中哥特式风格的体现及作用

张 颖, 金 爽

(东北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 长春 130024)

**摘要:** 小说《秘密花园》是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弗朗西丝·伯内特的代表作之一, 也是其最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品。小说歌颂了自然的伟大, 人性关怀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等。作品自发表以来受到国内外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学者们从女性主义、成长主题、神秘主义等角度对小说进行了研究。主要探讨哥特式风格在小说中的体现及作用, 包括哥特式风格在小说人物塑造、背景环境描写以及故事情节推进中的具体体现, 进而分析哥特式风格对于小说主题强化、情节推进、审美教育及小说自身深度、现代性提升方面的独特作用。

**关键词:** 《秘密花园》; 哥特式风格; 儿童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71-05

## On gothic features and its function in The Secret Garden

ZHANG Ying, JIN Shu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Secret Garden i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as well as the most popular novel of Frances Hodgson Burnett—a famous American writer for children. Extolling the greatness of nature and the importance of humane care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ildren's growth, the novel has received wide attention from critic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n which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eminism, the theme of growth, mysticism and so 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gothic features and their functions embodied in the novel, which include the specific reflections of gothic features in the characters, settings and plot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unique effects of gothic featur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theme enhancement, plot advancement,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elevation of the modernity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novel per se.

**Key words:** The Secret Garden; gothic features; children's literature

弗朗西丝·伯内特(Frances Burnett, 1849—1924)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市, 28岁出版第一本畅销书《劳瑞家的那闺女》(That Lass O' Lowries)。让伯内特真正开始出名的是她的儿童文学作品, 如1886年发表的小说《小少爷方特罗伊》(Little Lord Fauntleroy)和1905年出版的《小公主》(A Little Princess), 这两部儿童文学作品均被改写成话剧。但其代表作还是《秘密花园》(The Secret Garden), 《秘密花园》发表于1911年, 讲述了一个名叫玛丽的女孩的故事, 她开始时病黄体瘦, 性情恶劣。但是在与大自然的交流中, 在善良的人们的帮助呵护下, 逐渐改掉了那些坏毛病, 拥有了健康美丽以及一颗善解人意的心, 同时古老庄园中的“秘密花

园”也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

小说自发表以来受到了不断的赞扬:《纽约时报》曾声称“这是一本神奇的、充满糖果香味的书。”《时代周刊》曾说道“这是一个关于大自然的魔法和人类美好心灵的故事。”近年来评论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该小说进行了研究, 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主义、神秘主义、成长主题等角度, 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分别对该小说进行了分析, 而对于该小说哥特式风格虽有触及和研究, 但却不是很深入, 而且没有论及小说哥特式风格的作用。因此本文试图探讨哥特式风格在作品中的体现及其对作品成功的独特作用和贡献。笔者期待从一个新的视角进一步对该小说的成功及特色进行阐释。

收稿日期:2012-11-16

基金项目: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当代美国少年小说类型研究”(11BWW048)资助

作者简介:张颖(1955—), 女, 辽宁大连人, 教授, 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及英美少儿文学研究。

## 一、哥特式小说及其特点

哥特小说(Gothic fiction)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出现在18世纪中后期,但远在这种小说诞生之前,“哥特”这一词汇就已经存在。“哥特”一词最早指公元5世纪左右居住在北欧属于条顿民族的哥特部落。“哥特”一词同样在建筑风格中得以追溯,这种建筑风格出现在12至16世纪的欧洲建筑中,其特点是:高耸的尖顶、狭窄的窗户、染色的玻璃、阴森的地下藏尸室等。直至18世纪中期“哥特”一词才与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相结合。其诞生的标志是贺拉斯·瓦尔普的小说《奥特朗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该小说的副标题“一个哥特故事”(A Gothic Story)命名了这种体裁的小说。桑德斯总结哥特小说的特色是:迷恋于折磨与恐怖、巫术、恋尸癖、心神不定、峭壁与深渊、鬼魂出没、突然死亡、地牢、梦幻、幻觉和寓言之中<sup>[1]</sup>。作为一种小说题材,哥特小说具有其鲜明的特点:人物塑造上,哥特小说中的人物通常具有不明或隐秘的身世、阴暗压抑的内心、诡秘的行为、异常而复杂的情绪体验。情节氛围上,哥特小说极力渲染一种紧张、恐怖、阴森、凄惨、幻灭、怪诞、超现实的格调。故事类似悬疑小说一般节奏紧凑、环环相扣。主题思想上,哥特小说通常反映社会、政治、教会和道德上的邪恶,从而反映人性恶与残忍的一面。而作为哥特小说的故事发生环境则通常是类似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古堡、荒野、暗室、秘密通道及修道院等。

作为一种小说题材,哥特小说曾经风靡一时,有若干优秀代表作出现。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作为大众通俗读物流传的,至今,对其地位价值的评说仍然不一。尽管典型的哥特小说已随着时间流逝成为历史,但其写作风格却得到了广泛的、不同程度的应用。例如《简爱》中阁楼上的疯女人、《厄舍古屋倒塌》的背景环境及人物塑造等。哥特式风格来源并根植于哥特小说的特点。具有哥特式风格的作品通常在一方面或若干方面具有哥特小说的特点,例如在人物塑造、背景环境烘托、情节推进、主题相关契合性等方面均可体现出哥特小说的特点。具有哥特式风格的作品对哥特小说风格的应用程度也不一,有的小说具有较浓厚的哥特式风格,有的作品则只是对哥特小说的特点稍加应用以取得恰到好处的效果。无论这种哥特式风格应用的深度及广度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哥特式风格已经存在并贯穿到文学作品的创作中,而其接受与应用必然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小说《秘密花园》虽然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但文本中却充分彰显了哥特式风格,这种哥特式风格分别体现在小说的主人公的塑造、故事发生的环

境地点、在恐怖氛围中推进的情节中,从而使这部儿童文学作品吸引并迎合了小读者的阅读需求,同时使其更具鲜明的时代性、复杂性、深刻性。

## 二、哥特式风格在《秘密花园》中的体现

《秘密花园》中哥特式风格首先体现在人物塑造中。根据哥特式小说的主要特点及定义,具有哥特式特征的人物通常具有令人不悦的外表、变态的心理、古怪阴森的性格和神秘隐蔽的身世等特点。而小说《秘密花园》中的人物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上述特征。首先,小说中很多人物拥有令人不悦的外表。例如主人公玛丽,在小说的开篇,她十分瘦弱,面色焦黄,看上去没有任何生命力,像个久病的孩子一样。她难看弱小的样子使得大家根本无视她的存在,以至于她独自一人被困在被瘟疫侵袭的大房子里若干天都没有人想起她。另一位主人公克林的形象同样令人不舒服,他总是习惯痛苦地蜷缩在床上,虚弱得不能动弹,面色苍白,毫无生命力。如果说孩子们的相貌令人不悦,那么“秘密花园”主人柯瑞文先生的外貌似乎可以形容为阴森。他有着严肃阴郁终日没有笑容的面容。这些人物不仅外表令人不悦,他们的内心和性格也同样扭曲不正常。首先玛丽的脾气非常坏,倔强,暴躁,自以为是,为所欲为,自私自利。她的内心也同样阴郁,她对待一切都是冷漠的,她不懂得关爱别人。克林的内心世界更是灰暗,他总是想着死亡,并确信自己不能活下去。死亡就如同迷雾,终日围绕在他的身边,驱之不散,挥之不去。“但他只是躺在那里,想着自己的事,还有他的痛苦与厌倦,一连几个小时,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sup>[1][26]</sup>无休止纠缠他的想法就是他的背会不会驼,他是否明天或者马上就会死去。他年轻幼小的内心充满了绝望与奇怪的念头,他的内心已完全扭曲不正常。再来看看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和他的形象一样让读者感到不悦,他经常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大吵大闹。克林完全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内心充满死亡念头的、粗暴的怪人。柯瑞文先生的性格同样扭曲变态,只因为一点儿生活的打击,他变得古怪、冷漠、自卑、心灵完全扭曲变形。他的世界充满失望、痛苦、折磨、逃避。他让所有的美好如同被遗弃的“秘密花园”一样永远沉沦在记忆深处,永远不能得以苏醒。关于这些人物的身世众说纷纭,具有神秘未知的气息。首先主人公玛丽的父母在文本中提及甚少,读者只是知道她的妈妈很美丽而已。对于读者来说她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更是知之甚少,只有在她与仆人零星的对话中读者才能略有了解。克林的处境更加令人难以想象,他的父亲终日将他关在房间中以使其躲避世人的目光,对于其身世更是期望它成为永远不为人知的

秘密。文中多次提到仆人对于克林存在于现实的隐瞒犹豫。最后克林的出现也是主人公玛丽的无意发现的。而柯瑞文先生自己的身世在人们心目中更是充满了疑问,他有着怎样神秘的过去?他所隐瞒的不愿面对的事实又是什么?这些人物身上的哥特式神秘风格形成了一个个谜团,在阅读中伴随着读者,等待着读者去将其一一解开。

哥特式风格同样体现在小说对背景环境的描述中。小说开篇的背景环境就呈现了哥特式的风格。主人公玛丽家中发生了霍乱,一切都笼罩在阴森、恐怖、绝望之中,所有的生命在转瞬间消失。死亡、疾病充斥着一切。文本中对这场霍乱的描述不禁让人不寒而栗。“从那以后,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了,清晨的神秘氛围玛丽也弄清楚了。霍乱以最致命的方式在这一带爆发了,人们像苍蝇一样死掉了。”<sup>[2]7</sup>之后无助的玛丽被安排到其叔叔柯瑞文先生的家,玛丽这一路的旅行也同样令人沮丧。黑夜,阴雨的天气,毫无生命的荒原是她一路的主要风景。柯瑞文先生的住处,也就是玛丽将要生活的环境也充满了恐怖、阴沉、神秘、古老的气息。柯瑞文先生的庄园坐落在空旷的荒原上,似乎没有生命,没有人烟,到处死气沉沉;只有连绵不断的阴雨和呼啸的寒风。柯瑞文先生的庄园自身更是充分地体现了哥特式风格。那是一座古老的庄园,庄园本身充满了神秘的,恐怖的气息。这座庄园拥有数不清的空房间,没有人知道它们的过去,甚至没有人进入过这些房间。正如玛丽所想的一样:“她想象不出在那座有一百个房间的房子里会发生些什么事情,那座房子的所有房间几乎都关着门……并且,那座房子坐落在荒原的边缘。”<sup>[2]29</sup>同时,这座庄园具有悠久的历史,没人知道它的年龄,它过去的繁华,它所呈现的只有破落,陈旧,死气沉沉的冷寂。更令人惊奇的是这座庄园里的花园——“秘密花园”。从故事开始它就像是一个迷,困扰着主人公,等待着主人公去解开。当“秘密花园”的秘密被解开后,呈现在玛丽眼前的所谓花园同样具有哥特式的风格。这座花园的状态正如文中所述:“……高高围墙上爬满了攀援玫瑰没有叶子的枝茎……地面上到处盖着萧瑟的枯草……树上既没有叶子也没有花……”<sup>[2]113</sup>很久以来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这座园子在过去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恐怖事件使得一切都变得萧条、死气沉沉,更是无人知晓。它早已成为一座被遗弃的、死寂的花园。而柯瑞文先生居住的这座庄园本身就犹如中世纪被遗弃的城堡,屹立在空旷的荒野中,散发着神秘、未知、恐怖的气息。玛丽的生活环境,沉浸在恐怖、奇异、惊险、神秘、让人窒息压抑的氛围之中。

小说《秘密花园》不仅在人物及背景环境中充

满了哥特式风格,同时哥特式写作手法也贯穿在小说情节的推进中。首先,在小说的开篇,一场可怕的霍乱夺走了几乎所有人的生命,唯一幸存的是那个暴躁、令人厌恶的小女孩玛丽。接着随着情节的推进,玛丽奔向她新的归宿,柯瑞文先生家,旅途本身是阴森的、无生气的,似乎与他们一路相伴的只有阴雨和黑夜。而伴随着她的是旅途中听到的关于柯瑞文先生生活环境和为人的种种传言,这些传言更是令人不寒而栗。小说的情节再次随着这种哥特式的风格推进,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传言中柯瑞文先生那似乎早已被遗弃的、空旷的、荒芜的庄园以及主人公玛丽对这座具有神秘色彩的庄园的逐步探索。随着玛丽的探索、故事情节的推进,那个“秘密花园”出现了,而“秘密花园”的出现也是伴随着这种哥特式风格所营造的神秘、未知气氛当中。首先是花园被园艺师及仆人不小心提及,之后是玛丽在隐蔽的角落发现这座神秘花园的钥匙,最后是玛丽在神奇的知更鸟的引领下找到“秘密花园”。另外,随着主人公玛丽对柯瑞文先生庄园的认识与探索,另一位主人公克林出现了,而他的出现也是伴随着哥特式风格的烘托。克林的出现不是突然的,他的出现在小说情节的推进中是早有渗透的。而这种渗透也是在哥特式风格的关照下逐步实现的。首先是午夜可怕的类似风声的哭喊。“那是一种奇怪的声音……风声听起来非常像一个孩子的哭泣声。”<sup>[2]71</sup>接着是仆人对他的存在的支支吾吾的掩饰。“‘没有’她回答,‘是风声吧,有时候风声听起来就像是人在荒原里迷了路而号啕大哭起来一样。’”<sup>[2]71</sup>最后克林才在恐怖、扭曲、令人窒息的环境中出现。而玛丽对于她自己所发现的“秘密花园”这一秘密的态度也是时时隐藏而犹豫的,这一秘密逐渐为人们所共知的过程也是在神秘、谨慎的氛围中进行的。情节结构强势紧凑也是哥特小说情节上的特点。在小说《秘密花园》中,情节的推进同样具有上述特点:玛丽家遭受了霍乱,玛丽被快速送到了柯瑞文先生的家,“秘密花园”钥匙的发现,“秘密花园”的发现,克林的露面,一切都在快节奏中推进,一环扣一环,给人一种紧张来不及喘息的感觉。哥特式小说同样会用暗示性的语言制造秘密悬疑使其情节紧凑、富有张力。小说中“钥匙”“秘密花园”“奇怪的哭喊声”等充满未知暗示性的语言恰到好处地营造出了这种情节的急迫性,紧凑性。

### 三、哥特式风格的作用

那么,哥特式风格在小说创作中有什么作用呢?笔者认为其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形成反差,强化主题。作为一部优秀的

儿童小说,《秘密花园》的主题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的歌颂、对生命的热爱、成长过程中人性关怀的重要性等方面。小说的主题可以从小说的很多方面得到体现,例如对自然环境细致入微的描写、对主要人物的成功塑造等。这其中主要人物及自然环境在小说前后的变化以及由这种变化形成的反差在突出小说主题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在这种反差的形成过程中,哥特式风格起到了关键独特的作用。当小说中那些具有哥特式特征的丑陋、暴躁、极端的人物在大自然和人文关怀下变得积极乐观、充满朝气时,我们知道了大自然的伟大神圣,人性关怀的重要意义。当小说中那些具有哥特式风格的荒芜、阴森、冷漠的自然环境在孩子们的耕耘下重现生机与活力时,我们知道了人与自然之间是需要彼此相互的尊重与关爱的。当那些充满神秘未知的事物将其本真面目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我们明白了坦然真诚、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的重要性。我们知道通常儿童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观察能力,他们对各种反差及变动特别敏感。这种由于哥特式风格所引起的在小说人物及其环境中的反差能给小读者带来极大的精神上的震撼,从而在其心目中留下深刻、鲜明、长久的印象。小读者似乎可以在头脑中形成一幅幅鲜明的具有反差的动态画面。例如由病态丑陋扭曲变为美丽善良健康的女主人公玛丽,由死气沉沉变为生机勃勃的“秘密花园”等。这样,小说的主题就能更好地传递揭示给小读者们。正如没有黑暗我们不能强烈地感觉到白昼的耀眼一样,没有这种哥特式风格在小说中很好的应用,读者很难体会到人物及其环境前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由这种反差所揭示的小说主题也将很难被有效地传达。

其次,吸引读者注意力,推动情节发展。小说《秘密花园》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代表作,其目标读者主要是儿童。而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决定小说要在内容与形式上符合他们的需求。众所周知,相对于成年读者而言,儿童读者往往缺乏耐心,其注意力不易长时间保持在文本上,其对作品及文本的理解能力也是有限的。小说《秘密花园》中哥特式风格在吸引儿童读者注意力及兴趣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首先,相对于传统儿童文学中经常描述的美好、善良、积极向上的人物及背景环境,哥特式风格所创造的惊险、恐怖、怪异、阴森的人物及环境能够抓住小读者的心,吸引其注意力。因为哥特式风格在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及营造的环境对于儿童读者来说都是相对陌生的,离他们的生活是有一定距离的。而这种陌生感,距离感往往能够激发儿童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使他们对文本的注意力保持相对稳定。同时具有哥特式风格的小说在内容

和情节上能营造出一种紧张急迫的氛围,而这种紧张急迫的氛围更能吸引小读者的注意力。另外,我们知道好奇心和求知欲是儿童主要的心理特点之一,而在小说《秘密花园》中,由哥特式风格所创造的悬疑、谜团恰好迎合了成长中儿童的心理需求。具有哥特式风格的小说通常具有惊险、悬疑、恐怖、充满谜团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小说《秘密花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可以把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比作一个一个谜团的呈现及解开的过程。遭受霍乱成为孤儿的玛丽将怎样生活?传说中玛丽叔叔空旷阴森的庄园到底是什么样子?死气沉沉的庄园有着怎样的过去?那午夜恐怖的叫喊声是什么?毫无生气的秘密花园能否复苏?连小说题目本身也充满悬疑色彩,如同一个谜,等待我们去将其解开。可以说小说《秘密花园》情节的逐步推进正是在这种哥特式风格的关照下实现的,而这种充满悬疑、谜团的情节可以激起小读者的好奇心,迎合并且满足他们对未知事物求知的欲望。

再次,恐怖的关照,独特的审美教育功能。由于时代的变迁以及审美个人体验的差异,人们对“美”的概念与理解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如果说哥特式风格为作品营造了一种独特的“美”的话,那么这种“美”属于崇高的美的范畴。朗吉弩斯(Longinus)在其著作《论崇高》中最早在美学范畴内提出了崇高理论。在朗吉弩斯看来,崇高就是那些巨大的、不同寻常的事物,以及人的心灵对这些不同寻常的事物的热烈追求和永恒惊叹<sup>[3]113</sup>。十八世纪的伯克(Burke)在《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中指出,崇高是注重痛苦、危险与恐惧的自我保持的情感。由晦暗、力量、庞大、无限性、空虚、沉寂、困难引起的恐怖性和与人敌对性是引起崇高美的主要因素。同时伯克还强调:“凡是可恐怖的也就是崇高的”,“惊惧是崇高的最高效果。”<sup>[4]</sup>席勒也认为,一切异乎寻常、神秘的、难以捉摸的东西,还有黑暗,都是关照崇高的对象<sup>[3]124</sup>。从以上的有关崇高的理解及定义可以看出,哥特式风格在文学文本中的运用能够很好的营造这种崇高感。首先哥特式风格作品中恐怖、晦暗、神秘、空旷的背景环境让读者能够体会到一种崇高感,例如:巨大高耸的古堡、黑暗神秘的修道院等。其次,哥特式风格所塑造描绘的扭曲和异乎寻常的人物和事物也能创造一种崇高感。最后,哥特式风格作品所阐释的痛苦、危险、敌对性等主题也很好的诠释了崇高感。《秘密花园》这部具有哥特式风格的作品同样为小读者营造了这种崇高的美,而这种崇高的美对于儿童的审美体验是独特的、陌生的。传统上,儿童所接受的美通常是柔和、鲜亮、阳光、令人感到亲切的。而这种由哥特式风格创造的阴郁的、庄严

的、强大的、肃穆的崇高美会对儿童读者的内心产生强大的冲击力,从而使其在阅读过程中完成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如果说小说《秘密花园》向读者传达了什么是生活中的真善美,那么其哥特式风格无疑在无形中同时将恶、丑、缺憾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很多批评者及读者认为儿童文学作品不应出现太多的恐怖,血腥,阴郁的描写场面,认为由其制造出的“噩梦”将会长久的萦绕在儿童的心间,从而影响其健康成长。但是,事实是生活中善与恶,美与丑,阳光与阴森是并存的,任何人在其成长过程中都必须要学会接受与适应这些。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尽早认识理解其存在是必要的,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试着理解珍惜善与美,并学会如何将那些恶与丑,那些残缺不完满转化成为美好的事物。由此,可以说小说《秘密花园》不仅为小读者上了一堂关于认识恶与丑的课,同时教会他们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让生活中丑与恶转化为美与善。

最后,增加小说深度,提升小说现代性。作为一部公认的优秀文学作品,小说《秘密花园》的深度与复杂性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儿童文学层面,小说的很多方面已颇具现代性作品的深度。正如美国作家兼学者安丽森·卢瑞(Alison Lurie)在牛津版的《秘密花园》序言里指出,小说非常明显地包含了20世纪西方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几个重要主题。一是对内心世界的关注;二是提倡回到自然;三是神秘主义。而小说中哥特式风格的运用对于增加小说的复杂性,提升小说现代性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强调对人物内心情感世界的描述是哥特式小说的特点之一,哥特式小说通常关注人物细微的心理变化,对潜意识心理和罪恶感意识有意识地进行挖掘。而这种写作风格在现代派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保留与应用,从而为二十世纪文学“向内转”提供了依据与资源。小说《秘密花园》在哥特式风格的关照下对人物的内心世界也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如玛丽面对柯瑞文先生庄园时的心理反应,克林完全变态扭曲的,充满死亡意识的未来观,柯瑞文先生自我残忍的,扭曲的内心折磨等。这些描写无疑使这些人物形象更加饱满丰盈,将他们的多个侧面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使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具现代性,多面性。同时这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关照也增加了作品本身整体上的深度与现代性,在认识人类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方面为读者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哥特式风格同样有助于“神秘主义”的呈现。“神秘主义”一词是从拉丁文occultism(意为“隐藏或隐蔽”)派生而来的,其具体含义是指能够使人们获得更高的精神或心灵之力的各种教义和宗教仪式。神秘主义

包括诸多理论和实践,例如:玄想、唯灵论、“魔杖”探寻、数灵论、瑜伽、自然魔术、自由手工艺、共济会纲领、巫术、星战学和炼金术等<sup>[5]</sup>。哥特式风格所营造出的恐怖,奇幻,阴郁,反常等特色很好的迎合了“神秘主义”的特点。小说中具有哥特式风格的人物、背景环境、情节等使小说笼罩在了这样一种神秘色彩之中。例如:小说中屡次提出“魔法”(magic)这一词汇概念。在小说中的主人公看来,正是“魔法”让一切发生了奇迹性的变化,而人们通常会自然地将“魔法”与神秘联系在一起。由哥特式风格营造的这种神秘性使小说不仅仅反映了儿童成长的好奇心及探索心理,同时暗示并揭示了许多现代社会现象及问题,例如:人性不完美的一面、人的内心世界之复杂、自然环境与人类敌对的一面等。从而使这部作品的深度得到提升,内容的严肃性得到增强。同时,现代作品由“神秘主义”衍生而来的若干主题,如孤独,世界的荒谬等也通过哥特式这种风格在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暗示和阐发。这一切使这部儿童文学作品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超越,从而使其经典性能够接受历史与时间的考验,得到认可与巩固。

作为一部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品,小说《秘密花园》值得称道的地方很多。但哥特式风格在文中的大胆应用无疑是该儿童文学作品的特色之一。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哥特式风格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它为小说主题的呈现、情节的发展、儿童的审美教育及自身深度、现代性的提升提供了很好的服务。该小说中哥特式写作风格的成功运用,让读者知道儿童文学作品并非与哥特式这种写作风格格格不入,相反,两者的结合及很好的运用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效果。

#### 参考文献:

- [1] 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M].谷启楠,韩加明,高万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98.
- [2] 伯内特.秘密花园[M].刘晓媛,译.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10.
- [3] 李伟昉.黑色经典:英国哥特小说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13-124.
- [4]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42.
- [5] 裴志伟.附魅、祛魅与转魅:西方神秘主义诗学的跨现代转向[D].兰州: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

〔责任编辑:吴晓红〕

# 词学批评“远”范畴的审美空间

郭守运, 张嘉斌

(华南师范大学 南海学院 中文系, 广东 佛山 528225)

**摘要:**“远”作为中国古典词学批评中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 在审美空间上表现为三个维度, 分别为空间之远、时间之远和哲思之远。中国古代词作中“远”范畴的审美内涵, 超越时空的距离, 由“眼中之远”升华为“意中之远”, 最终指向人的内在精神世界, 是对艺术价值和生命真谛的超越性指引。

**关键词:**远; 范畴; 词学批评; 审美空间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76-04

## Research on aesthetic space of the category of “Distance” of Ci criticism

GUO Shou - yun, ZHANG Jia - bin

(Nanhai Campu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225,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aesthetic categories of Chinese classical criticism of Ci (a Chinese poetic genre), “distance” assumes three dimensions in the aesthetic space: spatial distance, temporal distance and philosophical distance.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s of the category of “distance” in the ancient Chinese Ci works, by transcend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ance, transform from the “physical distance” to “imaginary distance” and reaches the inner spiritual world of man, which is a transcendental guidance of artistic value and true meaning of life.

**Key words:** distance; category; criticism of Ci; aesthetic space

“远”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审美范畴之一, 也是极为重要的前位范畴之一, 在范畴体系和架构中起着支柱性作用。古人认为:“大家古文所以过人者, 厚也, 秀也, 远也, 肆也。”<sup>[1]</sup><sup>[148]</sup>纵览中国词学批评史可见, “远”对古典诗词的创作和鉴赏的影响极为深刻, “远”范畴及其后序、合体范畴构成了以诗话、词话为中心的文学批评的主体范畴之一。

由于古代文学中, 词与诗的天然联系, 词人将诗文笔法运用于词作的情况颇为常见, 所以传统诗文批评的诸多概念、范畴, 常有被人用以论词的。词这一体裁的兴起比古诗要晚, 词学批评紧随其后。“远”作为词学批评范畴萌芽于唐前, 成型于宋代, 承传于金元, 盛兴于明代, 最终在大力推崇词体的清代奠定了它的地位。究其根由, 乃是古代士人对“远”的精神境界的崇尚。伴随着时人对“远”的极力张扬, 词学范畴“远”被进一步推崇和标举,

由此形成的与之相关的意象、母题十分普遍。“远”范畴既深化了人们对词体的认识, 同时丰富了文艺批评范畴理论。

“远”作为古代词人艺术和人生追求的最高精神理念和审美准则之一, 在审美空间上表现出来的三个维度, 即“空间之远”、“时间之远”和“哲思之远”, 为词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审美标准。“远”的审美价值由“眼中之远”升华为“意中之远”, 不只是对现实距离的超越, 而且是对人的内心世界与内在精神的归宿和渴求。

### 一、空间之远

远的本义是空间距离之远。《说文解字》解释云:“远, 辽也”<sup>[2]</sup>; 《广韵》亦云:“远, 遥远也”<sup>[3]</sup>。春秋时期“远”又由空间之远引申为时间之远, 如《吕氏春秋·大乐》道:“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sup>[4]</sup>。

收稿日期:2012-09-20

基金项目:2011年度教育部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远范畴的审美空间研究(11YJC751025)”资助

作者简介:郭守运(1979-), 男, 安徽淮南人, 文学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古代文论与美学。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宇宙观念中,“远”是用来表达那些可视而又无法限定的无限宇宙时空的。“远”即“道”的化身,由个人之有限体会时空之无限,而《庄子》中所形成的“远游”与“逍遥游”使得“远”成为后世的审美观照方式之一。老庄的超越脱俗精神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艺创作,因而在古典诗词创作和鉴赏中,文人对“远”的追求,也体现了这种对人类有限的、可视时空的审美性超越。

“远”在古典诗词之审美意象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由此产生大量体现空间之“远”美的作品。描绘烟雾的“远烟”,描绘山峰的“远山、远岫、远峰”,描写树林的“远林、远翠”,书写踪迹的“远迹、远游、远足”等,这些“远”的词语组合是中国古典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一个广阔的“远”的文学审美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文人的审美心态、审美体验以及“远”组合所承载的内涵都是非常丰富的。且看南宋词人韩元吉的《霜天晓角·题采石蛾眉亭》:“倚天绝壁,直下江千尺。天际两蛾凝黛,愁与恨,几时极!暮潮风正急,酒阑闻塞笛。试问谪仙何处?青山外,远烟碧。”上片的“倚天绝壁,直下江千尺”是眼前之景色,下片的“青山外,远烟碧”已经突破眼前之景而达到有限空间的超越,从而引出词人阔达悲远的心灵境界。该词虽名为题咏山水之作,但显然寄寓了词人对时局的感慨。“试问谪仙何处?青山外,远烟碧。”词人想起壮志难酬、客死异乡的李白。葬于青山之上已数百年,而今但见青山之外,远空烟岚缥碧而已。词人虽然身任官职,但在当时投降派得势掌权的情况下,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读者从虚无缥渺的远烟中,已能充分领悟到他此刻的心境。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词人无论是用何物来表现自己的情感、也无论这是何种情感,他们所置身的都是一个共同的“远”的空间,创作的起点自然是有限空间之远即“眼中之远”,最终目的却是要表达超越有限空间的心理空间之远即“意中之远”。在向读者呈现远大广阔的景象的同时,又从根本上超越了眼前之远。在词人不断地吟咏及喟叹当中,“远山”、“远水”、“远天”、“远地”已不单属于自然界,它们都承载着词人深厚的情感,成为具有特定审美内涵的意象。不管是晏殊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还是晏几道的“远山低尽不成歌”,“远”始终是一个关键,它意指的不仅是“眼前之远”,而是由景及情而生出的“意中之远”,由此形成词人笔下情景交融之意象。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仅有大量体现空间之“远”美的作品,在理论探索上也颇有建树。作为

古典文学中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远”对古典词学批评有着深远的影响。一般说来,北宋文人作词多疏淡,讲究运意深远。李清照在《词论》中评柳永词:“耆卿为世皆警久矣,然其铺叙委婉,言近意远,森秀幽淡之趣在骨。耆卿乐府多,故恶滥可笑者多,使能珍重下笔,则北宋高手也。”<sup>[1]352</sup>宋人已经将“深远”、“高远”等作为创作标杆,要求词作应当能够把读者带向高远的境界。据《苕溪渔隐词话》记载,王安石曾与黄庭坚论后主词:“荆公问山谷云:‘作小词曾看李后主词否。’云:‘曾看。’荆公云:‘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又细雨湿流光最好。’”<sup>[5]665</sup>可见我国古典词学批评偏重于对“远”的崇尚。“远”的含义在此绝不仅是就视觉距离的远近而言的,论者企图通过“远”的景物设置,把读者的审美活动引向文本表层画面之外那个更加广阔无极的宇宙时空中去。让凡俗尘器中的心灵遨游于广袤无垠的意中之“远”,生活的奥秘尽藏于读者的无限想象空间之中。

中国古典词学批评中,以有限空间之“远”来把握、描绘无限之“远”的思维方式,其实是一种心灵的直观方式,也可以说是直接体悟的审美方式,它在词论中的出现并非仅以“远”字呈现,词论中还有一些与“远”范畴紧密关联的范畴,共同构成词学批评的重要部分。以“清空”为例,它是指词创作中所达到的一种古雅脱俗、含蓄幽远的至高境界,“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语)。“远”的空间距离是“清空”的前提,唯与物象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才能成其境界,清空深邃,博大广阔。这种主体心灵突破外物象在的限制所形成的审美境界,必能产生宁静淡远的审美情趣。所谓“清空”,乃是对现有生活的超越,力求摆脱功利的世俗生活,解脱人们在尘世中疲惫压抑的灵魂,构筑一个精神上逍遥无待的境界,从而在这一境界中得到生命的升华。也正因为古人这种尚远的品格,词方能达到一种清明空灵的境界。

词中之“远”,最终指向的是由眼前之景延伸出来的“意中之远”。情景交融产生的“意象”超脱了有限的空间,在登高远望的有限空间的距离的体悟或感受当中,可以发现中国古人在空间变化之时所产生的审美意识及审美体验。中国古人在艺术审美中看重“虚”,“远”则是朱良志所说的“艺术家精心构筑的第二时空——虚灵时空”<sup>[6]</sup>。虚灵时空是一种心灵境界,这种境界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审美意象建构出一种物我交融的具有超越意识的审美境界,它能通过想象把读者引入一个融宇宙、

古今、人生于一体的诗意栖居地,让人忘怀世事、净化生命、体味超越自我的天地之大美,体悟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以上正是空间之远的审美内核。

## 二、时间之远

“远”范畴的时间之美,是审美主体运用神思之巧妙,通过艺术想象以及时空变化所营造的美之远。“远”的时间之美,抒发了古代文人在追古思今、俯仰天地中的生命美感,它不只是对物理时空的超越,而且是人的内心世界和内在精神的归宿的渴求。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生命的意义是在时间之流的体验中获得的,生命的本源和归宿是“道”,生命存在的质感和绵延在于时间之“远”。

词作为承载土人文化心理、审美趣味的重要载体,能让词人在回望和追忆中寻求自身存在的意义。在中国传统诗词中,登高怀远、怀古是重要的主题之一。咏史怀古,在时间长河的追忆和反思中孕育而生丰厚的感情;登高望远,通过与抒情对象的空间距离之远,拉长心理的审美体验时间。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道:“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遥远的青山,之所以能“献愁供恨”,不仅是因为山河壮丽与国家国土相对应,还因为它们精神情感的徜徉提供了一个辽阔无垠的空间,拉长了审美感受的时间。空间之“远”引出了时间之“远”,时间不仅物化了,同时带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此外,临远和远眺都带来时间上的回忆和追思,“远”代表栖息之地,是精神的归宿,具有浓厚的归乡意识。柳永在《八声甘州》道:“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遥,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在广阔的空间里,人意识到自身的渺小与孤独,从而在回望和追忆中寻求自身的存在意义。空间和时间的存在虽然是相互统一的,但是相对人的感官而言,空间在视觉上相对静止,而时间是流动的,这种流动感源于人的心理体验。由此,在“登高临远”、“追思怀远”的同时容易产生对过去、未来的追思,即回归到时间链条之中。词人极力营造的意境之“远”,其实是一种心理体验之“远”,它不仅停留在空间,而是与时间密切结合的。

“远”,即是词人在心中营造的一个想象世界,一种赋予时间丰厚意义的行动。对时间之“远”的关注,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所以“远”范畴体现了中国文化对时间的独特体悟。《铜鼓书堂词话》评宋人李秋崖的落梅词《高阳台》云:“藓梢空挂凄凉月,想鹤归、犹怨黄昏。黯销凝,人老天涯,雁影沈沉”,认为“其雅正澹远、柔婉深长之处,令人可思可咏。”<sup>[1]453</sup>在中国传统文化当

中,梅以其贞干高节,先春而放,故常得到人们的青睐。在文人雅士眼中,梅花更是他们的知音人,落梅更是宋人流风余韵的发扬。落梅的孤寂与人的年华易逝相对应,激荡的感情在读者的审美世界中创造了寥廓无垠的空间,拉长了审美感受的时间。这一个过程使人在精神上进入空灵虚静的状态,所以论者方才得出“雅正澹远”的中肯评论。时间体验与生命的存在方式是一致的,生命的终结意味着时间的终结。人在生命时间与物理时间的比照中,会发现个人生命时间的飘渺虚无。追求“无限时间之远”,是对超越性存在的体验,是一种精神漫游。

词的审美质性与其遣词造句有着莫大的关联,历代词论者非常重视时间之远美,在远时远地细心感悟每字每句的构造,与审美客体保持一定的审美时空,从而把人推向更上一层的审美高度。清代彭孙在《金粟词话》中肯定“词以自然为宗”,即“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便率易无味。如所云绚烂之极,乃造平澹耳。若使语意澹远者,稍加刻画,镂金错绣者,渐近天然,则骎骎乎绝唱矣。”<sup>[7]</sup>推敲字句是十分考究的,在流动的时间体悟中迈向超越性的审美新天地,“远”的审美方向由有限而无限,最终指向超越时间的生命存在。

中国古代文人特别重视对虚空的体悟。在这种体悟之下,往往产生对“远时”的细心描绘与构造。在虚幻的时空当中,艺术家对生命抱有一种空灵的体验,生命的美感油然而生。乃至在这个过程中,空间也是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幻化、流动,如宗白华所说的:“我们的空间感觉随着我们的时间感觉而节奏化了、音乐化了!”<sup>[8]</sup>物理的时空状态并非人类生活的全部依据,艺术的使命恰恰是超越人类的时空局限,在“远”时“远”地重塑无限自由的审美新天地。

## 三、哲思之远

“远”范畴的前两个维度——时间之远和空间之远,表明了“远”对现有时间和时空的审美探寻,并在诗学构想中用情思的无限想象超越现实的有限距离。在此基础上,中国词学无论是创作还是鉴赏,其对于“远”的意境的探索,体现了具有诗性智慧的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哲学根性上来,因为中国文人和艺术家所崇尚的“远”最终指向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是意之远、心之远。

在中国的艺术哲学中,大自然无处不体现出流动不已、俯仰远近的生命精神。词学批评中的“远”范畴实现了超越有限、追求无限的要求。词人采用词“远”的艺术技巧,将个人意念与理想人

格的融合,在艺术世界展现生命自由的美态,使人暂时摆脱了世俗的束缚羁绊,进入到自由自在审美境界,到达了对生命反思、追求和把握的最高境界,也实现了将审美境界当作人生最高境界的愿望。

“远”范畴与古代文人的精神内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作为词学批评范畴的“远”具有自身的哲学内核,标志着古代文人形而上的理性认知。五代至北宋,词被视为“小道”,仅供娱宾遣兴之用。北宋中后期开始,词逐渐与诗文并驾齐驱,意旨之远、气度之宏越来越成为词家评词优劣的标准。例如张炎《词源》中批评周邦彦说:“美成词只当他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惜乎意趣却不高远。”<sup>[5][1727]</sup>周邦彦词以文辞华丽、韵律优美见称。张炎指出周词采唐诗用之,有唐人气魄,但可惜“意趣却不高远”,说的就是周词缺乏“远”的气度。同一个标准,张炎赞赏元好问,称:“元遗山极称稼轩词,及观遗山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如《双莲》、《雁邱》等作,妙在模写情态,立意高远,初无稼轩豪迈之气。岂遗山欲表而出之,故云尔。”<sup>[5][1740]</sup>《雁邱》一首,为后世传颂,词曰:“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元好问这首词,是有感于大雁投地殉情而作。但此词开头却破空而来,突发天问,作者本要咏雁,却从“世间”落笔,明显是感时深远之作。上片词遥想双雁,双依为命,一往情深之景,因而寄情于雁,对其殉情表示同情与同感。大雁殉情勾起作者家国身世之悲,于是作者下片转入了迷茫寂寞的历史沉思中:孤雁长眠处,正是当年汉武帝渡汾河祭祀汾阴的地方,当是时,箫鼓喧闹,棹歌四起;但如今,荒烟飘渺,平林萧索。古与今,人与雁,更加感到鸿雁殉情的凄烈。但是死者不能复生,招魂无济于事,山鬼也枉自悲鸣,在这里,作者把写景与写情融为一体,更增加了悲剧气氛。词的最后,是作者对殉情鸿雁的礼赞,他说鸿雁之死,其境界之高,上

天也会嫉妒,虽不能说重于泰山,也不能跟莺儿燕子之死一样同归黄土了事。它的美名将“千秋万古”,为后世骚人所歌咏传颂。此外,这首词描写的是“情”,而中国古典诗学一般倾向“性静情动”,认为“情”是一样随物流转、常生常灭的东西,入诗词难为正宗,而张炎依旧说此词“立意高远”,有“豪迈”之气。那是因为,作者感大雁殉情壮举,体验到情的刹那迸发,感悟其中永恒的价值。作者看到古今变迁,尽成虚幻,唯有一往深情是人真真实实的体验,于是叫人重视深情,启发后人。因此,张炎评之“立意高远”,是独到而中肯的。开启“远”的境界,人置身于其中与宇宙天地沟通接洽,生命的价值、艺术的内涵方能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词学批评中的“远”范畴及其艺术表达,不仅揭示了古代文人普遍的生存境遇,更彰显出一股勃然而不可磨灭的艺术生命力。人们不仅在想象中体会心灵的悠游,在行走中获得真切的生活体验,也在追忆中反思个体伦理的深层涵义。中国古典词学批评中的“远”范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它在审美空间展现出来的三个审美维度不仅把人的视线引向远方,而更是把人的心灵导向无限,于无限中追求独特的生命精神,因而对于词在宋代“别是一家”成为独立文体做出了重要贡献。

## 参考文献:

- [1] 贺贻孙.与友人论文书(四)//于民.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478.
- [2]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7:42.
- [3] 广韵[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2:260.
- [4] 吕不韦.吕氏春秋[M].陆玖,注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135.
- [5] 邓子勉.宋金元词话全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 [6] 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05.
- [7] 谭新红.清词话考述[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388.
- [8]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89.

[责任编辑:吴晓红]

# 西方文学经典中“医者”形象的嬗变

宋萍

(安徽医科大学 外语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由于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医生角色不时地作为一种承担特殊社会意义和负载作家审美理想的独特形象进入文学的视野。随着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和文学语境的变迁,文学作品中的“医者”形象与内涵亦不断演变。以“医者”形象变迁这一视角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相关文本,研究西方文学不同时期作品中“医者”形象所呈现的不同面貌——从《圣经》神话中医治一切的上帝到现代派作品中接受过医学教育并掌握现代医学技术的医生,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医者”形象经历了去神性化的过程。同时指出,不同时期的“医者”形象又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医学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作家对医生角色的认识与思考。

**关键词:**西方文学;医生形象;演变;社会和医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80-06

## On the change of the doctor image in western literature

SONG P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and significance of medical profession, the doctor image has been enjoying a unique position of assuming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writers' aesthetic ideals within the scope of literature.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and literary contexts, the images and connotations of doctors has been evolv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octor image, this paper, by analyzing related literary works, explores different doctor images at different literary stages, and delineates the degenerative process from the omnipotent healer of God to the doctors armed with modern medical techniques. Meanwhile, the doctor images at different times also reflec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medic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backgrounds as well as the writers' understanding of and reflection on this profession.

**Key words:** western literature; the doctor image; evolution; social and medical development.

在西方文学经典中,“医者”作为一种承担特殊社会意义和负载作家审美理想的独特形象,不时进入文学视野。然而,“医者”形象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学作品中,蕴涵着不同的主题和内涵。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指出,文学艺术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并反映这种社会历史现实。这是一种总体把握,具体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则应从属于这个特定时期。即便有某种超越,也是在这个时期基础上的有限超越。本文拟采用马克思主义文学

批评理论和文本细读的方法,关照西方医学发展历史,对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医者”形象进行深度解读,以期梳理“医者”形象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整体演变趋势和历史成因,并指出这一解读有助于深入把握文学文本所蕴涵的深层意义。

### 一、文艺复兴前西方经典中的“医者”形象:神话学和神学襁褓中的婴孩

宗教是特定生产力水平下意识形态的特殊表

收稿日期:2012-11-28

基金项目:2011年度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1sk113)资助

作者简介:宋萍(1976-),女,安徽肥东人,文学硕士,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现,是人类思维能力巨大进步的表征;就文学而言,神话是人们在数千年生存斗争和发展中用来表现美好愿望,反映善恶观念的一种形式,是人类知识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和神话互摄共生,水乳交融,传承人类精神深层结构中的乌托邦理想。圣经文化和希腊神话是西方文化的源头。本文拟分析圣经文本来探寻文艺复兴前西方经典中的“医者”形象。文艺复兴前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医者”形象诞生于独特的文化语境,氤氲于浓厚的神学氛围之中,烙印了深刻的神话色彩:医者要么负载着神的角色,预言和拯救;要么作为人类与宇宙/神交流的中介,体现了当时幼稚但浪漫的整体宇宙观和心物一元论。

自中世纪以来,《圣经》就有“唯一的书”和“书中之书”的称号;既是伟大的宗教学原典,也是文学典籍中的扛鼎之作。因此,我们对西方文学中“医者”形象的认识从《圣经》开始。从某种意义讲,基督教从发源起就是医治人类疾病的宗教<sup>[1]55</sup>。《圣经》作为基督教启示录,启示造物主上帝不仅赐予人生命,同时医治人类的灵魂和身体。《圣经》塑造了耶和华上帝的医者形象。当以色列民在摩西带领下逃脱埃及法老的奴役走向上帝的应许之地时,上帝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sup>[2]111</sup>。在这段宣言之中,上帝将自己代表医治者的名字告诉以色列民,但同时又威胁说:如果他们不顺从的话,就会将疾病加在他们身上。也就是说,疾病是对上帝不顺从的产物,是上帝对人类疏远的惩罚。“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sup>[2]331</sup>耶和华神既是造物主,也是医治者,灵活的救赎与身体的医治是上帝对人类的双重拯救。“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sup>[2]956</sup>。整部《旧约》,上帝乃是唯一的“医者”,作为当时的医者代表耶和华,他对人类的救治关切身心的统一,精神和肉体的和谐;人类信仰的日渐缺失和精神的颓败在《旧约》上升到寓言和预言的高度,精神和信仰的堕落瓦解成了病的根源,信仰的复苏,对宇宙的敬畏成为耶和华的救治良方,在此意义上,《圣经》成为医治人类精神和肉体疾病的宗教典籍。

《新约》中耶稣进入了与疾病和痛苦以及它们背后之邪恶势力的直接对抗。在《新约》中,上帝的救治更具体,他担负着医者和受难者的双重角

色,受难即甘受苍生一切病苦折磨;牺牲和爱是他的良药。<sup>3</sup>彼得前书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sup>[3]404</sup>“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sup>[3]13</sup>“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病人。”<sup>[3]22</sup>耶稣的服务反映出一种广义的医治,既搭救人的肉体,同时也拯救他们脱离罪。首要任务不单是施行肉体的医治,而是宣告上帝的释放、饶恕、和好、援救和救恩。他的医治通常都伴随着对罪的赦免。身体的医治在一种更广博的服务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只有这更广博的服务才能实现对人类存在的各个范畴的医治,恢复到上帝造物之初的和谐。

医者形象的惊人相似也出现在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如同《圣经》中的上帝,他是希腊神话中既能医治也能降瘟疫杀人的神。比如他用音乐治病:同时拨奏竖琴的两根弦,就可使箭伤的创痛得以减轻。阿波罗之子阿斯克勒庇俄斯继承了阿波罗的医治神能,被视为古希腊医生与医术的保护神。这种看似偶然的相似和统一背后隐藏着内在的深层原因。文艺复兴前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医者”形象就像是神话和神学襁褓中的婴孩。《圣经》中的上帝和希腊神话的阿波罗神,他们的医治之恩具有宗教的普适性,灵魂的救赎与身体的医治完美的合二为一,体现了神话的浪漫和理想性。《圣经》和希腊神话中的“医者”形象真实的反映了先民对健康、和谐、秩序等的原始诉求。这种医治体系充分展现了当时幼稚但浪漫的整体宇宙观和心物一元论。然而,在后来的基督宗教发展史上,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慢慢形成,新的“医者”形象和医治体系开始出现在新的文学经典之中。

##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医者”形象:神性与人性的撕扯,理想与现实的挣扎

文艺复兴是西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宗教神化氛围渐渐淡却,人文主义精神开始萌生。天真浪漫的整体宇宙观和心物一元论让位于欲望蒸腾个性解放的物质主义。14世纪起,由于科技进步,实验方法的兴起,实证医学得到了重视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对古代权威发起挑战。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医生代表、近代解剖学的奠基人维萨里于1543年发表的《人体构造》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围,“医学革命”由此拉开序幕。建立在对事实观察基础之上的解剖学研究开始盛行,人们一度信奉的古老学说渐渐丧失权威<sup>[1]98</sup>。这一时

期经典文学中的“医者”形象再现了当时的时代风貌和精神内涵。与之前的“医者”不同，他们撕扯在神性与人性之间，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中。文艺复兴巅峰时期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医者”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一剧中客观地反映了人类的精神堕落——妄自尊大、唯利是图、放纵情欲、冒险主义、拜物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麦克白这一形象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冒险家、野心家的高度艺术概括。在个人野心和权势欲望的驱使下，从一个功勋卓著的英雄沉沦为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剧中有两位医生，一位是英格兰医生，另一位是麦克白身边的苏格兰医生。两位医生在戏剧发展的关键时刻出场，各有不同使命。第四幕中，苏格兰马尔康王子和贵族麦克得夫在英格兰王宫前遇到英格兰医生时问道：“王上出来了吗？”英格兰医生答道：“出来了，殿下；有一大群不幸的人们在等候他医治，他们的疾病使最高明的医生束手无策，可是上天给他这样神奇的力量，只要他的手一触，他们就立刻痊愈了。”<sup>[4]64</sup>话音落地，医生退场。马尔康接着向麦克得夫解释：“害着怪病的人，浑身肿烂，惨不忍睹，一切外科手术无法医治的，他只要嘴里念着祈祷，用一枚金章亲手挂在他们的颈上，他们便会霍然痊愈；据说他这种治病的天能，是世世相传永袭罔替的。”<sup>[4]65</sup>这就将医治与王权联系起来，对疾病“束手无策”的英格兰医生对国王的妙手神通惊叹不已，医生角色不过是个戏剧策略。英格兰王被视为上帝的化身，能够借助神力消除疾病和灾难，使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国王依赖“世世相传永袭罔替”的权威“天能”治愈了“一切外科手术无法医治的”的疾病。这种“神奇的力量”正是王权神圣性的体现。君权神授，国王披上了神的外衣，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圣经意义上神的精神被异化了，爱和信仰堕落为赤裸裸的现世利益，宗教精神沦为物的附属物或工具。

作为英格兰医生的衬托，苏格兰医生在麦克白夫人夜游一景中出场。此前的麦克白夫人坚强、诡异狠毒，激将麦克白弑君夺权，表明上淡定自若，但内心隐藏着深邃的痛苦与冲突并在梦游一幕全面崩溃。医生观察麦克白夫人秉烛夜游时徒然感慨“反常的行为引起了反常的纷扰；良心负疚的人往往向无言的衾枕泄漏他们的秘密；她需要教士的训诲甚于医生的诊治。”“这种病我没有法子医治”<sup>[4]71</sup>。作为行医治病的医生坦诚无力治好他的病人，似乎是对医学的揶揄，但实际上蕴含深刻。深重的罪恶感和灾难感使麦克白夫人“因为思虑

太过，继续不断的幻想扰乱了她的神经，使她不能安息”。第三幕中，麦克白问道：“你不能诊治一个患病的心灵，从记忆中拔出根深蒂固的忧愁，拭去脑筋上写着的苦痛，用些甜美忘忧的解药洗净那郁结在她胸间的危险东西吗？”医生答道，“那还是要仗病人自己设法的”<sup>[4]74</sup>。精神的疾病需要从精神入手，灵魂的救赎需要发自内心的忏悔以求宽恕。对于内忧外困、罪恶深重的麦克白，莎士比亚借医生之口为他指明了洗清灵魂罪恶的赎罪之路，但麦克白拒绝了，他直接斥责医生“把医药丢给狗子吧；我不要仰仗它”<sup>[4]74</sup>。信仰虚无的麦克白拒绝医治，彻底摒弃信仰和精神的救治，这是宗教信仰和精神救治在张扬的人类欲望前的颓败。

需要指出的是，莎士比亚的创作历程是个渐趋成熟的过程。早期莎剧中的医生很多不过是叙事策略，是借着医生的身份和形象另有所言所指。及至后期，一方面，自然科学逐步兴起，医学从基督教神学体系中剥离，并依据解剖学以及物理化学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为一门科学学科。神圣的拯救历史不再是历史的核心；相反，人类利用自然和控制自然的能力成了核心<sup>[5]</sup>。另一方面，莎翁思想中的人文主义向度和基督教向度逐渐融合。他的作品由早期的阳光明媚经由中期的乌云压城、风雨骤至，转变成后期的回归妥协而万物融融。《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中的萨利蒙医生出身高贵，珍视美德与医术。“美德与才艺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堕落的子孙可以把显贵的门第败坏，把巨富的财产荡毁，可是道德和才艺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朽的神明。你们知道我素来喜欢研究医药这一门奥妙的学术，一方面勤搜典籍，请益方家，一方面自己实地施珍，结果我已经对于各种草木金石的药性十分熟悉，不但能够明了一切病原，而且对症下药，百无一失。”<sup>[6]</sup>医生萨利蒙被塑造成兼具仁爱和神能的“上帝”。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生活矛盾的象征性处理，医生萨利蒙是莎士比亚塑造的精神和信仰救治的成功典范。尽管在当时的欲望和物质的双重处境下，医生萨利蒙仅仅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形象，莎士比亚还是利用这个文学形象成功的也是象征性的解决了信仰和物质的二元对立。莎士比亚特有的戏剧表现力给观众和读者保留了乌托邦理想的空间以及对人文主义精神非物质层面的诉求。

### 三、启蒙运动和工业社会时期的“医者”形象：医者和病人双重角色的困顿和纠结

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主义和工业社会进一步

高扬物质化和现世精神,特别是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学理性侵蚀和瓦解了宗教信仰使其沦落为形式外壳。医学领域日益倚重试验和实证方法,临床医学和解剖学使医生成为观察者和实验者。病人被客体化。医者和病人的关系不再是宗教意义上的救赎而是冰冷的实验和被实验,病人成了实验对象,医者也被异化为实验工具。此外,文艺复兴之后的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深化,医生经常处于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文艺复兴之前的宗教和神学意义上的“医者”形象不复存在。医生时刻经历各种矛盾的摧残,挤压,沦为或明显或隐匿的“病人”,担负着“医者”和“病人”的双重角色,不断忍受理想挫败后的孤独和煎熬。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医者”既是医生又是饱受欲望纠缠、深受物化和异化之苦的病人。这一矛盾的双重角色使他们总处于物质和精神错位的困顿和纠结之中,不是堕落于物欲苦海就是受挫于现实生活。很多“医者”在矛盾和挣扎之下由正常到疯狂,再现了启蒙运动之后特别是工业时期严重的物化现实所施与医者的影响。

乔治·艾略特的代表作《米德尔马契》中主人公利得盖特医生就是在欲望纠缠与物质压迫之下心生幻灭抑郁而死。年轻时利德盖特坚信:“医学事业有着广阔的前途,它是全世界最好的职业”。为了这个信念,他去伦敦、爱丁堡以及当时欧洲医学发展前沿中心巴黎接受专门教育,立志沿着维萨里、比夏等大师的足迹从事科学研究,希冀在病理学方面有所突破。更为可贵的是,他能“把科学和艺术看做互相沟通的事物,把知识上的收获和社会的福利直接联系在一起”,是个德才兼备的医生。他放弃首都伦敦来到外省米德尔马契立志要干一番事业,尽管他很清楚这事业“也并不能直接给他带来财富,甚至不能保证他得到优裕的收入”。但他年轻且抱负不凡,不愿沽名钓誉,不效法那些“一边揭露别人制造假药,一边出售有害的药水而谋取暴利”的伪慈善家。然而,金钱至上、道德贬值、信念动摇、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盛行的社会世俗最终摧垮了立志献身医学的这位理想主义者<sup>[7]</sup>。

“工业化带来了巨大的物质繁荣,可是同时却让人们付出了惨痛的精神代价,其中最让人痛心疾首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沦为赤裸裸的‘现金联结’,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自由放任、竞争供求关系的哲学来说明……在这种哲学中理想、真理与崇高的事物都已经死亡,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和无厌的贪欲……”<sup>[8]</sup>整个社会成了一张用现金联结的网。在这张网上,人与人之间因

着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错综复杂的关系。医生之间明争暗斗,政客之间尔虞我诈,谣言无处不在。资产阶级选举不过是代表不同利益集体或政治团体之间的角力,不谙政治之道的利德盖特自医院牧师事件选举后就被动地卷入到小城的政治漩涡中。他与资产阶级富家小姐米德尔马契市长的女儿罗莎蒙德的不幸婚姻更是让他陷入家庭囹圄。这位千金小姐的拜金、奢华和虚浮的直接后果就是一连串的开销。而这诸多开销象钳子一样把利得盖特钳住,使他背上沉重的债务,从此断送了他事业上的追求。而他所工作的医院最后由于投资人的丑闻牵连而被迫关闭。在债务的沉重压力之下一败涂地,利得盖特只好听任妻子摆布,放弃理想,迁居伦敦专给富贵闲人看富贵病。壮志未酬抑郁而死。

异化的物质世界里,上帝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作为上帝创作的医生的权威自然被消解颠覆。沦陷于现世之网中的医生利得盖特在社会矛盾的重重挤压摧残下,负担了医生和隐匿压抑的病人的双重角色。如果说利得盖特医生的悲剧是社会挫败的结果,那么杰基尔医生则是理性凌驾于人性、科技异化和物化人类的代表。当鲜活的生命被异化为科学实验的对象,医生和病人之间不再有宗教意义上的救赎关系而是冰冷的实验和被实验的关系,病人被看成了实验对象,而医者也被异化为实验工具。《化身博士》中的杰基尔医生最后的死亡就是这种这种异化的必然结果。杰基尔医生是一位受众人尊重博学多才的医学博士。在欲望与野心的驱使下,他把自己作为实验对象,用自己研制的分身药剂将自己的身心分离,善恶分别寄寓与两个不同的躯体,各自随心所欲,不受彼此的束缚与监督。但科学的理性最终坍塌,杰基尔医生身上的恶最终占了上风并且不受善的掌控。在一连串令人发指的罪行之后,杰基尔医生无法忍受罪恶的折磨结束了生命。科学理性与科学实验颠覆了生命、人性的本真意义,医生自己成了欲望与实验的客体。工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的物化成为常态。文学作品中的“医者”也就兼具上帝与魔鬼的双重身份,在上帝与魔鬼之间挣扎,以致疯狂而死亡。

#### 四、20世纪医者形象——异化的集体与边缘化的个体

20世纪是物质主义的全球化。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是这种全球化的开端,那么下半叶就是全球化的集中体现。随着科学创新和技术发明的突

飞猛进,从宗教神学统治下获得新生和自由的人们,又逐渐沦为先进科技的奴隶,西方社会发出“20世纪,人死了”的哀叹。在只见科技不见人的当下,社会文化严重异化,医学文化也深受影响,原本最富人类博爱温情的医学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和冷冰冰的机器,解剖学和临床医学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这是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成功的典范。医学从源头到重心,从横经到纵纬,从战略构想到具体措施,从运行策略到发展愿景,所关注的除了技术还是技术<sup>[9]</sup>。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文学中的“医者”总体上表现为更严重的“疾病”状态——现实的异化和信仰的坍塌使他们成为一个被异化的群体——功利主义的大多数,而那些极少数仍在坚守和搏斗的医者拥抱着破碎的信仰残片论为边缘化的孤独个体。

诺贝尔得主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阿罗史密斯》就深入刻画了医学界的这种现状。一个沉溺于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时代,医生为聚敛钱财、捞取功名而弃道德与不顾,欺骗、共谋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医生吉克博士就是这个异化群体的代表人物。罗斯科·吉克博士是医学院耳鼻喉科教授,十足的实用医学观的倡导者和鼓吹者,他扬言“扁桃腺在人体内存在,是为了给专科医生提供专用汽车的”<sup>[10]102</sup>。也就是说,医生为了多赚手术费,可以切除健康病人的某种可有可无的器官。在一次演讲中吉克博士说道:“知识是医学界最宝贵的东西,可是,如果你不能把他卖出去,它就一点用处也没有。而要把知识卖出去,你就必须首先使那些有钱人对你的的重要性留下深刻印象。不管病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你始终都必须对他使用点‘商业手腕’。你要问他,同时也要向他的担惊受怕的家属,解释你对他的病所花费的辛劳和心血,从而使他感觉到你已经或打算对他做好事,你做的这种好事比打算要所取得手术费用更重要。这样,他拿到你的账单时,就不会误解和抱怨了”<sup>[10]102</sup>。

吉克博士把他的这套实用医学哲学观毫无保留地灌输给了他的学生。其精髓就是把医学当作一种文化资本经营,把自身当作一种产品推销使用。吉克博士的实用务实使他在赚取钱财的同时,在仕途上亦顺风顺水,最终爬到有势力的泽西市新理想医疗器械和设备公司副总经理的位置。在告别演说中,他忠告学生:“真正有价值的人就不只是一个乐观处事的人,而且是一个受过哲学训练,特别是受过实用哲学训练的人。这样,他就不至于一味空想,成天大谈‘伦理道德’和‘慈善事业’。

尽管‘伦理道德’可谓冠冕堂皇,‘慈善事业’堪称高尚美德,他也绝不会忘记,不幸的是世人是依据一个人能够积蓄多少响当当的现金来评价他的。”<sup>[10]103-104</sup>作为医学教授,他没有向学生强调医学知识、认真诊治和对症下药的重要性,而是反复强调推销术,把自己成功推销给病人,赚取病人诊疗费。这种金钱至上的实用主义医学观是对医学研究、医生角色和医学人文精神的背离和异化。对于吉克博士等流,活着就是为了满足经济和物质的欲求,精神和理想是一片荒原,他们变成了纯粹的欲望机器,内在的乌托邦理想也压抑为零,

在这个荒原世界里,年轻的主人公——马丁·阿罗史密斯崇尚真理、献身科学、正直诚实。在重技术轻研究的医学院中,其他人不过是把医学视为成名致富的晋升阶梯,只有细菌学家戈特利布博士是他崇敬的对象,而从现实层面上来讲,戈特利布博士本身就是一个边缘化的不被理解的对象。“他甘愿清贫,埋头于纯科学的研究,探究各种细菌的物质组成和化学过程,探索它们的生存和灭亡的规律,以及那些经过其他生物学家的繁忙努力之后,大部分仍然还不为人们了解的基本规律”<sup>[11]22</sup>。从科学的宏观意义上来看,“他属于人类的大恩人之列,因为在以后的任何时代,无论那种结束大流行病或小传染病的艰苦尝试,都必须受到他的研究的影响。”<sup>[11]23</sup>可学生们视他为“实验室里的一个老而无用的家伙;他没有什么想象力;他株守在这里,而不出去见世面享受战斗的乐趣”<sup>[10]42</sup>。在这个功利社会里,阿罗史密斯处处碰壁,无所适从。在偏远小镇开业行医时,他建议预防天花,却遭到落后愚昧而又抱有偏见的村民们的讥讽,最后不得不离去。在担任市卫生局副局长时,他严格执行卫生法令,关闭不卫生的牛奶厂和焚毁肺结核菌蔓延的住宅,触犯了当地权贵富商,引起了开业医生们的憎恨,最后在权贵、富豪的夹击之下黯然下台。在位于纽约的全美一流的研究中心麦格克生物研究所从事抗菌素研究工作时,又遭到心狠手毒、追名逐利的所长——伪君子霍拉德博博士的排挤,马丁走投无路,最后逃到佛蒙特州荒无人烟的大森林中,用两间小木屋建成简陋实验室,从事纯科学的研究。当盈利主义、尔虞我诈和追名逐利在医学界大行其道时,违背医学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奉行实用主义医学观,背离传统医学人道便是医生群体的整体面貌。这种利己主义、金钱至上主义是对医生的身份意识和具有崇高神圣色彩的医生形象的彻底异化;而落寞孤单、边缘化的人物阿罗史密斯仍抱着梦想的碎片,执着的追求科学理想,这是绝望中的

希望,是作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得已的文学虚构。从文学接受角度来说,医生阿罗史密斯的角色反映了人类对理想医者的诉求,刘易斯通过阿罗史密斯表达了人类对医者的信仰和精神回归的渴望。

然而,理性主义与机械主义使人类更大步迈向物化,欲望的争夺、野心的满足最后招致灾难的再次降临。人类精神荒原化,上帝的光辉与灵性不复存在,人类退落成一座华丽的坟墓。随着绝对主体主义及世俗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泛滥,人本主义逐步走向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最终导致自我解体。沉溺于物欲横流之中,人只不过是精神世界彻底沦丧的行尸走肉,医生的生存也失去了意义。《第22条军规》中的丹尼卡医生就是这种物化代表。丹尼卡是驻扎地中海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的军医,他意识到战争就得有牺牲,但他不想作任何牺牲,只想发财。作为医生,他一再宣称“治病不是我的事”,对物欲的追求却无所不用其极。他讨厌飞行,又想领取飞行津贴,于是处心积虑地哄骗连长把他的名字记入飞行日志以套取飞行津贴。由于他的名字出现在一架失事飞机的飞行人员名单中,他被“死亡”了。丹尼卡的“死亡”预示着纯粹物质主义的必然结局,是对现代人以及现代医疗的某种警示,亦是对现代医生生存方式、价值体系的颠覆。

## 五、结论

文学作品中“医者”形象的演变折射出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医生”形象从文艺复兴前神话学和神学襁褓中的婴孩,经过文艺复兴时期神性与人性的挣扎以及工业革命时期“医病”双重角色的困顿与纠结最后到二十世纪的集体的异化,经历了去神性化的过程和日益物化的演变。医生在现代社会

的困境也给我们指出了医学领域的的新视角:单纯的生理治疗或心理治疗都不能更好的使人类从病痛中解放心灵,实现身心健康。人与自然的和谐,信仰的建立,精神与肉体的统一才是医学精神的实质,也是人类寻求自我医治的唯一有效路径。通过对经典文本中“医者”形象的辩证历史解读可以汲取医学领域以及社会生活领域极为重要的精神财富。

### 参考文献:

- [1] 罗伊·波特.剑桥插图医学史[M].张大庆,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 [2] 圣经《旧约》[M].南京: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2008.
- [3] 圣经《新约》[M].南京: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2008.
- [4] 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卷三)[M].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 [5] G·希尔贝克,N·伊耶.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年世纪[M].童世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6] 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卷四)[M].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338.
- [7] 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外省生活研究[M].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40-145.
- [8] 袁英.《米德尔马契》:伦理关怀与道德寓言[J].外国文学研究,2012(1):68-74.
- [9] 箴加禄.昝旺《医学文化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248.
- [10] 辛克莱·刘易斯.阿罗史密斯[M].李定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 [11] 杨海鸥.从《阿罗史密斯》看美国医学文化的实用哲学观[J].学术探讨,2010(4):22-24.

〔责任编辑:吴晓红〕

# 五河民歌过渡性的时空特征辨析

朱家席

(蚌埠学院 学报编辑部,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作为明清民歌的现代传承之一,五河民歌与明清民歌二者间具有很强的艺术关联性。同时,由于五河民歌所处的特殊地域,它既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润,也受到吴楚文化的渗透,体现出明显的地域过渡特征。因而,从审美风格上看,五河民歌兼有北方粗犷豪迈之壮美气韵与南方细腻缠绵之优美风韵。

**关键词:**五河民歌;过渡性;时间;空间;地域

**中图分类号:**I27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86-04

## The spatial – temporal trans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Wuhe folk songs

ZHU Jia – xi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s, Bengbu College, 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dern inheritances of the folk songs during Ming – Qing Dynasties, there is a strong relevance between Wuhe folk songs and the folk songs during Ming – Qing Dynasties. Meanwhile, due to its special location, Wuhe folk songs embody distinct transitive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influenced by both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and Wu and Chu cultures. S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style, Wuhe folk songs assume the straightforward style of Northern China and the delicate style of Southern China.

**Key words:** Wuhe folk songs; transitivity; time; space; region

安徽省五河县地处淮北平原与安徽中部丘陵地带之交汇处,因淮、浍、漴、潼、沱五条河流穿境而得名,且紧邻京杭大运河,东西、南北交通可借舟船之利,十分方便,其文化过渡、交融现象十分明显。五河域内无高山大川,因此少有山歌流传,而以其独具特色的民歌小调享誉国内,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曲《摘石榴》红遍大江南北,老幼妇孺皆能哼唱。2001年,在广西南宁市举办的国际民歌艺术节上,来自安徽省五河县的民歌《摘石榴》、《打菜苔》双获金奖。基于对具有中国古代民歌代表性的《明清民歌时调集》与五河民歌的对比分析,探讨五河民歌因其独特的地域性展示出来的典型的过渡性时空特征。

## 一、历史过渡性特征

中国古代民歌的起源为《诗经》中记载的古歌

谣,其后绵延经历了楚辞、古今乐府、古代戏曲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俗曲的影响等流变过程,其名称与形式也在不断变迁演化。明清民歌时调是明清时期诞生的一种音乐性文学新样式,向上溯源,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这些市井俗调,它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有着充分的缘由,并以特定的人文思想意识和社会背景为衍生条件<sup>[1]</sup>。一般认为,明代民歌在初始时期对南方民歌具有很明显的导引作用,从李梦阳“真诗乃在民间”论断来看,冯梦龙等编辑整理的《挂枝儿》、《山歌》等受到北方民歌的影响不容忽视。沈德符《野获编》之卷二十五“时尚小令”条,其记有:

自宣正至成弘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今所传《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鬏髻》三阙,为三牌名之冠,故不虚也。

收稿日期:2012-10-03

基金项目:蚌埠学院淮河文化研究中心项目“明清时调与五河民歌渊源考述”(BBXYHHWH2011B05)资助

作者简介:朱家席(1972-),男,安徽灵璧人,文学硕士,编辑,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靡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年以来，又有《打枣杆》、《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入心腑。其谱不知从何来，真可骇叹。

由此可见宣德至弘治年间，《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等民间小调已经开始在中原地区广为流传，而赫赫有名的《挂枝儿》等吴地民歌本是“北人长技”。五河县建制于南宋咸淳七年（1271），追溯其民歌源头，最早可见于明代天顺二年（1458）所修的《五河县志》。其“风俗”编记载：

除夕前二三日，小儿打腰鼓、唱山歌来往各村，谓之迎年。

三月建辰……清明，民间祭祀、扫墓，官祭历坛，请城隍出巡，百戏竞作，举国若狂，歌舞灯彩三日而毕。

第二条记载与如今安徽省五河县城每年4月5日起举办的清明庙会情况相吻合，足见当今的五河民歌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在民歌的融合过程中，五河因地理位置的原因无可替代地扮演着过渡性角色。明代洪武三年（1370），五河民歌逐步形成并开始走向成熟，加上明清、民国时期的快速发展，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左右，以安徽五河、蚌埠等地为中心，遍及皖、苏两省十几个县市的广大地区。这种情况与明代宣德至弘治以后，民歌的中心逐渐南移并实现南北合流不谋而合。

元代是中国古代戏曲走向成熟的阶段，但戏曲艺术与民歌的发展却是并行不悖，民间广泛流传的俗曲俚调在大量的元杂剧作品中也时见一斑。燕南芝庵在《唱论》曾经提及过“街市小令”：“成文章曰‘乐府’；有尾声名‘套数’；时行小令唤‘叶儿’。套数当有乐府气味，乐府不可似套数。街市小令，唱尖歌倩意。”<sup>[2]</sup>足见俗调时曲已经不是新鲜事物，在当时还是十分盛行、广受大众欢迎的。宣德、正统至成化、弘治时期，《锁南枝》、《傍妆台》等民间小调已经在中原地区广为传唱，直至嘉靖、万历以后时调民歌形成铺天盖地之势，中间已经过了一个漫长阶段的酝酿，终成喷薄之势<sup>[3]</sup>。

应该指出的是，明清民歌时调关于时间的界定

从字面上看是专指明清时期，但其实际内容所涉及的绝非明、清这样两个时代，之前之后的民歌小调也因为其强大的惯性而被纳入，最终成为一个集合，或称为一个总称。

根据李开先《词谑》中对明代民歌的分期，在第二阶段即庆时期，民歌趋于南北合流，而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时尚小令》：“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则以《闹五更》小调的风靡一时为合流的标志。而在更早一些时候，刘半农先生从法国国家图书馆抄录的敦煌曲子里，已经发现了“闹五更”的影子。无独有偶，正如傅芸子先生指出的那样：以“闹五更”为主题的歌曲在众多明代民歌选集里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词林一枝》中的《哭皇天歌闹五更》；《金瓶梅》之73回《潘金莲不慎忆吹箫，郁大姐夜唱<闹五更>》，就明确表明《闹五更》之存在。可见这一时期《闹五更》在民歌中已经广泛被应用，成为标题的一个常见的范式<sup>[4]</sup>，只不过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言的《闹五更》是民间更加广为流传的小调。

延至今日，五河民歌中仍保存了大量以“闹五更”为题材的小调，如《五更疼郎》、《五更情》、《五更盼情郎》、《五更盼郎归》等。其内容有劳动号子、秧歌（田歌）、小调等，以小调类的民歌较多，也最具五河地方特色特色。兹举几例，与上述内容比较，以示其渊源承递关系：

一更初，夜坐调琴，欲奏相思伤妾心。每恨狂夫薄行迹，一过挽人年月深。君自去来经几春，不传书信绝知闻。愿妾变作天边雁，万里悲鸣寻访君。……（敦煌曲子《五更调》）

一更里，教奴泪满腮，我好伤怀，呀！我好伤怀。斜倚帏屏呆答孩，手托腮，盼多才，不见他来，呀！不见他来。痴心只恐他忘旧，我好疑猜，呀！我好疑猜。想是冤家恋章台，恋花街，伴裙钗，把奴丢开，呀！把奴丢开。……（万历刊本《万曲长春》卷五之《汇选苏州歌叠叠锦闹五更》）

一更鼓儿敲，我的心里似（那个）猫爪子挠，思念我（那个）情哥哥（哩）不时朝那窗外瞧哇，只见树影摇摇依得喂，不见你那个细高挑。……（《五河民歌选》之《五更情》）

一（呀）更子里，月亮照花台，小奴家巧打扮，等我的情郎来。脸上就搽香粉，发间插金钗，对镜子上下照像，仙女下凡来，呀么哎嗨哟。……（《五河民歌选》之《五更盼情郎》）

由此可知，《闹五更》自始至终都是以表现出

男女主人公约会前的焦急等待、渴盼长相厮守为主旋律,充溢其中的是强烈的对爱的追求。周玉波先生将中国民歌的发展、进化分别以《诗经》、南北朝乐府和《挂枝儿》等为代表划分为这样三个阶段<sup>[5]</sup>,从时间概念上看跨度大,艺术形式跳跃性强,但其关于人类真爱、真情的表述却是高度一致的,仍然属于“元叙事”范畴。不同时代诗人在追求内容和形式在高度统一基础上形成的和谐是一致的,“对于人类来说,生命是自由的前提,而自由是生命的意义”,主体性的人的本质是自由,所以审美的快乐是一种体验自由的快乐,审美的经验是一种体验自由的经验,换言之,无论是什么样的时代,人们对于爱情自由的追求总是高度耦合的,用歌声传递、表达内心世界的方式不同而其实质则一。

中国古代民歌的文字表达形式和音乐风格是在不断演进、发生变化的,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民歌艺术形式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五河地处淮北、淮南、苏北、苏南交界之处,其语言、文化等方面既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南方吴楚文化的渗透,其音乐风格中表现出来的过渡性、融合性自然不难理解。

## 二、地域过渡性特征

民歌属于一种地道地道的口传文化,口传文化的最大缺陷在于在传播过程中容易遗失,这是古今中外很多国家的口头文学没有得保存和继承的主要原因<sup>[6]</sup>。同时,人们对民歌的欣赏与需求也是多元化的、动态变化着的,单一的样式必然会使人们产生审美疲劳和厌倦,在传播过程中容易遗失。近年来,对于文化融合的研究中人们越来越重视人口迁移因素的影响。因为在人口迁移中文化总是随之迁移,并与当地文化逐步融合,产生新的、更具生命力的样式。着从中国古代戏曲的变迁中可见一斑。

明初,朱元璋在定都于南京、凤阳、北京三地的选择上曾经出现激烈的争议,最终形成了三都并存的历史现象。凤阳作为龙兴之地的陪都之一,在统治者的政策倾斜下,经济社会得到很大的发展。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移民措施:“均浙直之民于江淮齐鲁”,洪武二十二(1389)年,“迁杭、湖、温、台、苏、松等民人往淮河以南滁、和等地耕种。”“夏四月己亥,徙江南民田淮南,赐钞备农具。”<sup>[7]</sup>大规模移民政策的实施,使南至苏吴、北达山东,大批移民的涌入并和原居民形成了有机的融合。移民先后带来了各地的方言,与当地语言融合积淀,最终形成皖中江淮官话。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文化空间的全

新构成下,五河民歌在不同文化基因中不断汲取倔强地生长,在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日趋成熟丰满。同时,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的水路,五河民歌也得以传播和发扬,实现南北过渡与融合。

民歌与方言、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联。江淮方言区由于地理位置南北分界的特殊性,也是南北文化交融的地区,江淮方言声调介于二者之间,民歌也同样呈现出南北兼具的旋律音调特色,简洁中有着婉转,爽朗中有着细腻。五河民歌的这种地域性过渡特征首先强烈表现在语言方面。明清民歌时调是纯粹的市民文学,口语化程度极高,包括俗语、谚语、成语、惯用语、歇后语、俚语等,与当时的文言化色彩极浓的书面语有着显著区别。例如,“俏”和“冤家”形成一个复合词,作为独立词根组合在一起,“俏冤家”并没有简单地将两个词根的表面意义相加,而是另外赋予了这个新词另外一层含义。“俏”字“峭”的省改,有貌美、俊俏、风度翩翩之意。“冤家”本意指仇人,在明清民歌中则是较多地表现为对情人的昵称,甚至是“爱之至极”的反语。这种情况在通俗文学作品诸如戏曲、小说中极为常见。在《民歌时调》中,频频出现“俏冤家”一词,据学者统计,共有 53 例<sup>[8]</sup>。

俏冤家,家去了,便无音信。你去后,我何曾放下心,那一日不着人在你家门前问。愁只愁你大娘子狠,怕又怕令堂与令尊。担惊受怕的冤家也,怎么来得这等艰难得紧<sup>[9]</sup><sup>[49]</sup>。(《挂枝儿·私部·问信》)

俏冤家,约定你三更时候。临行时,切不可被那人勾,访着实决不与你轻将就。非是我提防得你紧,怎奈你是个薄幸的囚,我若略放些的宽松也,你就别寻条路儿走<sup>[9]</sup><sup>[53]</sup>。(《挂枝儿·私部·紧防》)

此外,与之相近的还有“俏冤家进门来,我和你从长计较”(《挂枝儿·欢部·愿嫁》),“想冤家,想得我恹恹憔瘦”(《挂枝儿·想部·相思》)等。这种对情郎的特殊称谓在五河民歌也是十分常见的,如风靡大江南北的《摘石榴》中女主人公深情的表白:“昨个天我为你挨了一顿打,今个天我为你挨了一顿骂,挨打受骂都为你小冤家哟!”在似嗔非嗔的倾诉中,将自己忠于爱情、不怕受苦的决心表露无遗<sup>[10]</sup><sup>[26]</sup>。

在当代歌谣中,大量使用带有文言色彩的“奴”、“小奴家”、“小奴奴”等词汇的情况除五河民歌以外是很少见的,如“三更天奴在房中来祷告,可怜奴四脚无力实实难熬”(《正反十

字》)<sup>[10]42</sup>、“忽听门外情郎哥哥来哟,小奴干哥哥我双手把门打开呀”(《打牙牌》)<sup>[10]51</sup>、“姐在南园摘石榴,哪一个讨债鬼隔墙砸砖头,刚刚轻巧砸在小奴家头哟”(《摘石榴》)<sup>[10]26</sup>。这种“非贬义”色彩的自我称呼,集中地体现了五河民歌对明清民歌时调的继承,被打上了深深的历史印记。

综上所述,五河作为皖北的门户,水陆交通便利,毗邻洪泽湖、高邮湖、大运河,南来北往可借舟楫之利。因其处南北交汇,五河在明清时期的地理沿革上情况错综复杂,语言、文化既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吴楚文化的渗透,其民歌风格既有着淮北的粗犷豪迈、壮美大气,又有着明显的吴侬软语之风韵,过渡性特征十分明显。这种本土的民歌多源于乡野百姓的日常生活,凭借着独特的地域、民族风情和不可替代的乡土魅力而顽强地一代又一代延续生存下来,它凝聚了人们对本土文化的一种情感上的认同,也包含了当地最大多数的人群音乐审美兴趣相互碰撞后的融合。

五河民歌以淮河流域民风流俗为根,兼容并蓄而独树一帜。它虽然深深打上了南北文化碰撞、融合的印记,但最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以其独特魅力赢得人们的喜爱。它是五河人民真实生活的写照、五河风俗民情的再现,也是中国民歌文化的重要构成,自古以来始终扮演着民间文化传承桥

梁的角色。

#### 参考文献:

- [1]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下) [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760 - 761.
- [2] 燕南芝庵.唱论 [M] //傅惜华.古典戏曲声乐论著丛编.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57:10.
- [3]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85 - 488.
- [4] 周玉波.明代民歌研究 [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5:53 - 54.
- [5] 周玉波.老情歌·老童谣·老民谣 [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5.
- [6] 王爱红,周红.从文化角度谈原生态民歌的兴起 [J].科技信息,2009(15):8 - 9.
- [7] 张廷玉.明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4:46.
- [8] 王丽坤.《明清民歌时调集》俗语词释例 [J].文化学刊,2009(4):96 - 102.
- [9] 冯梦龙.明清民歌时调集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0] 安徽省五河县文化体育局.五河民歌选 [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吴晓红]

# 俞樾诗歌谐趣化现象的审美探析

程 璐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 芜湖 安徽 241000)

**摘要:** 俞樾是同光年间著名的经学家, 他博学广识, 兴趣宽泛, 涉猎面极广, 在当时颇富盛名。然而, 在经学大师的光环下, 俞樾实际上还拥有古文字学家、教育家及文学家等多重身份, 除了那些备受世人推崇的经学及诸子学著作之外, 他在诗歌等文学领域亦有所造诣, 著述丰富, 不容小觑。作为清末著名的经学大师, 俞樾却热衷于“词章”之学, 其诗歌创作以诙谐的笔调和通俗的语句见长, 开辟了学者为诗的另一番天地。

**关键词:** 俞樾; 诗歌; 谐趣化

**中图分类号:** I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3)01-0090-05

Aesthetical study on the humorous phenomenon in Yu Yue's poems

CHENG Lu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Yu Yue is a famous scholar of Tong Guang period with a wide range of studies and broad interests. However, behind his glory as an eminent scholar, Yu Yue has also multiple identities of the scholar of ancient characters, educationist and writer. In addition to his highly respected academic works, he has also been accomplished in literature like poems. As the eminent scholar in latter Qing Dynasty, Yu Yue is keen on the study on “词章”, whose poetic creation, by featuring a humorous tone and colloquial language, opens up a new world for scholars’ writing of poems.

**Key words:** Yu Yue; poems; humorous;

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春试, 俞樾凭借一首“淡烟疏雨落花天”拔得头筹, 获得了曾国藩的赏识, 自此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之后或荣或辱的羁旅经历, 或喜或苦的自身感触都可从诗中得以窥见。俞樾诗歌的创作远远早于其经学著述, 且数量庞大, 著有《春在堂诗编》二十三卷、《曲园自述诗》、《小蓬莱谣》三部诗集, 编选了《东瀛诗记》、《慧福楼幸草》, 还有一些连篇的诗作如《咏物十一首》、《佚诗》、《吴中唱和诗》以及诗论散见于他的杂纂之中。俞樾写诗讲究“触景而发, 称心而出, 无不曲折而奔赴”<sup>[1]322</sup>, 因而其诗歌与深奥晦涩的经史著述不同, 喜用浅近的语言表达真情实感、书写生活百态, 甚至有相当篇幅具有诙谐化的特征。这些具有谐趣味的诗歌混迹于大量的述行诗和赠

答诗等传统诗歌题材之间, 绽放出其特殊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意蕴, 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 一、戏拟之笔与谐趣之意

俞樾以治经名扬天下, 而与此之外, 他的诗歌创作亦蔚为大观。尽管他自称:“自来经生多不工词翰”<sup>[2]64</sup>, 但这却丝毫没有影响他对诗歌的热衷。他的诗作分布极广, 除了有《春在堂诗编》、《曲园自述诗》、《小蓬莱谣》三部单独的诗集, 收入了大约二千余首诗歌外, 在他的散文、随笔、杂记作品中, 诗歌的影子也是随处可见。据粗略统计, 俞樾流传于世的诗作约有三千余篇, 其中还不包括他编选的《东瀛诗记》以及《慧福楼幸草》。如此规模的诗歌创作, 对于不以诗作留名的经学家来说, 可谓

是极其庞大。俞樾的诗歌涉猎极广,就诗体而言,涉及了四言、五言、七言古体、歌行体、五言七言律诗以及五言、七言绝句。就题材而言,有述行诗、赠答诗、叙事诗、咏物诗等。而有趣的是,这些传统题材在俞樾的笔下,却散发出异样的光彩,特别是叙事诗和咏物诗,它们不再仅限于单纯地记事写物,反而多了一层情感色彩,还常常以谐趣蕴含人生哲理,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情感是具有诙谐意味的调侃,是对传统题材的别样书写。

总体而言,可以将这种诙谐化的诗歌分为两类:

首先,是对生活琐事的幽默书写。俞樾认为:“诗论工拙,不论题之大小。”<sup>[3]682</sup>因此,在俞樾的诗歌作品中,生活琐事、日常用品都是最常见的题材。这种生活琐事诗大多是作者日常“自娱”之作,常以白描手法,笔调幽默且用语浅近平和,《清史稿》称俞樾诗风“温和”,大略是由此而来。这种温和的调侃使俞樾的诗歌充斥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如他的《剃头诗》,全篇370字,“通篇描写,颇为曲尽”<sup>[2]667</sup>,详细地描述了日常剃发的过程,用语浅近,多用比喻,显得十分有趣。俞樾选取了日常生活中一件极小的琐事——剃头,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对其进行描述,他将“虱与蚤”形象地比作是“山贼”,而将“剃头”比作“治山贼”,需“先除其道”。更是进行自我调侃,称剃头前“首乃如蓬葆”,因此“惊走戛羹嫂”。全诗妙语连珠,将剃头的过程比作“天花飞”,甚至用典来加强诗歌的风趣意味,称“吾非陶彭泽,折腰亦弗恼”。剃头本是最平常的事情,而有趣的是,这些原本平凡无奇的琐细事物,被俞樾以一种幽默地方式进行书写,竟然变得生动起来,充满了喜剧意味。全诗虽然稍显冗长,但表现出的是一种怡然自得的生活情怀,是一篇典型的游戏之作。

这种作品大量充斥于他的诗作之中,《春在堂诗编》卷五《脚划船》<sup>[1]390</sup>将划船形象地比作“五指化作狮子王,一足跳学商羊舞。”卷十九《件儿豆腐歌》“杭州饭店件儿肉,每肉一件卖钱六……”介绍了“件儿豆腐”的美味及做法,用语极为通俗浅近,此外,其诗还展示了俞樾和友人之间的“斗菜”之趣,先是友人许信臣向俞樾“夸口福”,他尝过之后,指出自家做的豆腐干更美味,大家都抢着吃,“应比件儿豆腐好”。卷四《戏咏西瓜灯》讲述了制作西瓜灯的过程,体现出作者的生活情调。“一场瓜战夜初停,幻出团团满月形。圣火养成千岁绿,仙丹炼就十分青。”俞樾风趣地将吃西瓜比作“一场瓜战”,将勺子在西瓜上挖出的痕迹比作“团团满月形”,使得吃西瓜这件小事变得有趣起来。此

类生活琐事诗常以选取的事和物命名,笔调诙谐幽默,将生活中的小事写得妙趣横生,虽然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但反映的则是作者日常生活的情调,平凡却更加生动有趣。

除了对平凡事物的幽默书写之外,俞樾也擅长对新奇有趣的事物进行诙谐的解读。作者往往着眼于生活中所见所闻的新奇事物,以此作为题材,用“戏笔”、“戏拟”的形式对它们进行解读,较之平常的咏物叙事诗,多了一种“新鲜奇妙”的意味,更增趣味性。卷二《予来新安问字,诸君日有至者,而方言不同相对无语戏作此诗》以方言不同,不能交流这件趣事为题材,先是风趣地指出各地方言的差异“周客不知鼠,楚人不识虎”,然后描述了两人对面无言的尴尬场面“欲言未言先咷嘴,似解不解两齰齰。”诗末付之一笑“君不见公羊作传语则齐,淮南着书音则楚。尤胜一声棱等登,口作筝声不成语。”鲜明地表现出两人因方言的差异,试图说话又怕对方听不懂,焦急的重复“eng”的音(“棱等登”皆是“eng”韵),如同筝的声音一般。这首诗风趣幽默地讲述了生活中的一件趣事,让人闻之发笑,诗末的拟声字极为巧妙地调侃了两人,充满了诙谐喜剧的意味。俞樾喜“奇”,他曾作《征求异闻启》并附小诗“郭冲五事太寥寥,戏学姚崇十事要。不论搜神兼志怪,妄言亦可慰无聊。”<sup>[4]</sup>这种尚“奇”的爱好在诗歌中亦有体现,表现为俞樾对新奇事物的好奇。卷十二《乌目山人王朝忠所书细字歌》记载了在象牙、西瓜等对象上刻字的奇事,诗中描述众人见之惊愕的样子,亦引人发笑。卷十三《用西洋法照全家小像为赋一诗》“一老龙钟曲园叟,两行雁翅合家人。传神西法由来妙,照影东坡逊此真。”描写了新奇的西洋照相法,幽默地以东坡之画比照相之术,体现出俞樾对新奇事物的喜爱和接受。卷二十一《咏留声机器》亦是表现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和喜爱之情。

其次,友人间的游戏之作与自我调侃。除了对生活琐事的幽默书写之外,俞樾诗歌的诙谐化还体现在他与友人的唱和诗以及自我调侃上。俞樾交友甚广且热衷于以诗会友,和友人之间进行唱和。对于亲近的友人,俞樾常与之互相调侃,诗中往往充斥着幽默的情调。卷二《莲叔以咏古诗见示戏和四首》,作者选取咏古诗中四物,沧海君椎、祢正平鼓、李长吉锦囊和乐昌公主镜,以一物贯穿于史实之中,并且认为此物在历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组诗属于俞樾与友人之间的游戏,以严肃的语气,看似咏史,实则是幽默地调侃。《三潭印月旧有美人石,久沉水内,雪琴侍郎督健儿架木悬甃

扶而起之，戏调以诗》<sup>[5]1197</sup> 将西湖的美人石拟人化，把打捞美人石比作“美人扶起上秋千”，风趣幽默，足见俞樾和友人彭雪琴之间的谐趣。不仅如此，彭雪琴还写诗给俞樾，调侃道“石美人扶而不起，殆为小姑所妒。”俞樾翼日前去时，见美人石已被捞起，叠韵一首贺之曰：“美人扶起嫩寒天，想见彭郎喜欲颠。寄语尹邢休避面，小姑远隔路三千。居然罗靴步瑤滨，雾鬓风鬟妙入神。前日原非娇不起，美人怕作犯斋人（自注：前两日侍郎正持斋也）。”以此调侃彭雪琴，这组诗，构思奇妙新颖，风趣幽默，充分体现了俞樾唱和诗谐趣化的一面。

另外，俞樾还有一部分诗歌自我调侃，亦可见谐趣。这些诗大部分集中于五十岁左右，多数描写诗人垂垂老矣的感怀，但并无悲观的负面情绪，表现了俞樾的自嘲精神和乐观的心态。

“臣之壮也不如人，况复桑榆暮色新。霄汉雁行惭鲁卫，江湖牛耳愧齐秦。生看白日堂堂去，惟有青编故故新。自笑生平成底事，耦耕虚负旧乡邻。”（俞樾《自笑一首四叠前韵》）

“生平事事不如人，坐看烟云眼底新。鼠璞尚忧能误郑，羊皮何苦更干秦。明知身世交相弃，未厌形神两共亲。自笑飘摇无所着，海山兜率孰为邻。”（俞樾《自笑五叠前韵》）

“自笑羸疏潦倒人，敢将花样更翻新。笥中裘有卅年晏，箧中书无十上秦。捧檄迢遥怜弱息，倚闾辛苦累衰亲。一椽仍向吴中寄，病树萧条庐照邻。”（俞樾《自笑六叠前韵》）<sup>[5]1150</sup>

这组《自笑》诗表现了作者晚年时豁达的心境，不乏诙谐之感和自我调侃之意。另有几首《残牙》以老年落齿为题，亦是自嘲之作，但是较之《自笑》诗，纯属自娱的游戏，显得比较通俗浅易。

俞樾诗歌的诙谐化不仅体现在诗歌的选材和情调上，他用语亦通俗浅近，带有鲜明的谐趣化倾向。这种语言的谐趣化突出表现在，引俗语入诗。卷十六《排闷偶成》“三春常是雨帘织，永画如年不卷帘。窗下喃喃猫念佛，床头唧唧鼠求籤。（自注：两句皆据俗语）但知精力随年减，未觉韶光遇闰添。今岁西湖好风景，酒痕襟上未曾沾。”<sup>[1]553</sup> 作者自注“窗下喃喃猫念佛，床头唧唧鼠求籤。”两句皆是来自俗语。卷十八《辛丑元旦》开篇“纔过鼠后即牛前。（自注：俗传有此语）”而下一篇《新年杂咏》7首也在题下注道“皆用俗语”。更有《缪

悠词》12篇“语音俚俗，意涉荒唐，殊非雅正之音，是谓缪悠之说。”

“一阵狂风一阵烟，八哥飞到画堂前。竟无大镬煎干海，尚有长人顶住天。臂上几曾能走马，腹中真见会撑船。何时刘海来相助，脚踏金蟾手要钱。”

“分明不是蜃中楼，一段风光一段愁。卧榻侧容人熟睡，矮檐底要客低头。戴将石臼跳难好，打破砂锅问未休。幸有肚皮弥勒大，送来都向袋中收。”

“花落安能再上枝，近来世事十稀奇。偷鸡已悔徒抛米，药虎何当自服砒。胆小常防雷劈顶，心粗又惹火烧眉。何堪再作回头看，张果驴儿莫倒骑。”<sup>[1]572</sup>

全篇皆化用俗语和俗传，“腹中真见会撑船”来自“宰相肚里能撑船”；“打破砂锅问未休”来自“打破砂锅问到底”；“偷鸡已悔徒抛米”来自“偷鸡不成蚀把米”等等。而作为正统文人，俞樾曾在《春在堂随笔》中为自己辩解道：“然则俗语所谓驼背者，昔人亦尝以之入诗……虽以俗语入诗，不免为大雅所笑，然亦有本也。”<sup>[2]156</sup> 尽管如此，这些俗语的出现，增加了诗歌的趣味性，更偏向市井百姓的审美取向。这种戏拟的心态和浅近的用语共同构成了谐趣化的现象。

## 二、平和之心与浅近之说

清代诗坛流派众多，“宗唐”与“宗宋”之争持续不断。对于经学家而言，从事诗歌创作的也不在少数，翁方纲的肌理说便是针对以“经术”、“学问”为本来作诗。俞樾虽然身为著名的经学大师，他的诗歌创作却偏离了学问。钱仲联称：“俞樾以学人为诗，但和晚清宋派诗人所标榜的学人之诗异趣。”<sup>[6]</sup> 不仅如此，如上文所述，俞樾的诗歌笔调风趣幽默，语言通俗浅易，有谐趣化的倾向。这位以经学为本的学者一反常态，与“学人之诗异趣”，其诗歌具有谐趣化倾向主要源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诗歌的戏拟与俞樾心态之关系。俞樾认为：“言出于人，其人不同，其言亦异。而世之世人执一以概之，徒见风人之辞微婉不尽，以为诗教固如是，是有风而无雅矣。”<sup>[3]34</sup> 也就是说，俞樾主张诗歌是生活的反映，情感的载体，诗作因为诗人学识、心境的不同而大相径庭。诗歌创作讲究“随笔”且“随意”，不假雕琢。因此，俞樾的诗歌大多是“触景而发，称心而出”<sup>[1]321</sup>，与他的生活心境息

息相关。根据俞樾的年谱,可以将他的生平大致上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早年游学游宦时期(1821—1857);二是罢免及避乱时期(1858—1865);三是苏杭讲学及晚年闲居时期(1866—1906)。尽管早年游宦颇多坎坷,中年又遇战乱颠沛流离,俞樾却总是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这种乐观的心态促使他擅于挖掘生活中的趣闻,能够在日常生活和平常事物上找到乐趣。在诗歌创作中,这种乐观精神得以发挥,呈现出谐趣化的创作情调。

俞樾的个性恬淡、随和,罢官之后更是无心官场,专心着书,他在《春在堂随笔》中写道:“(谢梦渔)尝语余曰:‘学问是一事,科名是一事,禄位是一事,三者分而不合。有学问者不必有科名也,有科名者不必有禄位也。’余深韪其言。”<sup>[2]141</sup>他主张“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sup>[2]143</sup>这种旷达洒脱的气度养成了他平和的心态,这种温和的心境使得他以轻松幽默地态度对待世间种种,表现为诗歌的谐趣化倾向,如《莲叔有红叶读书楼,客至则止宿焉。然宾朋彻夜更鼓,逼人每不能睡,戏作小诗以告主人》一诗<sup>[7]</sup>。俞樾在友人家里做客,但是晚上吵闹不能入睡,换做是别人,或者打道回府,或者直接找主人质问。俞樾却以诙谐的笔调写了一首小诗告诉主人,幽默地描述了夜不能眠的苦处,全篇无一斥责之词,而意思却一目了然。既然他是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那么他对待人间种种自然不会过于介怀,反而是一种诙谐地方式进行表达。这种乐观、平和的人生哲学是俞樾诗歌谐趣化的重要因素。

其次,诗歌的谐趣化与俞樾诗论之关系。俞樾的诗作颇丰,却很少有专门的诗论,对此,他曾作出了解释:

“余亲家翁彭雪琴侍郎尝劝余作诗话,谓‘君着书几三百卷,各种皆备,所欠说诗耳。’余因念比年来,江浙闲士大夫屡刻诗集者无虑数十家,不余鄙弃,刻成之后必以示余。若就其中刺取以为诗话,未使不足成书。而衰病相乘,精神疲荼,竟不能从事于此。”(俞樾《吴牧驹<小匏庵诗话>序》<sup>[3]1435</sup>)

因此,除了《湖楼笔谈》卷六有较集中的诗话外,他的诗论大多散见于《春在堂杂文》中。俞樾认为诗歌以博采众长为最佳,他在《张星阶<鸥榭诗钞>序》中赞道:“其诗出入唐宋诸名家,无斗器之习,无靡曼之音。格律清整似王魔诘;意味淡远如韦苏州;词旨敷畅似白香山;意思隽永似陆剑南……”又评《三十六桥可园诗钞》:“合杜韩韦柳而

炉冶之,以自成一家……而曲园又何以望之”<sup>[3]602</sup>他多次提到自己的诗作,称“然余自十五六岁始学为诗,至今七十有二,而所为诗终不外乎香山剑南一派,自愧诗境不高。”<sup>[3]601</sup>“诗格不高,终其身不能出香山剑南两家门径之中……”<sup>[3]114</sup>俞樾以白居易、陆游为宗,他的诗论也大多来源于对这两人诗作的解读和创新:

第一,俞樾主张通俗浅近,深入显出。俞樾的诗歌常常以谐趣化的外表包含深刻的哲理,用语浅近,但立意深远。俞樾认为:“世传白香山诗必老妪能解,而后存之,故流于率易,此不知诗者也。白香山使老妪解诗,正其经营惨淡之苦心也。文章家贵深入显出,惟诗亦然。使老妪读之而不解,必其深入而未能显出也……求其深而又深,又求其显而又显。”<sup>[3]601</sup>因此,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俞樾的诗歌常用白描的手法,且引俗语入诗。在题材和情调上,也部分迎合了大众的审美观,力求妇孺能解。而另一方面,诗歌的立意深远,极力避免过于纤佻,流于平庸无聊,从而呈现出谐趣化的现象。

第二,强调诗主性情,不假雕琢。俞樾在《汪穉泉诗序》中写道:“以诗主性情,言情之作入人尤易。”又称“余读其诗,沛然从肺腑流出,不见斧鑿之痕,诚亦香山一派。”<sup>[3]114</sup>他的诗歌主张随性而发,因此展现出他对生活的直观感受,而正如上文所说,他平和幽默地处世哲学自然表现为诗歌的谐趣化倾向。另外,俞樾主张诗歌讲究天然,不事雕琢,称“余性坦易,不喜作艰深语。”<sup>[3]573</sup>“余爱其语简而明,诵之,如见其物。”<sup>[3]1466</sup>因而,他的诗歌大多还原了生活的原貌,以浅近诙谐的语言,将生活中趣事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

第三,主张题不分大小。俞樾选材大多较小,他认为:“诗论工拙,不论题之大小。”<sup>[3]682</sup>效法陆游的闲适诗,吟咏日常生活情境,在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而这种诗意基于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往往具有充满诙谐的喜剧意味。又因为贴近生活,语言也较口语化,更增谐趣性。

### 三、诗歌艺术的审美创新

俞樾的诗歌兼采白居易、陆游的两家风范,以浅近通俗的语言,对日常趣事、友人交往进行诙谐幽默地书写,亦有一些自我调侃之作,具有诙谐化的艺术特点。这种诙谐化的现象是对作者平和乐观心态的表现,也是俞樾诗歌主张的载体,更是作者抒发性情的产物。这种谐趣化的诗歌意味无疑是俞樾诗歌趋俗的写照,日常事物、市井俗语以及对通俗文艺的观照,都增强了这种趋“俗”的倾向。

俞樾作为一名经学大师,却偏离“以学为诗”的旧途,尽管他的诗歌仍有一些考据之作,但仅仅是冰山一角。但是,俞樾诗歌的谐趣化绝不是毫无意义的自我调侃、以俗语、俚语对日常琐事喋喋不休地无聊之笔,更不是对诗歌法度、雅正之风毫无顾忌地撕裂和破坏。正如杨昌浚在《春在堂诗编》序中写道:“太史之诗,寓新变于法度之中,发神悟于意象之表,天才隽迈,绝去畛畦。骤读之,清奇秀拔,若古干之疏峭,而洪波之激荡也。”<sup>[1][32]</sup>在“深入显出”的心理暗示下,俞樾引俗语入诗,以诙谐的笔调来创作诗歌,但是,这种“显出”的背后是“深入”的本意,这就和宋诗的“以俗为雅”有些相似的地方了。

然而,俞樾诗歌和讲究法度以及力求“以雅化俗”的宋诗还是不同,“法度形成之后的稳定性可以规范诗人的创作,诗人循而行之,是共同的行为。情与意,则人各有其分际,是诗歌创作中最有活力的个性因素。”<sup>[8]</sup>俞樾诗歌以性情的抒发为特点,虽然以“深入”为本,又以“显出”为要,描绘的往往是闲适的生活以及调侃,更多地是“雅”“俗”的交融而不是“以雅化俗”。“求其深而又深,又求其显而又显,有一唱三叹之音而无千辟万灌之迹,合杜、韩、韦、柳而炉冶之。以自成一家。”<sup>[3][602]</sup>所谓“深”代表着诗歌的意蕴以及法度,所谓“显”则是性情的展现和用语、选材、风味的俗化。

由此可见,俞樾以自己的诗学创作实践,体现了他在封建末期的独特的诗歌美学。他的诗歌在

入“俗”的诗歌内容、语言和意味以外,暗含着“雅”化的底蕴;而这种“雅”化是和“俗”并存于诗歌之中的,两者之间的张力使得俞樾的诗歌更具艺术魅力。俞樾调和了学问和性情之间的关系,以“雅”“俗”并包的诗歌形式和意蕴,开辟了学者作诗的新境界。从这个角度看,俞樾在中国诗学史上的地位,有待于学术界的重新审视和定位。

#### 参考文献:

- [1] 俞樾. 春在堂诗编[A]//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 俞樾. 春在堂随笔[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 [3] 俞樾. 春在堂杂文(光绪九年重定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4] 俞樾. 右台仙馆笔记·序[M]. 山东:齐鲁书社,2004.
- [5] 俞樾. 吴中唱和诗//曲园杂纂(卷四十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50.
- [6] 钱仲联. 近代诗钞[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505.
- [7] 俞樾. 佚诗[A]//俞楼杂纂(卷三十六)[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97.
- [8] 刘诚. 中国诗学史·清代卷[M]. 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157.

[责任编辑:吴晓红]

# 中国“身体政治”的研究旨趣及其启示

王 华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南京 210095)

**摘要:**近年来,“身体政治”在国外的研究如火如荼。相比较于国外的研究趋势,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从历史文化、医疗生育与劳动生产等方面,对我国的身体政治的论著进行了一番梳理,并提出了后续研究的一些启示。毋庸置疑,在现代性的带动下,国内的身体政治研究必将呈现出丰富而多元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身体政治;研究旨趣;启示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95-06

## On the purports and revelations of China's research on "body politic" WANG Hua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body politic" is flourishing abroad. Compared with the foreign research situation, such research at home is just under way. Regarding the aspects of historical culture, medical & fertility, and laboring and production,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works on "body politic" in China and proposes some revelations for the follow-up research. Undoubtedly, motivated by modernity, the research on "body politic" at home is sure to exhibit varied and multiple tendencies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body politic; purport of research; revelation

虽然身体司空见怪,但却飘忽不定、难以捉摸。在某些社会趋势的推波助澜下,身体被公认为是具有重大社会意义与思想内涵的研究对象<sup>[1]</sup>。无论如何,社会科学领域依然对身体的研究表现出欣欣向荣的倾向,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一态势或许与工业化社会的兴起、发展不无关系。现代文明带来了工业化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转变、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消费主义观念与世俗生活方式的大行其道、女性主义的政治运动以及全球化因素的综合作用。特纳(Bryan S. Turner)总结了学界普遍的几种看法<sup>[2][36-46]</sup>。

第一种观念认为身体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在传统的人类学研究中常常存在这样的倾向,例如莫斯(Marcel Mauss)指出身体并非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娴熟载体,而是蕴藏着潜能。因此,所有“身体技术”都由各自社会构建的,并随时间的历久而演化<sup>[3]</sup>。这种观念对后来的戈夫曼(Erving Goffman)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脸面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戈夫曼强调身体是人们日常社会实践行为的关键要素,其核心焦点在于社会实践中的身体如何将被管理、塑造、控制,以符合期望的社会互动<sup>[4]</sup>。

第二种观念把身体视为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象征系统。作为象征人类学的经典著作之一的《死亡与右手》由《一项关于死亡的集体表象的研究》与《右手的优越:一项关于宗教两极性的研究》两篇论文组成。在《右手的优越》中,赫尔兹(Hertz)批判了人们头脑中以往的常识,认为右手优越于左手是身体机能本身决定的,而是强调了社会的集体表象对左右手二元对立的决定作用<sup>[5]</sup>。作为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重要人物的赫尔兹坚信,这种作用源自于原始思维里固有的神圣与凡俗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值得关注的是,文化人类学家在研究仪式、祭祀等的过程中将身体的象征意义进一步发展完善。他们明确地意识到身体在诠释传统文化与社会意义中的关键作用,道格拉斯(Mary

收稿日期:2012-11-20

基金项目: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的信任机制研究”(11YJC8400612012)资助;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社会意识整合中的身份构建问题研究”(12YJA701182)资助;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变迁中江苏警察执法观念转变的主体间性问题研究”(2010SJD840002)资助

作者简介:王华(1980-),男,江苏海安人,社会学博士,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讲师,研究方向:社会人类学。

Douglas)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她将污染(polution)作为研究的重点，并结合禁忌等问题非常出色地展现了身体的象征意义。认为身体是社会象征的“自然”承载体，体现着社会构成与解组的符号意义<sup>[6]</sup>。

第三种审视身体的方法将身体与权力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权力关系，尤其是微观的权力不动声色地透过身体加以呈现。生物性的实体已经渐渐退去，身体完全成为了权力形塑、控制、锤炼的对象，完美地呈现出社会意义的接收器的一面，俨然成了被驯服的工具。

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而言，何谓“身体政治”？洛克(Margaret Lock)在《培育身体》中指出：“身体政治是指对个体和集体身体的规划、监管和控制，它存在于生殖和性领域、工作和休闲方面，以及疾病和其他的人类反常状态中，与后结构主义思潮有关”<sup>[7]</sup>。事实上，“身体政治”不同于“肉体政治”(carnal politics)，它不仅仅限于肉体的物质层面，还扩展并延伸至的社会性身体的领域。其中的权力层面涵盖了政府与法律中的制度性权力，经济生产中的纪律处分权力，消费中的自由选择权以及谈判中的个人权力等等。当主体及其行动设法消减强加在身体上的权力时，身体政治便由此显现。可见，身体政治是一个围绕着身体、政治、文化为主题的研究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研究话题。

同时，身体政治也是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治理术的概念涉及治理与思维模式的结合体，它常常被定义为统治的艺术或治理。它不仅包括了政府的行为实践，还体现了被治理者的行动反应。因此，治理术不应该被单纯地理解为统治行为，至少还包括了被治理者的行为反馈。在福柯那里，治理术有三种意思，其中之一是“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计算和策略所构成的总体，使得这种特殊然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这种权力的目标是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配置”<sup>[8]</sup>。因此，治理术通过个体或集体的身体来实现自我的权力意志。与此同时，个体或集体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甚至反抗。这两方面的交织才完整地彰显了身体政治的独特魅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作品被认为是最出色的研究成果之一。他的作品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斩不断的身体通史。他努力向人们展示身体与施加其上的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福柯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生命政治”(bio-politics)<sup>[9]</sup>。他认为，社会微观权力潜移默化地渗透至身体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使身体全面笼罩在一个权力干预和知识教化的区域内。从酷刑、惩罚到规

训，再到监狱，权力话语的目标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从“有形的身”向“无形的灵”不断发生转换。规训身体的手段也不再赤裸裸地通过暴力实现，而是借由全景敞视的监控与欲望的激励来完成。

当然，身体政治必然涉及到性的课题。福柯的《性经验史》试图说明人类的性在反对性欲机制的过程中呈现了多样化的技能，以抵抗权力对性的压制<sup>[10]</sup>。毋庸讳言，福柯对身体的关怀超越了一般的意义范畴。而在对现代治理术的解读上，福柯则从具体的个体的身体转向抽象的“人口”，重点分析国家与人口的关系。通过这些研究，福柯想表明，权力已经渗透至人类社会更广阔的领域——权力不但对人们的日常活动进行管理与控制，而且还将对人口的生老病死给予规划与调控。

由此可见，福柯的研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丰富的启迪作用。不但如此，他还在潜意识里试图构建一种研究“身体政治”的独立的分析框架，目的是打算将有关权力与身体的一切研究统合于旗下。福柯的论述引发了学术界对身体政治的有关讨论，这些讨论可归纳如下。

## 一、历史—文化中的身体政治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对身在其中的人们具有渗透与内化力量。人们的身体因此而承载着一定的社会意义与思想内涵。黄俊杰<sup>[11]</sup>将人的身体作为政治权力的隐喻(metaphor)，并以此来论述国家等政治组织及其运行过程。他指出，中国古代“身体政治论”的特点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这种观念将身体推及的国家视为一个聚合性的有机体，并借助身体的隐喻来揭示国家的组织与运作。由此，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家们把政治过程看作一个人的身体由内而外的运行机制，并在这个运行过程中灌输了丰富的思想内涵与社会价值。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过程可看作是个体修身齐家的过程。

在讨论近代中国的身体观时，黄金麟将身体置于历史结构与国家欲望的重叠中<sup>[12]</sup>。他主要围绕三个基本问题：身体的历史变化、历史特性与危险性，以及普适的身体模式是否存在。因此，著者通过对身体的国家化、法权化、时空化来解读身体在近代中国发生的变化。在身体的国家化中，黄金麟列举了军国民、新民、新文化运动对国民身体的影响。身体的法权化经历了由传统的伦理律法转变成西方的权利法律，突出了法系的改弦更张对身体塑造建构的作用。身体的时间化是指，在西方钟点的精确时间逐渐取代传统时辰的过程中，人们的身体如何被进一步地控制与改造。而身体的空间化，是以清末民初各种学生运动的空间为场域，考察空

间与身体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上述两位的研究从宏观的视野讨论身体，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国家是如何操控身体、利用身体，以实现其政治意图的过程。令人遗憾的是，如此宏大的叙事难免无法体现出权力操控身体的精细一面，亦即权力无孔不入的特性没有得到彰显。细腻的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缺憾，他们认为权力作用于身体不仅仅是宏观抽象的，更多的是采取“潜入夜润无声”的花样。因此，他们的研究往往从微观的角度，对作用于身体的某个部位的权力进行不遗余力的挖掘。

在历史上，人们头上的植物——头发也常常与政治权力有着不解之缘，只不过前者成为了后者政治意图的表达。在《头发的故事——身体的政治》中，作者认为从清军入关的“留发不留头”到反清复明的“留辫不留头”，头发更是作为政治倾向的代言物。然而头发并没有随着革命的结束、朝代的更迭而烟消云散。相反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头发再次成为了红卫兵小将们的“专政”对象。“鬼头”、“黑帮头”、“阴阳头”统统都是被打成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以及“黑五类”分子的身体标志<sup>[13]</sup>。然而，著者并没有将视野局限在中国，还对其他国家，包括日本、法国、德国等类似问题也做了梳理和分析。因此，著者认为，身体原本是一个简单的形式而已，但政治的力量却将之塑造成极其复杂又有内涵的肉身事实。即使是不起眼的头发也在不同的时空中与权力丝丝入扣，而一抹毫厘的发梢也成了政治展演的舞台。另外，黎志刚的《想像与营造国族：近代中国的发型问题》、汪民安的《我们时代的头发》以及于闽梅的《一九二七：王国维的辫子》等都是这类研究的代表。

## 二、生育—医疗中的身体政治

人类的性爱、生育的本能与生俱来。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以生育权的名义亮相的本能获得了法律的确认与保护。但在某些国家中，人们的生育活动却受到了国家干涉，赤裸地暴露在权力的控制之下。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公开信<sup>①</sup>，号召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其理由是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国家“一胎化”的政策及其后果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讨论。

格林翰(Susan Greenhalgh)认为，建立在科学名义上的“人口科学”是帮助中国政府解决人口问题的合法话语。如果能够长期坚持实现一胎化政策，那么国家将能快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大目

标。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1970年代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论调。该论调通过测算人均指标，并将之与美日等发达国家做对比，最终得出中国的落后归咎为人口过多。因此，当政者认为人口急剧增长是国家落后的关键因素。在当局者眼里，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都与之有密切关系。因此，加强对人口数量的控制是实现新世纪经济目标(人均收入达到800美元-1000美元)的关键。因此，当政者们普遍认为，只有阻止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国家才能实现财富的快速积累、国家权力得到牢牢掌控、本国的国际地位也随之得以提高。最后格林翰指出，这些观点完全是对西方理论的误读。因为一旦将人口数量当作国家发展的累赘时，那么解决的方式可能是剧烈的，对身体的控制也必然是残酷的<sup>[14]</sup>。

在《中国人口治理》中，Susan Greenhalgh 和 Edwin A. Winckler 细致地考察了从列宁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整个过程中的人口政策。对于作者来说，治理术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生命政治”，这是一种管理生命的政治。其意图是关注人口的健康、福利、安全和财产的最大化；另一种是超越了旧式的主权国家权力，是一个三种力量结合而成的统治形式。这三种力量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机构、中间规训机构的治理以及个人的自我治理。作者认为，中国的治理术主要体现为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动员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做法(bureaucratic approaches)到邓小平时代的改革，逐渐达到顶峰并向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前进<sup>[15]</sup>。

可见，格林翰等人将19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大规模社会实验视为巨大的悲剧。虽然她对中国的生育政策作了很深刻的理解和剖析，但其观点主要侧重在国家对人们身体的治理(government)上，并没有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其他因素对人口政策的影响。也就是说，格林翰等人借由对中国人口政策的实施运行的分析，来考察当代中国国家权力是如何管制或治理民众以达到权力意志的。因此，可以说，虽然他们的研究视角值得学习和仿效，但是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仍然是值得商榷的。类似这些生育治理方面的讨论还有 Tyrene White 的《China's Longest Campaign》、Thomas Scharping 的《Birth Control in China, 1949-2000》等。

如果说对人类生育的控制充分体现了福柯的生命政治，那么这种对生命的管制将政治与治理结合起来。毋庸讳言，一胎化政策就是追随这样的思路，对生育一胎的夫妇给予积极鼓励，而对二胎却

<sup>①</sup> 见新华网，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4/content\\_2547034.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4/content_2547034.htm)

毫不留情地进行消极处理。由此可见,国家权力一旦与性、身体联系起来,便表现出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然而,身体政治并非一味否定性地压制身体,它还具备肯定性的鼓励作用,鼓励身体以特殊的方式适应并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这种劝导性的身体政治同样具有治理的威力,只不过变换了一种控制形式而已。为了探讨女性主体与客体化身体的话题,黄咏梅将研究的触角伸展至虚拟的网络减肥社区和现实中的胖妹家族这两个层面,检视以批评瘦身风潮、要求管制情色的“国家派”与强调塑身女体、主张情色女性的“市场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在这种典型的论争之下,黄描述了女性个体看待、管控、形塑自己的身体以及在此过程中的身体感受和社会体验。压制色情的论调与传统男权的意外合谋,使得市场逻辑煽动下的瘦身氛围遭到了一定的羁绊。然而“解放妇女团体”则展开反击,将塑身看作是对传统男权的反抗。无论是胖妹还是瘦身女性,追求性感是她们的一致目标。这也增加了其对生活、对自我的控制感觉,还成为了她们自身身体认同的源泉之一<sup>[16]</sup>。类似的研究还有赖英宏的《主体型构、能动性与政治抵抗——以国内塑身论战为例》、简忆铃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暴食症女性的身心政治》等。

无论是压制还是激励,人们都或积极或消极地以特殊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感受不同的身体经验,经历相同的身体政治。然而,对于有些社会现象,这种身体政治的解释却勉为其难。我们或许要引入“政治的身体”才能更好地加以理解。例如,在《走出乙肝:从身体的政治到政治的身体》中,邵京先生指出,在身体的政治里,行动的主体是统治者,客体是被统治者,治者主动施政于受治者的身体,因而身体的政治是一种治理术。与此相反,政治的身体首先是被政治化了的身体,而且是受治者主动施行的政治过程。作为主体的受治者对抗的是统治者、是强加在其身上的权力<sup>[17]</sup>。借此,邵京先生以一个乙肝的网络论坛为田野调查点,对身染乙肝的网络群体进行人类学研究。通常,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入学、入职等方面均遭受到了排斥和歧视。然而,这一群体借助相对开放的网络平台,构筑起他们自己的政治动员的社会空间。他们的身体也就自然构成了政治化了的身体。由此,该群体逐渐向特殊利益群体过渡,并提出他们的社会诉求。

可见,乙肝维权者们被动地形成了一个群体,但这并非是一个无助的群体。政治化了的身体使他们成为了一个左冲右突、不断征战的能动群体。不过,这一抗争的过程显得特别漫长且又无比艰辛。

时至今日,当突如其来的 SARS 来临之时,身体政治能发挥怎样的效果?国家、社会、民众又作

怎样的应对呢?汪民安以 SARS 危机为例,将身体拉到危机社会的前台。他认为人们的利益、身份、地位以及意识形态在危急中被摧残得体无完肤。人们历史性地撕下表演的面具,撤退到本源的身体层面。而医学的知识话语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科学权力。在它的指导下,城市被划分成若干小块,家庭被隔离成封闭的空间。从表象上看,处理危机的手段与福柯意义上的大禁闭有相似之处。然而,汪民安认为,今日的隔离不同与历史上的大禁闭。这种隔离是一种纯粹的身体禁闭。它是一种具有社会责任的牺牲行为、一种增进公共利益的公益行为。被隔离的人们在灵魂上毫无改造与忏悔之意,反倒觉得这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而做出的自我牺牲。毫无疑问,SARS 危机时期的个体身体被权力的眼睛监管得密不通风,尤其是那些感染者身体更是如此。这种得到了大众支持的权力轻松地转化成一双双犀利的眼睛到处搜索和抢救异常的身体,而非将它们残忍地消灭。因此汪民安认为,这是一次积极的权力干预。权力的对象并不是权力的敌人,而是服务的对象。此时,权力运作的目标是要将身体揽入安全的地界,保护他们<sup>[18]</sup>。关于医疗的身体政治研究,我们还可以阅览《药物治疗与身体经验: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我建构》、李舒中等的《身体、主体与疾病经验——医疗人类学的探索》、邵京的《边疆,道德,治理:以感染性疾病的控制为例》、郑丹丹的《身体的社会形塑与性别象征》等研究著述。

### 三、生产—工作场景中的身体政治

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离不开生产,生产也自然离不开劳动者的辛勤劳作。为了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雇主们往往对雇员的身体提出严格的要求。正如福柯所言,生产中的纪律用“温和—生产—利润”<sup>[19]</sup>的原则来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伴随着身体在生产领域的大量集聚,时间表、操作培训、检查、监视等治理技巧被工厂车间大量使用。在这种情形下,权力的压制手段在不断翻新变化。而雇员的身体也无情地被捆绑在忙碌的生产空间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着优质服务。

近年来,不断发展的服务业对从业人员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为此,霍克希德(Hochschild, A)曾提出“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的看法。该观点揭示了资本的力量通过制造微笑来达到情感管理的目标。可见,服务行业除了需要雇员付出体力和脑力之外,还需要他们将自己的情绪投入到生产销售过程。蓝佩嘉就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而对身体劳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sup>[20]</sup>。她认为,资本不仅对体力劳动提出要求,而且还严格控制身体转换成劳

动的不确定性，以防止不必要的成本上升。如此一来，现代资本的运作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所言的资本只是单方面地对身体进行压榨、剥削的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基于这样的看法，她将女销售员与顾客互动的情绪劳动作为考察重点。她强调，情绪劳动比制造产业内的体力劳动所受到的规训更加显著。为此，她把对女销售员的剥削的身体、规训的身体、镜像的身体、沟通的身体等多元身体劳动予以一一呈现。在此基础上，蓝佩嘉最终揭示出百货店化妆品专柜的身体控制与规训机制。这种规训与控制形塑了女销售员性别意识与阶级认同，并挖掘出男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配套话语在固化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由此可见，情绪劳动将人类劳动分离成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和情感劳动，有力地揭示了资本力量渗透至化妆品女销售员身体的嗜血本性。同样是研究女性劳工的潘毅，将国家、市场、父权等因素结合起来，立体式地审视三重大山之下的女性打工者的生存与抗争的事实。通过在深圳一家港资企业的田野调查，潘毅全景式地描述并分析了打工妹这个新型打工阶级的形成与解构。她认为在跨国资本进入社会主义中国的特殊阶段，作为从农村到城市的女性打工妹是一种新的社会身份认同。这种认同符合了国家转型、社会变革以及嗜血资本的需要。借助年轻女工身体的痛楚，尤其是女工的尖叫和梦魇，著者揭示了打工妹是如何被市场力量、现行体制和父权文化所蹂躏的。夜晚的尖叫与梦魇看似是个别女工个体化的行为，但却是整个女性打工群体都无法逾越的悲惨遭遇。这一社会事实也表明了她们对现实处境的强烈不满和无言抗争<sup>[21-22]</sup>。如此富有社会学想象力的展现让国家的力量、资本的嗜血本性暴露无余。与此同时，压在新三座大山之下的女性身体又显得那么无奈与悲凉。

不过，潘毅并没有将打工妹摆在一味逆来顺受，屈服于国家、资本、父权这三重大山的位置上，而是进一步展现女性在异化劳动和农村生活的夹缝中抗争的微观政治。著者吸收了德勒兹和瓜塔里关于“抗争的次文学”的思想，将打工妹可能的抗争方式概念化为“抗争的次文体”。她指出打工妹群体预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抗争主体的诞生，以及一场“沉默的社会革命”的降临。

通过打工妹对城市居民的衣着、体态、举止的刻意模仿与调整，朱虹论述了打工妹从进入城市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自身城市社会化的努力<sup>[23-24]</sup>。同时在工业标准化的规训和消费世俗化的诱惑下，打工妹逐渐积累城市社会知识和文化符号，找寻城市人的行为逻辑，建构自己“不求是个城市人，但求像个城市人”的城市生活世界，以适应现代城

市。与此同时，为了招徕更多的食客，城市餐馆对她们身体的规训也是其努力改变自身形象的压力所在。不管是积极的寻求模仿还是被动地无奈调整，这些打工妹们的身体塑造都为其自身积累了身体资本，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城市与农村社会等级的身体区隔的价值判断，以弥合等级化了的城市人与乡下人之间的身体图式。

同样是研究社会底层的秦洁，从身体经验的视角对重庆的搬运工群体“棒棒”的生计做了一番人类学考察，研究描述了“棒棒”在搬运物资时获得了各种身体技术，这些技术既是某些农村生产特点的遗留痕迹，又有在都市中人力搬运的新烙印。而“下力”虽然表现为搬运的身体动作，但也传递着身体感知与经验。在此基础上，作者围绕“下力”的身体感知及其身份意识的社会建构成分，探讨“经验之身”与社会观念文化因素的互构对其特殊身份地位形塑的影响，并揭示出他们的身份意识是痛楚经验的产物，也是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果<sup>[25]</sup>。因此，无论是生存的工具还是经受疼痛的物质性存在，“棒棒”的身体都可以视为身份区隔的社会意义之载体。相关的研究还有何潇、何雪松的《苦痛的身体：一位青年女性打工者的疾病叙事》。

#### 四、总结与启示

通过以上的归纳，我们发现这些研究存在一些共同点：

第一、以上著述都反对将身体当作一个纯粹的肉身看待，并强调身体是社会力量的产物。这是典型的社会建构论的身体观。这种观念认为，“人的身体特性被视为由政治、规范和话语等方面的规定与调控的客体对象”<sup>[1]20</sup>。这些研究著述或多或少受到了道格拉斯、福柯以及戈夫曼等人研究的影响。他们的研究领域或写作风格虽然各不相同，有的甚至风马不及，但都竭力主张身体承载着社会意义。这些意义是由个体所无法驾驭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所决定的。由此可见，身体政治中的身体是社会力量施加于其上的肉身载体。身体是一个消极的承受者和被控制者，同时也是社会结构关系的隐喻与表达。

第二、虽然说身体的身影朦胧、难以把握，但无论是抽象的身体还是具体的肉身，身体政治依然无处不在，形影相随。也就是说，社会结构的力量绝不放弃任何施加力量的机会和可能。从一胎化政策的实施到整形美容的选择，让我们看到身体经历了一个从否定性的压制到肯定性的激励转变。虚化的身体、实在的身体并不是如此重要，重要的是权力漫布在超越时空的社会背景当中。它往往不见首尾却又无处不在，不动声色却又雷霆万钧。

第三、纵然以上研究的关注重点不同,但大部分著述都一致地将生物性身体作为研究客体,考察权力与肉身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样的身体政治只囿于权力与肉身的勾连之中。毫无疑问,它的诠释效果受到了限制。基于这样的思考前提,这些著述往往忽略了对阶序性身体的刻画与分析。阶序性身体,简单地讲,就是一个社会中不同社会等级的人们的身体也被分为三六九等。在《阶序人》(*Homo Hierarchicus*)中,杜蒙(Louis Dumont)认为,身体是特定社会中承载社会文化的象征体系,并且与社会等级分类机制关系密切。“阶序”(hierarchy)一词意为,整体的各个要素遵循其与整体的关系来排列等级而使用的一个规则。在阶序原则之下,印度社会中的等级规定着人们的日常交往,婚姻、食物、身体触碰都受之约束<sup>[26]</sup>。这种社会结构的区隔构成了种姓制度的基础,区隔的身体又隐喻了等级结构的社会分类。因此,阶序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社会现象洞见和思路。

第四、在分析劳动生产中的身体政治时,绝大多数文献都离不开女性的身影。这完全得益于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的发展。她们一方面将身体作为男权、父权压迫的分析对象,另一方面又将身体视为资本用于政治运动与抗争。例如,以权力、性和身体政治为研究主题的亨利(Nancy M. Henley)认为,对于大规模社会控制和小范围的人际管制而言,非言语的身体行为是其最主要的手段。她指出人们日常生活互动的细微方面实质上都是微观政治的表达。而这些表达均用来维护现状,并构成某些重要却被忽视的社会控制的手段<sup>[27]</sup>。相关的研究还有 Rich, A 对强迫性异性恋的分析以及 Walby, S 对男权制模式的讨论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的研究拓宽了身体政治的研究领域,启发了后续以女性为分析对象的学术研究。

#### 参考文献:

- [1] 克里斯·希林. 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 [M]. 李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2] 布莱恩·特纳. 身体与社会 [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36–46.
- [3] Marcel Mauss.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essays [M]. Routledge, London: Routledge, 1979.
- [4] 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M]. 冯钢,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5] 赫尔兹. 死亡与右手 [M]. 吴风玲,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6] 玛丽·道格拉斯. 清净与危险 [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 [7] Margaret Lock. Cultivating the Body: Anthropology and Epistemologies of bodily practice and knowledge [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3 (22): 133–135.
- [8] 米歇尔·福柯. 安全、领土与人口 [M]. 钱翰,陈晓径,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91.
- [9] 米歇尔·福柯. 生命政治的诞生 1978–1979 [M]. 莫伟民,赵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10] 米歇尔·福柯. 性经验史(增订版)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11] 黄俊杰. 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 [M]. 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
- [12] 黄金麟. 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 1895–1937 [M].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
- [13] 郭春林. 头发的故事:身体的政治 [J]. 同济大学学报, 2007 (5): 90–99.
- [14] 黎志刚. 想像与营造国族:近代中国的发型问题 [J]. 思与言, 1998, 36 (1): 99–118.
- [15] Susan Greenhalgh and Edwin A Winckler. 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From Leninist to Neoliberal Biopolitics [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6] 黄咏梅. 塑身运动、厌食症到胖妹骄傲的思考——一个女性主体与女性身体的提问 [EB/OL]. [[http://www.cc.ncu.edu.tw/~csa/oldjournal/34/journal\\_park285.htm](http://www.cc.ncu.edu.tw/~csa/oldjournal/34/journal_park285.htm)].
- [17] 邵京. 走出乙肝:从身体的政治到政治的身体 [A]. 乔健:异文化与多元媒体 [C]. 台北:世新大学出版, 2009: 115–138.
- [18] 汪民安. SARS 危机中的身体政治 [A]. 身体的文化政治学 [C]. 洛阳: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3: 255–63.
- [19]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245.
- [20] 蓝佩嘉. 销售女体女体劳动:百货专柜化妆品女销售员的身体劳动 [J]. 台湾社会学研究, 1998 (2): 47–81.
- [21] 潘毅. 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 [J]. 开放时代, 2005 (2): 95–107.
- [22] 潘毅.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形成 [M]. 任焰,译. 香港: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2007.
- [23] 朱虹. 收割城市的女孩 [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 [24] 朱虹. 身体资本与打工妹的城市适应 [J]. 社会, 2008 (6): 153–175.
- [25] 秦洁.“下力”的身体经验:重庆“棒棒”身份意识的形成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0, 32 (3): 6166.
- [26] 路易·杜蒙. 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 [M]. 王志明,译. 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2.
- [27] Nancy M Henley. Body Politics: Power, Sex,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M].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 Hall, 1977.

[责任编辑:吴晓红]

# 媒介融合时代对体育新闻信息的再认识

吴月红<sup>1</sup>, 陈明珠<sup>2</sup>, 颜彦<sup>3</sup>

(1. 安徽工程大学 宣传部, 安徽 芜湖 241000; 2. 安徽工程大学 学报编辑部, 安徽 芜湖 241000; 3. 安徽师范大学 皖江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 给体育新闻信息的传播带来了新的传播语境, 其传播也出现了新的特征。分析了媒介融合与体育新闻信息的关系, 重点阐述了媒介融合时代体育新闻信息的采集、加工、发布和消费出现的新变化, 通过分析新变化从而达到对新传播语境下体育新闻传播的再认识。

**关键词:** 媒介融合; 体育新闻; 信息

**中图分类号:** G2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3)01-0101-04

## Re – understanding of sports news and information under the context of media convergence

WU Yue-hong<sup>1</sup>, CHEN Ming-zhu<sup>2</sup>, YAN Yan<sup>3</sup>

(1. Propaganda Department,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2.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s,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3. Wanjiang Colleg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arrival of media convergence has brought new communicating circumstances to the spread of sports news and information and some new features have occurred during the proces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edia convergence and sports news information, focuses on the new changes in the gathering, processing, publishing and consumption of sports news information, and, by analyzing the new changes, acquir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ports news spread under the new context of spreading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media convergence; sports news; information

信息时代的到来, 数字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给各种媒体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各种传播媒介相互渗透, 在发挥各自传播特点和优势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信息网络, 进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于体育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各类职业竞技和奥运会为主体的观赏性竞技和大众传媒的互动, 促使体育运动由传统的个人健康事业演变成以体育传播和体育消费为主体的产业门类, 同时也促使体育赛事转播和体育节目日益成为大众传媒的主要内容之一<sup>[1]</sup>。可以说, 体育及其相关新闻的传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在媒体融合的背

景下, 体育新闻信息的传播已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因此, 在当今语境下有必要对体育新闻信息的特征、传播进行再认识, 从而更好地促进体育传播事业的发展。

## 一、媒介融合与体育新闻信息

当今时代,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 媒体的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已成为媒体发展的新趋势<sup>[2][1]</sup>。“媒介融合”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 I. 浦尔教授提出, 指各类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 以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为代表的传统

收稿日期: 2012-11-10

作者简介: 吴月红(1972-), 女, 安徽芜湖人, 编审, 硕士, 研究方向: 体育传播学。

媒体和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还可以作为独立的媒体形态存在,通过不同的传播方式提供不同的服务;然而最近几年,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受众逐渐改变了其获得信息的方式,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的极大冲击,各种媒体开始调整自己提供信息的方式,进行内容的数字化,以适应受众的需求;另一方面,计算机数字技术、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也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数字融合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因此,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我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出现了媒介“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模糊或消失”的现象,出现了媒介间的交叉、混合,甚至出现了多种媒体汇聚在一个传播平台上进行信息传播的情况,这种媒介间边界的模糊与消失就是媒介融合。媒介融合主要包括媒介传播技术的融合、媒介平台的融合、媒介产品的融合、媒介企业的融合和媒介市场的融合,这些形成了新的传播语境,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各种信息传播活动都有了新的发展。

信息最广义的概念是,信息是物质的普遍属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运动形式。它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它在物质运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表述它所属的物质系统,在同其他任何物质系统全面相互作用(或联系)的过程中,以质、能波动的形式所呈现的结构、状态和历史<sup>[3]</sup>。新闻信息指的是新近发生的为公众所关注的具有新闻价值的社会信息。体育新闻信息是新闻信息重要的一类,是具有新闻价值的有关人类体育运动、健身活动及其相关方面的社会信息。

但我们要注意到的是,无论媒体怎么发展,都离不开信息的传播,发挥信息传播功能优势是其发展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托。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并没有改变新闻的实质,新闻依旧需要职业记者的发现和挖掘,依旧需要职业编辑的加工和编排,依旧需要通过媒体到达让受众接触到。它改变的是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接受方式。体育新闻信息作为新闻信息的一个独立类型,它遵循的也是这样的规律,体育新闻信息的传播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但其传播的速度和受众接受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因此,有必要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对体育新闻信息的传播进行再认识,从而能更好地把握体育新闻信息的基本特性,才能为更大范围实现信息共享、挖掘更高新闻价值提供更加优质的信息服务创造条件。

## 二、媒介融合时代体育新闻信息的采集

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使传播者可以更方便地

根据新闻信息内容的需要来选择和决定使用什么样的媒介,使得媒体与新闻信息能够更好地实现形式和内容的结合。体育新闻信息传播与消费,在当今社会大众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受到欢迎,越来越引人注目,成为对受众产生重要影响的媒体信息,它在获得新闻效应方面具有其他信息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体育新闻信息的从采集开始就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要求,出现了新的变化。

媒介融合时代,体育新闻记者的信息采集工具有了新变化。我们知道,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传播方式,记者的采访工具会因为媒体的传播方式不同而不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各种媒体记者的采访工具也出现融合的现象,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记者的采访工具已不再是简单的笔记本、钢笔、照相机、录音机或摄像机等单一的工具,而大多采用包括数字相机、数字摄像机和便携式计算机组成的数字移动采访设备和移动通信设备。这些设备的出现,使各种媒体记者采集到的信息都适用于多媒体加工。出现在伦敦奥运赛场的新闻记者,仅从他们的装备来看,你已无法分辨是传统媒体记者的还是新媒体记者。

媒介融合时代,体育新闻记者的信息采集方式有了新变化。实地采访是传统媒体记者最经常、最普遍使用的采访方式,虽然新媒体的不断涌现,但这一采访方式仍是各种媒体记者采用的基本方式。它要求记者亲临现场,与被采访者进行面对面的谈话或亲眼目睹新闻事件的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通过记者的深入采访、现场目击和认证核对,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正确性和客观性。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为新闻的采访提供了一个新的有力的方式——在线采访。在线采访主要借助网络技术和网络手段,利用如电子邮件、视频采访、搜索引擎等手段进行网络访谈、寻找线索、查找资料和查证事实等,现在已成为不论是新媒体记者还是传统媒体记者都广泛采用的一种重要的采访方式。传统媒体如电视在进行体育新闻报道时,已不仅仅只有实地采访的报道,还有很多现场连线的采访,更加丰富了报道内容。例如,伦敦奥运会男子乒乓球双打及单打冠军张继科夺冠之后,除了记者现场面对面采访之外,电视直播视窗中还出现了张继科家人欢庆夺冠的真情时刻。多视窗的使用、采访方式的拓展,使得受众获得的信息更加丰富立体。

## 三、媒介融合时代体育新闻信息的加工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新闻信息的采集能力上,但随着科技的发展,

新闻信息采集手段效率越来越高,新闻信息采集的门槛越来越低,不同媒体获得信息的来源有趋同的趋势,在此传播环境下想要以独家信息来赢得竞争优势已不太现实。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媒介融合时代,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已不是新闻信息的采集能力而将越来越让位与新闻信息的加工能力<sup>[2][40]</sup>。因此,在体育新闻信息的加工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媒介融合时代体育新闻信息的加工呈现多元化。国家广电总局明文规定网络媒体没有新闻采访权,中国现在的网络媒体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新闻媒体单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网络等新媒体的体育新闻信息是一种二线或二手报道<sup>[4]</sup>。传统媒体在体育比赛的一线往往派有强大的新闻采集发传力量。网络等新媒体体育报道一方面来自记者的一线采访,更多的来自网络编辑的选择、加工和整理。媒介融合时代,媒介如果依旧保持一元利用信息的方式,即采集来的信息仅为单一媒体服务,在竞争越来越激烈、信息价值越来越昂贵的情况下,一元式的信息利用方式效率太低。通过媒介融合的方式多元地利用信息,降低传播成本,提高信息传播效率,最大限度地扩大受众覆盖面,从而构筑强势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与央视国际网([www.cctv.com](http://www.cctv.com))、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国广播网([www.cnr.cn](http://www.cnr.cn))、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国际在线([www.cri.cn](http://www.cri.cn))在同一传媒旗下的整合性媒介,它们之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实现资源的共享和整合。

媒介融合时代体育新闻信息的加工呈现集约化。在现今社会,信息之间的联系不再是线性的、一元的,而是网状的、多元的。各种媒体在加工海量信息时,不再是以往传统媒体一统天下时的粗放的自然状态来呈现,而是对信息作出梳理与整合,体现出集约化,这点在网络媒体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新浪体育在做伦敦奥运报道时不仅千方百计集纳最广泛的信息源,取得视频播放权,还有除了横向采集的各种赛事新闻之外,还纵向存储历史体育新闻信息,并根据脉络进行归纳、分类,使读者既能了解事件全貌又便于检索。

#### 四、媒介融合时代体育新闻信息的发布

新闻信息的发布最大特点和魅力在于时间性和受众能了解的事件发生时的原貌的程度。新闻信息的传播与新闻事件的发生之间的时间间隔越小,新闻价值就越大,这是新闻传播的一个客观规律。同时,新闻事件的原貌也是受众最关心的信息。现今的语境下,体育新闻信息发布的核心要素出现了新特征。

媒介融合时代,体育新闻信息的发布越来越及

时,更新的也越来越快。体育新闻信息的时效性表现得尤为强烈,对于体育受众来说,一场比赛的结果,甚至一个比分的变化都让他们为之牵挂。因此,体育比赛的悬念和变数要求体育新闻信息要传播的更加快捷和迅速。体育新闻信息对及时性和动态性的要求,正好能够适用于不同的媒体平台的发布周期。网络的及时便利性使得体育信息的传递快捷迅速,网络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随时添加或更新最新信息,这在更新体育赛事新闻方面比传统媒体要方便的多。对于一些重大的体育新闻,广播、电视媒体可以在第一时间现场直播的方式进行传播,让信息直达受众,于是网络、广播、电视等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可以协同,满足受众对体育新闻信息即时动态的需求。例如伦敦奥运会期间,除了电视媒体的实况直播以外,各门户网站也在第一时间通过弹出信息提示窗口的方式,让受众及时获取第一手资讯。如腾讯通过QQ弹出信息提示,新浪、网易则通过网页弹出信息提示。伦敦奥运会中国射击运动员获得首金,均是新浪、腾讯、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抢先发布简讯,随后又推出了详细报道。不仅如此,整个伦敦奥运赛事期间,受众还可以通过PPLive等在线观看奥运赛事,中国网络电视台也凭借央视资源优势,从各个角度为受众提供相关赛事报道。

媒介融合时代,体育新闻信息的发布越来越高保真化。从历史上看,体育新闻的传播有“文字-声音-图像”的发展过程<sup>[5]</sup>,在此过程中,报纸、广播、电视分别从文字到声音,再到视频,信息的可视性不断提高。报纸文字静态的报道,到广播声音的及时传递,再到电视的现场直播,使人们能够跨距离跨时空欣赏到精彩的体育比赛,而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体育新闻信息向着高保真化发展。随着网络及数字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犹如宇宙中的“黑洞”,无论多少信息、多少内容,它都能够将其充分吸收和保存,完全摆脱了作为传统主流媒体的电视、广播、报纸等会受到时段、时长、版面及文字等条件的限制和束缚。体育新闻信息透过新媒体的传播,受众可以按兴趣选择性阅读。同时,按照新闻的主次、媒体的重视程度,新媒体也可通过字体、字号亦或动态形式引导受众,更能突出重点。不仅如此,轻点鼠标即可随时播放相关赛事视频,经过精心剪辑处理的运动视频片段更能够再现精彩瞬间,满足受众高层次的审美需求,并且能够反复播放,令人回味。可以说,凭借先进技术的支持,将特定体育新闻相关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及背景材料链接成全方位、立体式的整体,新媒体的传播越

来越全面多元化,其保真程度越来越高。

## 五、媒介融合时代体育新闻信息的消费

新闻信息的最终落脚点是受众的消费,只有经过受众消费才能体现出新闻的价值。

媒介融合时代,体育新闻信息消费呈现出消费的散点化。竞技体育以其紧张激烈、充满悬念成为体育媒体关注的中心,越来越成为体育新闻传播的主体,相比其他新闻信息,体育新闻信息的受众往往更具有强烈的随时随地获取信息的渴望。对于受众的信息消费而言,他们并不关注从什么媒体获得信息,而是更关注获得信息的方便度、低廉度和丰富度,在接触媒体时选择有利于自己接收的一种媒体。相比较传统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人们的体育消费更加方便,人们不但可以在公交车、出租车上收到移动电视播出的体育资讯,还可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各种移动多媒体终端获取信息,收看比赛。因此,消费者的信息消费场所越来越散点化,随时随地只要信息能方便获得,就能进行信息消费。

媒介融合时代,体育新闻信息消费呈现出参与式消费<sup>[2][36]</sup>。传统的体育新闻传播,信息的传播者居于主动地位,但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受众地位出现了新的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信息单向的消费模式,更追求双向互动的平等传播。在各种重大体育事件发生时,如世界杯、奥运会等,微博、博客、网络社区、即时通讯等新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07 年 12 月 18 日,央视网以 2000 万元获得北京奥运会大陆和澳门地区独家视频转播权,同时,央视网还可以对该转播权按照国际奥委会相关规定进行分授权<sup>[6]</sup>。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央视网共与国内 9 家商业性网站、170 余家地方和行业新媒体机构、中央及地方新闻网站及北京奥组委官方网站和 2 家移动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签署协议,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宽广的奥运传播平台,覆盖中国 95% 以上新媒体用户<sup>[6]</sup>。

媒介融合时代,体育新闻信息消费呈现出集合式消费<sup>[2][36]</sup>。受众从传统媒介的新闻信息的分割

式消费向集合式消费转变。人们已不满足从报纸、广播、电视、书刊的分而治之的消费方式,更经常出现的方式是体育信息受众们一边看电视里的世界杯直播,一边用手机或电脑编辑、发送、阅读微博,对体育信息进行集合式消费。如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即我们熟知的 NBA,赛事的直播过程中,受众不仅能通过手机发送短信支持喜爱的球队球员、发表赛事点评,还可以登录 NBA 中国官方网站或是央视网站与主持人、网友互动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受众获得的不仅是赛事实况详情,更包括与之相关的球员球队信息、NBA 运作内幕、以往赛事回顾甚至包括未来赛况的预测等等。

## 六、结束语

通过对体育新闻信息的采集、加工、发布和消费的再认识,我们发现媒介融合时代的体育新闻信息无论从特征还是实践来说,都更加适合多媒体的表现方式,因此,在体育新闻的传播过程中利用好多种媒体,发挥其各自的优势,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实现体育与媒介的双赢,才能更好地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 参考文献:

- [1] 许正林. 体育传播学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2.
- [2] 许颖. 媒介融合的轨迹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2,36,40.
- [3]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4.
- [4] 刘斌. 体育新闻学 [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0:257.
- [5] 杨剑锋,雷海平. 新媒体语境下的体育新闻传播新格局 [J]. 中国体育科技, 2012,48 (1):127 - 130.
- [6] 王晓东,刘万超,魏永. 北京奥运会互联网传播研究 [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0,33 (1):32 - 32,38.

[责任编辑:吴晓红]

# 中国广告史叙事范式研究

苏 杨

(安徽工程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经历了对广告历史现象初步归纳总结、系统研究、深入探讨的三个阶段,我国广告史研究进入了稳定成熟时期。针对目前研究现状,从广告史宏观理论构建、断代史理论构建、媒介技术理论构建、符号理论构建四个角度归纳和总结广告史的研究对象和范畴,明确广告史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确立明晰的广告史研究范式,从而对后世广告发展起到总结和借鉴的作用。

**关键词:** 广告史; 叙史; 范式

**中图分类号:** F71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3)01-0105-04

## Research on the narrative paradigm of Chinese advertisement history

SU Yang

(School of Art,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After undergoing three stages of preliminary summary,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phenomenon of advertisement history, the study on advertisement history in China enters a steady and mature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 the paper sums up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cept of advertisement history from the four perspectives of macroscopic theory construction, dynastic history theoretic construction, media technology theoretic construction and semiotic theoretic construction, clarifies the research method and concept system of advertisement history, and establishes distinct research paradigms, which are of referential val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ater advertisement history.

**Key words:** advertisement history; narrative history; paradigm

## 一、广告史研究脉络简述

我国广告学的研究相当部分是建立在对历史的归纳和总结基础上的。目前我国对广告史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 年以前),对广告性质认定和广告历史现象初步归纳总结。

对中国历史范畴下的“广告”一词的考证,丁俊杰认为“中国和日本等国对广告的认识晚于西方发达国家”<sup>[1]</sup>。祝帅认为在 1918 年之后“西学东渐”的语境中,现代意义上的“广告”观念才与商业结合,在“新学”中诞生<sup>[2]</sup>。伴随着对广告内涵的界定,广告史研究开始起步。戈公振认为“广告不仅为工商界推销出品之一种手段,实负有宣传文

化与教育群众之使命也”<sup>[3]</sup>。徐宝璜提出“广告者,乃有力之商业媒介……排除诲淫之广告,即虚伪欺人者,亦不收登,……深得社会之信任,商业因之颇为振兴”<sup>[4]</sup>。中国广告初见倪端就肯定广告的工商业性质,在研究者眼里,它还要担负相应的社会责任。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至 90 年代初),广告作为独立学科受到重视,系统研究广告历史开始起步。

对广告比较典型的定义是“广而告之”。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广告,面临传统广告向现代广告转型的历史任务,在 1979 年 1 月 4 日《文汇报》上刊登的《为广告正名》中,提出了“现代广告”的科学性,即“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来说,也可以用来促进产品质量,指导消费”<sup>[5]</sup>,丁允朋提出“社会主

义广告的特征”应具备“五性一格”,即思想性、情报性、真实性、科学性、艺术性、民族风格<sup>[6]</sup>,首先把思想性放在首位,提出广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同时期《人民日报》引用“太白遗风”做成为广告积极作用的历史佐证。此后,广告史研究日渐深入。许俊基提出,“中国广告史,是一部标志着中国商品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社会主义广告事业应“较系统地叙述社会主义国家广告史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历史传承轨迹规律,讲清社会主义广告事业与资本主义广告事业本质的区别及其特点”。“社会主义广告事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主义广告事业是积极向上的……树立了科学的经营哲学和经营观念,让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介入广告领域。”<sup>[7]</sup>

第三阶段(90年代至今),引进和借鉴西方社会科学方法,以史带论,对广告史深入探讨。

90年代自社会学研究方法引入后,较多学者认可从传播学、市场学、社会学等学科角度来认识和定义广告,对广告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做出更为科学的界定。突出了广告的商业功能,重视广告的实用性,探讨方向倾向多元。如黄勇、李名亮指出广告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sup>[8-9]</sup>。在此基础上,何修猛从广告的功能和侧重点差别入手,将广告的定义分类为劝说型广告观、传播型广告观、促销型广告观,并从广告的现象和表征作为现代广告事业和传统广告现象的主要特征<sup>[10]</sup>,肯定了媒介在广告史分期中的作用。郜明将广告定义为“将广告主的商品等信息,通过创意活动,由媒介而进行的视觉化大众传播。”<sup>[11]</sup>沿袭媒介变更作为广告史分期的节点,强调视觉传播为广告构架独特的语言形式,提出广告的视觉传播是推动经济发展、扩大文化传播和时代风尚的动力,重视广告的艺术价值。

## 二、广告史研究的困境及解决建议

庞杂的广告现象需要解释,广告史范式提供了寻找解释的方法。它可以合理地解释事物发展的规律性,预见未来广告发展更多的可能性,建立研究的形式和方向。与广告研究相伴相生的史论研究背后,由于广告学多学科背景的杂糅性,广告史研究范式仍然遭遇以下困境:

第一,研究对象的模糊性:与相近学科新闻学、编辑学史论比较,前两者以书籍、报刊等纸质载体记录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内容丰富、详实准确,研究对象具有专一性,涵盖采编、制作、发行等周期性文化生产和消费行为。与引进学科传播学史论相比,我国广告史研究对象既包括多种历史物证,依赖于

考古学发现;也包括广告活动和相关行为,依赖于对多种文献的整理与探讨。研究对象趋于多元,由此产生论述对象模糊的困惑。对遗存物证整理还未形成完善系统。诸如此类,导致研究方法的有限性,制约广告史下一步研究。

第二,广告活动的商业属性:与新闻舆论喉舌的政治功能、编辑出版的文化传承功能相比,广告是纯粹以商品销售为目的的商业推广行为。兼及传播学、市场营销学、公共关系学、社会学、心理学、设计学、美学等多学科知识支撑,相关学者往往出于对某一学科交叉领域的兴趣,对与广告史料的归纳和总结,结果往往是片段化、散落的记录。在实践中,广告活动的主体,无论是广告主,还是广告公司、广告媒体,广告行为都是为了推广产品的短期目标,对广告资料的保存和记录重视不够。同时,出于竞争的考虑,公司之间交流和出版作品的行为有限,限制了资料的保存和流通。

“广告的历史是广告人自己的历史,它应当由广告人自己来书写”<sup>[12]</sup>本着学以致用的原则,广告史的研究应对后世广告发展起到总结和借鉴的作用。以此为出发点,广告史研究一方面依赖考古的不断发现,另一方面应确立明确和完整范式指导研究,包括“确定的研究对象和范畴,一定的研究方法和特有的概念体系”<sup>[13]</sup>,在明确的公理或基本假定的前提下,广告史研究应以时间为轴线,以空间为纬线,对广告现象生动的编织和记录,其中精彩事件的记录,也对现代广告发展起借鉴作用。

## 三、广告史研究四种理论构建及学术意义探讨

范式是“用以指导观察和理解的模型或框架。它不仅形塑了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同时也影响着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些事物”<sup>[14]</sup>。广告史范式是从时间上对广告事实的解释与认定,并为观察和解读广告现象提供了不同的方式。系统梳理中国广告史的研究范式,可归纳为四种表达方式:

第一种,宏观理论构建。从历史演进过程中,以朝代更迭为表述阶段,寻找广告发展规律。大致可以划分为远古至周、秦汉、三国至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民国、现当代。从宏观角度研究社会制度、整个社会和社会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条件下,社会中经济阶层的关系、国际关系、社会集团和机构内部的互动关系,由此产生对广告的影响,讨论广告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增加广告史对宏观历史环境的依赖性,暗示着广告史与商品生产与销

售、民俗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需要在历史研究寻找符合广告行为的物证资料,从生产生活中筛选出符合中国广告叙史范围和叙史主题的表达内容。以通史形式构建广告史的基础性研究框架,按照时间顺序理顺广告发展脉络,并确立广告史的学科地位,但往往因为依赖整体叙述需要,导致系统性强而表述粗略。早期的广告史研究论述和教材编写普遍使用上述方法,如陈培爱的《中外广告史》、赵琛的《中国广告史》。浩瀚的历史海洋为广告史研究提供了无限的资源。同时,缺乏问题意识的史料堆砌导致论述浅薄,是以往广告史研究遭受诟病的原因之一,如北京大学陈刚对目前广告史研究的批评。因此,对中国广告史的研究应注重深度和广度。从学科多元知识基础构建的立场考虑,在研究中需综合其他学科知识,如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设计的角度、文化角度等,多方面、有侧重地细分和明确广告史研究重点和手段方法。因此需要学人作更加知识化、客观化、实证化的具体陈述铺垫工作。

第二种,断代史理论构建。对广告历史分阶段解读,从具体的时代背景下,讨论广告的意义、作用与特点。对广告史断代解读不再拘泥于整体叙事的格式需要,因而对特定时期广告的发展规律阐述较为深入,发现、并补充完善广告编年史研究中忽视的细节。大致可分为古代、近代、现当代,目前主要集中于明清及以前的招幌楹联广告、民国时期月份牌广告、文革时期政治广告、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商业广告、公益广告等。以断代史切入研究更符合我国广告阶段性发展的特点。对当时社会条件下,影响广告阶段性特点因素总结,可以发现特定社会条件下,广告的具体形态和特点,使广告断代史的构架更加清晰。有助于从中发现广告发展中的主导性因素,由此明确广告阶段性发展特色,发现时代为广告孕育的机遇。如余虹、邓正强的《中国当代广告史》,河南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古代商业广告史》、《中国近代商业广告史》、《中国当代商业广告史》,黄升民的《中国广告20年》,中国传媒大学的《中国广告猛进史(1979—2003)》、《见证中国广告30年》等,探讨改革开放30年的广告发展历程。秦其文《中国近代企业广告研究》从近代企业国货中的爱国话语、抵制洋货中发现广告与经济史的印证关系。陈刚访谈改革开放以来对广告起推动作用的人物,印证中国代理制发展的历史基础与规律,出版《当代中国广告史(1979—1991)》。

对断代史中事件的生动还原,使史论内容饱满丰富,叙述不再空洞干瘪,如周伟的《广告秀:一百年中的经典时尚——时代印记:穿行于中国百年报

刊之林》,由国庆的《老广告里的香艳格调》,展示民国时期流行于上海月份牌广告的特色,揭示当时海派文化与广告结合诞生的视觉表现形式;由国庆的《老广告里的岁月往事》中的民俗现象,是对广告历史和事件的新鲜解读,对现代广告的一些表现手段和策略方法也起到借鉴作用。

第三种,媒介技术理论构建。从媒介进步史中,寻找典型的代表案例的叙史主题,归纳广告史阶段性叙史范畴,从东西方广告媒介特征比较中,发现以媒介为载体的中国广告研究范式。如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雕版印刷广告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广告实物”,“近代广告发展的最显著的标志是报刊广告的出现”<sup>[15]</sup>。

从媒介技术角度看,中国是最早发明造纸、雕版印刷的国家。织造工艺、锻造工艺、陶瓷工艺、雕刻工艺遥遥领先,由此才可能产生世界最早的印刷广告、物勒工名、旗帜广告和形式各异的招幌、多种多样的音响广告,这与当时社会文明和技术发展状况密不可分。中国广告史也伴随着中华文明经历了所有时代:以吆喝、实物广告为代表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以招幌(坐贾)和音响广告(行商)为代表的封建社会,以印刷和近代媒介为代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到如今以具有多功能、互动性强的多媒体代表的现代社会。将媒介的进化论作为梳理的繁杂久远的广告现象的一种工具,为今天的广告和媒介发展起到启迪作用,更具科学性,是一种简便而明晰的表述方法。因为有明确的参照对象,通过比较与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广告不同于西方的特殊规律,对于突破长期以来西方经典广告理论对我国广告研究的隐性霸权,对确立中国广告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栋梁兄弟本着“引进、消化、构建”的愿望,在《20世纪上半叶:品牌在中国〈申报〉广告史料(1908—1948)》,采用比较研究法和内容分析法,了解“国际品牌”“前世”在中国的广告活动,比较他们“今生”在中国的广告活动,“比较同一时期国际品牌在中国与欧美投放的广告,可以超越地域的差异,洞察商业全球化与本地化的进程。……了解国民根深蒂固的文化与消费特征。通过这些系统的窥探、洞察,把握和总结,认清民族品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由此思考与判断民族品牌的未来之路。”<sup>[16]</sup>

建立于传播学基础上的媒介技术理论,借鉴相关研究方法,如观察、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比较、解释等,从媒体个案发展的规律中确定广告特色。对广告媒体历史的研究意义在于:审视每一种媒体的历史发展规律、其承载的广告文化能力和广告表现

式样,可以保存和优化各种传统媒体的优点,不至于在媒介进化过程中迷失自己,并发现新媒体的广告和信息承载能力的机会,对增强广告效果方法做独立思考。

第四种,符号理论构建。延续中国设计的主题和范畴,挖掘断代史中被忽视的内容,突出工艺规范和审美特色。这种表达方式适合于将广告归属于以服务为目的的工商美术性质。

从“反映原始人喜怒哀乐的图画文字、象形文字、保存原始人记忆内容的结绳,称为原始人‘史书’的贝壳串,以及反映原始艺术的雕刻、绘画、音乐、舞蹈都可以视为是原始的广告形态”开始<sup>[17]7-14</sup>。广告的社会属性中天然地掺杂了艺术审美的因素。中国民间的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寻人寻物启示,传递的也是民间娱乐和文化活动的相关信息,不可避免地受到作为整个民族的审美意识的影响。近代中国广告的产生,是新式商业经营方式演变趋新的结果。即使“现代广告虽令人眼花缭乱,但溯其本源,都是从这种简单的表现形式(原始商业广告,笔者注)演变而来的,所不同的只是采用了新的手段和工具,增加了一些表现的新元素而已。”<sup>[17]7-15</sup>广告视觉传播……在传递商品信息的同时,广告也在传递一种时尚、一种生活观念和一种丰富的艺术情感<sup>[18]</sup>。作为工商美术的分支,同时具备审美性和商业性,其研究范式也应具备以上特点。有鉴于此,中国广告史研究范式有必要确立以艺术的眼光和人文关照研究范式,结合媒介的进步与艺术审美特点、发生和演变的规律,给予更直接的文化形态和审美意识上的关照,对广告设计中体现出的中国特色给予更多的总结和解释,继而挖掘中国元素的内在特质,在中国与全球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对接过程中,用正确姿态展现中国广告的精神面貌,以视觉符号和文化符号表现中国的气质与文化。

## 四、结语

今天的故事是明天的历史,广告学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奠定了广告史范式和发展趋向。每种范式都提出对广告现象独特的假定,并激发不同类型的深入研究,丰富广告史研究的视野。归纳总结中国广告史范式,可以更加科学地理解中国特色广告发展规律,并起着承上启下的铺垫作用。在突破西方广告理论的隐性霸权、树立中国特色的广告理论过程中,那些凌乱和琐碎的历史“镜像”在慢慢交织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图景。对学者而言,对广告史范式的研究要以古为今用的研究立场,尝试对当

代和古代历史的融汇贯通。用新的发现完善和印证历史,并用生动的案例阐述历史,生动还原广告历史真相。在时代变化中发现中国广告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的特征,及商品生产和交换中持久稳定的民族心理,寻找对后世广告发展的启示和借鉴方法。

## 参考文献:

- [1] 丁俊杰. 现代广告通论[M]. 北京: 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7:2.
- [2] 祝帅. “Advertising”为何是“广告”——现代“广告”概念在中国的诞生[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9 (5): 88-94.
- [3]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湖南: 岳麓书社, 2011: 184.
- [4] 徐宝璜. 新闻学[M]//戴元光. 中国传播思想史. 上海: 上海交大出版社, 2005:118.
- [5] 黄艳利, 杨栋杰. 中国近代商业广告史[M]. 河南: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3.
- [6] 秦臻. 中外广告简史[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155.
- [7] 许俊基. 中国广告史[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1-3.
- [8] 黄勇. 中外广告简史[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3:4.
- [9] 李名亮. 广告传播引论[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4.
- [10] 何修猛. 现代广告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2-5.
- [11] 鄢明. 广告学原理与视觉传播[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8:2.
- [12] 国际广告杂志社, 北京广播学院广告学院, IAI国际广告研究所. 中国广告猛进史(1979-2003)[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292.
- [13] 戴元光. 中国传播思想史[M]. 上海: 上海交大出版社, 2005:414.
- [14] 艾尔·巴比. 社会研究方法[M]. 岳泽奇,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33.
- [15] 陈培爱. 中外广告史[M]. 北京: 中国物价出版社, 2002:27-36.
- [16] 林升栋. 20世纪上半叶: 品牌在中国《申报》广告史料(1908-1948)[M]. 福建: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1-2.
- [17] 杨海军. 中外广告史[M]. 湖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7-15.
- [18] 鄢明. 广告学原理与视觉传播[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8:9.

[责任编辑: 吴晓红]



#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AND TECHNOLOGY

社会 科 学 版  
SOCIAL SCIENCE

第 15 卷第 1 期 (总第 56 期)

中国 · 淮南

#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5卷第1期  
2013年3月

(总第56期)

Vol. 15 No. 1  
Mar. 2013

## 目 次

### 十八大学习专栏

- 高校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途径 ..... 谢振安(1)  
党内民主制度体系的科学构建 ..... 孙功, 颜杰峰(4)  
执政价值观: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 .....  
..... 卢少求, 程增俊(8)

### 经济管理

- 股票流动性的行业差异研究 ..... 孙方思(13)  
安徽省产业结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 ..... 周瀚醇(18)  
女性网购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与消减路径研究 .....  
..... 刘蓓蕾, 何莉, 钱黎春, 吴金南(22)  
基于云存储模式的非书资料管理系统 ..... 黄兴燕(26)  
从市场营销哲学的演变看高校如何应对新的毕业生就业形势 .....  
..... 汪煜(29)

### 中国新诗研究

- 读诗会:朵渔诗歌的当代性 ..... 王光明(33)  
“新与旧的适应”——重识戴望舒诗歌的“传统”和“现代”及其关系 .....  
..... 郑成志(39)  
废名对“含蓄”传统的再发现 ..... 罗小凤(46)  
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汉诗意象思维的发展 ..... 陈培浩(51)

---

本期执行编辑:吴晓红

---

**汉语研究**

- 山东章丘方言的语气词 ..... 高晓虹 (56)  
《汉语大词典》释义疏失六则 ..... 钱慧真 (63)  
道教文献语言研究与训诂学——以《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为例 ...  
..... 刘祖国,丁晓娟 (67)

**文学研究**

- 论《秘密花园》中哥特式风格的体现及作用 ..... 张颖,金爽 (71)  
词学批评“远”范畴的审美空间 ..... 郭守运,张嘉斌 (76)  
西方文学经典中“医者”形象的嬗变 ..... 宋萍 (80)  
五河民歌过渡性的时空特征辨析 ..... 朱家席 (86)  
俞樾诗歌谐趣化现象的审美探析 ..... 程璐 (90)

**社会学研究**

- 中国“身体政治”的研究旨趣及其启示 ..... 王华 (95)

**新闻传播学**

- 媒介融合时代对体育新闻信息的再认识 ..... 吴月红,陈明珠,颜彦 (101)  
中国广告史叙史范式研究 ..... 苏杨 (105)  
文后参考文献表中中国著者汉语拼音名字可否缩写? ..... (3)  
标有引号(或书名号)的并列成分之间用不用顿号? ..... (7)  
未出版的学位论文参考文献著录方法 ..... (12)  
姓名中“吕”的汉语拼音怎样拼写? ..... (17)

期刊基本参数:CN34-1217/C \* 1999 \* q \* A4 \* 108 \* zh \* P \* ¥5.00 \* 1000 \* 23 \* 2013-03

## MAIN CONTENTS

|   |   |
|---|---|
| On construction ways of learning, serving and innovative Party organizations .....  | XIE Zhen - an (1)                                       |
| On the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of inner - Party democratic institutional system .....   | SUN Gong, YAN Jie - feng (4)                            |
| Governing values: core elements about the governing culture of the CPC .....  | LU Shao - qiu, Cheng Zeng - jun (8)                     |
| Study on the stock liquidity of industrial differences .....  | SUN Fang - si (13)                                      |
| Grey relevancy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industrial structur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nhui province .....           | ZHOU Han - chun (18)                                    |
|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ubtraction paths of females' risk perception of online shopping .....  | LIU Bei - lei, HE Li, QIAN Li - chun, WU jin - nan (22) |
| Non - book materials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cloud storage pattern .....   | HUANG Xing - Yan (26)                                   |
| How to deal with the new graduate employment situation regarding the evolution of marketing philosophy .....                                      | WANG Yu (29)  |
| A poetry seminar: the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of DuoYu's poetry .....  | WANG Guang - ming (33)                                  |
| On the mutual adaptation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a recognition o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 in Dai's poetry ..... | ZHENG Cheng - zhi (39)                                  |
| Fei Ming's rediscovery of the "implicit" tradition .....  | LUO Xiao - feng (46)                                    |
| The development of imagery - thought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since the 1980s .....   | CHEN Pei - hao (51)                                     |
| Modal particles in Zhangqiu dialect of Shandong province .....  | GAO Xiao - hong (56)                                    |
| On the six misinterpreted words in the Chinese dictionary .....   | QIAN Hui - zhen (63)                                    |
| Taoist literature language studies and exegesis—taking the example of Zhou's Communications with Immortals in Dreams .....                        | LIU Zu - guo, DING Xiao - juan (67)                     |
| On gothic features and its function in The Secret Garden .....  | ZHANG Ying, JIN Shuang (71)                             |
| Research on aesthetic space of the category of "Distance" of Ci criticism .....   | GUO Shou - yun, ZHANG Jia - bin (76)                    |
| On the change of the doctor image in western literature .....   | SONG Ping (80)  |
| The spatial - temporal trans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Wuhe folk songs .....  | ZHU Jia - xi (86)                                       |
| Aesthetical study on the humorous phenomenon in Yu Yue's poems .....  | CHENG Lu (90)   |
| On the purports and revelations of China's research on "body politic" .....   | WANG Hua (95)   |
| Re - understanding of sports news and information under the context of media convergence .....  | WU Yue - hong, CHEN Ming - zhu, YAN Yan (101)           |
| Research on the narrative paradigm of Chinese advertisement history .....   | SU Yang (105)   |